

明代
云南文学研究



孙秋克二著



昆明理工大学出版社
昆明·云南·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 / 孙秋克著. — 昆明: 云南
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539-0

I. ①明… II. ①孙…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云南省—明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4923 号

责任编辑: 文艺蓓

装帧设计: 袁亚雄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
作 者	孙秋克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539-0
定 价	48.00 元

序

张文勋

孙秋克教授承担的“2008年云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代云南文学研究》已如期完稿并将出版，这是我省地方文学史研究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而且是一项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个性的成果。其学术价值不仅对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明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是极有价值的补充。云南地处祖国边陲，又是山高水远，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特定的历史和地域，使云南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明代云南文学的大发展，足以表明云南由于多种地域文化、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多元性和独创性特色。无疑这在中国文学大花园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独放异彩，构成中国文学整体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说起云南历代文学史的研究，最早出版的专著有《白族文学史》、《傣族文学史》、《彝族文学史》（楚雄彝族）、《纳西族文学史》等，这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调查研究的成果，而且都是关于少数民族个别文学史的研究。当然，这都属于云南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都不能替代云南文学通史。本世纪初，张福三教授等编写的《云南文学史》是第一部云南文学通史，这对云南文学史的研究，也算得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我曾为之写过序。通史要研究史的发展规律，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和作家作品的完整性，所以不可能对每个时代、每个作家都作深入研究和论述。孙秋克教授的《明代云南文学研究》正好弥补了通史研究的不足，她以断代研究的形式，对明代云南文学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其体例不受时间先后的历史顺序限制，可以作专题性的综合研究，也可以作考证式的个案研究，还可以就历史和地域的背景作专章研究。这样更有利于作纵横兼顾、史论结合的深入研究，为写通史提供更翔实的史料和理论依据。孙秋克教授的专著正是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三个方面的

研究尤为引人注目。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特殊历史到元、明时期，是云南历史文化大转型、大发展的时期，明王朝对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开发政策，使得云南在各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改土归流、屯田屯兵、兴学取士等等政策，使云南迅速扩大了与中原的沟通。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明代云南已全面融入中华大一统的格局，明代云南文化已全面纳入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中。所以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此其一。文学繁荣兴盛，表现在作家群体的出现和众多作品的产生，有大批著名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丰富多彩的作品，才能形成光辉的文学史时期。明代云南文学的鼎盛繁荣，体现在有了一大批灿烂的文学明星，他们的文学成就，在云南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开辟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足以与中原文学大家齐名、填补边疆文学空白的作用。明代云南文学作家群体的出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就他们的生平行实来看，有生于斯、长于斯、热爱乡土的本土作家，有许多来自省外的宦滇职官和一些被滴戍的著名学者文人，他们当中多数都告老还乡或弃职还乡，集中精力从事著书立说和培养后学的事业。还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世袭土司望族中，也有不少著名文学家，如纳西族的木氏家族，彝族的高氏家族等等。这些特殊的作家群结构，都以汉文化为核心构成多地域、多民族、多阶层的文化群星。作者经过精心研究，把明代云南作家群大致划分为六大类型，不仅可使读者对明代云南作家群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特色一目了然，还可以通过作家群的生平行实和文化修养，看到汉文化对滇文化的全面影响，以及以汉文字为载体的书面文学成为云南文学主体的历史渊源。此其二。作为云南省社科重点研究课题，孙秋克教授对云南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南明）的一批本土作家如高应雷、文祖尧、苍雪等作了专章介绍，并对他们的生平行实作了细致的考证和研究，附以翔实的创作系年。这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云南古代文学史提供了很珍贵的资料。对“平居陈郭”、王锡衮的创作活动的考证也是如此。此其三。

云南文学史就其内容的丰富性，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其多元文化的融合性，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对上述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故此，孙秋克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后的研究也提示了诸多新思路、新领域。至于云南文学的内涵，除了以汉文字为载体，以书面文学为主体之外，如何把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包括在整体云南文学之内？如何在文学

史上处理这些关系？这都是我们从事云南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应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大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固然与孙秋克教授的大著无关，但确乎是从她的著作引发出来的思考，所以特在序文之末顺便提出来。衷心期望孙秋克教授有更多研究云南文学史的新作问世。

2010年2月17日草毕

前 言

云南文学崛起于明代。在这块耸立着崇山峻岭，奔流着滔滔江河，鲜花盛开，百鸟欢唱的土地上，一代文学家以地域色彩浓郁，人文底蕴深厚的创作成就，在中国明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走过的足迹，闪耀着云南文学既往的光辉，也昭示着云南文学充满希望的明天。

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或许对乡土有所偏爱，然而如果连这样的情怀都没有，又何来对同胞、对祖国、对人类的大爱、至爱和真爱？六百多年前的宦滇、谪滇文士从全国各地踏上这片热土，和云南作家联袂歌唱，把产生于红土地上的种种情怀，内化为情意绵长的滇云情结，外塑为刚柔相济的山川形象，那么真切又那么动人地表现了她的种种风情。今天的我们，是否应当在步履匆匆奔向未来的同时，也回顾彩云之南这片精神的家园，领略云南文学与华夏传统的血脉相连？

云南文学在明代崛起，这时期以汉语为载体，以传统诗文为主要形式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并在保持自身地域特点的同时，实现了与华夏传统文学的融合。明代云南文学的空前成就，是各民族文学精英的共同创造。大理白族诗人李元阳、永昌（今保山）回族诗人马继龙、丽江纳西族木氏家族等，就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

明代云南文学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轨迹。朱明王朝从经略云南之始，就在军事体制、行政建置、科举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把云南纳入了大一统格局，为云南士阶层的兴起、形成及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大量宦滇、谪滇官员进入云南，明季云南更成为外来文化精英的萃聚之地，也促进了云南文学的繁荣。外来作家和本土作家合力推动了云南文学的发展及其与全国文学的交融。明代滇云文坛群星丽天，名家辈出。我们要从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语境着眼，从全国明代文学的视野出发，才能比较清晰地概括这时期云南文学的基本内涵，并相对真实地描述其基本风貌。

本书立足于明代云南文学的特点和实际，以诗文为主体，以几大作

家类型及重要作家为基础，构建明代云南文学论述的基本框架。在具体的研究中，则把个案研究与综合阐述、历史语境与文学发展、传统内涵与当代视角、文学交流与地域特色等多种角度结合起来，把文本赏析、史料考证和理论概括作为三个重点，原人、原文，力求立体地呈现明代云南文学的基本特点，实现体例和理论的创新。最后以二十首论诗绝句，对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进行简要概括。本书也关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所引用则一一注明，并由学生按《新纂云南通志》编制了明代别集简表，辑录了重要研究论著论文索引，希望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方便。

然而，一本著作无论用多大的篇幅，都不可能做到内涵表述的完美无缺和理论概括的无懈可击。如果学界同仁和其他读者，能够从本书的具体论述和理论概括中，感受到与云南历史新篇章的揭开同步，明代文学曾经以怎样的态势，在遥远的西南边陲如火如荼，绚丽多彩地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地域文学的独特风貌，则寸心足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	(1)
一、云南文学崛起的多元因素	(1)
二、全国视野中的明代云南文学	(17)
第二章 宦滇职官的咏歌	(30)
一、洪武以来之渐兴	(31)
二、万历以来之盛衰	(45)
第三章 宦游诗人的心声	(57)
一、“水木心悬三十年”：安宁籍诗人杨一清	(57)
二、“忧国忧民意自深”：其他宦游诗人论略	(65)
第四章 隐逸文学的兴盛	(76)
一、“志不在干禄”：隐逸作家概况	(76)
二、“洗空势利一生心”：昆明郭文	(80)
三、“杨林两隐君”：兰茂和贾惟孝	(83)
四、“留与西南壮颜色”：晋宁唐尧官	(90)
五、“满山空翠淡忘机”：各地州隐逸诗人论略	(93)
第五章 谪戍文士的吟唱	(97)
一、《沧海遗珠》考论	(100)
二、杨慎的滇云岁月、文学思想和创作	(114)
三、杨门诸子与嘉靖云南诗坛之繁荣	(126)
四、程本立等谪戍诗人论略	(144)
第六章 明季遗民作家考论	(150)
一、高应雷创作行实系年	(151)
二、文祖尧创作行实系年	(163)
三、明季第一诗僧苍雪	(175)
四、从俗世到僧侣的担当	(189)

五、陈佐才等诗人的风骨	(209)
第七章 文学家族摭论	(217)
一、永昌府张氏：张志淳、张含、张合	(217)
二、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氏：木公、木青、木增	(223)
三、宁州土知府禄氏：禄厚、禄洪	(227)
四、大理府白族何氏：何邦渐、何鸣凤、何蔚文	(230)
第八章 余 编	(233)
一、“平居陈郭”考	(233)
二、王锡衮创作行实系年	(237)
三、论明代云南文学绝句二十首	(245)
附 录	(254)
一、本书主要参引书目	(254)
二、按《新纂云南通志》编制别集简表	(259)
三、重要论著论文索引	(273)

第一章 明代云南文学的崛起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敕令颖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统领大军征滇，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接着在云南全境相继建立了与全国中心地区大致相同的统治格局，开始了自汉置郡县，元设行省以来，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云南空前强大的统治。云南文学在明代崛起，与这个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此前云南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却未能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实现与全国文学的融合，明代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云南文学失去了自己的地域色彩，恰恰相反，由于其崛起之独特语境，地域色彩更为浓郁了。

一、云南文学崛起的多元因素

早在朱明王朝初定天下之时，朱元璋就在洪武七年（1374年）下了《谕云南诏》。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再谕云南诏》，诏曰：“今后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讨平之。”接着他对统领云南大军的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人连下了4道敕谕，云南平定后他又下《特谕云南平诏》，诏告天下臣民共知“大军既临，渠魁尽获，云南已平”。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继下《复谕云南诏》，诏曰：“今云南既平，诸夷服从，故诏谕以更生之恩。”同年他对傅友德、蓝玉、沐英等人连下了5道敕谕，洪武二十年（1387年）再下敕谕给当时的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张瑄、左参议韩钥敕、金齿指挥储杰等9员^①。这些诏谕涉及云南的军事防守、政权设置、社会治理、官员德才等诸多内容，充分表现了朱元璋不仅要平定云南，更要经略云南的雄心。明王朝在云南全面实施的统治，

^① 以上朱元璋诏谕见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使云南社会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云南文学之崛起，可谓势所必然。

（一）云南的社会变革加速了文学发展

朱明王朝经略云南的基本措施，使云南社会发生了迅速变化，这是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

在军事上，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朱元璋留下其养子、西平侯沐英为云南镇守总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被追封为黔宁王，永乐六年（1408年）沐英的次子沐晟因平定安南（亦称交趾，即越南）有功而被特封为黔国公，授以铁券世袭。军事防守的构筑也充分体现了明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强权。以首府为例，天启《滇志》卷二载，嵩明、昆阳、安宁、晋宁等四州，昆明、呈贡、宜良、富民、三泊、禄丰、易门、归化、罗茨等九县“修予疆理，皆樊圃牖户之奥区；诘尔戎兵，为设伏出奇之要领”；这是因为作为云南的首府，“通邑大都，四方所视，其取威也”^①。明王朝对云南其他重镇的建设大抵如此，如澄江府之“秀水前澄，奇山后耸，左有铁池之固，右有三关之警”，北胜州之“一江外绕，三关内固”，大理府之“负山面海，龙关扼塞”^②。

在政权建设上，朱明王朝建立云南统治体系的步伐相当迅速：洪武十五年明王朝改元代云南诸路为府，以中庆路为云南府，改行省为布政使司，置都指挥使司，洪武三十年（1397年）置按察使司。正统十一年（1446年）改麓川为陇川，设宣抚司于陇把。成化十二年（1476年）置临元、澜沧、金腾、曲靖四道。成化十五年（1479年）改木邦宣慰司为孟密安抚司，隶湾甸。嘉靖元年（1522年）复永昌府治，改金齿指挥使司为腾越州，仍置腾冲卫。万历十九年（1591年）设新平县，改直隶新化州隶临安府。二十五年（1597年）改顺宁为流府，二十六年（1598年）改大侯为云州。终明之世，明王朝在云南共设府20个，领州36个，置县32个，又分置各卫所附焉，并和全国同类地区一样，在云南实行了土司制度。从永乐四年（1406年）起，明王朝在云南边远地区陆续增设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一。

^② 陈文撰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252、262页）。

流官，并据云南“汉夷杂处”的实际设土知府，后期又改土归流，以在全国统治体系内采取特别措施的办法，保证了在汉夷杂处的边陲，其统治政策也切合实际。翻检史册，披览文献，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朱明王朝从建立伊始，就表现了从根本上控制云南的魄力，其巩固政权的重要举措亦贯彻始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如此精心地在云南构建过一个这样严密的统治体系，从而形成了中央政权对西南边陲的强大统治。

在经济发展上，云南被纳入到明王朝的统一规划中。滇云自古幅员辽阔，州府各负山川形胜之势，自然资源丰富，冬无剧寒，夏无酷暑。虽然明王朝自统治云南之始，即贯彻与一般地区相同的赋税制度，但在承担赋税之后，官吏榨取之余，百姓还不至于无以为生。作为首府，云南府的经济状况可资全省参照。万历时期云南布政司参议谢肇淛在其《滇略》中详尽地记载了当时云南府这方面的情况。他说，云南郡雄据滇池，方圆300里，周围平地肥饶千里，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自汉以来风俗豪华奢侈。历史记载说巴蜀的商贾，窃取其秣马、犍僮、牦牛而致殷富。自唐代以来，干戈迭继。明朝统一后以汉法绳之，贡赋繁重，人们饥色可掬。“然田无旱潦，米不转输，山泽之利，取之无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方乐土，未必胜此也”。其他各府的情况大抵如此，如：“大理……民输赋（缴纳赋税）如竞市，不待催科（催收租税）。百年以来，民以饮博（饮酒赌博）废业田，多逋赋（逃避赋税），胥役怙权鸱张，鱼肉小民，其一变也，网亦少疎云。”“谚曰：‘金临安，银大理。’”明王朝统治者在经济上对云南人民的压榨，在资源上对云南的掠夺，云南珍稀资源的进贡和赋税之重，史载历历，有案可查，但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让这里相对成为一片安居的乐土。经济基础是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诚如谢肇淛所言：“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义，人文日益兴起。”^①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云南各地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这正好让我们从正态的分布，看到云南各地经济发展与文学繁荣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结构上，云南有了重大的改变。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从江南地区大量移民到云南，罪犯更是“尽室以行”，云南逐渐呈现出“土著者

^① 李春龙、刘景毛校点《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卷四《俗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3页）。

少寄籍者多”的状况^①。移民是明王朝经略云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对改变当地社会结构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其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以屯田和充军为主。林超民先生说：“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59576户，经200多年的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471048户。其中军户总计335426户，占71%强。与军事屯田开展的同时，还实行民间屯田。明代还将罪犯贬谪充军到云南，这是明代内地汉人移民云南的一个特点……到明代后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的总数已达300万左右。”“明代200多年间……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形成‘云南人’。‘云南人’这个称谓具体在何时出现已难考订。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②除了常规性的移民，明王朝各级政权所需的官员也大举入滇，他们在云南的停留虽有暂时性，但代代相沿，对云南汉文化传播和云南文学崛起的影响不可小觑。

大量汉族移民在改变云南社会结构的同时，对云南汉化的程度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谢肇淛描述了晚明云南的这一社会状况：“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③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记载，云南巡抚顾应祥的《昆明池歌》以生动的形象，抒发了对云南终于与全国“礼乐不异车书同”的感慨^④。明代云南汉文化主流形成进而融入到全国大一统的程度，仅举一二事例即可见其一斑：昆阳人李尚文博学能文，不乐仕进而徜徉于山水之间，尝恨滇中乏书，于是同其子李沧到江南购书千余卷，归教乡人^⑤。一个乡绅出以这样的举动，没有华夏传统文化兴盛的大氛围是不可想象的。乾隆《丽江府志》载，丽江纳西族土司木氏府中有“万卷楼”，楼中所藏“凡宋明各善本数万计，群书侵版，大要俱备”。木氏以文学家族称名，无疑得益于所藏万卷汉文典籍。

云南社会结构的改变还有一个重要表征——本土土阶层的兴起。明

①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卷四《俗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② 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卷四《俗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④ 天启《滇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

王朝不仅向云南大量移入汉族居民，而且继之以大力兴教办学、推行科举的空前壮举，形成了大量“造士”的实际结果，促使明代云南士阶层勃兴并形成，进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这个在移民基础上云南社会结构的又一重大变化，“从而改变了原来土酋与土民，或部落首领与部民为主的社会结构，促使云南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内地基本趋于一致……促使云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移民的部分子弟，在接受了儒学教育的同时，逐渐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跻身于‘士绅’阶层和社会群体的行列，成为云南社会中新兴的独立阶层，发挥着引领云南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①也即是说，跻身于士阶层者无关其民族身份，只在于是否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或取得了某一级科名。明代云南士阶层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关系甚大。正如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之兴起极大地推进了文学的发展一样，明代云南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对文学发展的推动，比中心地区不过是延迟了两千多年而已。

明代云南社会各方面改变带来的汉化程度之高是空前的，这是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但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士阶层的影响更为直接，士阶层的形成推动了云南文学的发展，为云南文学汇入华夏文学的主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此前历朝均不能望其项背的。

（二）兴教办学促使文学创作力量发展壮大

笔者认为，外来各类人员带入云南的文化影响，均属集体无意识状态，它虽是云南文学发展的因素，却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作用必然依赖于统治王朝有意识的作为，才有可能产生，这就是明王朝在云南的兴教办学，在促进士阶层兴起的同时，促使文学创作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云南建学虽始于汉代，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达到明王朝这样的力度。朱元璋多次诏谕有关云南教育的问题，继他之后，有明一代的皇帝都重视云南教育的发展。《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六）载，永乐十年明太宗就曾为云南武定、寻甸、广西等三府请设学校之事，对礼部大臣强调过在边疆兴教办学的重要意义：“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明太宗强调了国家有所作为对

^① 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于化民成俗的重要意义，可谓言简意赅。

我们仅以云南府庙学和府学的修建为例，即可见明王朝在云南兴教办学的气魄。云南府庙学在五华山右，元代至元年间由总管张立道兴建，兼置学舍，在平章沙木斯迪音拓之后废弃。明初，镇守总兵沐英把兴教办学作为其先期处理的要务之一，在旧址上重建庙学，为以后的扩建奠定了基础。景泰年间云南巡抚郑颺继而兴建了成德、达材二坊，天顺五年（1461年）都督沐瓚继续兴修。弘治十五年（1502年）云南巡按何琛建聚奎楼为讲堂，又增置号舍，嘉靖十年（1531年）建启圣祠、敬一箴亭^①及《视听言动心五箴碑》。万历元年（1573年）云南巡抚邹应龙凿泮池，十八年（1590年）云南府知府易以巽重修殿庑，四十年（1561年）云南巡按邓澐、提学黄琮以昆明县学庙附于府学，四十三年（1612年）云南巡抚周嘉谟、提学张^闾迁建明伦堂。崇祯元年，云南府知府王绍旦建文昌、魁星二阁。经历了200余年，云南府学庙终告修建完成。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个王朝从上到下，从中土到边陲的整体意识和对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在辽远的边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众多大吏代代相传，为兴建一所学校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作为首府，云南府的学校备受重视。天启《滇志·学校志》（卷八）对洪武以来云南府儒学扩建的记载，集中表现了明王朝在云南的兴学之势。沐英在元代赛典赤所建旧学的基础上建儒学，此后历代扩建，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巡府都御史周嘉谟、提学佺事张^闾，迁府县二学明伦堂于庙门之左右，斋舍、坊表加饰焉。左署陈臬^②，右联武库，仓山^③屏其后，柏台^④距其前，双塔^⑤为文峰，滇池为泮水^⑥，高若登天，成于不日。盖天地建设，留为圣人之居；川岳炳灵，绵衍在兹之脉者乎！”如此气势恢弘的学堂，我们今天遥想，仍不胜向往之情！

① 按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有《世宗肃皇帝敬一箴并序》，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世宗撰“敬一箴”，并亲注程颺“四箴”颁行天下学校，全国学校纷纷刻碑建亭。

② 陈臬：张布刑法的机构，亦借指任司法官职。

③ 仓山：疑为商山，又名蛇山，连峰叠嶂，雄丽岩峯，云南府城枕其山而临滇池。

④ 柏台：御史台的别称，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

⑤ 双塔：昆明城南东西原有二寺，东为觉照寺，西为慧光寺，其中各有一塔东西对峙，两寺早已不存而双塔犹在。

⑥ 泮（pàn）水：古代学宫前的水池，形状如半月。

云南府学校的建设如上所述，我们再略述州县学宫的兴建：洪武十六年（1383年），晋宁州建学宫，同年呈贡县学宫亦建成；洪武十九年（1386年），嵩明县学宫由知州赵幹幕、戴民俊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基础上增建；永乐元年（1403年），安宁州学宫由知州李智明重建，同年建昆阳州学宫；弘治年十六年（1503年），昆明学宫由云南巡抚林元甫和巡按陈天祥建成；弘治年间宜良设县学，正德四年（1509年）知县余志刚建成学庙；隆庆元年（1567年），旧附于安宁的禄丰县学宫由邑人王昱捐款建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罗次学宫由云南巡抚陈用宾建成；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易门县学宫由巡抚陈用宾题建，旋即改迁于城南；崇祯中，旧附于罗次的富民县学宫建成^①。其实到弘治年间，无论兴建还是附学，云南府所属地的子弟，皆大抵有学校可上了。作为首府，云南府教育发展的步子自然较快，但其他地区的教育发展速度也并不缓慢，如：永昌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曲靖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元江府庙学建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姚安府庙学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腾越州庙学建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和云南府一样，在一些没有建学校的地方，也有就近附学的办法，以解决学子受教育的问题。

明王朝在云南不仅广建学校，而且广选良师，对学官和教官的选择均相当严格：“明初教官，多用儒士，后随着科举之实施渐用举人，监生、贡生皆一时之选。特别是‘举监’与‘贡监’两者，在明中后期已成为儒学师资的主要来源。前者即会试下第后入国子监肄业的举人；后者即各府、州、县儒学取得进入国子监深造资格的生员。”^②如《明宣宗实录》（卷四）载，洪熙元年（1425年）改授四川雅州学正何源为土官司衙门吏目，原因是何源“以监生授学正，自陈不通经学，难为师范，愿改他职。上谕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非经明不可为人师……量才授职，则人皆效用，官不废事。’”学官自己不愿滥竽充数，皇帝也倡导量才授职，充分体现了明王朝对边疆教学质量的重视。云南教官的标准，并不因为地处边远而有所降低，甚至有以进士充任的。如《明太宗实录》

① 详见《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二》（卷一百三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总第六册（第481~483页）。

② 台湾黄文树《明代在边陲——云贵地区的教育关怀及其对当今原住民教育的启示》，辅英技术学院2002年全国关怀研讨会论文。

(卷三十三)载,永乐二年(1404年)秋,吏部上言有进士自陈是云南人,“不闲吏事,愿为教官”。明成祖高兴地说:“云南人能举进士,可嘉,就受云南学官,以劝其乡人。”《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永乐六年(1408年)记载,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敏上言曰:“‘师儒之职,为后学矜式,云南郡县学官多用土人,学问肤浅,容止粗鄙,不称师范。宜别选用经明行修之士,庶几教养有法。’太宗俱从之。”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命廷臣举有学者提督学校,以邵玉任云南学政”^①。邵玉字德温,鄞人(今浙江鄞县),宣德十年(1435年)举人^②,授汝州学正,升南宁及河间府学教授、顺天府学用,擢云南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邵玉教士以身为范,先严义利之训,“三典文衡,得人为多”,李东阳即其门生^③。昆明人张英,字时俊,正统三年(1438年)以解元入太学。当时祭酒李时勉因直言获罪,张英忿而会同时大坚等上书朝廷,请以身代,李时勉因而得到宽宥,张英名动京师。但他是日即乞归养,大学士商辂赠之以诗。张英致仕后居乡教授生徒,得到黔国公沐琮的礼遇,卒年九十四岁^④。由以上数例,可见明王朝对教育很重视。因此,当时主管教育的职官和师资,皆遴选足以为人师表者。

明王朝在云南不仅兴办学校,还大力兴办书院。终明之世云南全省有书院80余所,且不说首县昆明,如姚安府有南中书院和三台书院,临安府有景贤书院,永昌府有正学书院,蒙化府有明志书院。据天启《滇志》卷八《学校志》载,昆明五华书院气势颇为宏大,由大门、仪门而入为堂三楹,左右有号舍各数十所,为早年中丞御史台、藩臬大夫、郡伯庶尹相率博士弟子以时讲业之所。遇都试之岁,并取闾省诸生上等等,委任府佐教官,督课评定诸生学业。万历间云南提学黄琮在《修建五华书院记》中云:“夫学士之田也,有庠序以联之,有科举以劝之,而又为书院以课督之,与催耕促织何异?海内自白鹿、衡麓等四书院^⑤外,在在有之,宁独不以为病,实以为利。至于滇,则余又以为亟焉。”他以力田为喻,呼吁“其耕当倍力”,“所谓劳来而辅翼之者当倍笃”(天启《滇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七。

② 按雍正《云南通志》载为进士,误,该年无春试。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万姓统谱》卷一百二。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

⑤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为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此处“衡麓”当指衡阳石鼓书院。

志》卷二十)。书院里的学官亦非泛泛之辈可以充当，陶成编纂的《江西通志》(卷八十二)载隆庆进士聂良杞(字子实)“出典滇学，置五华书院，萃博士弟子读习其中，士风丕变”。在教育官员们不懈的努力下，五华书院成为聚集三迤十四府秀士的书香胜地。姚安的三台书院为李贽创办并亲自讲学，亦培养了不少人才。

明王朝办学，可说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场所。如儒学(亦称庙学)的建立原只为祭祀孔子，但实际上往往与学校合而为一，成为学堂。以云南府为例，其建儒学的历史始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后废弃。元世祖至元年始建文庙，复废弃。昆明县儒学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原是独立的，嘉靖十七年(1538年)迁于府学东南半里处，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文庙为启圣祠，以明伦堂为府学，设明伦堂于启圣祠右，儒学遂与府学合并，四十三年(1615年)又迁府县二学明伦堂于庙门之左右，呈庙学合一之态。学校与书院、儒学三者相辅相成，此外还有社学、卫学，在云南广大地区形成了覆盖面极广的教育体系，入学者甚众。终明之世，“全省正规府、州、县、卫学60所有余，书院56所，社学可考者165所，共计有儒学教育机构280多所；入学生员子弟更是难以计数，据提学道副使樊枢良天启元年所上《请加额解疏》所说：‘向往尔时，庠序之士不逮九千余人，未有今日之盛也。自四十八年三月职受以来，迄今岁考，东西十六郡，将遍按籍计之，有一万二千余人，而新进者不与焉。’说明仅万历四十八年(1560年)云南就有12000人在各级正规儒学中就学，如果历年累计，其数量相当巨大。正规官学学额有限，书院、社学不在受限之列，那么，云南280余所各类儒学教育机构中，不啻于有数万，乃至十余万云南子弟诵读其中。”^①

明王朝的学校建设规模，不仅从国子监深达于县学，而且在学校体制上进行了严格而详尽的规定，保障了儒学在学校教育思想上的中心地位。中央一级有国子监和宗学，地方上则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同时都司、行都司、都转运司、抚按司、土司有儒学；此外有京、卫武学；还有医学、阴阳学等。明代民间书院的兴办亦盛极一时。“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学制详明为历代之最。其学科之扩充，学规之严密，皆较

^① 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优于历代。”^①从明王朝的教学体制上还可以窥见，当时的教育理念既重视儒家思想，又兼顾其他技艺和自然科学，从而促进学子的全面发展。我们还可以从更具体的事例中看到明王朝兴办教育的苦心：陈弘谋在《重刊小学纂注序》中说到他的“圣世化民成俗之方”，即让“边方士庶均沐圣朝雅化”，如此“则敦本行、崇实学宜首务矣”（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于是他重刊《小学纂注》，颁之于通省学塾，让学生习与智长，化与性成，打好基础，以待异日明体达用。可见，即令是“小学”，亦非单纯的教之以技，而是把人文教育贯穿其中。

各级各类学校不断增建，设施不断完善，加之保障教师素质，完善教学体制，完备教学内容——明代云南兴教办学的可观成效日渐显现。早在正德年间，云南巡抚何孟春针对武定军民府的文教情况有一个上疏，专门呈报云南文教的成果。他说：“今承平日久，云南文教大行，与中国等。本府离会城不过二程，府中街市居多汉人，土军下屯寄种，夷民相接，言语渐变。应袭土官颇知书史，佐属俱是流官，所辖州县，僰人子弟多务读书。五七年间，有人附云南府学者，有人昆阳州学者。父兄耳闻目击，皆有愿教子弟之心，其子弟皆有愿学之志行。”^②各级各类学校无疑是造就士人的主要基地，从这里走出去的士子，无论属于哪一个民族，无论最终是否进入科举之途，都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

（三）推行科举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兴盛

在兴教办学的基础上，明王朝在云南大力推行科举，通过科举实现仕进，促进了云南向学之风的形成和文学的发展。

云南人生性恬淡，曾有“不乐仕进”的记载，但明代科举的兴盛使这一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如澄江府“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初不知学，今以岁久，渐被文教，有以科第跻膺仕^③而封及其亲者。于是闾里翕然^④向学，相率延师训子，而家有诵读之声，皆乐于仕，非复昔之比

① 《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一》（卷一百三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总第六册（第466~467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何文简疏议》卷七《地方疏》。

③ 跻（jī）膺（wǔ）仕：登上科举高榜，跻身高官行列。

④ 闾里：乡里；翕（xī）然：一致。

矣”；“金齿久无学，士风委靡。正统间始建学，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①据雍正《云南通志·选举》载（天启《滇志》所载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王朝始命云南选贡并送应天府乡试。永乐九年（1411年）诏云南布政司取士，乡试一级各省举人皆有定额，云南的名额则渐次递增：洪熙元年定云南乡试额10名，宣德四年（1429年）令贵州就云南乡试，七年（1432年）增云南乡试额五名。正统二年（1437年）令开科，不拘额数；五年定乡试额，云南20名。景泰元年（1450年）令开科，不拘额数；七年（1456年）复定乡试额，云南30名。成化三年（1467年）增额10名，十年（1474年）复增5名。弘治八年（1495年）增额5名，正德五年（1510年）增额5名。嘉靖十六年（1537年）始令贵州另得开科，定云南乡试额40名。万历元年（1573年）增额5名，四十三年（1615年）增额2名。自后增减不常，或增1名，或仍旧额。崇祯十五年（1642年）增额7名，总数至54名。可见，有明一代，科举名额都对云南有所倾斜。

不仅名额不断向云南增补，而且云南入国子监就读的诸生，以及云南本地的廪生待遇，都得到了朝廷的格外恩典。《明太祖实录》中关于赏赐云南监生的记载多得不胜枚举，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赐国子监云南生尹葆等衣、钞、靴、袜；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赐国子监云南生段士吉等苧布袭衣^②、靴、袜（卷二百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云南布政使司贡生杨嵩等六人入国子监，“命月朔朝见，著于令”（卷二百一十六）。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的科举，皇帝也往往对云南士子特加照顾。《明宣宗实录》（卷九十六）载：“宣德七年冬十月……云南太和县儒学生段聪岁贡至京，两考不中，当充吏。聪奏曰：‘臣本夷人，性资愚鲁，乞仍归读书，以俟再试。’行在礼部言：‘充吏，今之定例。’上曰：‘夷人难比内郡学者，姑令归进学。’”《明实录》颇多这类记载。上行下效，云南布政、巡按两司官员也都关心学子，并曾为他们编选教材、校勘制艺卷子以推进科举。如“巡按御史新安张公应扬缉古文词曰《名文汇选》，督学佥事闽中邓公原岳梓《文选》，亲为校勘，论舛悉正。其

① 陈文撰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版（106、325页）。

② 苧（zhù）布：用苧麻的茎皮纤维作原料织成的布帛；袭衣：成套的衣服。

以制举艺、手批为诸生矩彀^①者，则有学宪华亭范公允临所订《月指录》、巡按海南潘公俊所订《艺林拱璧》……”^②

我们先以首府的情况为样本，看看明代科举在云南的实际结果。明代隶籍云南府的举人、进士人数甲冠滇云，聂良杞^③所作《云南府儒学乡贡题名记》载：“滇建学五十有三，云南府学其一也。始洪武癸酉（二十六年，1393年）迄嘉靖丙午年（二十五年，1546年），凡乡贡得士二百有奇^④，前监察何君琮所为立石，充轍无余地矣。继自己酉（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而下以至于今，又六十有馀人，不胜载也。”又曰：“今受命事三年矣，不佞^⑤固甚愧作人罔效^⑥，而乙酉之岁所得士若张生弋以下四人，又相与有一日之谊者。”（天启《滇志》卷二十）张弋为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年）科举人，该科云南府共取乡贡5人，张弋次年春试（丙戌科）中进士，邵年齐下一科（己丑科，1589年）中进士^⑦。元代云南各路虽普遍建学，然而终元之世，云南府仅有昆明县中进士5人^⑧，这个数字其实也就是元代云南全省进士的总和。当然，这里要考虑到元代多年废除科举，恢复不过50来年，其间还有停顿这一事实，这5人登科于至治元年（1321年）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近40年间。但无论如何，综合举于乡试的数目，明代科举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王朝命云南选贡，给举额二各送应天府乡试，可叹全省当年竟无一人能够应试。但随着教育的兴办，这种情况渐渐改变。据天启《滇志》和雍正《云南通志》载，有明一代云南府总计中进士56名，计有洪武年间3人，永乐年间1人，宣德年间1人，成化年间8人，弘治年间4人，正德年间5人，嘉靖年间15人，隆庆年间缺，万历年间13人，天启年间3人，崇祯年间3人，举人则达近700名。明代固重流品，

① 矩：规则；彀（gòu）：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喻范文。

② 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③ 聂良杞，江西金溪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历十一年（1583年）任云南提学僉事。

④ 有奇（jī）：有余、有零头。

⑤ 不佞：佞同佞（nìng）；不佞，谦辞，犹言不才。

⑥ 作人：培育人才；罔（wǎng）效：没有效果。

⑦ 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4页）。

⑧ 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93页）。

但亦有以举人授职者，还有以征辟、选贡入仕者^①，这就为云南士子广开了向学上进之路，文风得以大开。据张丽剑以天启《滇志》为样本统计，以乡式中举上100名者为下限，有明一代其他州府的情况为：大理府有举人475名，进士47名；临安府有举人482名，进士47名；永昌府有举人244名，进士22名。鹤庆府有举人135名，进士22名。整个明代科举，总计云南有举人2457名，进士234名^②。登科人数以云南府居多，其次为大理、临安、永昌等教育发达地区。就经济力量和教育力量的分布情况看，这一现象是合理的。程本立在《送太学生尹士葢序》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朝有汉唐所无之天下，斯有汉唐所无之太平。六诏编为郡县，皆设学校，经生升于太学者，岁有其人。”“嗟夫王化所及，风气随之。今之云南，非昔之六诏矣。谕夷戎为华夏，易戈鋌为干羽，变淫哇^③为韶龔^④。予何幸，身亲见之哉！”（《巽隐集》卷三）《巽隐集》中有三篇以“送太学生”为题的序，一篇为昆明太学生而作，另外两篇则为大理升太学者而作。

对于明王朝在云南推进科举的成功及其与文学风气大开的关系，杨慎的《云南乡试录序》说道：“今皇上远述唐虞，近法圣祖，屡下明诏，锐意作新。文必宗经，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⑤之诗，梓材^⑥之书，复作于今日；收济济之士，迓穆穆之衡，行媿于古。先诸士乎，沐熏濡化，提耳面命，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尔滇云，圣祖常有谕言曰：‘气厚风和，君子道行之所。’尔诸士子，生其乡邦，久佩谏训^⑦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犹刮目，矧^⑧曰涵泳已百七十载，济

① 如昆明李纯正统间举孝廉，升至为监察御史（《滇略》卷六）；呈贡文祖尧天启间选贡，任太仓州学正（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

② 张丽剑《明代汉文化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影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③ 淫哇（yínwā）：粗鄙淫邪之声。

④ 韶龔（sháohù）：汤乐名，后亦指庙堂、宫廷之乐，或泛指雅正的古乐。

⑤ 菁莪：《诗经·小雅》中《菁菁者莪》篇名的简称。小序曰：“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后因以“菁莪”指育才。

⑥ 梓材：木之精者。治木器曰梓。语出自《尚书·周书·梓材》。宋代黄伦《尚书精义》卷一：“《梓材》之为教化。”

⑦ 谏训：谋略和训诲，语出自《尚书·夏书·胤征》。

⑧ 矧（shěn）：况且。

济数三五六经，诸士勗^①哉！今日之滇云，非昔日之滇云矣，勗哉！”^②

科举兴盛是明代云南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甚至不妨说，这时期以汉语为载体，以诗文为主体形式的云南文学，也是科举的间接产物。诚如杨慎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所言，明代云南所得到的发展机遇，是千年之期而一朝相遇。科举对于云南文学发展的影响，在明初即已初露端倪：“永乐九年，始命监察御史巡按云南，始诏云南布政司开科，取举人洪诚等十二人。时滇中文教渐开，士人诗赋埒于中土。如‘平居陈郭’四人，皆永乐间以诗名家。”^③ 诸葛元声从科举的角度总结云南文学的成就，虽在有意无意之间，却道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四）主流思想之确立推动了云南文学与中原的融合

考察明代云南文学的发展，不可忽视当时社会思想背景的影响。朱明王朝以程朱理学立朝，但亦以倡导佛教为务，行以教辅政之实。朱元璋曾对儒学和宗教的关系作过一个阐释，他说，佛教“渐入中国，阴翊（暗中辅佐）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异圣人之道而同焉。”^④ 万历间云南督学方沆在《重修碧鸡山华亭寺记》中也诠释了儒释同一的思想：“儒曰‘尽心知性’，释氏曰‘明心见性’。辟之大明当空，万汇毕照，则性体然耳。世儒不察，猥云释氏若空……昔程伯子（程颢，1032年~1058年）入佛寺，观威仪整肃，叹曰：‘三代礼乐，其在兹乎！’其之谓通论。”（天启《滇志·艺文志》）儒释一主一辅，云南亦不因边远而例外。明代云南文学在主流思想影响下，逐步实现了与中原的融合，进而长足发展。

从上文所述明代学制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的学校教育以儒学为中心，各级教官和地方官员亦以倡明儒教为己任。实际上不仅学校，书院亦是儒学的养成地和传播地，这既是明代科举的需要，也是政治教化的需要。历史文献中明代官员们为学校、书院和科举题名录所撰写的序文、碑文和教材，都确切地记载了明王朝贯彻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办学主导思想。

① 勗（xù），勗勉，勉励。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

③ 诸葛元声《滇史》，云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太祖文集》卷十《宦释论》。

明王朝兴教办学的目的与科举造士是一致的，所以教学内容必然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挂钩。众所周知，明代科举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主流思想的地位远胜于此前任何时代。杨慎的《云南乡试录序》云：“尝伏读科举之诏矣，《易》用程子《传》、朱子《本义》，《书》从夏氏、蔡氏两《传》，《诗》采汉《笺》暨《集传》，《春秋》本三《传》兼胡氏，《礼记》则古《注疏》与陈澹《集说》，裁订自渊衷，参采乎诸儒，使孔孟复生，亦无异论也。又尝观先正首科之题辞矣，曰：‘初场在通经而明理，次场在通古而贍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所谓“沐熏濡化，提耳面命”的儒学内容，杨慎已概括得相当清楚了。

学校教育的主导思想不仅影响到学子的人生观，而且必然通过学子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黄琮在《修建五华书院记》中阐述了儒学之于风化的重大意义，他认为世道不古，民风不纯，扑而旋起，“岂非教道衰而彝伦斁^①，爱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乱之萌无自消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仅仅举办学校不够，还要于“庠序之外，复于书院课督之”。因为“要令从六艺中寻求服习，涵濡而自得之，实非课程可及”。“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所谓“约礼”，即确立以儒学为中心的人文之学，“故文之于学，宇宙之日月灯光也。文斯辨辨而后不可欺，不可欺而后有责以不自欺，不自欺则诚，诚之至，圣之至也，学之事尽矣”。

如果我们再以《列女传》来看大兴儒学对社会的影响，或许更有意味。以《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三十九）的《列女传》为样本，仅云南府在明代就载录了340余位（包括附传）女性。她们中死节者占绝大多数，年龄从幼女到60余岁不等。这个数字，已超过了《明史·列女传》的总和。其中有几个身世比较显赫者：沐英的13世孙沐天波之母、妻、女三代，李东阳曾为作《可贞堂记》的方妃之妻，以吏部尚书致仕的严清之妻（光禄寺少卿施昱之女）。《列女传》固多士大夫之妻女，亦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性。从深达于闺阁的理学思想之影响，不能不令人感叹明代云南风化之结果！试想闺阁尚且如此，士子、士大夫又将如何呢？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在其送行诗《送云南府学司训高宗礼》中慰勉其友曰：“昆明池水隔天涯，万里西行喜过家。莫叹青毡清似水，文风今日似中华。”^② 儒学在云南社会生活中的确立，使明代云南文学与中原融

① 彝伦：常理；常道。语出自《尚书·洪范》。斁（yì）：败坏。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十五。

合，复古、载道观念在发展中不时重现，儒家的传统精神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重气节、尚节操等，不仅表现于士大夫的言行之中，亦是重大的文学主题，并在鼎革之际成为时代最强音。

一方面确立儒学中心，一方面把佛教当做施政之辅，故云南虽地处边远，佛教却在历史的基础上更加发扬光大。据《佛统记》，大理府鸡足山的传衣寺始于释迦牟尼入涅之日，其大弟子迦叶入定之时。汉时摩腾竺法兰由西天竺进入中国，建感通寺于大理，昆明圆通寺则建于元代。洪武年间平滇之后宗教渐倡，至中晚明禅道大兴，天启《滇志》载录明代云南有寺观近700座（卷十七《方外志·仙释》），实际上可能不止于此数。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始吾阅道光《志》，寺观类凡六卷，庵、寺一千六百五十余所，即惊云南寺院之众。然《志》为道光间所修，不足以概明季。后阅大错和尚撰《鸡足山指掌图记》，言鸡山大寺八、小寺三十四、庵寺六十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又惊叹鸡山一隅静室何如此之盛？然此为大错修《志》时住山半载所亲勘，其言至可信据。”从寺观的数量可见僧侣之众，不妨视此为佛教在云南复兴的重要标志。

明代云南佛教的兴盛，首先出于政治原因。简言之，明初朱元璋就倡明宗教，以教辅政，不仅地方大员护法，且在府、州、县三级均设有僧官之职，洪武间云南高僧就得到朱元璋的宠渥，同时也有日本僧侣被谪往大理，后来僧众陆续进入云南，开辟荒山以建寺观，形成滇南佛教兴而仙、道随之的局面。嘉靖、万历年间鸡足山佛教大盛，至明季永历帝入滇，诸多志士逃禅以全志节，滇云佛教复兴，高僧辈出，流风远出云南，在全国颇有影响。其次，明代云南士人有读书僧寺之风，嘉靖以来士大夫更有禅悦于寺观者。如大理李元阳、保山马继龙、宁州王元翰、禄丰王锡袞、姚安陶珽等著名文士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甚至土知府如丽江木增和姚安高翥映，都和僧侣、寺观关系不浅。一时士夫无不谈禅，僧侣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各阶段宦滇、谪滇官员也推进了云南禅悦之风的兴起^①。历史学大师陈寅恪为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称“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读也”，“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此为中的之论。社会现象必然要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中原文学中随着佛教兴盛而兴起于六朝的山水诗，在明代云南兴起，亦与禅悦

^① 参阅《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五至一百七《宗教考》。

之风大有关系，说山水诗半成于寺观并非夸张之语。不仅士大夫文学追求放情山水，更有诗僧如苍雪、担当的山水诗，为明季云南具有全国声誉的代表。其实诗僧现象在明代云南文学中早已有之，如昆明丁氏之子古庭著有《山云水石集》，他于成化年间落发于昆明五华寺，得西蜀无际祖师薪传，随处开堂说法，导化群迷，回滇后黔国公建归化寺，礼请他为开山祖师。净轮师法古庭，倡无际宗风，成化年间在都城创万福寺，道法大振，别号竹室，有《竹室集》。这类诗僧不仅弘扬佛法，也因诗歌创作而和士大夫一同促进了云南文学与中原的融合。

综上所述，朱明王朝对云南各方面的用心经略，使云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云南社会在各个层面上与全国接轨，步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而文学的发展必然与此息息相关。在明王朝对云南实施统治七十余年后，云南巡抚、钱塘郑颺在《重修云南志序》中全面地总结了前期统治所取得的成就：“云南以险远后服，太祖皇帝特命勋臣镇之，迄今七十余年。山林川泽坟衍，原隰物产之富，郡县城郭疆理之雄，灵坛古迹琳宫梵宇之胜，园池楼阁亭台馆榭之丽，贤臣哲士之生于其乡，仕于其地，《诗》、《书》、《礼》、《乐》之教养其人，于是道德既同而风俗丕变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其时耶！虽然礼乐文章之明备，道德风俗之同一，固由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纂修，抑何以成昭代制作之盛，而睹今日大一统之寰区哉！”^①“大一统之寰区”囊括了明代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举等与全国接轨的基本状态，所以说云南文学崛起于明代并与中原文学合和，实为势所必然。

二、全国视野中的明代云南文学

由于地大物博，文化的多元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南北之分，南方区域通常被人们划分为荆楚、吴越、巴蜀、岭南等文学圈，而云南文学在明代以前还不成气候，至明代的发展无疑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朱明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控制边陲，在文化、教育方面化民成俗的空前强势，使云南文学实现了与全国的合流，

^① 天启《滇志》卷二十四《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从而立起了云南文学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明代云南文学三分天下的发展以诗文的繁荣为标志，首府的创作成就总体较高，永昌府、临安府、大理府、丽江府的成就也比较突出，其他地区亦各有其胜，形成了云南文学崛起的态势。这一态势于明末清初就引起了著名文学史家的关注，在《列朝诗集》、《明诗综》、《石仓历代诗选》、《明文海》等全国性的大型总集，甚至在《御选明诗》中，都可以看到明代云南文学的印迹。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云南文学与全国文学之关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云南文学发展史及其地位的认识。

（一）云南文学形式与全国之异同

影响明代云南文学生成的种种因素，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它自身的特点，与同时代全国文学相比，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风貌。以全国明代文学而论，小说、戏曲、诗文是三种主要的形式；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看，长篇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传奇戏曲在中晚明达于繁荣，终于与传统诗文三足鼎立，成为学界所公认的最能代表明代文学成就的部分。也即是说，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以诗文为主体的走势，自南宋后期历元代到明代，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诗文虽不能说已经完全衰落，但无论我们今天怎样强调其成就，它在明代文学三分天下的整体格局中只占一角，显然已勿庸置疑。然而明代云南文学的情况恰恰相反：以汉语为载体，以诗文为形式的传统文学异峰突起，小说和传奇戏曲的成就却远不如诗文那么突出。这使得我们探究明代云南文学的发展主流，必然要以诗文为主要关注点。并不是说在小说和戏曲方面云南完全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该承认已经形成的基本事实，从而清醒地看到明代云南文学的突出成就之所在。缘于云南文学到明代才实现了与全国文学的接轨，这就决定了它与全国文学的发展状态相比有异和同两个方面——其相同处在于诗文与全国文学合流，其不同处则是：在全国明代文学中只占三分之一的诗文，在云南却成为主体。明代云南文学的这一状态，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图所能改变的，而这正是明代云南文学的特点，也是本书所要探究的主要内容。

再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这一条重要的线索着眼，云南文学与全国文学相比也有所不同。由于明代云南文学以诗文为主体，中心地区的复古风气在一些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中也不可避免地有所表现，但是这种影响

从不曾对云南文坛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或说由于云南诗文的流派体系并没有明显地形成，所以也就没有任何一个主导思想可以左右不同时期的文学，进而左右作家的个人创作。当然我们也可以列举出一些相反的事实，如张含的文学思想，在前期明显地受到“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复古论的影响，唐尧官的文学主张也表现了明显的复古意识，而担当的复古理论在明末与陈子龙同步。但事实的另一面是，云南诗人的复古观并非对七子派亦步亦趋，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张含虽然先接受了李梦阳的影响，进而却更多地接受了杨慎的影响，这才成为云南成就较高的诗人。再者，杨慎对明代复古派领袖的门户意识本来就相当反感，他以其特立独行的文学思想和自成一家的创作，成为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而别开明诗境界的诗人。所以我们不妨说，由于杨慎在云南的重大影响，嘉靖时期的云南诗人虽然也受到外界复古派的影响，却不会在其流风盛行于天下之时，被熏染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即使在缺乏杨慎这样的文坛领袖的其他时期，云南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也没有明显的门户倾向，而是显出了强烈的地域色彩。

云南文学在明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诗文创作成就引人注目。从全国文献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张志淳、张含等人的著作提要，明末清初钱谦益纂辑《列朝诗集》录入的云南诗人诗作有杨一清、张含、兰茂、郭文等数人，还有迁谪流寓云南的诗家数十人以及丽江土司木氏家族的诗人。清代朱彝尊编辑的《明诗综》除选录了郭文、张含、李元阳、王锡袞等云南诗人的作品外，还选录了仕宦和谪戍云南的众多诗人之咏滇诗。清代王士禛所撰《居易录》记载了“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及董难等诗人。从本土文献看，《云南丛书》明代以前别集为空白，明代则有18种。秦光玉辑《滇文丛录》载汉代至明代近200家，文200余篇，其中明以前只有24家，文45篇（包括语录），明代则有154家，文167篇（包括碑文）。李根源等辑编《永昌府文征》，诗歌部分汉至元代总数仅有19首，而明代录诗1578首、144家。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别集类明代以前仅著录3部，明代则著录了168家。张文勋老师主编的《云南历代诗词选》总辑诗词800首，诗人343家，其中明代诗人占40%，诗家占31%。从作家声名看，安宁籍的杨一清和长期流寓云南的杨慎，昆明郭文和高应雷，嵩明兰茂，呈贡文祖尧，禄丰王锡袞，诗僧苍雪、担当等，在外界均有大小不同的影响，张含父子和“杨门六学士”称名于外，木公、“三山”亦为人所知。然而因研究、推介不

力，明代云南文学的成就，至今并不完全为外界所认识。如兰茂、张含、李元阳、王廷表、担当等作家不仅有成功的文学创作，还有值得重视的文学理论，然而近年出版的《明诗话全编》^①虽然收录了云南数家文论，但于兰茂，只摘录了其《声律发蒙》而未见其论诗绝句九首，担当的文论则完全失收。

其实早在明初云南诗歌就有甚大影响，这就是“平居陈郭”和《沧海遗珠》。“平居陈郭”是明代前期昆明隐逸诗人郭文和省外谪戍文吏平显、居广、陈谦等3人的并称，这个并称见于典籍，包括《明史》（《文苑传二附·王绂传》），杨慎的《升庵集》（卷五十七）。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卷十六引）更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由此可见，作为清代著名文学史家的朱彝尊，对“平居陈郭”的关注程度有多高。《沧海遗珠》这部诗歌总集具有珍贵的文学史价值，它载录了明初迁谪流寓云南的21位诗家及作品，其编选者是黔宁王沐英的第三子、当时云南都督沐昂（1379年~1445年）。四库馆臣赞其“去取颇为精审”，在明初的诗歌总集中犹可称为善本，非万历以后的诸家选本之相互标榜，珠砾混淆者可比^②。这部诗集曾经盛行一时，袁嘉谷曾用《列朝诗集》和《明诗综》这两部著名的总集为样本，对《沧海遗珠》远达清代的影响做过一个统计：“《明诗综》选王景一首，王璫（汝玉）五首，张洪一首，曾烜二首，邾（朱）经三首，范宗晖二首，平显二首，施敬十一首，刘叔让一首，皆取材于此集，《列朝诗集》几于全收。”（《滇绎·沧海明珠》）作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钱谦益编纂的《列朝诗集》成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实际上他在天启初年即萌发了编纂此书的念头，但因故而辍。时隔20多年，在原先的合作者程孟阳（嘉燧）离世后，钱氏心怀百年世事之悲，一人独担“采诗”与“庀史”之责^③，3载始成其编。《列朝诗集》载录明代诗人2000余人的作品，一些在当时即已身名俱沉的诗人藉以存世，一代诗史亦得以较为全面地展现。如果我们说《沧海遗珠》在明代前期文学史上的意义类同于《列朝诗集》，决非夸张之辞。明初作家作品散佚甚多，往往不可稽考，谪戍者的作品更是如此，而《沧海遗珠》恰恰以此为辑录对象，其珍贵价值不仅体现于云

① 吴文治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沧海遗珠》目录后。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自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19页）。

南文学史，它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珍籍。可见，云南文学崛起之时即气度不凡。

（二）云南作家形态与全国之差异

以诗文为主要形式的明代云南文学，其作家形态与全国同时代的同类文学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何以如此说呢？众所周知，明代诗文以流派众多为特点，在明初则突出地表现为地域作家群现象。这是因为朱明王朝建都南京，南方文坛的地位比较突出，又因统一不久，全国文坛尚维持着在元末割据形势下以地域分野的形态。胡应麟《诗薮》曰：“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江右诗派昉于刘崧。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①对于胡应麟此说，迄今学者并无多少异议。但随着朱明王朝大一统局面的稳固并迁都北京，明代中后期的文坛领袖，往往以聚集门生同僚为基础而形成文学流派，有意识地进行文学活动，又每每以一派文风盛行天下，全国中心地区的诗文因而呈现出茶陵派、前后七子、公安派、唐宋派、竟陵派等文学流派迭替和论争的态势。另一方面，作家群现象也同时存在，如“弘治十才子”、“吴中四才子”。然而在整个明代，作为云南文学主流的传统诗文，并未形成足以用流派称之的作家统系，作家群的现象也只是在一些时段相对突出，如嘉靖时代的“杨门六学士”。文学流派的涌现是文学发展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云南文学直至明代才得到发展繁荣的重大契机，所以流派成熟的时机尚未到来。如果严格地以共时空这一基本条件来衡量，连作家群也不多见。但是假若我们比较宽松地看待这个问题，亦不妨把明代云南作家的形态作群体观。沐昂编辑的《沧海遗珠》全为滇戍诗人，他们却不一定共时空，而杨慎对明代云南作家所作的一个概括，可作为这一认识的又一印证：

洪武中，学士王景常、御史大夫韩宜可、编修花纶、长史程本立，名流诸公数十辈先后流寓其地，诸执戟于役，又多江南移徙，敦悦余风，相观而善。自昆明西届永昌，东极临安，人士彬彬，汲古撝藻，又以远方不乐仕宦，故学不为科举而恒嗜声律。观《沧海遗珠》一帙，为杨文

^①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

贞公（杨士奇）所赏，其诗与《鸣盛集》及《选粹编》埒工媲美。其后有“陈郭平居”四子出焉。四家之后，各有宗派，溪渔其一也。溪渔既抱璞怀馥，又与在轩胡公、两湖叶公二三诗人同闲连墙，声之绮靡，与滇之山水相辉映，是可无传乎？^①

杨慎所言，囊括了从明初到嘉靖时期谪戍云南的作家、本土隐逸作家和内外混和的唱和诗人群等几种类型，虽然溪渔（孟富）的宗派史料不详，在轩（胡廷禄）与两湖叶公的唱和，其成就和影响远远不能与“平居陈郭”相比，更不能和“杨门六学士”相埒，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杨慎看到了云南作家创作活动的基本形态——以某种相同的身份而形成相近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他们可以是共时空的，也可以是跨时空的，《沧海遗珠》所载 21 位谪戍诗人亦如此。杨慎也指出了谪戍作家“先后流寓其地”，却“敦悦余风，相观而善”，隐逸作家则既“不乐仕宦”，“学”又“不为科举而恒嗜声律”，其他诗人之聚合，则因相互唱和之乐。可见，明代云南作家的形态，主要以某一身份角色的类同为群体，而不拘于共时空条件。以共时空为基本条件的作家群，则有“陈郭平居”（即“平居陈郭”）四子和以杨慎为中心的“杨门六学士”，胡廷禄和两湖叶公尚不能算作家群。

简言之，在概念上文学流派严于作家群，作家群严于某种身份类同的作家群体——某些作家因某种身份类同，或形成共同的创作倾向，或表现了他们生活的基本状态，更或在文学主题、文学风格等方面有所类同，这样的作家群体是自然的、原生态的，或说是以后世文学史家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这就打破了文学流派所具有的派系意识、宗主意识和风格意识，也没有作家群共时空及共同文学主张方面的限制。明代云南作家这一基本形态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学后发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独特历史文化环境的因缘。除汉以来中原主流文化、文学传入之绵远而微薄的积淀外，主要因为明王朝统治边陲，实现大一统的文韬武略，使文学家自然而然地以某种文化身份或社会角色来进行创作，因此，地缘和时空在其中就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明代云南”这个历史和地域的概念下，云南文学的主体作家大

^① 天启《滇志》卷二十四《艺文志·溪渔诗集序》，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6 页）。

致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其中又可细分为宦滇职官、谪戍作家、宦游作家、隐逸作家、遗民作家、文学家族等六种类型。此外有并称作家如“平居陈郭”，还有作家群如“杨门六学士”。这当中必然会产生交叉的情况，这正表现了明代云南文学的立体性和复杂性。所以本书各章的论述，并不完全为类型所囿，笔者或以身份（如《沧海遗珠》作家群），或以所系中心人物（如“杨门六学士”之于杨慎），把一些作家归入到相应的章节中。这样的论述基本结构，可以较好地整合作家作品，其思路来自对明代云南文学实际的考察，应当比较接近文学史实。

苏东坡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壁》）明代云南文学的态势是否也如此呢？试图探讨明代云南文学形成及演变的种种现象、创作态势，以及它和全国诗文在交融中如何保持自身特点，我们以纵横交错的时空为经纬，基本立足于对几大类型作家作品的研究，力求在此基础上对明代云南文学作出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这样，或可突破一般文学史叙述的平面性，从不同的侧面突显明代云南文学的特点，进而更为深入地开掘和描述其独特面貌？笔者希望能在在这方面做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也是本书研究明代云南文学，不采用文学史分期论述的一般体例，也不以单个作家作品之研究为体的主要原因。

（三）云南文学与全国之交流

判断一个时期的文学是否繁荣，对外交流和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尺度。

就作家群体而言，明代云南文学与全国文学的交流有三个突出特点：其一，宦滇和谪戍作家既带来了内地文学的风尚，又受到云南山川风物的影响，他们在滇云的创作因鲜明的地域色彩，不仅在其个人作品中别具一格，也成为云南文学的一个部分。如茶陵派“六公”中的何孟春，后七子中的徐中行，弘治十才子中的朱应登之创作皆如此。其二，云南本土作家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始终保持和发展了地域文学的特点，为明代云南文学与全国文学的融合作出了贡献。其三，同一个时期的作家唱和并不受地缘的局限，如“平居陈郭”中有3个外来文人，“杨门六学士”中有昆明、晋宁、大理、永昌等地的诗人，永昌汤琮等5人诗社中也有江南诗人。本土和外来作家之间的交往，形成一时文学之盛事，使得明代云南文学空前繁荣。

就作家个人而言，宦滇、谪滇作家和本土作家中某些成就较高者，以其全国性的地位和影响，使云南文学走向全国，为外界所认识。安宁籍诗人杨一清虽不居于本土，但他以刻骨铭心的乡土情结，扩大了云南文学的影响；杨慎在 30 余年的谪滇生涯中，不仅使嘉靖中后期的云南文坛成为全国翘楚，而且培养并向外推介了不少云南作家；李贽在姚安栽培了陶珽等一批文士，促进了云南文学与外地的交流。再者，本土宦游或流寓外地的作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内外交流的桥梁：永昌张含年少时随其父宦游，结识了杨慎并与其订交，他和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也有密切交往；大理诗人李元阳仕宦朝中时，在嘉靖前期京城诗坛上有一定声名，又与唐宋派领袖唐顺之同气相求，后来和李贽交谊匪浅；呈贡诗僧苍雪在江南声望极高，和他同里籍而流寓江南的诗人文祖尧也有较大影响；昆明诗人高应雷流寓湖南溆浦，留下了一段文学交往的佳话。上述诸人是明代云南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进行文学活动的时期，亦为云南文学发展的繁荣期。不过，我们既要承认以杨慎为代表的外来作家对云南文学的影响，也要对兰茂、郭文、张含、李元阳等本土作家的影响有充分的估量。

就时期而言，在嘉靖和明季两个阶段，云南文学与外地文学的交流比较突出，下面分别简述之。

1. 杨慎与嘉靖云南诗坛。从嘉靖四年（1525 年）初来到云南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由于杨慎谪居滇云，云南成为全国文学在西南的一个重镇，这种情况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杨慎到来之前云南诗坛并非寂无所称，如隐逸诗人郭文、兰茂和《沧海遗珠》作家群，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由于“大礼议”的结果，杨慎这个嘉靖时代全国文学的重要领军人物被充军云南，使得几乎整个嘉靖年代，云南诗坛都因其影响而为全国关注，也是无须争辩的事实。如果注意到在杨慎被判谪戍云南的嘉靖三年，短时期内京城诗坛因“大礼议”的处罚，导致了诗人群体的风流云散及诗坛格局的重建，进而促进了领军人物谪戍地文学的兴起，云南正得其益这一事实^①，我们就会对嘉靖云南诗坛的历史地位有更为恰当的认识。还有一个“如果”：如果我们再从“杨门六学士”着眼，以李元阳卒于杨慎之后 20 余年来论，这种影响就更为长远

^① 该论见余来明《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第四章，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了。杨慎在云南不仅凝聚了以“杨门六学士”和滇云各地作家，如“安宁诸友”邱月渚、杨墨池、张松霞辈，大理隐士董难，邓川杨南金，昆明沐九华兄弟，丽江土知府木公等诗人，而且吸引了海内“名硕谕德”，“千里神交，邮书相讯”^①。可见，由于杨慎的巨大影响，远在边陲的嘉靖云南诗坛也因此而备受外界的关注，这无疑提升了明代云南文学在全国的地位。

2. 明季云南诗人与吴中文士的交流。明季云南诗人与吴中文士多有交往，从吴中地区在全国明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来看，这也是一种必然。当时云南诗人或寓居，或宦游，或专程游历于吴中，形成了云南文学家与吴中文士交往的一道风景线。成名于江南的苍雪在吴中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声望，这时期云南文人结识江南名士，大半由其引荐。因此，苍雪虽然不在云南，他却是杨慎之后云南文学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钱谦益、吴梅村、董其昌、陈继儒、毛晋等名重一时的诗人、书画家、藏书家和出版家与苍雪都不是泛泛之交，本土诗人涉足吴中者，亦往往通过苍雪的引荐而得以和他们结识。如丽江土知府木增请毛晋刻印书籍，就是通过苍雪介绍的（见毛晋《野外诗卷·送法润禅师载〈华严忏仪〉还南诏》小引）。钱谦益不仅为苍雪的诗集作序，而且在苍雪圆寂后为其作塔铭（《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六《中峰苍雪法师塔铭》），《梅村集》更以《赠苍雪》冠首。晋宁诗人唐大来（担当）游历江南时与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有深交，其诗其人倍受他们的称赞。呈贡诗人文祖尧宦游娄东，鼎革后曾依苍雪而寄迹中峰寺，后居昙阳观，他住中峰寺时吴梅村曾相送，他居昙阳观时吴梅村又曾相访。宁州土知府禄洪父子亦与董其昌、陈继儒有文字之交。以上事实说明，云南文学家终明之世都非偏居一隅，寂寂无闻。杨一清跻身于中国文学史的名家固无愧色，杨慎在云南的创作，亦是奠定他在全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部分。

上述种种情况，呈现了明代云南文学与外界交流的复杂状态，同时也显示了明代云南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四）云南文学审美特点大略

云南文学在明代异军突起，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此前各时代的总和，

^① 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四库全书》本《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

而且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诗文的所有样式：文有赋、颂、赞、记、疏、序、跋、碑、表、檄、书、铭、论、说、议、辨、考等类别，诗有歌行体、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绝、排律、六言等各体，词这一形式也为作家们所喜爱，真可谓众体皆备，百花齐放。

明代云南文学与全国文学相同的形式，表达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内容。在与全国同时期文学的融合中，云南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必然使其在全国同类文学的大系内，部分地形成独有的文学内涵和审美特点，也就是地域文学色彩。从各个不同类型作家及其代表的诗文创作中，我们可以大致抽绎出明代云南文学的基本精神和审美特点。在与全国文学的交流及云南文学自身传承的合力作用下，明代云南文学如同这块土地那样绚丽多彩，作家们在文学形式上兼收并蓄，在艺术风格上雅俗并举，并积极创新求变，表现了乡土情怀，独立人格，爱国激情和丰富的人本思想。在审美层面则形成了或奇崛雄健，或清新秀逸，或幽永婉丽，或沉郁疏朗的审美境界——这一切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景观为背景，成为与全国中心地区传统文学同中有异的地域特点。这样的概括显然是比较抽象而不全面的，在具体的论述中亦难以一一对应，所以笔者只是把散见于本书的这些基本描述先抽绎出来，对明代云南文学的地域审美特点作简要阐述，较为详细的论叙则见于各章节。

地域文学的特色，无疑首先表现在富有本地山川风物特点的艺术形象上。不论是本地作家还是外来作家，都对这块土地充满了新奇感和热爱之情，这里的一切观之不足，写之不尽，正所谓“镇日相看浑不厌，丹青写入画图”（王来贤《焕文山》）。山川风物与人文情怀，自古在传统文学的创作中相得益彰，甚至不妨说人文是山水的灵魂，山水是诗文的泉源。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以“得江山之助”来论《离骚》的独特风格，这个说法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其指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如《新唐书·张说传》记载，张说谪居岳州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黄庭坚在《书自作草后》亦说自己寓居开元寺的怡惺堂时，由于可以坐见江山，故而在这个地方所写的诗别有灵趣，似得江山之助^①。关于诗文与山水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大理著名诗人李元阳在《送元罔马大夫之任序》中说得很明确，他认为“人由地佐，地以人重”，并说山水可以助人益文，反之人文亦可以助山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谷集·别集》卷十。

水成名：“地以文显，景因人胜。”（《玉湖游录序》）事实上，云南的山水不仅成就了明代许多诗人的山水诗文，也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歌之咏之，抒发各种情怀的独特艺术背景。缘于这个背景，明代云南诗文形成了主要意象群，水如滇池、洱海、澜沧江，山如太华山、五华山、苍山、玉龙雪山，花如山茶花、杜鹃花、梅花，等等，从而奠定了云南文学独特的审美风貌。另一方面，云南的山水也因全国各地和本土文士的题咏，具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积淀为深厚的人文底蕴。

印证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用《沧海遗珠》这样典型的例子，也可以从各时期诗人的创作中去领略。《沧海遗珠》是明初中外诗人在云南因缘聚会，吟咏滇云的结集，杨慎《升庵集》中有大量咏滇诗，后七子中的徐中行就把自己的一本诗集题名为《滇池集》（全集已佚而有遗篇）。杨慎的《滇海曲》以“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对春城昆明作了最为贴切的描写，至今仍为昆明的一张名片。其他诗人也有很多精彩的描写，如郭文《滇中竹枝词》：“金马何曾半步行，碧鸡那解五更鸣。”冯诚《游太华寺》：“山花有色多红白，野鸟无名自去来。”韩宜可《题五华山图》：“翠藁影落中天晓，玉柱含光大地秋。”陈逊《北岭晴岚诗》：“边城胜景晴如海，赋得新诗思欲醺。”段信《判山耸翠》：“崑崙群岫俯孤城，翠色横秋驻晚晴。”侯璉《高黎贡山》：“高黎贡山花正红，千岫万岫烟云中。”李元阳《泛洱水》：“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马继龙《沧江怀古》：“孤江铁索跨长虹，鸟道从天一线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有许多表现山水胜景和人文胜迹的文赋，如唐尧官的《山茶花赋》、王士性的《泛舟昆池游历太华诸峰记》、李元阳与冯时可的《游鸡足山记》等等，汇成了明代滇云山水诗文的洋洋大观。江山胜景或柔美或壮丽，四时风物或旖旎或凄清，一旦进入文人的创作世界，就与滇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作家们的个人别集中把它们识别出来，即使不出现地名，对那些富有滇云色彩的意象，也不用进行考证。在七子派流风裹挟天下时，外来作家和本土作家在云南的创作，却挟带着高原山川清新健美，朗润自然的气息，蔚为云南地域文学之大观。

在带有鲜明云南色彩的景物中，融进了明代文士的乡愁和失意，舒卷着历史的风云和沧桑，表现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雄心，使明代云南文学呈现出厚重的人文内涵。张文勋老师把“中华民族精神的诗化表现”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国家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爱国精神”、“以道德为准绳的主体人格精神”、

“以‘中和’为目标的和谐精神”^①。中华民族这四个传统精神的诗化，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气质，在明代云南诗文中亦有同样突出的表现。不仅如此，因为圣朝天威的空前远达，因为鼎革之际的激烈振荡，在明代云南诗文中，这四种内在气质的表现，有时甚至超过了同时期全国文学。无论宦迹有多么辽远，仕途有多么艰难，抑或逃禄于山野，持节于僻壤，明代云南诗文中表现的民族精神，让我们今天翻开卷册，仍觉动人心弦。教育和科举造就了明代云南本土文士，但他们中的多数并非专力于文学，也就没有必要矫情，宦滇、滴滇职官在云南的歌咏同样如此。所以，在他们笔下多是切实的王朝文治武功之实录，和着发自内心的爱国激情，以及亲情、友情和乡情，使明代云南文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诗化的一个部分。除了抒情言志的诗歌，以及记叙山水胜境、描写个人情怀的各类记叙文，我们还可以从施尧化的《新建重关记》、侯璉的《新筑腾冲司城记》中看到巩固城池的军事举措，也可以从严清的《迁巡抚都察院记》、曾存仁的《布政司题名记》中看到政权建立的轨迹，还可以从陈善的《重修提学道记》、王鳌的《重修云南府儒学记略》中看到文治的努力，从张洪的《感通寺记》、陈晟的《香林寺记》中看到宗教的兴盛。这些文章既不是官样的，也不是客观冷静的记录，而是充满了欣逢盛世的激情，跃动着建功立业的雄心，所以虽为历史文献，却不妨作为不乏文学意味的散文来欣赏。

清代倡导“性灵”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这个比喻带有封建士大夫玩弄女性的色彩，不值得提倡，但后一句用之于论诗则颇为贴切。文学作品要使人“动心”，不能只有精巧的修辞，而必须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唯有其真，才能动人。诗人们自豪地歌颂仕宦云南的种种感怀——有的歌颂大一统局面：“越裳文物齐中土，声教从斯振古今”（陈文燧《云南贡院即事》），“鼓角边城静，车书乐土遐”（胡大观《至滇》）；有的歌颂各民族和睦景象：“未论文教开荒服，已见夷民款圣朝。鸟语花明迎使者，澜沧江上瘴全消。”（朱应登《澜沧江》）这显然不是苍白的颂圣之歌，而是由衷的情感。作家们也会有怅恨悲愁，如雷应龙《送别陈大刚上舍》：“仕路一万里，儒冠三十年。”马继龙《闻笛》：“年少贾生差作赋，数奇李广不封侯。”这些诗

^① 张文勋《中华民族精神的诗化表现》，《国学丛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17页）。

作，让我们感知了封建时代仕宦的辛劳和壮志难酬的郁闷。然而，诗人们入世的热情并没有因而消减，如杨应科《云南坡题壁》吟道：“楚水黔山九度过，壮怀今尚未消磨。”闪继迪《秋兴》吟道：“厚禄清朝才俊满，莫教汉主忆廉颇。”

更令人感动的是，作为治理天下、为民父母的职官，作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许多诗人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悲悯情怀和勤政为民的品德，即令“俸钱差素饱，奔走幸荣形”，萦绕于心的仍是“民困何由息，心同敢自宁”（庄诚《大理道中》）。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的情怀，使他们在灾难降临时责难自己无力救民于水火：“才疏民瘼总萦心，时难捧米徒充口”（周仕国《洪涛吟》）。他们也会对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沉痛之感，邓渼的《行部迤东西轺中杂述》详尽地描述了战乱和酷吏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灾难，何孟春的《洮岷道中》也表现了对民艰的忧虑：“几处青稞熟，深忧白雨伤。荒城谁为守，十室九逋亡。”对人民的同情，必然导致对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批判，唐尧官的《从军行》四首鞭挞了拓地开边所造成的危害：“有道守四夷，拓地亦何为？嗟哉远征人，徒使妻子离！”（其一）陈佐才的《农夫哭》则表现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农夫农妇相对哭，可怜人反不如畜。”除了诗人们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地方官的章疏中看到对政治弊端有力的批评，如蒋宗鲁的《奏罢屏石疏》，陈用宾的《罢采宝井疏》等等。

还有不能遗漏的一笔：在鼎革之际，许多作家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发出了呼号，对这些作品，我们今天亦不能只作封建狭隘的民族情绪观。只有这样，诸如陈佐才、陆天麟对故朝的哀悼，高应雷、文祖尧对故园的执著——也即明季遗民的诗歌，才能得到其应有的地位。如果一代作家心中只有“小我”，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就无从升华到“大我”这一崇高的精神境界。明代云南文学家的心中不仅有“小我”，更有“大我”，一代文学也因而具有了灵魂，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魂。云南文学的这一特点在明代一以贯之，在明季由于云南几比京畿的特殊历史地位，表现得更为强烈。

作为引论，笔者对明代云南文学崛起的独特历史因素，及其在全国明代文学视野中的特点和地位进行了大致勾勒，虽然已经说了千言万语，但差可算作对明代云南文学的一个匆匆巡礼，下面将要在各个章节中展开的论述和考辨，或可相对深入细致地展示其主要风貌。

第二章 宦滇职官的咏歌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明王朝开创了把云南全面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的新纪元。随着云南各级政权的建立，大量科举出身的职官陆续入滇，有的人甚至不止一次与这块土地结缘。他们秉承王朝的使命在云南施展文治武功，成民化俗，不仅政绩卓著，许多人还斐声文苑。宦滇职官既是明王朝统治西南边陲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同时也为明代云南文化的兴盛作出了贡献。宦滇职官的文学创作表现了绝域仕宦的种种情怀和审美感受，成为明代云南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天启《滇志》载：“崇阳汪文盛，四明张时彻，白门刘麟，长州皇甫汸，番禺郭棐，天台王士性，吴郡冯时可，皆著声文苑而官滇，著作尤多。”^①《滇略》云：“文苑则中丞钱塘郑颺，郴州何孟春，吴兴顾应祥，崇阳汪文盛，侍御华亭包节，豫章邓渼，藩臬鄱阳童轩，吴兴徐中行，四明张时彻，白门刘麟，长洲皇甫汸，铜梁张佳胤，缙云何镗，钱塘陈善，莆田方沆，闽邓原岳，番禺郭棐，华亭冯时可，皆以文章名世，而政事勋业烂然不能相掩。”^②这两个名单所列人物，可谓当时宦滇作家中的佼佼者，在当时云南，也称得上群星丽天了。

有学者曾做过一个统计：“天启《滇志·官师志》记录了有明一代3210位宦滇官员的政绩以及45位谪居流寓云南官员的寓迹，据记载，从洪武到天启二百余年的历史中，曾经有59人出任过云南巡抚，有137人出任巡按，有448人出任过云南布政使司中的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职，有329人出任过按察使和按察副使及僉事，有196人出任过云南都指挥使司中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僉事等职。见于题名的还有2041人担任过云南各府州县的知府、知州、同知、通判、推官等地方官职。这些能见于记载的基本都是有一定的官阶，至少都是七品

^① 天启《滇志》（卷三十二）《搜遗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滇略》（卷五）《绩略》。

以上的官员，而职单位微的官员当还不计其数。”“他们来自内地的山西、山东、南京、浙江、福建、河南、河北、湖北等十余个省，涉及大半个中国。”^①

《云南通志草》云，其“艺文”载录的标准之一是“其人不必滇，而其事必滇也”^②。这个原则可以省却重叠或遗漏，也更能突出地域特色。本章所述作家，以其作品和行实载入云南方志者为限，兼及其他典籍时亦以关涉云南为限。另外，即使以文名甚著论之，人数亦不能过多罗列，只能取其代表作家，考其宦滇行实，从而勾勒这个作家群体在滇云的创作，并以他们的代表作来反映其基本创作风貌。

宦滇作家创作状况的兴衰，大致与明代云南文学的发展相一致而又不尽相同。下面以他们的宦滇年代为序，择文学成就较大者论列之，其宦滇行实和作品有疑者则加以考辨。

一、洪武以来之渐兴

洪武十五年（1381年）以来云南各级政权迅速建立，宦滇文学自张翥起始而渐兴。

张翥（？~1403年）字昭季，陕西富平（今西安）人，《明史》卷一百五十一有传。洪武中举明经，为东宫侍书。洪武十五年（1382年）张翥为左参政，迁布政使，凡云南贡赋法令、典仪制度皆为其所定，颇得民心，在他治理下境内安宁。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张翥入朝履行考绩，朱元璋特令吏部免考，并在同年二月的《谕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张翥敕》中曰：“西南诸夷……命官抚守。尔张翥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则诸蛮耳入，令布则诚信相孚，奠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来朝，不待考而朕各功居考内，出九州岛十二牧守首，惟翥为最。复命仍治黔南。汝往，钦哉！”^③张翥任布政使17年，执法廉洁，不避权要，赢得了滇人长久的怀念。

张翥的诗文多为他在云南任上所作，徐纮的《明名臣琬琰录》（卷十

① 沈海梅《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0页）。

② 转引自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84页）。

③ 天启《滇志》卷十一《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页）。

二) 载尹直《吏部尚书张公言行录》云：“闻其遗文，亦多是云南所作，雄健简直，类其为人，而深恨不见其全。往岁曾托友人杨一清访而求之，近今寂无所报。”《四库全书总目》载张欽《云南机务抄黄》一卷、《冢宰文集》一卷，又有万历间富平知县刘兑编辑的《频阳四先生集》四卷，录张欽、李宗枢、杨爵孙、丕扬等四人的诗文。张欽的文章质朴无华，如《感通寺记》、《建布政使公廨记》、《铜漏铭》、《麟溪集序》，不外实记其事并兼发成风化俗之论^①。天启《滇志》（卷二十八）载张欽的近体诗一律一绝共二首，咏滇池西畔的太华山胜迹。《太华山》：“太华嵯峨一望遥，到门犹似隔溪桥。兹云长见阶前起，孽火都来海上消。屋近树阴晴亦暗，砚涵竹露夜还潮。从今剩买游山屐，野客无妨屡见招。”《华亭寺》：“行过松溪与世分，华亭楼阁映青云。何当海阔天高处，长倚禅林作隐君。”二诗的风格同其文章一样平实，并且都在末尾透露了这位封疆大吏对林泉风流的向往。然而繁忙的政务，不可能让他作这样的选择。

张适，字子宣，苏州人，明初以儒士征授水部郎中，旋即放归。集中作品往往自称为滇池老渔，《祭西平侯》文则自署云南滇池渔课司大使。著有《甘白集》六卷，为正统十二年（1447年）其子张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文体修洁而未造深厚，如在嘉隆以后，则为雅音。在元明之间，则未能与诸家壁垒相当也。”生平不详，据四库馆臣此说，似为由元入明诗人。

侯璉（？~1450年），《明史》卷一百七十二有传。字廷玉，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人，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侯璉少年时就表现得性情慷慨而有志节，正统初因随从尚书柴车出铁门关御阿勒台有功，晋升为郎中。据其《新筑腾冲司城记》，正统六年（1441年）兵部尚书王骥统大军出征云南麓川，遣侯璉为先驱，日夜兼程行经高黎贡山入麓川，平定后参赞云南军务。《新筑腾冲司城记》云：“迨壬戌（正统七年，1342年）七月，云南遐荒，去京万里，百蛮杂处，叛服不常。自昔虽有武臣镇临，特乏文臣以佐耳。乃勅兵部左侍郎侯璉、刑部右侍郎杨宁迭更参赞戎务，用靖边夷，参赞云南军务。”^②景泰初侯璉以平边有功转兵部尚书，景泰元年（1450年）提督贵州军务时因劳累过度而病卒于普定

① 以上诸文依次见于天启《滇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云南通志》卷二十九、《明文衡》卷四十一。

② 天启《滇志》卷二十《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5页）。

(今贵州省普定县),终年53岁。《万姓统谱》(卷六十三)载“云贵两省军民至今企慕之”。侯璉名列天启《滇志》卷十《勋业名贤》,永昌府文献也有对他的记载。七古《高黎贡山》是侯璉的征途纪实之作,在军旅雄风中流露出对滇云奇景细腻的体验。诗曰:“高黎贡山花正红,千岫万岫烟云中。险道岩峣锁青黛,绝巘突兀摩穹窿。莺声鹊声满丹峤,远色近色皆苍松。记取此景付彤管,豪吟野眺生春风。”《滇略》(卷二)云:“高黎贡山在腾越东北百余里,古名昆仑冈,夷语讹为高良公云。界龙潞二江之间,潞江冬月无霜,而此山巅霜雪严沍,蒙氏封为西岳山。上下东西各四十里,登之可望吐蕃之雪山。山顶有泉,东入永昌,西入腾越,故又名分水岭。”对这样一座险峰及戎马倥偬征程的感受,诗人避开了平庸的记叙或描写,而是以出人意表的笔触开篇。一个“正”字,就把诗人对边陲腊月,高山之巅鲜花怒放这一景观的奇特感受恰切地传达出来。接着再以“千岫万岫”的烟云烘托山势之险峻,红花则宛如美丽的少女,映衬着山的雄姿。第二联进一步突出关山岩峣,险道摩天的景象。第三联则转而写听觉,“莺声鹊声”使雄峰充满了灵动之美。尾联抒发心旷神怡的情韵,意趣悠远。全诗刚柔相济,形象鲜明,让人浑然忘却了这是军旅之诗。

郑颢,生卒年不详。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贡士。正统间任云南按察副使,景泰间任云南巡抚右佥都御史。郑颢为官练达民情,政肃令行,才情则尤擅文章。正德《云南通志》、天启《滇志》均载其事迹和诗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九)所载犹多。郑颢的诗有的表现了对庄禅的思慕,如《春日游圆通寺》、《题雪谷》、《清旷轩》等。七古《登旷怡楼》描写了昆明禅寺幽雅奇丽的风景:“上人栖迹云霞中,楼居背倚青芙蓉。映帘花木四攒绕,深幽雅称金仙宫。古闻滇阳擅佳丽,五华特秀西南丛。沧波远引势吞吐,城门俯瞰烟溟蒙。楼台万井互参列,浮图百尺高凌空。面前冈峦总奔赴,嵯峨宛若君山峰。”深幽的是禅房花木,特秀的是奇山异水,沧波远引,冈峦如赴,景象如在眼前。诗人不只善于表现江山之美,也关怀现实民生,《巡边至水平过沙木和驿有感》就抒发了巡边的感受。开篇先描写望中所见:“长林散晴霭,曲涧鸣春泉。野芳秀而沃,山花红欲燃。”山野之花本为鲜妍的“时物”,触目即惹起诗人的欣赏之情,然而转瞬就触动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怀:“边民久凋敝,兵戈困连年。”美丽的春天与民生凋敝的情状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诗人不仅仅产生了忧虑,更激起了他“绥来乃吾责,布德诚所先”的使命

感，让我们看到了其心系苍生的境界。

童轩，生卒年不详。字士昂，江西鄱阳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据天启《滇志》（卷十、十二）载，童轩在成化间由都谏出任云南提学金事。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卷十一）《童轩传》记载：“己丑（成化五年，1469年）入覲……改金事督云贵学政。”入覲即上京考绩，以定官员的调选。《明史》（卷三十一）《历志》记载：“成化十年（1474年），以监官多不职，擢云南提学童轩为太常寺少卿，掌监事。”据这两条材料，童轩任云南提学金事历时五年：成化五年（1469年）至成化十年。《罪惟录》（卷十）载弘治十年（1497年）童轩以南礼部尚书致仕，同书卷十一本传载其以疾卒，赠太子少保。

童轩的著作，《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载有《枕肱集》二十卷，《四库全书》收《清风亭稿》八卷，《提要》云：“第一卷为骚赋，第二卷至八卷皆诗。此集为其门人李澄所编，后有魏骥、杨守陈、沈周诸人题词。其诗雅淡绝俗，而在明代不以诗名。殆正德以后，北地信阳之说盛行，寥寥清音不谐俗尚故欤。朱彝尊《明诗综》仅录其《忆金陵》五言律诗一首，未尽所长。又引周吉父之言，称其《九日诗》‘黄菊酒香人病后，白苹风冷雁来初’，《草堂诗》‘草堂夜雨生蝌蚪，花径春风叫栗留’两联，亦非其至。或彝尊偶未见其全集亦未可知也。轩又别有《枕肱集》，今未之见，其存佚盖莫之详矣。”四库馆臣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童轩虽不以诗名，但沈周诸人为其集题词，足见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二，童轩之“不以诗名”并非其诗不佳，而是因其“清音”不谐正德以后的“俗尚”，即不合前七子的拟古之风。其三，童轩的诗“淡雅绝俗”，朱彝尊所称道的两联，尚不足以说明其成就。

童轩与吴中著名诗画家沈周（字启南）为挚友，曾相互论定其诗。成化二年至六年（1466年~1470年）童轩左迁寿昌知县，沈周作《送童黄门士昂出宰寿昌》诗。此外童轩与沈周尝互为对方的文集作序、跋。成化二十年（1484年）童轩在为沈周《石田稿》所作的序文中说道，他旧日路过吴中，沈周曾去旅舍中寻访，二人“握手论诗”，沈周拿出《石田稿》请童轩为序。童轩评沈周诗曰：“观《春雪》、《秋兴》诸诗，则知启南忧国之忠；观《家君赏菊侍行》诗，则知启南爱新之笃；观《送继南弟执役》及《和陈启东》诗，则知启南交友之笃。”（钱谦益《石田先生事略》）沈周的《题清风亭稿后》，亦表明他不愧为童轩的知己。诗曰：“一编新寄自严州，洗眼开心读不休。夜月有辉生白璧，春风无迹动

黄流。潮阳遣鳄多高思，蜀道闻鹃足远忧。落落乾坤雅音在，独怪绝唱少人酬。”^①和沈周并称“吴中四才子”的文徵明说，沈周“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终于忘世者”。^②清代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四）收录沈周《从军行》并注曰：“忘世人有此悲壮之作，诸选本往往遗之。”童轩并没有单纯地把沈周视为隐士，只见林泉高致，而是看到了其诗入世的一面，而四库馆臣对童轩诗的评价，亦显然受到了沈周的影响。沈周最欣赏者，是童轩诗的山水清音，宦滇诗作亦在其中。

《清风亭稿》和云南地方志载童轩咏滇诗多首，当为他在云南提学僉事任上的创作，有的诗本集未见载录。观其咏滇诗，自出机杼而不失雅正，即景生发而不事模拟。如天启《滇志》（卷二十七）所载五言律诗二首《鹤庆道中》、《天井铺》（这一首不见载于《清风亭稿》）。《鹤庆道中》中的“暝雪依巢鸟，斜阳归寺僧。林疎鸣败叶，涧古积坚冰”两联和《天井铺》“山高赤日薄，树老白云留。听瀑全疑雨，临风绝胜秋”两联，不仅对仗工稳，更捕捉了云南夏日风物的特点，清新的意象中蓄蕴着浓郁的诗情。童轩的格律诗也有形式比较疏放的，如《滇略》卷八所载《禄脰驿》：“京国云山远，悠悠入梦思。频年縻薄宦，何日是归期。鱼雁音书断，风霜道路迟。窗前残月白，起视夜何其。”羁旅客愁在边城的暗夜中，如此自然地浮上诗人心头，聚到笔端，格律虽然严整，却不影响对感情的表达，诗风也比只注重形式的一类要灵动得多。此诗《清风亭稿》卷五题为《禄脰驿和祝廷瑞侍御壁间诗韵》。“鱼雁音书断”一句，“断”作“杳”。童轩的歌行体在韵律的讲究中不失这种体裁特有的雄丽洒脱之美，如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所载《点苍山》（《清风亭稿》未见载）：

点苍山色何奇哉，芙蓉朵朵天边开。嶙峋直上九千仞，俯视群岫皆蓓蕾。夸娥不能移，巨灵不能劈，南风十日吹不平。但见云开横铁壁，琪花瑶草四时闲。此景仿佛非人间，千年老雪消不尽。龙湫六月生阴寒，我欲乘风升绝顶。倒控苍虬凌倒景，黄鹤仙人手可招，咫尺蓬莱五云境。

① 以上童轩与沈周的交往，来自陈根民《沈周与宰执宦僚交游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甫田集》卷二十五。

诗中既有生动的比喻，亦有夸张的描写，人间天上，风生水起，纵横开阖，音韵铿锵，表现了苍山的奇伟和秀丽。“落落乾坤雅音在，独怪绝唱少人酬。”来自实境和心灵感悟的诗篇，自然要出于流风之上，而不只讲究格律对仗之类。这是诗人的成功，也是滇云山水的骄傲。

朱应登（1477年~1526年），《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附于顾璘传后。字升之，直隶宝应县（今属江苏扬州）人，弘治己未（十二年，149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正德年间朱应登任云南右布政使，恃才傲物，因流言而罢归，仕宦终于此任。著有《凌溪集》十八卷，其中有赋二卷，诗十卷，文五卷，附录碑文、传铭、诗文一卷。朱应登在弘治、正德年间颇有诗名，他既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称“弘治十才子”，又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四大家”。在“弘治十子”中朱应登只算是“前七子”的外围，在“四子”中他却是与“前七子”关系最为密切者。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云：“李何并兴，李目空诸子，自三秦而外，得其门者盖寡，心慕手追，凌溪一人而已。其口占绝句云：‘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盖其文亦宗北地者。祝希哲赠诗云：‘大韶张官悬，九变尽美善。’陈鲁南诗云：‘摘毫扬美词，肆意逐高云。’李献吉诗云：‘疏越发潜响，烂若湍锦舒。’徐昌谷诗云：‘神飙清管发，逸兴白云俱。’其为名流所赏如此。”^① 观其诗，这些评论并非一味谀词，但四库馆臣说朱应登的诗“沉着顿挫处，则才力不及梦阳”^②，也是的论。《梦大复何子》是朱应登与前七子关系的明证，他完全把自己置于何景明门下，表达了景仰之情。如说：“篇章烦见示，触目见古色。浏浏清籁鸣，擢擢朱弦直。指摘发隽语，要我以终极。大质多浑成，至宝去雕饰。晤语忽复竟，惊起谢良德。”从诗意看，朱应登对前七子并不是单方面的热情，李梦阳的《章氏芳园饯朱应登》亦表达了对他的情谊：“细雨林塘花可怜，况有美酒斗十千。见日玄蝉元嘈嘈，含风绿筱自娟娟。朝廷岂料更新主，尘世难逢感昔年。纵倒芳尊不成醉，别怀忧绪两凄然。”^③ 看来他们不仅论诗艺，亦是朋友。

上文说到诸人评朱应登的诗并非一味谀词，他在云南的创作可以印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四十七。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凌溪集提要》。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空同集》卷三十。

证。天启《滇志》（卷十二）载其七律《兰（澜）沧江》：“千寻铁锁贯长桥，积翠浮天万壑遥。人向中流看砥柱，路从平地入岩峣。未论文教开荒服，已见夷民款圣朝。鸟语花明迎使节，兰（澜）沧江上瘴全消。”诗歌开篇的“千寻铁锁”意象来自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但这并不能掩盖朱应登全诗即景取境，自为创意的功力。《明诗综》（卷四十七）录此诗误题为《沧浪江》。从诗歌所咏景物看，《沿途咏怀》三首大概和《兰（澜）沧江》写于同时。诗为五言绝句，第三首犹佳：“岩栖夷獠自成家，残火阴阴绿树花。一枕江声清不寐，不知身已在天涯。”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所载《泛舟歌》以清新俊逸取胜。诗咏澄江，高原的这颗明珠如其名一般秀美，诗人以独特的笔触描绘了江景奇观，当写到“须臾长风起天末”一句时，人生忧乐，世事浮沉，历史兴亡之感一时齐集笔端，境界为之开阔。最后道“江流不管古今事，明日江头人复来”，可谓语尽而意不尽。全诗转接自如，笔调顿挫有致，颇有初唐歌行遗风。虽然用“翠肃爽”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江波难免有生造之感，但并不影响全诗的流畅。

《明诗综》（卷三十七）引许伯诚语云，朱应登教导诸生说：“文者言之精也，诗者言之华也。‘精’则寓文于质，故先体格而后组饰；‘华’则缘情制词，故首兴致而尚婉约。汉魏诗雅而邃，六朝诗艳而缛。辞随世异，情由衷发，吾于唐取其温厚焉。乃知见定于中，言发诸外，篇有所本，辞有所裨，信乎必传也已。”朱应登推崇汉魏、唐诗，可见说他穷追“李何”不为无据。不过在“情”和“词”中他先取“情”，追摹前人则先取其体格精神，主张“辞随世异，情由衷发”，这与“李何”之拟古论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何孟春（1474年~1536年），《明史》卷一百九十一、天启《滇志》有传。字子元，郴州（今湖南郴州）人，其祖何俊曾为云南按察司佥事。何孟春是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授兵部主事，正德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天启《滇志》称其“博雅冠于一时，政务安集”（按雍正《云南通志》作“政务简静”）。明世宗召为吏部右侍郎，嘉靖三年“大礼议”起，何孟春以上疏忤旨，夺俸调南京工部。告病归。隆庆时追谥文简。何孟春游于李东阳之门，《怀麓堂集》卷十有赠诗，题为《送何孟春归省其大父佥宪公且应湖南试》，诗曰：“山水湖南秀，英灵信有之。后来谁先子，今去有余师。汉室占星聚，虞廷指凤仪。聪明愚可守，此语未堪疑。”按诗意，李东阳与何孟春的祖父何俊有师生之谊。

何孟春学问渊博，在云南为官有所建树，《何文简疏议》十卷之第四卷至第八卷为其巡抚云南时作。孟春的疏议直陈时事，论说得失颇为剀切，就文学性而论成就甚高，从《复永昌府治疏》可见其章疏的特点。此疏《何文简疏议》未见载，天启《天志》（卷二十九）、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九）载之。文章开门见山直陈防患于未然的紧迫性：“臣闻消变于未萌者策之上，消变于将萌者策之中，变成而后救斯无策矣。”作者以危言开篇却并非危言耸听，下文环环相扣，从现实到历史，层层剖析陈述此论之起因，以征信开篇之论断，而后再回到题旨，接下来表明上奏的初衷：“臣叨授巡抚之寄，忧如焚灼，博采广询，共言惟是复府治、设流官以抚安于内，则外变自息。”由此顺势引出主张复设永昌府治之利者六项，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此策“决可弭患于将萌，垂泽于永久。如或一有无效，臣甘万死以谢妄言之罪”。这样的收笔，既表现了作者的气性，又有力地表明了何孟春建策之信度，可说深谙疏议之道。对于当时的云南来说，这道奏疏称得上实施控制，长治久安之策。从文学性来说，文章情理兼备，逻辑严密，言词质朴而不失文采，有汉初政论文之风，所以四库馆臣谓何孟春的疏议“卓然可传”^①。《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和天启《滇志》卷一《地理志·沿革大事考》，皆载世宗嘉靖元年敕设永昌府之事，天启《滇志》等并载敕文《世宗谕新设永昌府知府严时泰勅》，可见何孟春建策之切实可行。何孟春有《何燕泉诗集》四卷，诗风受茶陵派的影响比较明显。《明诗综》（卷三十一）只载其诗2首，云南地方志则未载。其实如《洮岷道中》这样的诗，在明诗中不失为佳作：“景色来西徼，萧条信远方。水分羌部落，山绝汉封疆。几处青稞熟，深忧白雨伤。荒城谁为守，十室九逋亡。”诗人关怀民瘼之情溢于言表，语言清简，诗风健朗。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今福建莆田市），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年间为云南按察副使。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九）载其为云南按察副使的时间为正德年间，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见素集附录·编年纪略》载：“弘治元年正月注云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十一月至云南，三年庚戌推湖广按察使。”秦光玉的《滇南名宦传》（卷二）亦载林俊弘治元年擢云南副史，世宗时卒，享年76岁。

林俊为官方正严明，驻云南鹤庆府时，曾撤毁鹤庆淫祠360余处，用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卷提要》卷五十五《何文简疏议》。

这些材料来修复学宫，并创筑赵州城池，其所到之处，“一时贪墨，望风解绶，卫官虐军，皆置之法”。地方安宁，百姓拥戴（天启《滇志》卷十《官师志》）。

四库馆臣评林浚诗说：“其诗源出江西而于黄庭坚、陈师道两家尤所摹仿。”^①《明诗综》（卷二十九）引杨应宁语云：“见素诗宗子美，晚乃出入黄山谷、陈无己间。”《见素集续集》（卷五）《教二子》则云：“一脉真源世不孤，亦知混迹未迷途。机圆翻信巧成拙，墨守终期智破愚。几辨义田随二范^②，别寻文派^③附三苏^④。相仍仰止瞻依地，留与诸孙作画图。”对于这首诗，我们姑且不论别的，只说诗人既以“三苏”为其家“文派”，当然也就为其所宗。不过说林浚诗宗杜甫和诗宗江西派也不能算错，江西诗派的宗主黄庭坚本出于苏轼门下。林浚在《见素集》中多次从人生与创作的关系这一角度提到杜甫，如《送别序》（卷一）：“古称诗穷人，文章憎命达。”《赠张白斋报政序》（卷七）：“古所谓诵子美诗已瘡，读陈琳之檄愈头风。”《借溪记》（卷十二）则借白居易与西湖和杜甫与浣花溪的关系发议论：“然蜀处一隅，游赏之盛，溪不当湖之半而名殆右之，岂非子美之沉落一世，瑰词杰制，尽用以发灵。是溪非若乐天假守于杭，为西湖风月勾留已也。”林浚认为，西蜀僻处一隅，若从风景来说，浣花溪不及西湖的一半，但名气恐怕过之。这是因为杜甫沉落于此，而以其杰作尽发溪之灵秀的结果，并非像白居易做官杭州，于西湖不过是流连风月而已。景因人名，人以景留，在不同的对应中，林浚揭示了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瑰词杰制”的成因。

《滇略》（卷八）载林浚的《大理分司诗》和《蒲缥驿》，《见素集》未见，可能因为诗作于云南而成佚篇。诗如下：“徙倚近孤松，青山隔邻壁。诛茅何者家，烟花共游息。启窗日未曛，钩帘月又夕。谁将炯炯心，照此幽幽室。”另一首《蒲缥驿》：“草亭动孤酌，日敛瘴烟昏。老屋因风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见素集提要》。

② 指晋范宣、范宁。《晋书》列传第六十一《儒林》：“范宣，字宣子，陈留人也……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

③ 古河名，源出山西省，流至天津入海。

④ 此外《见素集》卷十二《岩山记》、卷二十七《祭杨石斋乃尊》、《续集》卷九《棠陵记》，都有赞颂眉山“三苏”之语。

卷，清溪带雨浑。桴鼓新声在，山瓠古意存。荜门通细火，渔唱起江村。”两首诗意象幽寂，格调清高，真有“孤风远韵”（《见素集》卷十二《天游子记》）。这样的美感表现在某一联中，往往带有山谷体的韵味却并不那么瘦硬，我们从《见素集续集》（卷三）中略举几例：《山庄次山斋韵》：“小亭孤坐欲黄昏，门外双溪带雨浑。”《又次白岩燕泉二翁韵》：“乡国老怀风自下，关河孤泪梦常倾。”《四休述怀》：“红雨满江枫叶暮，青霜孤径菊花秋。”

林俊诗文的基本格调与其性格比较一致，至于摹仿之迹，应当说并不突出。林俊在滇云为官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文集中不乏对滇云人事有趣的表达。如《鹦鹉翡翠解》以滇西鹦鹉为喻发人生之感悟：“食人食、言人言以隳误人事，生亦良赘矣。”（《见素集》卷二十八）另一篇《三南记》叙云南籍首辅杨一清的事迹，称杨一清引其为知己。全文落笔于对“三南”的注解：“公世家宁川（安宁），滇南也；侨寓东陵，湖南也；奠居京口，又江南也。故曰‘三南’。”这样的写法，在为杨一清作传的诸多文章中别开生面，饶有风趣（《见素集续集》卷九）。

张佳胤（1527年~1588年），字肖甫，四川铜梁（在今重庆市西北部）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有《岷峽山房集》。张佳胤仕途显达，拜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卒赠少保，谥襄敏。嘉靖间他以佾宪督学云南，长于处事，“每边务有两可者，一语而决，核后效如射覆”（天启《滇志》卷十）。张佳胤名列后七子的外围，当时称“后五子”。《弇州四部稿》（卷二）《哀梁有誉》曰：“嘉靖甲寅孟冬，友人梁有誉以疾卒于南海。明年乙卯春讣至自南海，故善有誉者武昌吴国伦、广陵宗臣、吴郡王世贞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又走书西南报李攀龙、徐中行，哭如三人。又十月而友人户部郎张佳胤奉轡粤中，国伦等乃寓椒絮而南为文，授张生使告于梁氏之丧。”《弇州四部稿》（卷十四）有《后五子篇·蜀郡张佳胤》，《弇州续稿》（卷三）有《重纪五子篇》。《弇州续稿》（卷一百一十一）《瑞昌王府三辅国将军龙沙公暨元配张夫人合葬志铭》曰：“有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及余世贞者，与德甫相切劘为古文辞。有誉死而得张佳胤，名籍籍一时或以比邺中七子。”可见张佳胤与后七子关系之密切，实甚于诸人。

朱彝尊编《明诗综》（卷五十二）引陈子龙语云：“铜梁庄雅，亦称李王后劲。”同卷所引《诗话》则云：“肖甫以功业显，其诗亦多慨惋奋厉之气，与仰屋梁著书者不同。人皆称其近体不若五古，较胜十筹。”以

上二人的评论，从流派和个性两个方面指出了张佳胤诗的特点，但张佳胤与后七子实有不同，特别是他在滇云的创作，可谓脱略七子，语多慷慨，诗风雄肆。他督学滇云时，“凡滇池苍洱之胜，收以古文词”（天启《滇志》卷十）。如其《入滇城》描写进入云南时的感受道：“西南天尽见雄都，气象中原自不殊。”全诗表现了对云南山水的新奇观感，大汉当年的赫赫声威既是诗人的向往，亦是对当朝统治者的热望，衬以边地壮丽的风光，更见诗人之豪情。《自漾备趋金齿》也是一首佳作：“五月江声走白沙，沙边石气尽云霞。峰阴寒积何年雪，瘴雨香生古树花。独立南荒成万里，每凭北斗问三巴。兰津已说明朝渡，绝域虚疑汉使槎。”在诗人笔下，金沙江的壮美和山花、积雪的秀丽相映成趣，“独立南荒”给人的感觉不是凄凉而是豪放。《咏澜沧桥》则气势宏大，意象雄奇：“迭岭遥知万马愁，兰津西渡赤虹浮。鼉鼉驾浪声齐动，鸟雀飞梁影并收。缆束长江标绝壁，天悬双镜照中流。当时汉卒劳歌地，翻石于今作壮游。”汉卒劳歌，今朝壮游，绝域的观感，完全取决于诗人不同的心境。滇南壮丽的风物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一腔豪情驱动他笔走龙蛇，自然也就完全无须模拟前人了。歌行体的《石屏歌寄王元美》咏叹大理石屏之巧夺天工，如曰：“巨灵笑揽芙蓉气，叱咤天式扶混茫。五色氤氲夺万象，珠岩片片皆文章。”“若有人兮隔沧溟，潏荡秋波似洞庭。侧身东望暮烟紫，何以报之锦石屏？”诗以雄放的风格和丰富的想象，成为同类题材中的杰作。

顾应祥（1483年～1565年），字维贤，浙江长兴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他在嘉靖间两次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文章行谊为一时推重。滇人祠祀与王恕、何孟春并^①。诸方志多载其《昆明池歌》，这首歌诗描绘了滇池形胜和阴晴之间的不同奇观，以壮丽的山水为背景追溯昆明的历史，表现了诗人既欣逢盛世，又巧遇江山胜迹的欣喜和豪迈之情，想象丰富，气势雄浑。

张时彻（1504年～？），字惟静，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任云南按察使，迁南京兵部尚书，有《芝园集》。《滇略》（卷八）载其《入滇》诗四首，其一曰：“天边乘传客，历险到殊方。草长知烽息，民流属岁荒。岩花薰涧壑，木叶堕衣裳。何事秋风起，愁看白发长。”诗有初唐格调，然无深韵雅致。

^① 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九，天启《滇志》卷十《官师志》所载略同。

皇甫汧（1504年^①~1583年），字子循，号百泉山人，长洲（今苏州）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以吏部郎中左迁大名通判，大约嘉靖三十三年任云南按察司佥事。按杨慎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第七次返蜀，次年寓居泸州，到他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还滇时皇甫汧已离任，只能寄诗与杨慎表达情意^②。《皇甫司勋集》卷七有《从军行二首寄赠杨用修》，其一云：“三纪踰瓜期，数口尚匏系。竭来秉宪章，欲往问奇字。为赋从军行，聊展怀人思。”“三纪”言杨慎谪戍已逾30年，“瓜期”指官吏任职期满而由他人接替。“竭来”两句谓自己本欲向杨慎求教，终归无缘面见。其二云：“五月行渡泸，千里望巴国。泸水向东流，巴云忽西匿。相思持寸心，愿附双飞翼。”这是以想象之词表达自己对杨慎的情意。《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二）有《舍资驿有杨太史垂柳篇书于壁因寄》^③，诗云：“垂柳年年陌上春，题诗不见倚楼人。萍踪恨杀巴江远，望入峨眉翠转颦。”诗歌表达了诗人对杨慎的仰慕和失之交臂的遗憾。

皇甫汧叙其在滇交游道：“遐陬罕晤，仅得张子含、李元阳。杨太史慎先已徙泸，数移书相诏示。”^④张含和李元阳虽是“杨门六学士”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但皇甫汧毕竟与杨慎在诗坛上又一次失之交臂，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杨慎作为第一流诗人于嘉靖三年（1524年）被判充军云南，而皇甫汧于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这时京城诗坛的中心人物如杨慎、何孟春等已成批地被罢官、贬谪、流徙，京城诗坛为之突然空虚，皇甫汧等因而成为嘉靖年间的重要诗人。若无“大礼议”事件，皇甫汧的成名恐怕不会如此顺利而迅速^⑤，所以，冥冥之中他和杨慎就有了一种联系。此前，皇甫兄弟四人（冲、淳、汧、濂）在吴中因“并好学而工诗，称‘皇甫四杰’”^⑥，冯时

① 查清华、汪惠民《皇甫汧生卒年考辨》，雷磊《第七届明代文学年会暨明代湖南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遗产》网络版。

② 见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其“嘉靖三十八年”条对此考证甚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页）。

③ 原作《垂柳篇》见《升庵集》卷十三。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司勋集·自序》。

⑤ 参阅余来明《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1页）。

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二》。

可则称“皇甫百泉与王弇州名相埒”^①。可见，若非“大礼仪”，杨慎和皇甫汈原该有机会碰面并切磋诗艺的，虽然皇甫汈的成就远不能与杨慎相比。皇甫汈自己对“皇甫四杰”之称颇为自得，《皇甫司勋集》卷五十四《黄先生墓志铭》曰：“吴趋为之语曰：‘黄家二龙、王氏双璧、皇甫四杰’，凤毛鸾翼，同学莫敢仰视矣。”按“黄家二龙”为黄鲁曾、黄省曾兄弟，“王氏双璧”为王守、王宠兄弟。

皇甫汈一生宦历处处，其诗风亦随其步履一变再变。四库馆臣总结其诗风的变化曰：“一变为楚音，又一变为江左之音，又一变为燕赵之音，又一变为蜀音。今统观所作，古体源出三谢，近体源出中唐。虽乏深湛之思，而雅饬雍容，风标自异。在明中叶不失为第二流人。”^②就其诗风之变化而言，四库馆臣忽略了一个细节，即诗人在“蜀音”之前曾说过：“自檀州移栝，迁滇臬，遐陬罕晤，仅得张子含、李子元阳，若杨太史慎先已徙泸，数移书相诏示，而观察周满、贵州学宪谢东山亦以诗交，有渊云之余风焉，则又间为蜀音。”^③显然，在“又一变为蜀音”之前，先有与滇云诗人的交往。不妨说，皇甫汈在滇云受到的熏染，是其诗风多次变化中的一个元素。皇甫汈的诗风多被人们以“似中唐”论之，但其咏滇诗可谓清旷超迈，“风标自异”。

皇甫汈的咏滇诗甚多，他自比嵇康，这个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其咏滇诗中。究竟是对万里云南的观感触发了诗人的豪兴，还是诗人的性情原本如此？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始发滇中》曰：“荒外倦游日，南中归去情。春心同社燕，旅迹任江萍。自恨拂衣晚，谁云脱屣轻。独怜山太宰，门下绝嵇生。”（卷二十）《发滇口占》则曰：“嵇生慢与世相违，金马关前欲拂衣。自笑此身犹社燕，一逢春色便南飞。”（卷三十二）在这几首诗中，飘泊的意象并不带有通常的颓唐色彩，意境亦非中唐的幽清远致，而给人以潇洒脱略之感。《皇甫司勋集》卷二十集中了皇甫汈的咏滇诗。如《滇南雪后》以新巧的意象造为疏阔之境：“闰月凝寒早，炎方见雪稀。六花金马上，一似玉关飞。素积昆池练，晴连华岳晖。吴兵犹挟纊，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雨航杂录》（卷下）。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司勋集提要》。

③ 见余来明《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所引皇甫汈《皇甫司勋集》卷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集部第3册，第337~338页。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司勋集》未见。

未报解征衣。”诗人以巧妙的想象，描绘了云南飞雪的奇观：“六花”在金马山头飞舞，好似玉门关前的茫茫飞雪；雪后的滇池宛如白练，与太华山在晴光乍露时交相辉映。首尾两联表现异乡行人的新鲜感，诗人将观感自然地渗入到山水景物之中，从而加强了景物的情趣。联想与写实，静态与动态，不同笔墨的交替使全诗境界疏阔，风格恣纵。诗人的五言律则在工整的对仗中显出情致，如《宿太华山寺》当中的两联：“寺远云间塔，山深午后钟。庭花闲自落，海鸟偶相从。”《宿太华寄答周子》当中的两联：“竹径云初合，薇轩月自悬。秋光涵一水，夜雨净诸天。”或许这类诗仍有中唐流风，山寺钟声，落花海鸟，白云山月，澄水碧天——所有的景语，全都可作为情语观。诗人在《宿太华寄答周子》的尾联中自道：“即境虽云异，看心共是禅。”这话似说其处境虽异而诗心未变，事实上表现了禅境的影响。与中唐诗僧皎然的同类诗两相参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皎然的《送关小师还金陵》写道：“蕉花铺净地，桂子落空坛。持此心为境，应堪月夜看。”（《全唐诗》卷818）在皎然的这首诗中，诗人以心为境，境由心造，皇甫汈则即境会心，境由心生。两位诗人观物的方式有所不同，意境的表现也就两样：前者的景或许是真的，但诗人着力处在于印证禅思，故意境清幽而超然；后者的景完全是真实的，诗人无须着力而禅趣无所不在，固意境清朗而开阔——恰如胡应麟评皇甫汈的五绝所云：“清空潇洒，色相尽空，虽格本中唐而神韵过之。”^①我想，上面所举诗人的咏滇小诗也可为此作注。

皇甫汈仕宦云南时，正赶上云南嘉靖诗坛繁荣的尾声。虽然当时杨慎返蜀，皇甫汈与他失之交臂，但差可慰其诗怀的是和张含、李元阳的交游。对于皇甫汈来说，这种交游固因“遐陬罕晤”，但也缘于他对杨慎的崇拜。作为文学活动贯穿嘉靖一代而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云南文学史还是应当为皇甫汈的到来和加入记上鲜明的一笔。

徐中行（？~1578年），字子与，号天目山人，浙江长兴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隆庆间为云南布政使司左参议，后七子之一。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九）本传云：“僚属绅士以邀其奖掖为荣，滇风为之蒸变。”可见徐中行在云南文士中影响颇大。徐诗以云南为名者为其所著《滇池集》，天启《滇志》（卷二十六）《艺文志》载其《送方伯敬亭陈公乞归钱塘长歌》，其注云：“《滇池集》一帙，龙司徒郎施家藏抄

^① 转引自清代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皇甫汈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本，不著作者姓名。要之声调，酷似中兴七子，当出徐天目先生，然亦不敢执定。今祇以集名识之。”古永继点校本按云：“本书卷二七《艺文志·五言律诗》载《滇池集·初入滇关》二首，《滇略》（卷八）《文略》作‘吴兴徐中行《入滇诗》二首’，则《滇池集》确为其所作。”五律《初入滇关》二首笔力苍劲，气势雄放，论者以为非亲临其地者不可为。如第一首的第二联勾勒初到滇地的观感：“白日开南徼，青天豁大荒。”此联一向为人称道，确实，无论从意象的新颖贴切，还是意境的雄浑开阔，以及语言的清新流畅看，都堪称佳联。歌行体的《送方伯敬亭陈公乞归钱塘长歌》虽不及六朝歌行之流丽宛转，却也清朗雄健。

二、万历以来之盛衰

万历以来，宦滇文学达于繁荣。李贽的到来及其与李元阳的交往，为这时期的云南文学史增添了光采。明季，由于大明王朝岌岌可危，宦滇官员往往无暇顾及文学，故创作有所衰落。

李贽（1573年~1620年），又名载贽，字卓吾，又字宏甫，号温陵居士，又号龙湖叟，福建晋江（今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此后未应春试，循例任职，沉沦下僚。李贽曾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在礼部任司务，并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任满后退出官场，迁居于湖广黄安，几年后在麻城芝佛院落发为僧。光绪《姚州志》（卷五）《名宦》载李贽万历五年（1577年）为姚安知府，在任上政令清简，公务之暇与释子参论，又每至寺庙判了公事。李贽任知府时的清廉，在府志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离任时囊中仅有图书数卷，当地百姓遮道相送，致使车马不能前进。巡按刘维及当时藩臬作《高尚册》，僉事顾养谦为之序。李贽在入滇之前曾对知交耿定向说：“待我三年任满，收拾得正四品俸禄归来，食住有资，再来黄安，同求学问的进益。”（《焚书》卷四《耿楚空先生传》）。然而入滇后，李贽的实际情形却如袁中道所说，“俸禄之外，了无长物”（《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李贽在姚州府任上的为政方略与当时的上司相抵触，关于这一点，在《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中有明确的表述。从这篇文章我们看到，李贽对“边方杂夷”的处置（怀柔于边民，反横暴于官吏）实为与当地环境相吻合的明智之举，而《姚州志》（卷

九)《艺文志》所载李贽的《论政篇·为罗姚州作》，则表现了他对地方治理的恰当策略。其文曰：“盖予尝闻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说焉……至人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惊也。动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繁而颠且扑也。”作于姚州时期的《蜻蛉谣》（《焚书》卷五）可说是李贽对其为政、处世思想的一个总结：“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李贽的治民方略，其实就是顺应客观规律，勿扰民。他致仕时当地百姓的留恋，正反映了其为政方略的成功。

姚州得到百姓供奉生祠之荣幸者，只有李贽和诸葛亮。天启《滇志》（卷十六）《祠祀志》载：“李公祠，在府城外青莲寺，祀李公贽。”同卷载“武侯祠，在府治东十五里”。民国《姚州县志·文征》中有陶珽的《李卓吾先生祠堂记》，其文曰：“先生去姚，距今四十年；其卒于长安，又距今十六年。余纵观守是邦者，凡有德于一士一民，皆有祠……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当其时，尽其心，如是则已；其去姚也，列系恋，无要洁，如是则已。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有时见，有时不见。而俗眼见其见者，不见其不见者，以为先生如是则已……余又纵观宇内诸公，无不读先生书，每就予问先生治姚状，思一当北面者，岂非以先生有终不可忘者耶？……夫祠，公典也，先生何私？若父老子弟而受私祠也……嗟呼！姚人于此，无负先生也，亦先生之无负姚人矣。”陶珽是万历年间进士，历官府道，博通儒释，有多种著作行世。同卷载钱谦益《陶不退阆园集序》曰：“同年生姚安陶珽，字不退，少有志于问学，游卓吾之门而有得焉者也。”李贽在姚安县德丰寺创办三台书院，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姚安诸生受到李贽思想的熏陶，成名者不少，当时被称为“龙湖高足弟子”的陶珽、郭万民均出于李贽门下。天启《滇志》（卷十一）《官师志》所列《郡县宦贤》仅有3人，除李贽外，还有万历提举吴崇德和熊过。

李贽在滇时曾往太和（今大理）会见致仕乡居，年已八旬的著名白族诗人李元阳，以元阳“侗傥非常人也，某见其人，又闻其声”^①。李元阳有诗道：“正卿鸡黍后，交道寒如水，乾坤千里架，今古几人曾？”“诘

^① 《焚书》卷三《李中溪先生告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9页）。

朝访山阿，窈窕相扶扔。联榻逢得孺，同舟愧李膺。”^①“姚安太守古贤豪，依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谦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八风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入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②万历八年李元阳去世，李贽写下了《李中溪先生告文》（《焚书》卷三），谓：“余等或见而知，或闻而慕。今其死矣，云谁之依！地阻宫羈，生与曷致？为位而告，魂其听之。且余等与公同道为朋，生时何须识面；同气相应，来时自遍十方。”文章情真意切，表达了对李元阳的怀念。

和《四库全书》一样，明清云南省志皆未收李贽的作品，《滇略》对此有一个解释：“姚安守李贽虽亦有文名，而其末也逃入緇流，横议杀身，君子无取焉。”^③见于府县州志的李贽诗文有《龙山说》（道光《大姚县志》卷十四）、《青莲寺二首》（民国《大姚县志》）、《光明宫》、《光明宫记》（天启《滇志》卷二十八，按1580年光明宫建成，五月李贽在鸡足山作此记）、《九鼎山》（按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九载此为李贽致仕后“趋大理”、过祥云、游九鼎山而作）、《禄劝州知州题名碑记》（民国《禄劝县志》卷十三）^④。李贽在昆明时还为丽江同知何拙作了《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⑤。

冯时可，生卒年不详。字敏卿，松江华亭人（今属上海），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年间任云南布政使司右参议，有《滇南稿》和《滇行纪略》。《滇行杂感》二首其一表现了冯时可的文学主张：“美好皆有涯，文章独得寿。神气出自然，斯能擅其秀。乃今操觚家，开篋拾钉短。既为古人障，又与今人斗。有肾无不剝，有髓无不镂。搢搢名理间，长夜空自瞽。达者洗其肠，澄然无一垢。酝酿自天机，众妙斯来就。发籁虽独唱，合辙与圣媾。岂为蜉蝣撼，允也垂宇宙。”^⑥显然，这是针对复古派模拟之风而发的感想，诗人欲以“自然”、“天机”来反对“操觚”、“钉短”。这样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冯时可从其主张出发，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规避模拟，表现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白水关驿对月

① 李元阳《感通寺送卓吾李太守回任自姚安见访往复千余里》，见《李中溪全集》卷三。

② 李元阳《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见《李中溪全集》卷三。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谢肇淛《滇略》卷五。

④ 参见郝晓莉《李贽宦滇事迹考述》，《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增刊。

⑤ 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二册。

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选明诗》卷三十。

诗》中的“抱影独寤寐”，《署斋》中的“云片浮轻素”之类，雕琢的痕迹就很明显。在雕琢中又时见涣散之句，如《点苍山》：“苍崖点霄汉，随照入孤城。晴雪岁时积，奇云日夕生。龙蛇依石卧，鹤鹤傍松鸣。十八溪分注，家家环佩声。”这首诗的前三联尚凝炼，尾联却不免流于散文化。朱彝尊说冯时可的诗“甫田弥望，稂莠汗莱”^①，这是符合实际的。冯时可的散文清劲简拔，描绘事物往往得其神理，成就高于诗歌。如《游鸡足山记》之《前记》写古木奇观，《后记》写绝壁深谷，描绘生动简洁而传神，文采亦清丽可观。

张祥鸢，生卒年不详。字道卿，金坛（今江苏常州西部）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万历初任云南府知府。有《华阳洞稿》、《虚庵集》。张祥鸢与后七子交往而其诗能不涉窠臼，《静志居诗话》评说“潇洒绝俗，颇类永嘉四灵”^②《湖心亭望月》较有代表性：“湖心亭上半虚无，身在英英白玉壶。凉雨初收峰似点，高云不动水如铺。杯前芳杜青堪把，槛外驯鸥近可呼。指点渔灯认归路，绝怜烟景晚模糊。”（《御选明诗》卷八十二）诗以明月波光之间虚实参半的景物，烘托幽渺空茫的心绪，把翠湖的灵秀之美表现得恰到好处。

方沆（1542年~1608年），字子及，莆田（今福建莆田市）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历七年（1579年）任云南提学僉事，谪宁州任盐吏，万历十七年（1589年）再任云南督学。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九）本传载其“初左迁安宁提举，清厘盐弊，商民感戴。复工文章，万历间转督学，品鹭公明”。在云南十年。天启《滇志·艺文志》载《华亭寺》，其诗开篇即道：“南荒十载忆登临，宝地重开祇树林。”朱秉器云：“子及诗非大历贞元以上语不道。”然而方沆的咏滇诗如果仅以一二例为证，学杜之迹或许比较明显，多数作品却颇得自然天成之趣。如《滇略》卷八所载《龙尾关天生桥》，以白描的手法描写天险奇观，风格刚劲简拔：“苍岭青未了，寒烟野戍平。危梁通地脉，削壁类天成。霜色孤鸿暝，涛声万马行。昔年曾割据，形胜控榆城。”天生桥在大理西南三十里洱海的下流，其石下断上连，绝壑深堑，凭虚凌空，仅可度一人。桥边激水溅珠，宛如梅树，人称“不谢梅”。桥之北有著名的“一线天”沓嶂，为旧水道。方沆的描写，格调大气与形象鲜明兼而有之。此外上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五十六引《静志居诗话》。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四十九引。

文提到的《华亭寺》和《苍洱纪行十八韵》、《西巡过禄丰诗》、《雄川阁》等诗，都为滇人一时传颂。

薛梦雷（1546年～1611年），字汝奋，号鸣宇，福建福清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万历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深得滇民之心。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一月，武定土酋凤克反叛，陷省城，胁迫推官白明通索府印，围攻云南府衙。巡抚陈用宾欲取印予之，薛梦雷坚持不允，谓“三日不能守，自矢空抱一腔血”。后来情势愈紧迫，陈用宾竟索印予之。事平后论失印之罪，薛梦雷被坐以持之不坚的罪名，以巡抚之职解任^①。《滇略》（卷二）著录薛梦雷《彩云篇》二卷。卷八《文略》载其七律四首：《到滇诗》、《泛昆明池憩罗汉寺》、《送漆兵宪城屯猛卯城》、《送沐都护西征诗》。天启《滇志·艺文志》载其《赏茶花述怀二十韵呈诸同台》等。薛梦雷的律诗情韵深长，五言“茶花二十韵”虽穷形尽相，但语甚雕琢而少情致，甚多不可解之语。如“冲寒业鹤顶，溼露湿燕支”、“灼灼殷帘幌，芬芬袭翠彝”之类，影响了诗情的表达。

谢肇淛（1567年～1624年），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任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年）升任广西按察使。在滇云为官一任，他对云南文化的最大贡献当为《滇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部著作“虽大抵本图经旧文，稍益以新事，然肇淛本文士，于记诵亦颇博洽，故是书引据有征，叙事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杭世骏《道援堂集》有是书跋，亦谓其详远略近，博观而约取，苍山洱水之墟，称善史焉，均非溢词也”。《滇略》具有历史和文学双重价值，非一般的志书可比。如卷二记大理苍山：“点苍山一名灵鹫山，在大理龙首、龙尾两关之间。绵亘百余里，若屏风然。有十九峰，环列内向。峰各一涧，悬瀑而下，散入市廛村墅，东注于洱河。阴崖积雪，经夏不消，故亦名雪山。山腰时有白云，横亘如带。”苍山的秀丽及其下市井的优美，在作者笔下是如此令人向往。又如卷四记云南的民情风俗：“滇中气候最早，腊月茶花已盛开。初春则柳舒桃放，烂漫山谷。雨水后则牡丹、芍药、杜鹃、梨、杏相继发花。民间自新年至二月，携壶觞赏花者无虚日，谓之花会。衣冠而下至于舆隶，蜂聚蚁穿，红裙翠黛，杂乎其间，迄春暮乃止。其最盛

^① 参见天启《滇志》卷十《官师志》本传，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和《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滇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者会城及大理也。”在这段记叙中，滇南春色之旖旎，百花之烂漫，人民之安乐，风气之闲适，在作者清新流畅的叙述中跃然纸上。可以说《滇略》的每一段叙事都如此简洁有致，情趣盎然，文笔流畅，形象鲜明，犹如一篇篇优美的小品文，可圈可点者不胜枚举。

谢肇淛诗承闽派，又服膺后七子，却未浸染牵掇刻削的陋习。他的咏滇诗语不华靡，气势沉雄，调古意新，卓然为名家。如五言长律《望点苍山》和《望雪山》，一咏大理雄峰点苍十九峰，一咏丽江玉龙雪山，尤能体现其苦心孤诣。《望点苍山》开篇以“点苍十九峰，一一芙蓉青”^①点题直起，从全局着眼描绘苍山的壮丽多姿和溪流奔腾，至“散入市廛间，家家鸣琮琤，远近注畛隰，禾黍藉生成”，则由山的自然走向转而描写市井人家，“阴崖四五月，积雪辉广庭”两句则又旋笔去写山头夏日的积雪，与此相辉映的，是“浓澹合画图，苍素何分明，追琢岂天巧，酝酿诚地灵”的大理石奇观。最后，诗人以抒怀结束，呈现出人与天合的境界：“奇境趣自合，绝域心所轻。悠然独长啸，忘此支离形。”这首诗与上文所引《滇略》对读，可感一文一诗，各尽其妙。《望雪山》则先写山行数百里，正在人困马惫之际，陡然看见玉龙雪山的惊喜：“千峰绕翠屏，惊见玉龙挂”，“烂如白芙蓉，横耸青天外”。^②与上一首描写苍山相比，亦写雪山而笔有二致，可谓异曲同工。《滇略》（卷八）载闽南布衣陈鸿的《寄谢在杭先生参滇藩》和闽南布衣徐勃的《送谢在杭之滇二首》，都是想象之词，远不能与亲历者的描写相比。

邓原岳，生卒年不详，字汝高，福建闽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万历中为云南提学佾事，天启《滇志》（卷十）有传。其人为官敏练通达，尤善奖掖，所识拔者皆成名士。他曾手注《文选》并刻版于滇以教学子。其诗滇中文献多有收录，如《点苍山石歌》一反赞颂美石的惯常写法，从关怀民生疾苦的角度着眼，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人文情怀：“点苍山头日吐云，紫光白气长氤氲。却产奇石作屏障，终朝开采徒纷纷。频年贡入长安道，浓淡之间山色好。君王便作图画看，岂识闾阎劓肝脑。朝凿暮解苦不休，诏书昨下仍苛求。前运后运相结束，道傍叹息声啾啾。耳目之翫岂少此，十夫供役九夫死！从来尤物是祸胎，吁嗟乎，当时作俑者谁子！”不能说描写大理石之美的诗歌不好，但邓原岳这首诗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六十二。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

所流露的对采石人的深切关怀和对当政者不恤民情的指责，使这类题材的作品在思想上更具深度。天启《滇志·艺文志》中有一篇佚名的《妖星讶》，与邓原岳的这首诗可谓姊妹篇，观其抒情角度，亦应为宦滇官员的作品。诗歌以“犷悍”的“妖星”比喻不顾矿工死活的酷吏，对这类官吏，人们“恨不即假巨灵刀”而“扑灭”之。这首诗鞭挞现实的用心和劝谏意图都表现得很明显，如诗中写道：“朝廷罢矿未罢税，岁岁犍金入大内。跪门借帑不得请，经略束手司徒愤。世人爱财如颠狂，百姓十室九逃亡。平居但知饱妻子，万一有事谁担当？悲风长号肠欲绝，仰天睇视目眦裂。闾阖九阍额难叩，杞人眼枯暗流血。君不见，善言三发荧惑转，壮士挥戈白日返。圣主应知改玉趋，中外臣式幸相勉。”

郭棐（1529年~1605年），字笃甫，广东番禺人。万历中期任云南右布政使。他为人实诚耿直，在任颇有政绩，著有《炎徼琐言》。《滇略》（卷八）谓其“为滇右辖，游陟名胜，题咏不绝”。如纪游诗《秋日游涌泉寺》：“天开宝刹凌云出，地涌珠泉抱寺流。龙气光衔祇树晓，莺花红映绮园秋。共凭罨画调鹦鹉，醉倚阑干望斗牛。笑问岩前飞瀑水，几时还作曲觞游。”全诗景物的描写生动形象，营造了一个优美的意境。诗人还善于运用色彩和动态来描绘形象，如《登太华山寺》以“四野黑云”对“满天红雨”，突出了滇中早秋的景色；《海洞奇游》则以“叶响长飘露，林香不断风”，逼真地写出溶洞花林给人的奇妙感觉（天启《滇志·艺文志》）。总之，郭棐的滇游五、七言律诗意象贴切，诗思不群，对仗工稳，辞藻清丽。

邓渼（1569年~1628年），字远游，江西新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大约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四十年巡按云南^①，《滇略》（卷八）曰：“豫章邓渼，以待御按滇，所至题咏殆遍。”有《南中集》四卷。邓渼的滇游山水诗时有清新浅易之作，但有时因雕琢而至生涩古奥，则令人费解。前者如《泛西洱河》：“觞豆笙歌载两头，春风徐漾木兰舟。鱼龙徙族闻中夜，蒲柳分行辨四洲。弓月全临堤影出，莲

^① 有《陇川曲》，按《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第278页）《滇略》卷七《事略》：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一月武定变乱，三十六年正月平；三十七年平陇川。又按天启《滇志》（第898页）卷二十六《艺文志》第十一之九《山茶花一百韵序》：“予以庚戌岁（三十八年）按部，事竣驻省候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云南通志》卷七《学校》：“四十年（1612年），巡按邓渼、提学黄琮以县学庙附于府。”

峰遥学浪花浮。清尊满泛空明色，宛在蒹葭白露秋。”后者如“涉涧漱潺湲，蹇步陟窈窕”，“尸旷讵因斯，窃欲辞廩料”（《盘龙山寺游瞩》）；“斲翠开筠房，疏碧架兰橑”（《华藏寺》）^①。写景如后者，实在太隔，这是雕琢太过带来的弊病。身为巡按的邓渼关怀现实，有一些纪事诗具有诗史般的色彩。《陇川曲》（《滇志·艺文志》）是一个七绝组诗，为官军凯旋而作，但多为想象之词，而《武定变》^②为其次年亲历其境之作，纪实性就强了。诗人在诗中详尽地叙写了官吏应变无力，百姓惨遭屠戮的痛苦。诗体为五言长律，气格沉郁，文辞质朴，有汉魏之风。

邓渼更为人称道的咏滇之作是《山茶花一百韵》（有序），此为《滇志·艺文志》的标题，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题为《茶花百咏并序》，后面附有樊鼎彝的和诗。滇中茶花被盛称为“明茶”，即因明代宦滇流谪职官的题咏甚多。这篇名作的佳处不仅在诗，也在其序文，序文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小品文。这篇序文用写意般的笔触描写冬末春初之景：“此花盛开，名园精舍，间获寓目。烁日蒸霞，摘文布绣，火齐四照，云锦成堆。信天壤之奇观，品物之钜丽也。”序文又把茶花之品归为“十德”：花艳而不妖、树可历数百年、肤纹苍润、枝条黝纠、蟠根离奇、丰叶如幄、性耐霜雪、四季常青、花期久长、瓶供可开。在序文的最后，诗人为滇南山茶花在唐人以前“独不经题咏，以僻远故不通中土，遂使奇姿艳质沦落无闻”的境遇而鸣不平，由“为兹花吐气，传之四方”开一百韵之咏。诗歌属辞比兴，亦花亦人，传神写照，深表山茶花之情致。两相比较，樊鼎彝的和韵诗就显得粘滞而有欠空灵了。邓渼与汤显祖有交谊，曾作《春日述怀寄汤义仍四十韵》。从诗之开篇“汉域春阴尽，苍山旅病淹”看，这首诗当为其在滇之作。邓渼此行应在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左右，天启《滇志·艺文志》载其五言古诗《行部迤东西辋中杂述》七首^③，第六首曰“前岁武定变”。

天启至崇祯年间时世动荡，忧患丛生，从《滇志》（卷二十三）所录天启间云南巡抚闵洪学和巡按朱泰祯的数道时事奏疏，可见时势紧迫，有时甚至刻不容缓。这时期宦滇作家的创作并非微不足道，但比起中晚

① 以上所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滇略》卷八。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六十三。

③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载为《行部迤东西辋中杂述二首》，以《滇志》七首之一为其二，之二为其六。

明之群星闪烁，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以朱泰祯和杨师孔较为突出。

朱泰祯，生卒年不详。字道子，浙江海盐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约天启五年巡按云南^①。著有《远人楼诗集》。朱泰祯的小品文清新简净，极有情趣，如《滇志》（卷二十五）《艺文志》所载《书杨冷然所藏十八大阿罗汉卷后》描写云南的红莲花：“滇中红莲，藕而不房，一萼千葩。非司花人手擘而以微风嘘拂之，终如拳耳。笑少陵‘莲房坠粉红’之句，翻于昆明池水间，不信耶。予池头艺白莲二本，比花时，忽复幻为青莲。有三异焉：其始萼也，如楚畹新芽，柔绿堪把，不类粉色，一异也；谛视之，有紫丝百道，螺纹缭绕，精极毫发，二异也；层台五重，更有紫药数粒，秀出房外，类花王之有舞青蜺，三异也。予念芝草无根，今始悟青莲之非种也。”这篇小品，可与邓渼的《山茶花一百韵序》媲美。朱泰祯的五七言律韵味沉厚，结体严整，并时有佳句。如《天生桥》中的一联：“樵客和烟窥一线，镜中渔唱自沧浪。”诗人把天险奇观尽显笔下而韵调飘逸。又如《初正过臬署，茶梅满架，光艳欲燃，为庄毓宪长、杨霞标督学赋》中的两句：“数点玉酥欺艳雪，一栏红玉散明霞。”色彩明丽的形象，表现了红茶和白梅同放的滇南奇观（天启《滇志·艺文志》）。《同闵曾朱中丞登城阅水抚慰灾氓》、《呈贡早发过晋宁道中喜见农事》表现对现实的关怀，《楼中对诸峰积雪》描写大理风光，皆有独到之处。

杨师孔（1570年~1630年），字愿之，一字冷然，号霞标，江西庐陵县人，贵州卫（今贵阳）官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贵州通志》卷二十八）。据天启《滇志》（卷十二）、雍正《云南通志》（卷十八）记载，他曾两次署官云南：万历间任云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天启间任云南按察使司佥事^②。杨师古崇敬的文坛偶像与明代其他诗人不同，他推崇杨雄，自己的诗文却擅长白描，语言清浅，风格健朗。《苍雪楼诗小引》这样写苍山：“春山妍，暮山紫，夏山翠，秋山青，奇山巧，佳山媚，险山怪。”苍山的种种名相形色和不可名状处，被作者如此简洁凝炼

① 天启《滇志·官师志》署其天启年间任，同书《艺文志》载天启五年朱泰祯数道奏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776-796页）。

② 天启《滇志·搜遗志》有杨师孔《游温泉记》和《游云津洞记》，皆道时在天启乙丑（五年），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1076页）。《苍雪楼诗小引》道：“岁丙寅（天启六年）仲夏，余较士叶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地现诸笔底。《昆池草小引》描绘滇池，则是另一副清丽的笔墨：“昆海一水荡天，太华、罗汉、碧鸡、玉案诸峰隐隐，如苍玉浮杯，横带晋阳诸州县。三百余里，朝霞夕霏，晴岚阴霭，灵幻万状，信天外奇观也……每挹池上剩馥残霞，便成小句。掬海为杯，朗吟一过，觉波光烟景，勃勃生动，不忍弃去。即以池名篇，用纪投荒享受耳……至篇中啸咏，浅淡无色，盖取昆池灵幻为奇，非谓腹中有字也。”^①文采得江山之助，真非虚言。诗人的这篇小引吸山川之灵气，而诗人咏滇诗中的滇池意象如《春日同诸方伯王给谏登太华》，则充满了诗人的个性和豪情：“昆池作杯酒为海，歌声激浪风森森。”滇池和太华山映照，在诗人笔下呈现为奇景壮色，如《武闾罗士十六夜月》的描写：“太华吐月杯中得，昆海还珠镜里浮。”在《初入滇较士》这首诗中，诗人狂歌远啸的形象与江山胜景合而为一：“潦倒来游翰墨场，无奇敢自拟《长杨》。心惊曾记输赢战，投庠难忘笔研长。云见昆池还五色，马呼华野擅千骧。独怜圣远风微日，今古悠悠谁是狂？”山茶花也被诗人用来作自我写照，如《春日同诸方伯王给谏登太华》：“悟到色空俱不染，此是山茶不二门”；《腊日西楼赏茶花》：“艳吐山阴虽近酒，性含清苦不离茶”^②。

上面我们对宦滇职官的在滇事迹及其创作作了一个大致巡礼，下面再对明代宦滇文学作一个简短的结论：

我们分两大阶段，大致安置宦滇作家所处的时代位置，以便勾勒明代云南这类诗人创作的盛衰轨迹和主要风貌。从上面的勾勒可见，宦滇作家的创作自洪武十五年以来渐次兴起，在中晚明达到繁荣，明末则相对衰弱。共有的宦滇身份和相近生活经历，使这类作家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这趋同性主要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于宦滇职官中那些有所作为的作家，其从政和军事生涯是他们作品所表现的重要题材。朱明王朝平定云南后接着迅速地建立并完善各级行政、军事、监察体制，使明代成为历史上职官入滇最盛的时期。宦滇职官多数是进士出身，甚至有以进士充军职者。明王朝对职官的选用比较慎重，特别是监察官员的任用，诚如云南右佥都御史郑颢在《云南按察司题名记》中所说：“非清强直谅、德望老成之士，不称其选，而

① 以上所引作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② 以上所引作品均见天启《滇志·艺文志》。

士之居是官者，必皆思自奋发，励廉耻，重名节，守正循理，以求无负乎上之任使。”^①入滇后大多数职官或“至于取义成仁，致命遂志；或忠愤独激，蹈白刃以捐生”^②；或不遗余力，兴教办学，化民成俗，促进云南文化的发展。不少职官政绩卓有可称，甚至留祀郡邑，获得滇人长久的怀念。他们中有许多人不仅执政有力，造福地方，还为促进云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如徐中行使“滇风为之蒸变”，方沆“乐与贤良文学谈说经史”，谢肇淛写出了详细记载当时云南风俗历史的《滇略》，邓原岳手注《文选》梓行于滇，李贽在姚安创办了三台书院，等等。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形成宦滇作家抒怀言志，写实纪行取之不竭的源泉，表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人文情怀，具有与此前云南历代诗文很不相同的盛世格调。

其二，在滇云大地上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使宦滇作家在其一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与这块土地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内在的时代精神，文学意象则具有鲜明的滇云色彩，再加上盛世情怀和云南山水的壮观形象相结合，形成了有异于外界流弊的创作风格。如侯璉《高黎贡山》的雄放与细腻，方沆《龙尾关天生桥》的刚劲与高古，谢肇淛《望雪山》的沉雄与清新，皇甫沄《滇南雪后》的奇丽与娟秀，杨师孔《春日同诸方伯王给谏登太华》的豪放与幽深，种种风格的呈现，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说云南的壮丽风光寄托了诗人们的豪情壮志，那么这里清丽妩媚，四季如春的景色，则唤起了远游诗人细腻深婉的情怀。他们怀着对滇云这片神奇土地的感动去歌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往往曲尽其态，各有千秋。宦滇作家的散文数量虽然没有诗歌那么多，但呈现出与诗歌不同的审美特点。如何孟春的奏疏情理兼备，文风质朴流畅；邓溪的《茶花百咏序》文辞优美，意蕴深远；冯时可的《游鸡足山记》文笔生动，比拟贴切；谢肇淛的《滇略》行文简洁，文采清丽。刘勰以“得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物色》）来说明自然环境与文学风格的密切关系，我们以此来评论宦滇作家的创作风貌同样恰切。

其三，在七子派风气流行天下的同时，宦滇作家在云南的创作往往脱略其上，即令是七子派中的诗人或外围诗人，其咏滇诗文的风格亦较少模仿之迹而自成清新之裁。如朱应登既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并称“弘

①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九。

治十才子”，又与顾璘、陈沂、王韦并称“四大家”，但他在云南的创作显得大气磅礴，自成气象；张佳胤名列后七子之后五子，但他与后七子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他在滇云的创作明显摆脱了七子派的影响，语多慷慨，风格雄肆而少刻削之迹。

总而言之，明代云南文学蔚为大观，宦滇职官有不可忽略的贡献。《永昌府文征》把宦滇文士有关的创作纳入其中，实在是见地、有胸怀的表现。这部大书既展现了滇宦作家的成就，亦印证了明代云南文学的影响。

第三章 宦游诗人的心声

宦游即背井离乡求学或做官。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云：“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李峤的《送崔主簿赴沧洲》云：“宦游从此去，离别几年期。”明代云南的宦游作家或竭忠尽心为国建功，或风尘困顿仕途坎壈，宦游虽一事，情形却不一而足，但绝大多数出于斯而归于斯，最终或致仕或免职，回到故乡教学育才，造福乡里。若逢时世动荡，甚至有捐躯而全节操者。本论包括原籍云南并平生心系云南者，如安宁籍的杨一清终生不忘故土，曾返乡祭扫祖茔。

下面笔者据方志、别集和总集等文献，把云南宦游作家中声名较显者，大略按其所属州府具列，并对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之行迹和诗歌创作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他则仅简要谱录，而名列“杨门六学士”者如李元阳、胡廷禄、唐铤，则纳入第五章《谪戍文士的吟唱》之三《杨门诸子与嘉靖云南诗坛之繁荣》，本论不赘。

一、“水木心悬三十年”：安宁籍诗人杨一清

在明代文学史上，原籍云南安宁的著名诗人杨一清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心怀故乡，在返乡祭扫祖茔时深情地吟道：“关山路尽九千里，水木心悬三十年。”^①这是无可比拟的乡梓之情，也是诗人一生出将入相，宦历处处而心系社稷，不忘故里的写照。其人，其诗，其学行，其功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杨一清（1454年～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又号石淙。其父杨

^① 《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抵家杂述》三首其一，本节所引杨一清作品除另注明者外皆出于此。

景以化州（今广东化县）同知致仕，携杨一清寓居巴陵（今湖南岳阳），后来一清为父卜葬京口，遂寓居丹徒（今属江苏镇江）。杨一清以“石淙”为号，明代中叶著名诗派茶陵派的领袖李东阳作《石淙赋》说杨一清“先世在云南，其地曰石淙，及游寓巴陵，卜筑京口，皆以名其所居”。杨一清不论仕于朝或官于外，凡有撰述题识，都以石淙为号，“示不忘也”^①。杨一清晚年号三南居士，这个号见于记载者有二说：一说杨一清“自谓生于滇南，长于湖南，老于江南，故晚号三南居士”^②；另说杨一清居江南，谓洞庭之波，昆明之漪，“平地仰喷，从天下垂，建长江而直泻，指瀚海而同归”^③，暗隐“三南”之义，故号



选自《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

“三南”。“生于滇南”说未见旁证，但此说见于雍正《云南通志》，其编辑总裁鄂尔泰曾官云南总督，纂修者靖道谟官云南姚州知府，此说不会是空穴来风。或杨一清出生后才随父宦游，存疑，但他原籍云南安宁是确凿的，见诸其本人、同时代人、史籍记载者不胜枚举，近年有人对其原籍复生纷纭，实无意义。

杨一清 12 岁举神童^④，宪宗命内阁选师教之，14 岁中举，成化八年

① 李东阳《石淙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怀麓堂集》卷六十一。

② 《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本传。

③ 李东阳《石淙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怀麓堂集》卷六十一。

④ 《明史》本传不载其举神童年岁，一些史料则载为八岁。袁嘉谷《滇绎》卷下载杨一清正德十一年回云南安宁扫墓之告墓文拓片曰：“臣年一十二岁，以明经童子举于朝，臣父母偕来京师。”《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6 页），又见于《少傅兼太子傅吏部尚书臣杨一清谨奏为乞恩祭扫事》，天启《滇志》卷十八《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8 页）。

(1472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升山西提学佥事,迁陕西副使,拜左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历户部尚书,入直内阁,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大学士,卒赠太保,谥文襄。

杨慎师事杨一清,亦为其知音。杨慎状元及第杨一清是其座师,就父辈的关系来说杨一清又是其父执。杨慎到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其疑义,一清皆能成诵。杨慎大惊,从此更加发奋治学^①。对杨一清一生的建树,杨慎在云南安宁《为大学士杨文襄公故里题碑》中作了精当的概括:“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将入相,文德武功。”^②杨一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则是:“六十年来三致仕,四千里外七还乡(按指还镇江)。君臣义重真难报,天地恩深敢暂忘。”(《致仕出城途次口占》)杨一清不仅出将入相,尽忠王朝,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有宗师地位^③。王守仁、李梦阳、何景明、康海、杨慎、邵宝等皆出其门下,李东阳为其挚友。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则同时出于杨一清和李东阳门下,他评点杨一清的诗作时亦引述李东阳的评论,可见三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对这两位老师李梦阳曾评价说:“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④不是李梦阳刻意要把两位老师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而是二人在当时文坛的实际地位就是如此。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曰:“弘(治)正(德)间诗道旁落,其可识曲而听真者,李文正、杨文襄也。”清代著名学者赵藩认为李、杨二人实为“两雄”,他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大学士杨一清》曰:“将相功名一代中,诗歌卓有杜陵风。后先七子休腾蹕,合与茶陵角两雄。”从私谊论,作为同时代政坛、文坛上并立的双峰,杨一清与李东阳在数十年的交往中相互引为知己,是明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杨一清为《怀麓堂集》作序,对李东阳的建树和地位作了全面而公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杨慎传》。

②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页)。

③ 袁嘉谷《滇绎》下:“《滇系》与《雷石庵集》载吕柟、王守仁、崔铣、李梦阳、何景明、康海、杨慎、乔宇、张璠、马理、陆深、邵宝,皆在门下,可谓盛矣。尚有罗钦顺、谢纯诸人,不可悉数。”“滇人知人推杨文襄,计所识拔诗文大家四:空同、大复、德涵、升庵。”(《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718页)。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空同集》卷二十《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

允的评价，李东阳亦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对杨一清的深厚友情，并对他的部分作品作了评点。不过，当我们今天回首这段文学史时，既要看到李、杨二人对当时文坛的实际影响，也要看到他们诗歌成就的最终轩輊——即事实上李东阳以茶陵派领袖的地位，对文坛的影响要大于杨一清，其诗歌成就也要高于杨一清。我们既不能抹杀杨一清在当时文坛上曾有过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不顾事实而把他的文学影响和成就拔高到与李东阳并列的地位。

关于杨一清的著述，方树梅说：“其以学行功业著闻者甚多，具见于《正学书院志》及《关西政教集》。”“上疏具陈边事，其一切兴革计处事宜，载《西征日录》中。”^①“公所著诗文，有《献纳稿》及《纶扉奏议》、《玉堂前后集》行于世。凡所撰述，皆以‘石淙’系之，盖不忍忘先世故居也。”^②《云南丛书》本有《石淙诗钞》十五卷，是书为李梦阳、康海编辑并评点，由石屏孝廉陈海楼自江西抄回，保山袁苏亭（文典）匆匆借抄刻印，原先的分类标目已不复存。卷末附有李东阳等人的唱和诗数首。

作为明代杰出的诗文家，杨一清在文坛上最重要的交往是李东阳和李梦阳。

杨一清在《怀麓堂集》原序中有关的评论，对于我们认识明代中期的文坛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杨一清首先肯定了李东阳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他说：“大夫士得其片言以为至宝，后进之士凡及门经指授，辄有时名。中年益深造远诣，比掌帝制、登政府，则又衍而为经纶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国，是变士习，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杨一清接着在文坛弊端日显的背景下，评价了李东阳独树一帜的历史意义：“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随之。故联篇累帙，盈天壤间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于世者，盖亦不数数见已。自余作者，各挟所长，非无足取，彙而阅之，乐恣肆者失之驳而不醇，好摹拟者伤于局而不畅。近或习为瘦辞硬语，使人不复可句。以是为古，所谓以艰深文浅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杨一清认为，正是在“文之弊一至是”的世风之下，李东阳以“深厚浑雄，不为偏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

① 方树梅《滇南碑传集》谢纯《杨石淙先生行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方树梅《滇南碑传集》雷跃龙《石淙杨文襄公传》（第11页）。

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的文风超乎其上，为世典范。杨一清指出其可贵处在“每吮毫伸纸，天趣溢发，操纵开合，随意所如而不踰典”，为那些“旬锻月炼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对李东阳的文学成就杨一清评价极高：“至其众体具备，无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益远，则如大河之源，出于昆仑，至于积石，又至于龙门砥柱，既乃吞纳百川以达于海涵，浴日月顷刻万变而不知其所穷。”从上述评价可见，虽然杨一清也重视李东阳的馆阁制作，但他决不以偏概全，而是实事求是地既指出了李东阳馆阁体文章的实用价值，又指出了他对当时文风的救弊意义，这比我们今天某些脱离时代语境的批评更为符合事实。如果我们了解明代诗文的复古浪潮并不始于前七子，而是承元末端绪而发展，就会更深刻地理解杨一清之于李东阳评价的文学史意义^①。

李东阳的《湘江送别诗序》后有杨一清的识文：“仆往年侨居镇江，馆于佑圣观。观之西曰能仁寺，湛然所住也，因得见此作。爱其高古有议论，读之数过，已而成诵。至今凡九年矣，偶与西涯（李东阳）道及，闻稿已不存，遂录而归之。予方病目，不能作书，此乃口授乔生字代书者也。”^②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杨一清对李东阳多年不变的殷殷情谊。同样，李东阳对杨一清的感情之深厚，不仅在于他们多年的交往和以文会友的交谊，更在于人生道路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之情。《怀麓堂集》中有多篇写给杨一清的诗文，《送杨应宁三首》第一首（卷六）明确地表述了二人的道义之交：“宦途亦多岐，所识能有几。朝游乐方剧，暮别情未已。平生道义交，岂独爱文史。”第三首则从二人身世落笔表达了其同进退的心愿：“君本滇阳人，还生岭南地。”“吾生半南北，归与子同计。”“此意君独知，吾言谅非戏。”他们的文字交往也是同忧天下，不以风花雪月为怀。在《次韵杨应宁久旱三首》（卷八）中，二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历历可见：“三复来诗百感侵，寂寥云汉有遗音。”“杜甫不胜忧国愿，向来真与海波深。”杨、李二人不仅是知交，还有通家之好。李东阳为杨一清之母撰《封太安人杨母张氏墓志铭》道：“东阳与杨应宁为知己二十年，获拜其母太安人数矣。”

① 参阅孙秋克《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东阳——明王朝造就的第一个诗人》，《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怀麓堂集》卷九十二。

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既是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的门生，又与杨一清有师生之谊。杨一清有《读李进士梦阳文喜而有作》赠之，诗曰：“斯文衣钵终归子，前辈风流直到今。”“聪明我已非前日，此志因君未陆沉。”杨一清既视李梦阳为正统诗歌的绍继者，又视其为自己的高足。李梦阳全面地点评了《石淙诗钞》，其点评大致有下面三种情况：一是以“大作”评定其馆阁之作。李梦阳批《五月七日先皇帝忌辰，悲感之余次韵涯翁先生诗韵二首》曰：“庙堂之气，自是大作。”他对这类诗往往直接出此二字，一目了然。二是以唐诗（主要是杜甫）和宋诗直标杨一清某首诗有某种气格。如评《林黄门寸草春晖卷》：“拗体愈精彩”；评《巡边偶吟四首》：“此首是杜格”；评《汝成将别予邀饮逸老园再赋一首》：“此篇纯类唐者也，它篇多唐宋杂派”；《题画送谢梅岐归闽三首》：“三首前一首唐也，后二首宋调耳”；评《途中再具疏乞归》：“七言婉丽者，中唐之调也”。第三类则以“情”、“味”、“真”、“趣”等概念指出杨一清诗的特点，这一部分评论尤为可贵，亦最能看到杨一清诗歌自身的艺术价值和李梦阳诗论的批评个性。例如：评《新兴道中遇乡友金调元，得西涯先生所寄书喜而有作》曰“诗本性情，情多自佳”；评《与原梁话旧有感》曰“情胜”；评《兴隆寺》曰“淡中有味”；评《陪西涯先生燎黄父墓用旧韵一首》曰有“无穷之悲，不尽之意，难为之妙”；评《奉陪石楼吏部李公游焦山口占一首，席上限韵得四首并录求教》之二曰“胸中有此景，笔端有此景”；评《再入夏城》曰“平平荡荡，写尽意象，无一字吃力”；评《安汝砺访予待隐园喜而有作二首》曰“情真、景真、句逸、调逸”；评《和孙思和西庄联句》曰“肺腑之语，真村庄诗也”；评《徐少参过丁卯庄有诗次韵赠之》曰“浑然天成之句，对偶复工”。如果李梦阳在人们的印象中已成为复古摹拟派的代表，那么这类诗论或许有助于对他的全面认识，亦有助于解释他何以成为明代中期诗坛的领袖，并创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诗篇之原因。甚至可以让我们由此想一想，李梦阳的复古理论，是否也有一部分言不由衷，为当时诗坛风气所裹挟。

从诗歌创作看，杨一清诗的题材与其生活轨迹相呼应，大致可以归为政治诗、军旅诗和抒情诗三大类。

杨一清一生出将入相，政治可说是他诗歌的必涉题材。然而不同于高高在上的许多官僚，他的诗歌对政治弊端的揭露和鞭挞，突出地表现在关怀民瘼上，所谓“都将一片忧民意，散作南荒有脚春”（《送林待用谪姚州》）。只要观其诗集中的《录民谣》五首，忧患之心即切切可感。

这组民谣所涉及的徭役、吏治、赈灾等问题均与民生息息相关。康海评点曰“篇篇俱实，字字洒泪”，可谓深得其情。

杨一清的军旅组诗《甘凉道中书事感怀杂诗》十六首，全面地反映了边关的各种弊病，若非身为三边总督而亲临其境，有实地感受，决不能写得如此切实。如指斥将帅疏于谋略：“谁云战争事，得失不须筹？”（其十一）指斥边将不恤下情：“民力须深惜，边储不易供。”（其十三）在其他诗歌中，杨一清也表现了对民力艰难的忧虑。《闻河套有警》云：“粟刍山积君休羨，民力年来已不胜。”唐代高适的边塞诗以揭露边弊而成其尚理之格，杨一清的这类诗歌与之相比，批评现实更为尖锐而情调更为愤激。正因为对边关忧虑重重，所以看到边塞清平的景象，诗人的欣慰之情不禁溢于言表。《将至凉州》道：“塞上马嘶春草绿，村中人和凯歌声。只因边徼无烽火，忘却关山是远行。”《孤山堡》云：“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券买耕牛。”从这类诗中，我们感受到了作为国家栋梁的诗人，对现实真实而深切的感受。

杨一清的抒情诗是其情怀心胸的表现，既有诗人意志品格的写照，也有情深意挚的人情。正如上文所引李梦阳之语，“诗本性情，情多自佳”。杨一清的言志诗以《砥柱行》为代表，此诗极为论者所关注，一向被认为是诗人的自况，而事实上诗人也无愧于这样的比拟，不赘。《和韵寄章德懋先生二首》其二曰：“早从科甲占时名，曾有昌言补盛平。”李东阳评曰：“首联二句岂自况耶。”（引自《石淙诗钞》）接下来第二联曰：“一代文章天下士，百年忧乐古人情。”把这一联看做诗人的自我写照亦很恰当。夏于中（良胜）的《东洲初稿》附录有杨一清的赠诗《与夏于中夜话感而有作》，缘于夏于中以进谏而被除名。诗云：“万古乾坤还正气，百年宗庙自深恩。亦知人众天终胜，得失穷通未足论。”这是杨一清对夏于中的安慰，更显示了自己坚信正义必胜，不以个人利益为重的政治品格。如果说《和杨镜川学士先生游南园诗韵》、《舟中杂兴》这类诗从容娴雅，台阁重臣的庄雅情怀流布纸上，那么《出连云栈》一诗道“蜀道秦关俱莫论，于今四海正为家”，其中所表达的心声，就无愧于诗人作为国家栋梁之才的豪迈胸襟了。

杨一清对三个故乡都怀有深切的乡情，并始终情系原籍云南安宁。诗人一生宦迹广远，地位尊崇，还亲自回原籍祭扫祖茔。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杨一清31岁，蒙皇恩回云南祭奠，其《谨奏为乞恩祭扫事》诚挚地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情：“臣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三世坟茔

俱在安宁州……云南远在万里，水木本源之念，恒切于衷。”^① 杨一清以诗纪其行，《石淙诗钞》载其返乡诗多首^②，这些诗抒发了感恩之心，表现了故里人情，殷切感人。《抵家杂述》三首其一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故乡的挂念，对仗工整但非关文字，而是出于真情的自然流露，“远奠”之情更是显得情意悠长。其二描写亲情，返乡的欣慰溢于言表。这首诗先写初还时似梦非梦的情境，洋溢着一片融融亲情：“远郡有人求识面，新诗无地不开筒。衣冠此屋皆弦诵，信是车书万里同。”温暖的乡情令诗人感动，圣化远达西南边陲，更让诗人觉得欣慰。寻访乡里历代功臣，是杨一清此行的重要行迹。《谒咸阳王庙》以奇绝的诗风追怀盛典赤的大功，《谒王忠文祠》则以“留得文章兼节义，不知曾汗几人颜”结穴，激越铿锵地表达了诗人高尚的情怀。30余年后的正德十一年（1516年），杨一清又亲作祭文，让其子杨绍芳返石淙祭扫祖茔。他作于晚年的《毛给事用成守制归云南，过镇江话旧，得三首兼以送别》，也是那么深情地抒写了对故乡的忆念：“碧鸡山下弹棋日，铁瓮城边载酒时。黑发相逢吾已老，清才如此世方推。风尘滚滚多新态，水木悠悠击远思。便欲从君还未得，倦揩双眼一题诗。”对原籍的乡梓之情，这位王朝首辅可谓终身不渝。

杨一清的诗歌在艺术上自成一格。李梦阳评曰：“先生诗矜持、严整、俊典，则七言律为最工，虽唐宋调杂，瑜瑕靡掩，然所谓千虑一失也。”（《明诗综》卷二十八引）作为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首推杨一清七律的成就，并用“杜格”、“拗体”^③、“似杜”^④、“仿宋”、“仿唐”^⑤等语评点杨诗，这本已拘泥，再以“唐宋调杂”为憾事，更不免限于门户之见。《诗话》说：“邃庵古诗，原本韩苏近体，一以陈简斋、陆放翁为师。”^⑥ 其实唐以来的诗人喜欢以古诗入律，近体则追求高古，因而古近体诗之间的界限已非楚河汉界那般不可逾越，有成就的诗人往往出入

① 天启《滇志》之十八《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页）。

② 见《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谒咸阳王庙》、《谒黔宁王庙》、《谒王忠文祠》、《抵家杂述》三首、《游法华寺和韵》、《和韵寄章德懋先生》二首、《界亭道中》、《题沈石田山水赠高铁溪贰守》、《水晶宫客》、《出连云栈》。

③ 《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卷二。

④ 《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卷四。

⑤ 《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卷六。

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二十八引。

乎二者之间。杨一清既近“杜”似“杜”，亦近“韩苏”而师“陈陆”，这正是其诗自成一格的缘故。杨一清的歌行最富有个性特点。《题沈石田山水赠高铁溪贰守》气度雄浑，纵横开阖，变化无端，集胸中丘壑和奇绝景观为一体，充分表现了诗人驾驭歌行体的能力及其对艺术的见解。诗人在诗中赞画家“胸中尚有万丘壑，气运泼泼随风生”，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歌行体的风格。诗人又道：“按图索骏竟何事，如舍其骨求其形。”这既是对画的评论，也是诗人高明的艺术理论。画求神韵，题画诗亦如此。诗人对画面进行了细腻鲜明的描写：“坡陀萦复路透迤，一峰特立苍冥表。山北山南青未了，处处琪花杂瑶草。山头老干屈铁回，山下髯龙何夭矫。山坳靛深堪结庐，翠竹为帷树为葆。”如同中国画要讲究虚实相间一样，题画诗也要讲究空灵，追求韵致。在细腻的描写之后诗人写道：“足音空谷已难闻，相逢且试开怀抱。”要以这样空疏的笔墨，方能凸现笔下神韵，更深远的内涵存于诗人由画面引发的意绪：“乾坤安得此区寰，我欲从之心懔懔。”“世间真贗不可知，夜光鱼目反相嗤。好事之流满天下，君看赏鉴者为谁。”诗写到此，已不止于题画，诗情画意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李东阳评这首诗曰“变化脱略”^①，实为杨一清歌行体的共同特点。李梦阳评点《界亭道中》一诗则道：“长篇才气，横压古今，然铺叙之词工而形容之妙寡，顿挫虽力而辟合未至，方之古人，盖有间焉。”^②此诗通篇实写山道，境界确乎比较逼仄，但观其高古之气，仍不失为好诗。《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有昆明县教谕乐恒的《后序》，他对杨一清诗文艺术的评价持论比较公允：“五古冲雅恬适，居然五柳（陶渊明）家风。徐则雄浑博大，直趋老杜门庭。间有推阐太尽，类宋人者，而非书写性格，本天地自然之间，以合于温柔敦厚之旨，则既不失‘三百’之遗，而堪垂不朽矣，又何必唐宋云。”不拘门户之见而自为创新之道，杨一清的诗歌足当此论。

二、“忧国忧民意自深”：其他宦游诗人论略

无论是在朝或在野，忧国忧民都是宦游诗人的重要主题。这情调也

① 《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卷一引。

② 《云南丛书》本《石淙诗钞》卷一。

往往渗入到思乡曲和山水诗之中，形成深沉的底蕴。

施铨，字文衡，昆明人。景泰元年（1450年）举人，授永从县（属贵州）知县，有惠政，致仕后授业乡里。著有《东轩稿》。

孙继鲁（？～1547年），字道甫，号松山，昆明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知澧州（今湖南澧县）。孙继鲁任淮安知府时，有宦官奉命督江南织造，擅作威福，孙继鲁因与之对抗而被构陷。但他依然为官以德，不惧权贵，约束子弟，不使作威作福，深得民心。做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时，孙继鲁因边事与总督翁万达意见不合，遂被诬下狱。他在狱中矢死不屈，疽发背而卒。后谥清愍，赐祭葬。狱中无纸笔，孙继鲁每日用饭盥画壁，与同时获罪的御史杨爵唱和百余首，天启《滇志》题名为《败碗集》、雍正《云南通志》题名为《饭盥集》，《千顷堂书目》又作《杨寿孙继鲁碗破集》，下注云：“狱中倡和，以毁磁书壁，故名碗破。”（卷三十一）。后面两个书名《明史·艺文志》皆不见载。与孙继鲁同时下狱唱和的御史杨爵著有《杨忠介集》，卷五《附录》存《孙继鲁》一诗。袁嘉谷《滇绎》卷下说：“《诗略》一篇之外，惟有《狱中酬杨御史爵》一绝句见传中，亟录而表之。诗云：‘忧国忧民意自深，谏章一上泪沾襟。男儿至死心无愧，留取芳名照古今。’”^①《滇南诗略》录其《温泉偶浴》一诗，风格清新，想象丰富。诗人以“碧溜清”、“火珠”、“波臣”、“三冬暖”等意象描写温泉给人的神奇之感，“冷面宁趋严罅热，冰心独解玉壶春”一联，则巧妙地把世态人情和自己的高尚操守蕴于其中，意象鲜明而寓意深刻。

李茂阳，字三山，昆明人。早年丧父，事母至孝，与兄向阳读书不懈。家中非常贫窘，司徒刘辅造访，赠之以金，不受。嘉靖十三年（1534年）、二十二年（1543年）弟兄先后中举。李茂阳授四川南充教谕，因多有成就而迁大足知县，其县苦于盗患，茂阳治理有方，朞年地方安宁。后因直言得罪上官，乞归终养。回乡后杜门不出，惟养亲教子。著有《归来园集》。

龙施，字德敷，昆明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解元。历任户部郎中，迁河东运同，以母老乞养归乡。家居20余年，澹然自乐，足迹不入公门，当事者屡荐不出。著书之外，制药济病。著有《露林蝉啸》、

^①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版（第722页）。

《归田百韵》、《田园杂兴》、《林皋漫兴》、《选玄析韵》、《吟稿》。

严清（1524年～1590年），昆明人，《明史》卷二百二十四有传。《明史》本传载其字为公直，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载其字为直甫。严清弱冠登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除富顺知县，“廉恤民，治声大起”。升四川右布政使，隆庆二年（1568年）巡抚贵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惮其风采，相率历名行，少墨败”（《明史》本传）。迁刑部尚书，以劳瘁致疾，四上疏乞归乡。其后特旨起用，因疾力辞。严清历任两京大理寺卿，三迁刑部尚书。万历十六年（1588年）特晋太子少傅，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恭肃。据《明史》本传和雍正《云南通志》本传载，张居正专权时尚书不附丽者，独严清一人而已。张居正卒后，朝廷籍没太监冯保的家产，搜得廷臣馈遗簿籍，独无严清之名，严清因而深得明神宗器重。谢肇淛《滇略》（卷六）说：“论者谓杨襄敏（一清）之后一人云。”著有《冰玉堂集》，仅从其集名，即可印证作者的品格。

严清的诗自然清浅，看似率意而为，实有机杼。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载其诗一首，题为《湖中遇雨》，诗曰：“太华云凝盖，中流雨打船。渔翁伏蓑卧，安稳下长湍。”短短一首小诗，把西山和滇池在雨景中融为一体，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坦然面对风雨湍流的胸怀。《滇南诗选》亦载其诗一首，题为《寄合川龙君》：“风雨终袍自不寒，白头按剑见交难。怜予更问金陵道，念尔常看玉案山。抱病有时还载酒，裁书无复慰加餐。翟公门雀今多少，此际何人数往还。”这首诗似致仕居乡时为酬答宦游知己而作，隐含了对势利之人的谴责。首联表达深切的知己之情，“终袍”来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战国时魏国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须贾，遭其毁谤，笞辱几死。后来他逃到秦国，改名张禄，做秦相，权势显赫。魏闻秦将东伐，命须贾使秦，范雎敝衣乔装往见。须贾不知，怜而赠其终袍一件，而后知道范雎即秦相张禄，乃惶恐请罪。范雎因须贾尚有赠袍念旧之情，最终宽释之。后来这一典故多用为表达眷念故旧之情。第二联表达相互间的牵挂，第三联描写自己在病中接到朋友书信时的情状，尾联则流露了居乡寂寞的心情。“翟公门雀”来自《史记·汲郑列传》：“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史载严清归滇后隐于松华别业中，后进登门拜访，惟以修身务学谆谆教导之。这首诗中所流露的情感，或许只是一时的心绪，未足以证明严清居乡而有急于用世之心。严清得疾归乡后，神宗曾数问阁臣严尚书病愈否？万历

十五年（1587年）兵部缺尚书，特诏起补，遣使促行，严清因病势沉重而未赴任。

张桥，字衡如，昆明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任工部主事，擢宁夏兵备佥事，不久以浮议罢归，潜心典坟，自六经子史，旁及真诠释典无不涉猎，才高学富，尤精书法。曾作诗千余首，多散佚。《梅花》长短句、《怀母》诗、《贺中丞见吾陈公序》等诗广为乡人传诵。

黄凤翔，字冲霄，昆明人。屡试不第，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授西曹郎。明代西曹为刑部的别称，袁宏道《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云：“西曹旧称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饰之士。”黄凤翔风节高尚，不避权贵，为主管官员所忌，于是拂衣而归，杜门整理旧业，著述甚富而无存。蜀人简西岱曾对杨升庵说：“黄竹泉，平平耳。”杨慎曰：“公无言！如竹泉者，宇内未易得也。”^①可见黄凤翔在士林中的声望。

王来仪（？~1647年），字仲威，昆明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授江苏吴县教谕，历官应州（在山西）知州。王来仪性情耿介，因与上官意见不合而归乡。王锡袞出其门下。甲申（1644年）闻变，王锡袞将督师赴难，王来仪涕泣相对，勉以忠孝。丁亥（1647年）流寇入滇，王来仪死于难。著有《晴窗集》。《昆明县志》载“其集兵燹后所存寥寥”。《滇南诗略》录其诗23首。

傅宗龙（？~1641年），《明史》有传。号括苍，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四川巴县知县，历浙江巡盐御史、贵州巡按、太仆寺卿、薊辽总督，以兵部侍郎转户部，因谏忤旨罢职。崇祯间复起为四川巡抚，不久加兵部尚书，又因言下狱。崇祯十五年（1642年）总督陕西，出征李自成，军溃被俘，死谥忠壮。《滇南诗略》存其诗3首，为军旅题材。《滇诗拾遗》存2首，《出都门作》由长安城中的西山，引出诗人对“归路”的联想，结句“若作山中梦，滇云咫尺间”，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

李畅藻，字涵白，昆阳人，贡生。任曲江（在今广东韶关）训导，致仕归诵，读书不辍，著有《竹龙记录》、《雪山堂集》。

萧景时，字应元，晋宁人。弘治二年（1489年）举人，湖北安陆知县。因不愿曲事上官而告归，作《秋雨赋》以表其志。著有《可亭集》。

^① 天启《滇志》卷十四《人物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

黄明良，字时际，晋宁人。嘉靖四年（1525年）举人，浙江温江知县，擢温州知府，升户部员外郎，出任贵州按察司佥事、毕节兵备道。罢归谢客，以诗文自娱，著有《西牧山人集》。

段承恩，字德大，号午衢，晋宁人，嘉靖十年（1531年）乡试第二名，次年春试中进士。任工部都水主事，擢御史，巡按辽东顺天，不久出任湖南辰州府。以疾病致仕，晋阶嘉议大夫。著有《三巡疏要》，佚。存诗数首，《雨后》颇见其描写功力和超逸情怀。

杨伯诚，名号不详。安宁人。著有《三楚壮游诗》，《升庵集》卷三有《三楚壮游诗序》，曰：“杨子伯臣者，连然韵士也。多才多艺，不伎不求……古诗五言合为各体一卷，题有楚字者，诗缘楚吟也。”道光《云南通志》著录时加案语云：“《安宁州志》嘉靖乙酉（1525年）举人杨茂，官岳州府通判，伯诚或茂之字。然不言有《三楚壮游诗》”。^①

朱化孚，号岱晟，安宁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行人主试贵州，迁兵部主事，擢银夏兵备道，升湖广按察使。著有《贡幽吟》、《阳城纪胜》。《千顷堂书目》（卷八）载录其《阳城纪胜》。

张鼎，字大鼎，安宁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举人，授安徽芜湖知县。以傲骨得罪权贵而被谪，复补麻阳县（在湖南）。工诗词，多古调。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载其著有诗文若干卷，名目不详。

赵日亨，字贞所，安宁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任太常博士，选御史，以贵州左布政使致仕，著有《寤歌楼集》，佚。

侯必登，字颐真，号星湖，澄江府江川县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乡试亚元，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授潮州知府。在任时罢一切苛政，主张与民休息。倭寇扰民，招抚讨平之。又破除迷信，为民排忧解难，深得潮州百姓爱戴，塑其像入昌黎（韩愈）祠以供奉之。升江西参政，上官有以不公之事强之，必登曰：“吾头可断，事不可从也。”时人称其贤。著有《金碧草》，《滇诗丛录》录其诗163首。其诗半为拟古，其学渊源有自。然而无论古体还是近体，侯诗都不乏自出新裁之作。诗人孤高耿介的个性，在诗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如《孤琴操》中以梧桐木为琴身，以白雪丝为琴弦的孤琴不发则已，发则“铿然徐逸响，千古以为希”，这正是诗人个性的自我写照。《写怀》则直抒胸臆，表达自己高洁的情怀：“平生有幽怀，乃尔远尘俗。轩冕讵不荣，迂疏厌拘束。”

^① 周钟岳等编纂《新纂云南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19页）。

“仰止廛高山，足音鲜空谷。匪及冰霜寒，宁知松柏绿！”侯必登也善于描山绘水。滇云山水，星湖澄波在他笔下或风情旖旎，或气势壮观，与诗人的胸怀合而为一。《滇南望》以滇池“吞吐炳二曜”的壮阔，映衬“金马迤东峙，碧鸡抱太华”的气派，诗人的胸次更显开阔：“太虚随鸢飞，深渊任鱼跃”；“俯仰天宇阔，翛然发长啸”。《星云湖对月》写金风玉露之夜，水天一色，万里澄明，含烟凝紫，月明如镜的美境，亦可移人心神。有一些诗显然作于诗人任职之时，从中可见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如《田客留客行》二首，第一首以欣慰的笔触，表现了农家朴实的生活和农人温厚的性情，第二首则抒发了与田家同乐的心情：“桑麻共话情滋悦，今年似比昨年别。时雨时暘风气清，野鸠朝暮簷头鸣。”诗人还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农人的祝愿：“不蚕那得闻机轴，勤耕但愿公私足。幸免饥寒度岁华，笑看稚子驱牛犊。冬来未厌衣衾薄，取醉村醪姑自乐。”

张西铭（1444年～1496年），字希载，宁州（今华宁）人。自幼聪颖异常，长而博学，登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江西金溪知县。其县多豪猾之人，张西铭下车伊始，即对其中最突出的施以教诲，其后这些人皆被感化，遇抚州饥荒，四方作乱，惟独金溪人相互告戒不要为盗。张西铭以政绩卓著擢升河南道御史，又迁顺天提学。著有《鹤轩集》。

张绎，字思绍，临安（今建水）人。弘治丙辰（1496年）进士，授四川南溪知县，擒贼、勘察积案有功，升四川佥事，后以贵州兵备副使致仕。著有《东岩录》诸稿。

王元翰（1565年～1633年），字伯举，别号聚洲。宁州（今华宁）人，先世居凤阳，由凤阳徙滇。其始祖王珊，洪武时因跟从颖川侯征云南有功，诰授武略将军，世袭于滇，遂为家。其后失官，子孙散处各地，在宁州者，即王元翰一支^①。王元翰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选庶吉士。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改吏科给事中。他意志坚定，以谏诤自任，弹劾不避权贵，中要为之侧目，最终挂冠而去。在天启、崇祯间朝廷曾两次拟起用王元翰，不果，漂泊东南10余年。崇祯六年（1633

^① 方树梅辑《滇南碑传集》刘宗周《明故征仕郎原任工科右给事中聚洲王公墓志铭》，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年)王元翰卒于南都(南京)客舍,时年69岁^①。《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有传。著有《凝翠集》,雍正《云南通志》载“著有《谏草》及《凝翠诗》行世”。

王元翰的歌行体《烟湖草阁行》描写高原明珠抚仙湖的景观,抒发了对归隐的向往之情,风格疏放,意趣幽远。“抚仙之湖长百里,碧波浩淼潇湘水”,诗人开篇即表现出高远的气势,接下来写碧湖观感:“群峰列屏手可招,澄湖拂镜点轻舸。雨度山空翠欲滴,风翻浪起雪为涛。”和开篇不同,诗人细腻地描写了景物的优美。但一切美景都只是铺垫,最终诗人归结于厌倦仕途,向往隐逸的情思:“扁舟酬唱水云中,肯逐轻薄图冷炙?君不见,东陵翁,学种瓜;杜公堂,在浣花。人生奔役何时已,不如栽桃满谷蒸红霞。任尔渔郎透消息,桑麻鸡犬自为家。”秦代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隐居,种瓜于长安青门。杜公指杜甫,桑麻鸡犬则指陶渊明。可惜诗人归隐乡土的心愿最终没能实现。《山中杂咏》以清新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绘出一幅意蕴深远的山居图:“醒起看山晓雾浓,江光树色转朦胧。一声啼鸟冥烟波,人在湖阴第一峰。”王元翰的怀古诗沉郁浑厚,情思悠悠,如《汴梁怀古》:“风沙莽莽暮云横,王气消沉四野平。梁苑空台飞泽雉,夷门无地老侯嬴。皋林冻压三山雪,灯火烟生万井城。惟有东流汴河水,浺浺历尽古今声。”《寄京口友人》以怀友寄寓人生的感慨,意味深远:“浪迹不禁双鬓改,知心今复几人存。三千里外悬君泪,犹与长江到海门。”诗歌浓缩了人生的许多况味,风格则简劲沉郁。

雷跃龙(1602年~1661年),字石庵,号伯麟,新兴州(今玉溪)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人,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史载雷跃龙为人重气节:“魏珰炽盛,屏不与交。崇祯中历官礼部尚书。”^②“丰姿隽逸,器识深沉,诗文才望……庄烈帝重之。”^③著有《葵谷草》。

雷跃龙的诗文俱有佳篇。《石淙杨文襄公传》较为详尽地记叙了杨一清的生平事迹,如记其识人造士:“创正学书院,选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识李梦阳,以文学名天下。状元康海、吕柟,名士马理、张璇辈,皆与焉。”论其才具影响:“公资警敏,能为文。诗与书多慕效李西崖,

① 方树梅辑《滇南碑传集》,钱谦益《明故工科右给事中聚洲王公墓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七十二)。

③ 《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三。

其功力差相伯仲也。好谈王霸经世大略，材猷足法，以是声誉籍甚。”传记对杨一清出将入相的经历与宦海浮沉，亦有较为客观的记载。

歌行体《昆池篇》^①是雷跃龙的代表作。历代歌咏滇池的篇章甚多，巡抚顾应祥的《昆明池歌》即为名篇，二诗相较，各有胜处。顾应祥的诗以“昆明池，延袤数百里，千山万山直自昆仑来，诸山之水汇于此”开篇，而后追溯滇池之得名：“相传其水颠倒流，滇池之名由此始。”接着写滇池周边形胜：“左有金马山，右有碧鸡峰。”在上面数笔的铺垫下，诗人描绘滇池景观，可谓笔底风雷，意象开阔而大气。写滇池的浩渺无际，洪涛巨浪，则出之以龙宫水怪兴风作浪的想象；写风静浪息，则出之以“一碧万顷开青铜”的优美比喻。美景描写接以对云南历史的回顾，并歌颂王朝的功绩，最后收束于诗人自得的心情和豪放的自我形象：“渺予生当全胜日，观风两度乘清骢。古来多少豪杰士，局于偏安之世不得一洗磊胸。百年过眼一弹指，得此胜览真奇逢。振衣独立太华顶，狂歌目断孤飞鸿。”顾应祥的《昆明池歌》一气呵成，大气磅礴，雷应龙的《昆池篇》则另辟蹊径，独出心裁。其诗略于叙事而详于描绘，间以抒怀，意象秀美飘逸，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这一点尤长于顾诗。诗歌开篇仅有几句涉及历史：“汉家欲拟昆明池，油幢绣鹞晚风吹。于今池上波犹阔，枉度清宵鼓角时。”在简略叙写历史后诗人主要是写景，其中的一些描写很有韵味：“野鳧画鹢寂无声，十里芙蓉连夜发。芙蓉万朵柳千条，双堤一镜照花娇。”这些描写在静态中蕴生机，于动感中含静谧。写滇池形胜，则既有实处，又不乏夸张：“太华峰顶揖桐君，玉案山头淹羽客。羽客淹流玉案愁，海风吹断五湖秋。”诗人还善于用色彩的对照掩映来渲染滇池美景：“绕遍碧扉仍雾锁，醉余红树倩烟扶。烟扶红树岚扶鹤，露浥胭脂堆翠萼。”和顾应祥一样，雷应龙这首诗也表现了鲜明的自我形象，但前者为皇朝臣子的意气风发，后者则带有高人韵士的孤清兀傲：“君不见，辋川图，鉴湖曲，处士孤山梅萼绿。又不见，浔江梢，归帆杳，徒悲天际孤鸿绕。何似泛星槎，歌窈窕，银河清浅寒光皎。盈盈一水两心悬，年年照彻湖天晓。”写到这里，诗人的笔触由描绘风景拓展开来，连续运用典故，写出观景之人触景而生的思绪：盛唐王维的《辋川图》是山水名画，明代徐渭的《鉴湖曲》有“十里荷花迷水镜，浅碧平铺万顷罗”的生动描写；宋代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写下了“疏影横

^① 此处所引《昆池篇》，据《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三。

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名句；中唐的白居易，曾在浔阳江头抒发天涯沦落的悲伤；传说东海与银河相通，每年八月有使者乘星槎来去；汉末古诗《迢迢牵牛星》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诗歌连用数典，本来极易造成生涩隔膜之感，但雷应龙较好地避免了这个毛病。全诗归结于无尽的遐思之中，余音袅袅。比起顾应祥的《昆明池歌》，雷应龙《昆池篇》的篇幅更长，但结构更为开阖自如，更兼形象生动，描写细腻，用典不着痕迹，二诗确实难较高下。不过雷应龙这首诗语言镂金错彩，不及顾应祥的那首清新明朗。

马继龙，字云卿，号梅樵，回族，永昌（保山）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官至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未刊。《滇南诗略》录其诗68首，《丽郡诗征》亦录其作。

马继龙在永昌的诗名仅次于张含，观其诗，宦迹曾到巴蜀、塞外，多抒仕途失意之感和羁旅客愁：“年少贾生差作赋，数奇李广不封侯。”（《闻笛》）“英雄千古兴亡处，只见鸦飞带夕阳。”（《江陵怀古》）；“玉关愁度雁，葑屋乱飞鸦。”（《雪中晓行》）“十年弹铗无人识，千里思乡有梦归。世味从来浑嚼蜡，生涯还忆故山薇。”（《雨中漫述》）在这些诗中，仕宦山川艰阻，耳闻目历的诸般事物，总是引起诗人的悲叹，深刻地表现了封建文士对现实的失望。然而叹息并未掩盖其诗歌意境的雄浑开阔，足见诗人胸次之高远。《沧江怀古》较有代表性：“孤江铁索跨长虹，鸟道从天一线通。树响龙来陵谷雨，山空猿啸石楼风。白蛮南诏襟喉地，万木荒祠鼓角中。象马来归贡赋，土人犹说武侯功。”诗歌前两联写江景，诗人纵笔描绘澜沧江之险峻，第一联比喻贴切而自然，第二联写实，灵动无滞，更兼用语准确达意，大江的形象跃然纸上。在雄浑景象的烘托下，诗歌后四句抒发思古情怀，第三联紧扣上半部分，以“襟喉”比喻澜沧江的重地之险，归结于诸葛亮平南之功，意味深长。马继龙不但擅长写壮阔之境，也擅长表达细腻情怀。如《蜀中悼亡》上半首轻灵流利，回忆与亡妻的琴瑟好合，下半首沉痛凝重，抒写永诀之恨，两副笔墨交错，情意笃厚，哀思绵绵无尽：“明镜当年双凤凰，春风琴瑟侍高堂。一朝花露芳容歇，千里江流别恨长。辛苦风尘三入蜀，渺茫魂梦独还乡。遥知太保山前路，唳鹤啼猿总断肠。”悼亡诗自潘岳开篇，元稹继之，苏轼引入词境，历代不乏胜语佳篇，马继龙的这一首可谓出奇制胜，所以《滇南诗略》评曰：“一语胜人千百。”

闪继迪（？~1637年），回族，保山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举人，授吏部司务。闪继迪天性笃孝，家法严正，平生喜欢奖掖人而不喜欢被人奉承。建策皆中机宜，乡人立祠报德。著有《羽岑园秋兴》、《吴越游草》。闪继迪的诗歌造诣颇深，如七律《和杨升庵春兴》对仗工稳，形象生动，语词清丽，章法严谨。诗人以白露生于太华山峰，滇池春浪蹴空开篇，描状昆明的山水之奇，起势不凡：“太华嵯峨白露生，蹴空春浪卷昆明。”第二联承此对昆明的历史进行勾勒：“江山半拥王褒碣，草树初青鄯阐城。”传说西汉时文士王褒奉帝命前往云南取金马、碧鸡，未至而卒，写下了《移金马碧鸡文》，后来杨慎据《汉书》移刻于西山石壁之上。鄯阐之名得自元代。这一联使用的典故紧扣诗意和景物，第三联继写纵目驰望所见，在江山辽阔之中，巧借通感细腻地描写初春景象：“千里关山迟雁影，万里烟雨湿莺声。”尾联再出典故：“伤心烂漫《长杨赋》，搔首低回细柳营。”这两个典故看似与诗意无关，实则隐含了时空悠悠，才人不再重现的伤感寂寞，表现出诗人登临胜境时对历史和人生的万端感慨。如此结穴，意味深远。

闪仲侗，闪继迪之季子，字士觉，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著有《鹤鸣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鹤鸣篇》条）载录，“时侍其父游吴越间，故取《中孚》九二爻词以名所作也”。《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亦著录《鹤鸣篇》三卷。

赵子禧，字庆夫，鹤庆人。天性孝友，多才多艺。成化十三年（1477年）中举，时年19岁。授临安训导，考选为吏部第一，升南阳府同知，政绩甚著。卒于官。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载其所著有《碧莎》、《蛙鸣》二集，万历《云南通志》著录《蛙鸣集》。《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作《碧莎蛙鸣集》，疑误。

沈政，字行之，通海人。景泰四年（1453年）举人，历官太常寺少卿。博通经史，尤长于诗，当时人比之为“辋川”，即盛唐诗人王维。诗无载录。

杨忠亮，字菴卿，石屏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授宁夏固原同知，挂冠归。优游泉石，读书吟咏自适。著有《素吟草》、《山窗漫言》。

综上所述，云南宦游作家走出滇云，则为天下国家效力，颇多忠义之举；致仕回乡，则远离世事纷扰，潜心著书育人。“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人才之出，邦国之光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雍正

《云南通志》卷二十一)——以云南宦游作家的生平行事，把这段话移用为对他们的总结，当无不合。他们的创作既有宦游经历的反映，又有家国乡土的情怀，视野开阔而富于时代色彩。在艺术上宦游作家不以门户为限，自为清新之裁，取得了令后人为之骄傲的创作成就。杨一清在全国明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他诗人的创作亦为云南文学增色。



第四章 隐逸文学的兴盛

云南隐逸文学在明代兴起，晚于全国同类文学 2000 余年——如果要
从楚狂接舆的《凤兮歌》算起的话。即令以陶渊明的田园诗为标志，时
间相距也十分遥远。虽然云南隐逸文学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起点就不
低，并在明末清初即受到人们关注。明代谢肇淛在《滇略》（卷六）郭文
小传中说：“杨林兰茂，安宁张维，皆以文章行谊为乡里崇尚，绝意仕
进，楷模后学。时人为之语曰：‘杨林有兰，安宁有张，而太和段锦文，
金齿汤琮，曲靖项瑄、柴宗儒，鹤庆奚谦，姚安李黻，先后隐居不仕，
咸有时称。”清代袁文典亦曰：“胜国时滇中诗人每多隐君子，其最著者
四人：兰止庵（茂）、郭舟屋（文）、贾东亩（惟孝）、董西羽（难）是
也……”^①“平居陈郭”这一并称见于《明史》，杨慎的著作亦有记载，
并认为郭文的成就远在其他三个外地文士之上。钱谦益纂辑《列朝诗
集》，郭文、兰廷瑞名列其中，王世贞、朱彝尊等著名学者对郭文的评价
都很高。其实明代云南隐逸作家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空谷足音是历史
的遗憾。

一、“志不在干禄”：隐逸作家概况

作为明代云南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隐逸文学形成的基础，主要是
士阶层的形成。隐者士也，这是古代隐逸诗人的特定身份。虽然有的士
子根本无心于科举，有的士子中举而后退隐，“志不在干禄”（贾惟孝
《阅耕归》）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但是如果不是“士”，就无从说“隐”。

隐逸作家的产生，还可从云南的士风和乡俗中找原因。朱元璋的
《谕云南诏》说：云南一贯“气厚风和，君子道行之所系”。杨慎则说云

^① 李文汉、李文林《杨林两隐君集·附录·滇南诗略五则》，《云南丛书》本。

南士人“又以远方不乐仕宦，故学不为科举而恒嗜声律”^①。史籍对当时首府云南府风俗的记载，在云南通省具有代表性。据说云南府古来“士大夫多才能，乐事朝廷，不乐外官”^②。我们知道，科举在中国古代士子的人生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云南士子读书不在做官，不为科举，这样的境界是非常纯粹的超功利境界，也即审美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云南的隐逸文学成就较高，是诗人的胸次决定了这一点。乡俗，则营造了隐逸文学产生的氛围。史载“吾滇人重去乡，昆明为尤重。县中自士大夫之服官于外，惟乡举赴礼部试乃出其里门。否则井田桑麻，以终老田间为乐也，其它牵牛远服贾者百不一二见，以故淳朴之气较他处为优”。“素重名义，民性纯良，不好争讼……野安井凿，户习诗书，民无告讦之风，士有干谒之耻”。^③这里说的虽是昆明人，但也是全云南的普遍状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云南人自古不艰于谋生，随着明代士阶层的兴起，遂成隐逸之风，此风云南府尤盛，其他州府次之。

从文化传统看，云南隐逸诗人的产生，还有庄子、陶渊明视功名利禄为敝屣的出世精神在起作用。杨林诗人贾惟孝在其诗《阅耕归》中说：“圣贤日与亲，志不在干禄。”这一思想颇有代表性。昆明诗人郭文在青草湖买舟筑屋，自号舟屋，啸咏自得，都督沐璘闻其名而拜访，他避之于芦丛中。其后沐璘轻装简从，载酒而来，郭文方与他谈论诗文，纵论古今，订布衣之交。嵩明诗人兰茂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参与官事（为兵部尚书王骥平定麓川献策），还是出于王骥的敦请。兰茂的性格简远冲淡，取号止庵，即耻于钻营利禄，止步功名之意。嵩明另一隐逸诗人贾惟孝博学强记而不求功名，安宁诗人张维生性同样颖异却绝意科举。晋宁诗人唐尧官是乡试解元，屡次应会试不第，遂绝意仕进，闭门隐居以诗书自娱。隐逸作家退隐的原因虽有种种不一，但追求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为其共同倾向。亦可以说，和陶渊明一样，隐逸是他们的人生选择，而不是家饶万贯，优游林下。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

① 杨慎《溪渔诗集序》，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卷二十四《艺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②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③ 倪惟钦、陈荣昌《续修昆明县志》卷三《风俗志》，1943年排印本。

要躬耕陇亩以谋衣食：“荷耒趋南亩，胼胝未足辞。”兰茂诗《耕》中所说的这种生活状况，并非只存在于个别人。然而“内省无复疑，高歌面苍昊”（兰茂《感秋》）——君子固穷的理念，学不为入仕的态度，使隐逸诗人能够淡定自如，安于田园，并在耕作之余，潜心读书和著述。殷才在成化间曾游北雍，屡次上书言时事，因言路受阻，愤而回乡躬耕。他回乡隐居后，曾任四川副使的赵璧前去拜访，此时殷才正在田间劳作。赵璧并不认为自己屈尊，殷才也不觉得受宠若惊。中国古代文化中固然有官本位崇拜，然而隐士的独立人格，却是被广泛尊重的。正是这样的传统人文精神，形成了隐逸文学的社会基础。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有《隐逸》传，其传自明代始，有明一代共录隐逸 23 人，其中云南府 13 人，曲靖府 3 人，临安府 2 人，澄江府 1 人，武定府 1 人，大理府 5 人，楚雄府 1 人，姚安府 1 人，永昌府 1 人，鹤庆府 3 人。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而且这个著录并不以文学为据，以云南府为例，著录的 13 人为^①：

郭文，字仲炳，号舟屋，昆明人，著有《舟屋集》。

殷才，呈贡人。

康诰，昆明人。

朱玘，昆明人^②。

邵忠，昆明人。

王琦，昆明人。

熊之龙，昆明人。

杨文林，昆明人。

丁焜南，字彦冲，昆明人。

郭之建，字用皇，昆明人。

杨惟峻，昆明人。

张国正，字永和，昆明人，著有《陇亩集》。

唐泰（担当），晋宁人，著有《儵园集》、《榭庵草》。

唐泰被作为隐者录入显然不当，如果以年代来考量，王琦、郭之建、张国正、唐泰不论隐于僧还是隐于田，皆在明季，与诸人不同，故笔者将这四人列入本书遗民作家之列；如果以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既是隐士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隐逸》。

^② 按朱玘应为晋宁人，字和斋。

且诗名甚高的，《通志》却未收录，如以下数人：

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别号和光道人。杨林人，祖籍河南洛阳。著述甚丰，正德《云南通志》（卷二十一）载：“所著有《玄壶集》、《鉴义折衷》、《经史锦论》、《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山堂杂稿》、《壁山樵唱》、《桑榆乐趣》、《樵唱余音》、《甲申晚稿》、《梅花百韵》、《秋香百咏》、《草堂风月》、《苹洲晚唱》、《韵略易通》、《金粟囊》、《中州韵》、《声律发蒙》、《四言碎金》等书，滇人多传之。”兰茂的文学代表作有《止庵吟稿》和《玄壶集》，诗文散佚不全，现存诗词200余首。此外还有杂剧《信天风月通玄记》20折，小说《续西游记》是否为其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

兰廷瑞，兰茂之弟。贾维孝，杨林人，字若曾，号东亩，著有《剩语闲咏稿》。

唐尧官，晋宁人，嘉靖辛酉（1561年）解元，著有《五龙山人集》。

张维，安宁人，著有《听瀑楼诗文集》。

其他各州府的收录情况略同，故笔者后文依云南府之例，只列载隐逸文学名家。

隐逸作家作品的存世数量，肯定比实际产生的要少得多，除了有的作家不愿意留存著作之外^①，还有不少作家的作品已散佚。

隐逸作家中人们历来认为郭文的成就最高。袁文典说：“予谓滇南诸诗家，均当以舟屋（郭文）为权舆。”^②杨慎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郭文，毫不掩饰对其诗的喜爱。杨慎的推重，使郭文成为明代前期云南作家在外界声名最高者。杨慎也推重兰茂和贾惟孝，还作过三首诗赠贾惟孝，第一首相当于兰茂和贾惟孝的合赞，称“题作杨林两隐君”。但兰茂、贾惟孝的诗名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远不比郭文声誉之隆。兰茂不载于《列朝诗集》，而他的弟弟兰廷瑞成就远不及他，却名列其中。可见不能完全以在外界声名的大小为依据，来评定作家创作成就的高下。

① 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载：“熊之龙，少颖异，卓犖有大志。崇祯间以岁贡入京，忽发叹曰：世乱亲老，何以仕为！遂归养。筑别业居之，承欢之暇，歌咏性情，陶然于山水之间。有所著述，辄焚去不传。”

② 《云南丛书》本李汉、李文林《杨林两隐君集·附录·滇南诗略五则》。

二、“洗空势利一生心”：昆明郭文

明初云南隐逸诗人以郭文（大约洪武至景泰初在世）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平居陈郭”是郭文和省外流寓者平显、居广、陈谦的并称，据笔者考证，此称缘于4人的唱和，否则难以解释郭文何以和外来者并称。请参阅本书最后一章中的《“平居陈郭”考》。

杨慎认为郭文的成就在4人中当居第一。《升庵集》卷五十七《平居陈郭》条云：“滇中诗人，永乐间称‘平居陈郭’。郭名文，号舟屋。其诗有唐风，三子远不及也。如《竹枝词》云：‘金马何曾半步行，碧鸡那解五更鸣。侬家夫婿久离别，恰似两山空得名。’又《登碧鸡山太华寺》一联云：‘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一时搁笔，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称耳。其全集予尝见之，如此二诗亦仅有也。”杨慎还有七律一首，题曰：《太华寺席上文似山咏郭舟屋“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之句，爱其善状景物而惜其全篇未称也，属余易其首尾》。^①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郭文传称，杨慎列举的这两首诗“于时以为绝唱”。康熙《御选明诗》和朱彝尊的《明诗综》都选了郭文的这首《竹枝词》，而《艺苑卮言》、《围炉诗话》、《续诗人玉屑》等诗话列举名句时，又都举了“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一联为例，可见郭文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句为此联，而全诗最为人激赏的则是《竹枝词》。

其实郭文的好诗并不仅是某一首或某一联，成就也不仅只在“有唐风”。天启《滇志·艺文志》载其诗多首。作为隐逸诗人，郭文倾慕陶渊明，其诗歌风格显然也受到陶诗的影响，他作《太华秋晓诗赠无念》对友人言怀说：“嗟予尚夙慕，奈兹尘务扰。拟效陶渊明，相从此投老。”但其诗风毕竟与陶渊明不同，如《观音寺玉泉》云：“流尽废兴多少事，洗空势利一生心。出山便入红尘去，好缓须臾伴醉吟。”这类诗歌集中表现了诗人超凡出尘，淡定自如的心境，风格古直朴素，却不似陶诗那样蓄蕴着不平之气。隐逸情怀，是郭文诗歌独特美感产生的基础。郭文的山水诗气势壮阔，意象奇丽。如《赋得滇池夜月》以“游空碧”、“水晶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十六。

域”为喻，描写水天一色的滇池夜景，给人一种梦幻般澄澈的感觉。《太华秋晓诗赠无念》大笔勾勒在太华山顶日落时分远眺中的昆明：“影落昆明寒，气吞金碧小。”身之所感、目之所见，在诗人笔下巧妙地聚为一体，高原之城的特点也就被韵味丰厚地表现出来了。歌行体的《武定狮子岩》则以奇崛的意象和雄放和风格，表现山的壮观，其气势或许就是升庵所说的“有唐风”了。然而唐风的影响虽可见于郭文诗，诗人却并非亦步亦趋地摹仿，而是在融会中化成了自己清新明丽兼豪放雄奇的风格。郭文在隐逸中学习民歌，他的《滇中竹枝词》开创了云南诗人向巴蜀民歌学习的先例。诗曰：

金马何曾半步行，碧鸡哪解五更鸣。
侬家夫妇久别离，恰似两山空得名。

诗人巧妙地借用昆明城外东西对峙的金马、碧鸡两山为比兴，别开生面地表现了闺怨这个传统主题，浑然天成、谐趣横生，深得民歌神韵。

竹枝词是源于四川巴蜀的民歌，中唐诗人刘禹锡把此调翻为新声后即流行于文人诗坛。明代曹学佺说：“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山《撒白雨》，此绵州巴歌也。‘巴歌’二字才见此。后刘禹锡之《竹枝词》，李绅之《巴女词》皆其变体，若常璩《巴志》所引《川岷》、《惟平》、《维月》、《孟春》等篇，则古诗者流，非通俗之唱矣。”^①“‘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纡那》披绿萝。’此刘禹锡《竹枝词》也。《纡那》当时曲名，刘诗翻南调为北调，二字皆叶平声，此随方转言也。”^②《竹枝词》进入文人诗坛后虽归七绝体，但仍以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并以各地方言和风物入诗为正格，所以诗人们往往在竹枝词前冠以地名，即令不冠以地名，亦可看到明显的地方特点。下面从《明诗综》里抽取几例加以说明。《明诗综》卷八载张翥的《西湖竹枝词》，诗曰：“南高北高峰顶齐，钱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潮头到湖口，郎船今夜泊西溪。”卷十五载胡奎的《吴江竹枝词》三首，其一曰：“青裙女儿双髻螺，唱出吴宫《子夜歌》。酒醒月明眠不得，秋风吹起太湖波。”卷五十三载邵圭洁的《苏台竹枝词》：“鱼尾晴霞片片明，鸭头新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蜀中广记·诗话记第一》卷一百一。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蜀中广记·诗话记第二》卷一百二十。

水半塘生。平川荡桨一十里，深巷卖花三五声。”这些作品不仅诗题标出区域，而且风物也都是地方性的，更兼民歌风格，这正是《竹枝词》的情韵之所在。郭文的这首《竹枝词》可谓深得此体神旨。杨慎被贬谪云南后曾亲访过郭文的诗歌，很欣赏他的这首《竹枝词》。杨慎在云南时也作了多首《竹枝词》，为其咏滇诗中最别具一格，又最有滇云地域风味的作品。如《滇海竹枝词》以滇池及周边的风物为意象，刻画了高峽雨后的美景。

不仅杨慎欣赏，继郭文之后，云南明清两代诗人也作了不少《竹枝词》。浪穹（今洱源）人何蔚文有《昆明竹枝词》：

金马比郎妾碧鸡，不须芳草怨萋萋。
愿郎驰驱万里去，妾自守更报晓啼。

显然这是对郭文《竹枝词》的翻作，但翻出了新意，不失为佳作。《滇南诗略续刻》卷二所载晋宁诗人唐尧官的《竹枝词》六首，则以女性为抒情角，蝉联而出，绸缪婉转地抒发了相思离别的愁绪：

漾东春水漾西通，江上红楼暮霭中。郎去郎来浑不定，相思日日望征篷。

郎在东吴妾在家，锦堂终日弄琵琶。茶蘼旧是郎亲种，不见郎归只见花。

岁晚瞿塘雪意浓，西飞鸿雁隔三冬。春衣欲寄床头锦，纵有长丝那得缝。

杨花扑地草连天，郎去秦淮又一年。帆影朝朝门外过，不知错认几人船。

巫山十二紫烟重，云雨多情恼杀侬。蹢躅^①浩冈红簇簇，蘼芜夹岸绿茸茸。

江上芙蓉朵朵开，江边鸂鶒^②去还来。乐得并头郎不见，倚舟日暮独徘徊。

① 蹢躅：音 zhízhú，徘徊不定的样子。

② 鸂鶒：音 xīchì，水鸟名，好并游，俗称紫鸳鸯。

诗人以一年四季风物的变迁为序，抒写闺中少妇的离愁。她春日倚楼盼望情郎，至春末荼蘼花开还不见情郎归来，转眼冬雪飘飘，隔冬又见鸿雁西飞……。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少妇总是这样凭栏倚舟而望，或在暮霭中独自徘徊。诗虽为六首，意绪却连贯而下，意象往复于四季，周而复始，摇曳生姿——这样的风格，颇似南朝民歌《西洲曲》重现，却又比它多了些朴实，少了些华美。滇云《竹枝词》的创作至此，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明末诗僧担当也作过多首《竹枝词》，如《脩园集·竹枝词三首》其一：“家在昆池流水旁，水从西去恨犹长。任教风浪能颠倒，妾不回头有直肠。”《榭庵草·竹枝词赠李台佐》：“东家赤尾用柳穿，西家巨口不论钱。撞着先生俱脱网，放生船是打渔船。”《榭庵草·浪穹竹枝词》：“城中水热洗欢容，城外水热洗愁绪。若搀一点茈碧浆，欢处无多愁更腻。”在担当的这些作品中，《竹枝词》表现的生活面更为宽广，风格也更为随意。

直到清代，《竹枝词》仍流传于滇云诗人笔下，如时亮工有《昆明竹枝词》二首，杨品硕有《丽江竹枝词》一组，都鲜明地表现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张履程更以各少数民族的风情为题材，写下了《云南诸蛮竹枝词五十首》，可谓滇云《竹枝词》的新发展。

由上述情况可见，郭文一首小小的《竹枝词》，产生了何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杨林两隐君”：兰茂和贾惟孝

杨慎称兰茂和贾惟孝为“杨林两隐君”（《庚寅岁赠贾东亩》）。

兰茂（1397年~1470年）是明代前期滇云成就最高的学者，也是本时期嵩明隐逸诗人的代表，所以谢肇淛说“杨林有兰”（《滇略》卷六）。然而明清两代省外学者对他的评价和载录，仅见《韵略易通》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史》（卷九十六）《艺文志》、《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之《经籍考》、《千顷堂书目》（卷三）等皆载其名目。总之，兰茂的文学创作在滇中虽然享有盛名，在省外却很长时期鲜为人知。其实，即令在整个明代文学史上，兰茂和郭文一样，也属优秀诗人。

兰茂的诗风清新秀逸，其中有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无论从“诗言

志”还是从“诗缘情”的角度看，都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复杂的情怀，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兰茂虽有隐士之名，但《秋夜吟》^①中的“甲兵胸”意象和“洁己士”形象，还是流露了积极用世的精神。隐居是诗人自觉的人生选择，所谓“我非无其才”，“愿作尧舜民”（《秋夜吟》）。然而，由于用世之心始终未曾泯灭，诗中也就表现出了许多矛盾和不甘，这样的心境以《端午日》较为典型。诗人说：“男儿特立天地间，才不见用何惭颜。”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心情，与兰茂为王骥献策后，希望他对自己有所援引而失望有关，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要具体分析。古来隐士既想用世，又耻于干禄的矛盾，在兰茂这里同样存在，这是极其自然的。在上面所引《端午日》诗句的前面，诗人说得很明白：“富贵危机从古然，清醒浊醉皆尘土。”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诗人在同一首诗中接着表明：“便当乐志老岩谷，功名未必胜清闲。”不难看出，兰茂深受李白徘徊于用世与傲世之间那类心境的影响，但其用世之心显然比李白淡泊得多。兰茂在49岁时所作《正统乙丑予年四十九用李太白紫极宫感秋诗韵》，即已明确地表达了坚定的遁世思想：“昔人当此年，仁路几反复。吾宁虚以欵，胜彼满而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兰茂在73岁时作《乐志赋》，开篇即对其隐居生涯作了一个总结：“唯人心之所之兮，宜取适于和宁。苟劳劳而失养兮，若有负于平生。”显然，“取适于和宁”是兰茂的理想，却不是他的现实目的。他接着说：“达人之至明兮，善藏器以俟时。或耕钓以自给兮，曷尝炫才而饰奇。必世主之求见兮，方出就而有为。匪独言而计行兮，道终合而弗离。凡君子之进退兮，盖于此而致思。”从这些话头中我们不难读懂兰茂真正的心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今日之藏，是为了某日之用。“用”的条件是遇到礼贤下士、志同道合的明主。另一面他也表达了一种隐忧：“与其动以取辱兮，孰若静而无求。”因此，他打算“敛踪迹以息游兮，甘淡泊而深处”。“从所好而忘忧兮，披简编以自娱”。可见，终其一生，用与藏、仕与隐的矛盾，在兰茂的内心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也就是他的诗歌时有不平之音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说兰茂的咏物诗表现了其心胸和节操，勿宁说这是君子固穷的写照。这一点，从下面的意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兰》：“众草焉能望，无人亦自香。”《松》：“自得云中老，何辞霜雪侵。”《竹》：“坚刚钟素节，孤迥抱明心。”《紫菊》：“尽堪

^① 本节所引兰茂诗词，出自《兰茂诗词新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娱冷眼，偕隐结忘年。”

终身隐居田园，使兰茂写下了不少优秀的山水诗。他善于以新颖的意象，传达对乡土的热爱和细腻独特的审美感受，在这方面《石羊杂咏》四首是代表作。在这个组诗中，水的空明，山的奇绝，丰收的喜悦，逍遥自在的心境，被诗人出之以清新俊爽的语言，交汇为风格轻灵的田园乐曲：写湖光山色之美，则说“山低月上早，风细浪生迟”（其一）；写瀑布之壮丽，则说“玉龙吹白浪，银汉落青天”。诗人写山水，则山容水态，各尽其妙；诗人写冬去春来，则意象新颖、情思深沉。像《新春》中“新莺初出谷，旧燕复来家”，堪比晏殊《浣溪沙》中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又如歌行体《送春曲》的潇洒清旷，令人想到唐寅（1470年~1523年）的《桃花庵歌》。兰茂在70岁时所写的《成化丙戌年予年七十岁近体诗十首》，无论是情调还是风格，都更与唐寅的诗风相近，尤其是第三首。诗曰：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亲灯火究残编。
因知有作皆虚幻，始信无为即圣贤。
爱景每于花下醉，避寒常是日高眠。
一闲如此谁班辈，已过春风七十年。

唐寅的《感怀》（《唐伯虎全集》）诗曰：

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
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
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
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

这两首诗的不同，在于所表现的诗人自我形象，一个透着江南风流才子的潇洒，一个充满滇南隐居布衣的落寞。成化六年（1470年）兰茂逝去而唐寅诞生，当然不可能是兰茂受到唐寅的影响。

兰茂又是一个优秀的词作家，与诗歌相比，他的词风显得更为细腻清美。《行香子》词一组四首分写四季，表现隐逸情怀，这样的写法流行

于元末明初^①。由这组词，可以想见滇中诗人并不闭塞。

兰茂还是一个批评家，他的九首论诗绝句，在明代的诗论中显得颇为不同流俗。它们集中提出了要求客观公正采诗（选诗）的标准，表现了对待格律的通达态度。兰茂对《唐诗鼓吹》的批评，尤能显出其认识的高明。诗云：

四海百年唐鼓吹^②，就中斑驳尚无穷。
山声野调西风里，考甚平平仄仄工。

诗人合乎情理地认为，当唐诗风标已堕于摹拟的怪圈时，汲汲追求其形式又有什么意义呢？看看当时外界选家选刻唐诗的泛滥现象，以及复古派拘于格套而限于创新的流风，兰茂针砭时弊的用意相当明显。

安宁隐逸诗人张维与兰茂并称。除上文所引谢肇淛《滇略》的评论外，清代王思训的《征刻滇诗启》中有“张维、兰茂既倡大雅于岩阿”之语^③。我们应当探究“大雅”之表现，因为在明代诗坛的一派模拟盛唐风气中，这是一个评价较高的赞语。我想，兰茂以其切身的感受来表现社会不公之现实，即可谓“大雅”。《雪谷樵人》叹“重裊拥炉者，诂识此人心”；《霜陇耕夫》叹“高粱几人许，日出掩重关”；《雨村牧竖》叹“争知堂上客，食肉对金罍”；《风波钓叟》叹“羨人平地上，燕坐饱肥鲜”。这几首诗中所写的渔、樵、耕、牧，本是广大百姓赖以生存的四大生产方式，诗人把他们的痛苦用对照的手法呈现出来，批判现实的意义就颇为深广了。兰茂对清平盛世、丰衣足食的期望，也显得内涵深厚：“相看诚自喜，岁稔少流亡”（《金马秋风》）；“剩得升平乐，山花插满头”（《松径樵歌》）。张维的诗流传不多，但如《温泉》这样的咏物诗，并不为表现山水和自适而作，它标举了诗人高洁的情操：“堂川胜景真为最，澡雪身心却在斯。”

① 见笔者《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② 按“唐鼓吹”即《唐诗鼓吹》。关于此书的编者学界有不同看法，以元好问编选的可能性最大。元人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散文独取《左传》、《史记》、《汉书》，止于韩、柳；诗歌起于《康衢》、《击壤》，止于李、杜。有明一代，这个选本和明人高棅编选的《唐诗正声》，同为馆阁庶吉士教科书。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征刻滇诗启》。

下面再就兰茂与俗文学的关系稍作探究。明代云南文学的成就在诗文、小说、戏曲的创作并不繁荣，但兰茂很有可能是《续西游记》的作者。现在学术界对这部小说的作者有三种意见：一为兰茂，二为季跪，三为佚名。清代袁文典所编《明滇南诗略》（卷一）称此书为兰茂撰：“止庵著作抄本……惟传其《续西游记》、《声律发蒙》二种，又有抄本《性天风月》、《通元记》、《南曲》……《续西游记》所言乃佛氏要旨，而取世所谓邱翁《西游记》取经之事，读其东还所历，与梅子和《历西游记》别是一种，然皆以文词通俗而传。”清代毛奇龄的《西河集·季跪小品制文引》则云：“季跪为大文，久已行世，而间亦降为小品。尝见其座中谭义锋发，齐谐多变，私叹为庄生，淳于骨稽之雄。及进而窥其所著，则一往谿口，至今读《西游续记》，犹舌拮然不下也。技之小者非大匠勿任，文之小者非巨才勿精。向使季跪所作非四子书题，为时所习，亦但若向之所为《续西游》者，则安知世无见毛颖而笑者矣。”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续西游记》、《后西游记》书录后引述了这段文字，但并未认定季跪为《续西游记》的作者。

一般学者否定此书为兰茂所撰，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兰茂生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卒于成化十二年（1470年），早于《西游记》世德堂本刊行一百多年；二是袁文典之说为孤证，不可信。然而从《西游记》流传的版本着眼，可驳第一种说法。因为世德堂本虽刻成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但朝鲜的《朴通事谚解》覆刻本中既有“至正丙戌（六年，1346年）春入燕都”的字样，同时又有明代地名顺天府。编者说在北京买到或见到《赵太祖飞龙记》和《唐三藏西游记》两种“平话”，而它们至迟在明初已经完成。从《朴通事谚解》与世德堂本相同的一面看，有《永乐大典》（1408年）第13139卷唐太宗《梦斩泾河龙》为旁证，说明《西游记》小说至迟在明初已经粗具规模。而从《朴通事谚解》与世德堂本的真正差异看，《朴通事谚解》与世德堂本《西游记》，所据并非同一个本子，世德堂本是对元本（祖本）《西游记》的改进、提高和发展^①。也就是说，在现存诸种明刊本《西游记》之前，必定有一个元本《西游记》存在。如此说来，兰茂未尝没有成为续书作者的可能。就兰茂为作者说而论，如果《滇南诗略》所载是孤证，那么毛氏所记季跪为续

^① 参阅徐朔方《小说考信编·论〈西游记〉的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6页）。

书作者同样是孤证，同样不可坐实。

相比较而言，如果以学术界现有的发现，硬要认定一个《续西游记》的作者，笔者认为还是兰茂更为可信一些。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如下理由：其一，《滇南诗略》说《续西游记》“所言乃佛氏要旨”和“东还所历”，这情节与今传同治本大体相合，可为兰茂作此书的有力旁证。其二，有学者认为《续西游记》的主旨是阐释禅宗的“明心见性”之旨，与《西游记》不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很有道理^①。如小说第十回回首诗云：“履道坦坦莫邪行，一入邪途怪便生。试问前行何是正，但教性见与心明。”第八十三回更明显：“行者笑道：‘师父，你不知我徒弟：久炼禅和释子，酒色财气俱忘。明心见性万魔降，争夺不存心上。’”再说续书写唐僧师徒取经归来诸事，内容与前作相比确乎别开生面，它也不同于其他续书写二次取经。这两个主要不同，倒是颇为符合兰茂不喜蹈袭的个性。郑振铎赞道：“《续西游记》全脱《西游记》的窠臼，别展二境，原是将无作有，故竖空中楼阁，却也头头是道，可证作者设想之奇。”^②观小说，郑振铎所言确为中的之论。其三，《续西游记》显然是词话本，其文字显得较为粗疏，但也是流利的白话文，韵语亦不乏合于格律者。兰茂虽然是文学家和学术名家，但写词话自然要追求浅显明了，这是合情合理的。除了回首诗和描述情景的韵文如五七言诗和骈文外，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乃至斗阵，五七言诗都被广泛地使用，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一并都会吟诗。如第三十四回过黯黹林，小说写八戒被阴沉国国王误吞入口，他暗自得意，“在魔王肚中，念几句词话儿”，念出来的是浅显的七言句。更有意思的是，唐僧师徒也不时联句和韵，第四回师徒四人行路，一人一句联成一首七绝。第八十回写唐僧因思归东土而悲伤，悟空宽其心怀，二人和韵作诗。小说写道，唐僧“对着高山流水，又动了唐人风韵道：‘悟空，你既宽我怀抱，谅你怀抱必宽，我与你对此高山流水，联一两句散心，我便咏流水，你却和高山。’行者道：‘师父尊大，当咏高山；徒弟卑小，当和流水。’”三藏依言，乃咏高山，行者忙接韵，“三藏与行者心志在高山流水，坦然自得”。在这些地方，孙悟空简直成

① 见王增斌、李衍明《〈续西游记〉主题探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②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58页）。

了一个文士。从这类描写看，这部小说出于兰茂这样的隐逸诗人之手，亦是合乎情理的。

兰茂的戏曲有《信天风月通玄记》20折，这是云南古代较早的戏曲作品。这是一部神仙道化剧，和《玄壶诗》表现的主旨相近，主张修身养性，返朴归真。杂剧叙述曾做过小官吏的风魔道士风月子静心修身养性，后来得到八仙的点化，终于得道成仙的故事。

兰茂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著名学者、保山袁文揆在《谒兰止庵先生祠墓同倪竹泉》中表达了对他的仰慕之情：“我爱兰止庵，终身尚其志。”袁文揆的评价代表了后人对兰茂的认同：“上下五百年，望古共遥企。大雅不复作，药灵耸寒翠。”“大雅”赞其诗，“药灵”赞其《滇南本草》。值得注意的是，袁文揆在这首诗里说兰茂“非无济世才，而为明主弃”。如果不是专有所指的话，这倒有别于一般的议论。安宁诗人段昕也在《过杨林谒兰止庵先生祠》中写道：“逸史空留高士名，长安肯上茂陵书。”他相信，只要兰茂肯用世，必能建立功业。

兰茂之弟兰廷瑞的诗，明显受到兰茂的影响。《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兰隐士廷瑞》称兰廷瑞“诗出杨用修（慎）集”。杨慎不止一处提到其诗，曰：“滇中诗人兰廷瑞，杨林人也。予过其家，访其稿，仅得数十首。如《夏日》云：‘终日凭阑对水鸥，园林长夏似深秋。槐龙细洒鹅黄雪，凉意萧萧风满楼。’《冬夜》云：‘枕上诗成喜不睡，起寻笔砚旋呼灯。银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风冻作冰。’《题嫦娥奔月图》曰：‘窃药私奔计已穷，藁砧应恨洞房空。当时射日弓犹在，何事无能近月中。’三诗皆可喜。”^①杨慎的所谓“可喜”即清新^②。无论从立意还是从风格论，这三首诗都当得起杨慎的赞美。杨慎还载有兰廷瑞的一首《信天翁》：“荷钱荇带绿江空，唼鲤含鲨浅水中。波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③《杨林两隐君集》附录兰廷瑞的诗，亦只有这四首，与升庵访到的数十首相差甚远。这四首诗《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六十一）载《题姮娥奔月图》，《御选明诗》（卷一百零八）载《夏日》，《历代诗话》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丹铅余录·总录》卷八、《摘录》卷十八《兰廷瑞诗》。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五十八《清新庾开府》：“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丹铅余录·摘录》（卷五）及《升庵集》（卷八十一）。

(卷七十七) 载《信天翁》^①。

嘉靖年间，贾惟孝上继兰茂，成为杨林地区隐逸诗人的代表，并得到杨慎和后七子之徐中行的推重。《杨林两隐君集》载其诗 66 首，《附录》载杨慎赠诗 3 首^②，《升庵集》不见载。第一首《庚寅岁赠贾东亩》可谓兰、贾二人的合赞：

兰叟和光卧白云，贾生东亩挹清芬。
何人为续嵇康传，题作杨林两隐君。

《癸卯岁再会东亩》和《三会东亩》，则表现了杨慎对贾惟孝的深切友谊和倾慕之情。贾惟孝亦写了满怀深情的《高峽见梅忆升庵》，诗中“可怜疏影横斜后，安得先生一再来”的期盼，如今读来仍觉动人。天启《滇志》之《艺文志》载徐中行的《赠孝义贾维孝》二首，其二道“杨云奇字虎头书，前辈风流总不如”，对他极为欣赏。贾惟孝与兰茂志趣相同，但他的作品流露出来的心境，显然比兰茂宁静。他的内心没有兰茂那种用与藏矛盾的煎熬，如其述志的《题庐四章》，表现出宁静淡远的思致。杨升庵的《庚寅岁赠贾东亩》说“贾生东亩挹清芬”，可谓中肯之论。贾惟孝的诗无论写景、状物、抒怀，都给人以平和疏放之感。《游法界寺》通篇以壮阔的景物，包蕴了深挚的乡土之情，尾联“天开图画无穷景，壮观嵩明第一州”以结句而开深远意境，尤能体现贾诗的风格。若以其《新春》和兰茂的同题诗相比，更显出兰茂的诗以清新秀逸取胜，贾惟孝的诗以平和疏放见长。

四、“留与西南壮颜色”：晋宁唐尧官

晋宁成为云南诗人的集中地之一，缘于正统文化的影响甚大。“晋宁之于滇，则文化之熟也最早。自汉以来即代有传人。而峥嵘葳蕤，盖自

① 天启《滇志》之《搜遗志》说《信天翁》“诗中有讽”：“信天翁，水鸟也，食鱼而不能捕，俟鱼鹰所得坠者，拾而食之。”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3 页）。

② 李文汉、李文林《杨林两隐君集》之《附录·滇南诗略五则》，《云南丛书》本。

有明一代始。”^①就隐逸诗人而言，明代中期以朱玘诗名较著，中晚明则以唐尧官为代表。

唐尧官（1541年～1610年）是嘉靖四十年（1561年）乡试解元，因科场失意而隐居，他不仅在山水中寄托情怀，也抒发对世事的感慨，并批判现实的弊端。唐尧官在多次春闱落榜后绝意仕进，宣称“何当谢尘鞅，于此奉金仙”（《盘龙寺》）。其《山茶花赋》以“移栽上林不可得，留与西南壮颜色”的新颖立意咏云南名花，在众多同题诗篇中显得很独特，不难看到诗人在为山茶花品格写照的同时，也把自己失意于科举而逃禄隐居的心境形象化了。怀念杨升庵的组诗《怀杨太史用〈春兴〉韵》，则表现了对升庵的同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慨：“前席不闻宣室召，湘流长抱楚臣悲！”（其二）“主恩浩荡戈矛外，壮志消磨诗酒间！”（其四）有不少诗人写过怀念杨慎的诗，但往往偏重于对他的追思或仰慕，而唐尧官的这个组诗显然寄寓了自己的失意，感慨出自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称得上是杨慎的后世知己。

唐尧官的诗歌古律体皆擅，大抵以律体抒情写景，古乐府则充分表现了诗人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可说是兰茂、张维诗歌的“大雅”精神在晚明之回响。唐尧官的诗歌理论有比较浓郁的复古色彩。他认为：“《诗》三百篇后，惟昭明太子《文选》所辑者，足以继其响，世共珍之矣。”（《滇文全录》卷二十一《选诗补遗小引》）因而，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上偏重古体。但其诗虽表现了汉魏古诗的影响，同时也挟带着初唐诗的风韵，或豪放或凄婉，有别于一般隐逸诗人的淡泊和超然，更重要的是，不难看到诗人的创造。唐尧官的这类诗可能多半作于归隐之前。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边塞诗，我们从中既可感受征战边关的豪迈情怀，也可体验思妇的愁怨，以及对不良政治的揭露批判。《结客少年行》描写了一个少年侠客英武的形象：

少年重意气，托身游侠窟。日醉酒家胡，气压敦煌卒。孙臆遥见待，郭解暗相谒。结客五陵游，金鞍逐电发。臂控两雕弧，射杀双飞鹞。奋忠报明主，从戎事征伐。烽火争边庭，虏骑分驰突。阵气结如云，剑光寒似月。百战瀚海空，一鼓单于殁。谈笑取封侯，归来未华发。

^① 缪季安《晋宁诗文征序》，1938年刻印本。本节所引唐尧官诗出于此本和《滇南诗略续刻》卷二，天启《滇志》等。

诗中的少年侠客意气风发，武艺超群，胸怀报国之志而驰骋疆场，奋不顾身，英勇善战。我们不妨把他看做诗人早年对自我形象的设计，或谓其建功立业情怀的寄托。《紫骝马》以良马为喻，抒发了诗人愿意为国效忠的决心：“幸得千金顾，宁辞万里行。”与少年侠客之清朗豪放不同的是，《紫骝马》激荡着一股悲壮之气。《出塞》则想象边关的实战之境：“羽檄动边城，将军出塞行。朔气侵旗影，悲风杂鼓声。分兵元近碛，放马不归营。挑战阴山北，看收破虏名。”

诗人不仅善于以古乐府表现斗士的悲壮昂扬之气，也善于抒发思妇的哀婉激楚之情：“依依杨柳色，相送洛桥边。飞去花如雪，攀来袖惹烟。心悬辽海上，泪落晓风前。莫负刀头望，流光不待年。”（《折杨柳》）在这首诗中，杨柳依依是离别心绪的摹状，飞花啼袖是离人远别后的悲伤，闺中女性心悬征战之人，泪落晓风，柔肠百结。然而思妇放下自己的悲伤，反而安慰征人珍惜流年，不畏艰险，早日立功。诗在悲伤哀婉中透着刚健之气，情韵天然，不假雕琢，入律的形式，并未束缚住诗人情感潇洒自如的表现。

在唐尧官的笔下，景物往往是清丽的，但深蕴于其中的感慨，并不因此而减少。我们不妨品味其《梅花落》：“香随风共远，花与雪俱飘。不觉年华改，空悲道路遥。”这首诗上两句写景，笔致轻灵，后两句抒情，笔调凝重，二者相依相偕。

如果说上面列举的作品多半表现了诗人的情怀，那么《从军行》四首以征麓川为题材，鞭挞了拓地开边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有道守四夷，拓地亦何为？嗟哉远征人，徒使妻子离！”（其一）诗人还为民请愿，发出了“谁念西南隅，才力久已殫”（其二），“开关利可谋，谁知桑梓残”（其四）的呼声。自明初王骥征麓川以来，到唐尧官的时代征伐已历多次，诗人的呼声并非出于一时的意气。

唐尧官的乐府诗也有失败之作，如《白纥辞》五首拟古的痕迹太过浓重，《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则明显可见对南朝吴歌和李白的模仿，而《燕歌行》抹不了曹丕同名篇的影子。对这类作品，仅举一例即可说明。《子夜四时歌·春歌》之二：“少小结同心，日久情复乖。安得随春风，处处入君怀。”模仿曹植《七哀诗》的痕迹明显可见。但指出唐尧官诗有模拟过于明显的缺点，并不等于说他只是一个从模拟出发而终于模拟的诗人。《滇南诗略续刻》（卷二）对唐尧官诗的点评是：“《子夜》

诸歌，情致缠绵，谐不涉俚，深入兴体，置诸六朝诸人集中，几无以辨。”这样的说法貌似恭维，实际上等于说一个诗人学习别人而与人家没有区别，这无异于否定了其创作个性。其实唐尧官的成功之作，往往由充沛的精神内涵，绝去雕琢的清朗语言，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汉魏风骨和初唐乐府的流利，被诗人融为一体，质实而清绮，沉厚而飞扬。唐尧官乐府诗中的成功之作，确乎表现了他不失本色的努力和自出机杼的才情，这是不能轻易加以否定的。

唐尧官的孙子，著名诗人担当对其祖父及其诗歌有一个总结：

古道敦素质，新声变其常。时代不可为，达人空徬徨。我祖昔高尚，笃志词赋场。何李起衰后，所守惟旧章。编为五龙吟，声谐凤鸾凰。云霄有遗响，振古何泱泱？岂知明季终，操觚者如狂。楚声乱大雅，时穷诗云亡。运会去莫挽，难以薄力匡。不见商周器，瓦缶亦生香。不见箕颖窟，衡泌亦可藏。那知水与木，源本自绵长。昌后貽厥谋，永为华国光。绳武余不替，王风自优扬。（《榭庵草·读先祖〈五龙山人集〉有感》^①）

在这首诗中固然有担当自己借题发挥的感慨，但他把唐尧官诗中有许多乐府的原因归之于复古之道，把唐尧官诗歌风格的特点概括为古道新声，无疑提供了又一个考察的视角，同时也为明代云南诗坛的复古现象提供了一个实例。

五、“满山空翠淡忘机”：各地州隐逸诗人论略

云南府之外，其他州府亦有优秀的隐逸作家，他们“忘机”（汤琮《法明寺》）于官场，乐在长林丰草之间。即谢肇淛所说：“先后隐居不仕，咸有时称”的一群（《滇略》卷六）。下面择要胪列之。

^① 《担当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一) 永昌府

永昌府声名最大的隐士实际上是张含，详见本书第七章《文学家族摭论》之一《永昌府张氏：张志淳、张含、张合》，此不赘。张含之外，《滇略》提到的汤琮等5人，是一个相互唱和的隐逸诗人群，笔者述其事迹作品可考者如下。

汤琮，号碧庵，被时人称为“汤鸚鵡”。正统间与同郡陶宁、张志举、程广、曹遇等人结为诗社，“素心相许，隐居乐志，以诗名”^①。《滇略》卷六载：“琮《题鸚鵡》诗云：‘翠阁香闺带绿阴，忽闻灵舌啾娇音。总将怀袖温存意，不称云林自在心。笼络反因毛羽误，矜夸休羨赋辞深。陇山烟雨春雏小，莫遣虞罗着意寻。’当时目为汤鸚鵡。”《永昌府文征》还录其《法明寺》一首，诗曰“饥饭困眠无一事，满山空翠淡忘机”，诗人心性的超然淡泊，于此可见。

陶宁，字致远，正统间贡生。精于诗，有佳句传诵人口。《滇略》卷六在汤琮之后载：“又有明经陶宁者，字致远，亦永昌人。有诗云：‘杜宇枝头百舌吟，何人不动惜芳心。桃花红雨梨花雪，铺得春愁一寸深。’又《题菜灯》有云：‘草堂照破蠹盐梦，华屋烧残肉食心。’惜其全集不传。”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曰，这两首诗是他和汤琮等人的文会之作。

曹遇，江南太仓人，官云南副史。《永昌府文征》录其《诸葛营》：“孟获生擒雍闾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夔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

张志举和程广生平不详。

丁嵩，家贫，事母甚孝。乡居开馆教乡里子弟，师从者如云。洪熙间被举荐怀才抱德，辞而不就。宣德间下诏让草野进言，丁嵩上《机务八策》，皇帝嘉许而采纳，征召丁嵩入朝，半道上病卒。著有《横峯樵唱》，《滇略》、《千顷堂书目》有著录。

俞焜，字溟湖，永平人，生员。博通经史子集，不乐仕进。遍游吴、楚、燕、赵、两浙间（按宋代有两浙路，地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著有《广叩缶集》。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汤琮传》。

郑文灿，字国光，腾冲人。嘉靖四年（1525年）举人，有才情，督学孙石矶和张志淳俱器重之。著有《梦骥赋》等行世。

（二）大理府

高可观，太和人，廪生。少年时随父宦游于燕、楚、闽、越间，每到一处辄亲近有道之人，讲求理学。返乡后放弃科举，修筑浩歌园，吟啸其中，自得其乐。著有《苍洱集咏》并天下名胜诗编，为李元阳所重。

杨辅，太和人，字存诚。博学多闻，隐居不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乐善好施。他把家财尽散于需要帮助的人，自己则粗茶淡饭。居住的小楼自命桂楼，在其间读书不辍。后入鸡足山，栖隐居于岩穴之中，八十余岁而卒。著有《桂楼集》、《篆隶宗源》。

（三）曲靖府

项瑄，南宁县人，生平不详。弘治间以良知之学教后进。每游山水，多有题咏。

柴宗儒，字师鲁，南宁县人。嘉靖间以举贡入太学，不久归乡，常带着经书荷锄田间，且耕且读。著有《居易稿》。

（四）临安府

濮宗达，字兼善。成化戊子举人。志尚高雅，不求闻达，杜门不轻易与人交往。著述甚富，存佚不详。

（五）楚雄府

俞汝钦，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举人。生性清高，超然尘外。居家不事产业，惟以读书明道为已任。隐居山中，足迹不到城市。当时地方官慕其名而拜访，俞汝钦无一言涉及私事，惟直陈地方利弊。曾纂修郡志，诗文风格清逸。著有《山斋集》。

丁大训，别号五楼山人。隐居吕合驿。万历间李贽为姚安太守时过必访之。著作散佚，仅遗《仙人骨》一绝，诗云：“五楼峰下紫云关，鹤

取秋风甚日还。白骨不随鸡犬去，只今遗蜕满空山。”

最后，我们对明代云南隐逸作家的创作特点作一个基本归纳：

云南隐逸作家的诗歌题材，表现了热爱乡土的深情、超然世外的心境，然而这只是一般隐逸文学的题中之义。隐逸作家创作的时代气息和诗人个性，更为强烈地表现在兰茂诗中用与藏、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以及他和唐尧官对社会民生的悲悯情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等方面。明代云南的隐逸诗人并非整日整夜地在田园中飘飘然，倘若只看到他们潇洒自适的一面，无疑将失之片面，导致对其创作价值认识的不足。鲁迅先生在其名作《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关于陶渊明的评价，同样可以用来观照明代云南的隐逸作家。

云南隐逸作家的创作艺术，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众体兼备，雅俗并举，并善于在创新求变中保持乡土文学的传统。作家们不仅擅长运用格律诗和古体诗的各种体式，而且乐于尝试《竹枝词》这类来自民间的诗歌样式，这无疑既有利于艺术的继承也有利于创新。在风格上，他们学汉魏、学盛唐而不拘门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郭文的明丽雄奇，兰茂的清新秀逸，贾惟孝的平和疏放，唐尧官的沉郁清朗——这些多姿多采的艺术风格之形成，正是作家们兼收并蓄的结果。

云南隐逸作家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在保持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界的影响。云南文学的发展，自汉以来虽然给人以草蛇灰线之感，但毕竟有一线文脉隐然延续，在明代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汇成洪流。郭文与平显、居广、陈谦并列而成就尤高，这是他融会传统诗艺而独出心裁的结果。兰茂、张维独倡大雅，拓深了隐逸文学的内涵。唐尧官既受到复古风气的影响，亦能够自出机杼。

杨慎这样的外来大家对隐逸诗人的推介及与他们的交往，固然对云南隐逸作家的影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隐逸作家自身创造的地域风格，亦是他们受到外界关注的重要原因。当我们在今天将这类作家置于明代诗歌流风中进行考察时，不难看到其成就及意义。或许有人认为滇云地处偏僻，风气闭塞，隐逸诗人尤其如此。然而，看看杨慎对他们作品的访求和搜集，再看看兰茂在唐诗选本盛行时所作的论诗诗，只要相对公允地进行评价，这类问题不辩自明。

第五章 谪戍文士的吟唱

滇云远悬边陲，关山重重，路远迢迢，自古被作为充军流放之地，内地人视为畏途。传说明代民谣曰：“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① 其实碧鸡关就在云南府首县昆明城外，而迁谪流徙者多半还要被遣往极边之地，如杨慎被判永远充军永昌（今保山），王景常、韩宜可被安置于临安（今建水）。明代章潢的《图书编》分别以《入滇之路》和《控制云南》（卷四十三）为题，记载了自古以来入滇通道的开拓。天启《滇志》和《春明梦馀录》也有关于入滇通道的记载^②。虽说自汉唐以来云南道路渐通，从内地入云南已有三条通道，而明王朝为了更好地控制云南，又新辟了入滇通衢，无惧万一中阻而致云南与中土悬隔。然而谪戍云南，毕竟是可畏之事。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云南更被作为谪戍重地，实际上这成为明王朝向云南移民措施中的一个部分。谪戍者或出于无心，或出于有意，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对云南文明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云南谪戍文学的极盛之时。

何为谪戍？这在明代其实是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说法。以《沧海遗珠》为例，它所载录的谪戍官吏，云南方志凡有所涉则统载入“流寓”，论列时则有“谪戍”、“安置”、“迁谪”等说法，《滇略》（卷六）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卷一百八十九《沧海遗珠》条）则称之为“迁谪流寓”。究其实，以上几种情形是有所不同的。流寓本为客居异乡，或避地筑室，久而定居，不带有处罚的性质，而“流”则为五刑之一。《明史·刑法》（卷九十三）载：“流有安置，有迁徙，有口外为民，其重者

① 转引自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② 天启《滇志》卷四《旅途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极详。《春明梦馀录》卷四十三：“云南自贵州乌撒卫入曲靖、沾益州为通衢”，“又自贵州普安州入曲靖。”“又有广南府一路，出广西安隆、上林、泗城，今因国禁不由。又有武定府一路，从金沙江出四川建昌卫，今亦莽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充有终身，有永远。”可见，“流”是刑，而“安置”、“迁徙”和“充军”，是“流”刑中的不同等级：“安置”即把被判处流刑的人送往指定地区居住，籍在卫所；“迁徙”则要对犯人先行杖责，而后令其离乡到指定地区居住，籍亦在卫所；“充军”为流刑中最重的刑罚，其中又有“终身”和“永远”之分。被判流刑者都要入卫籍守边，“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明会典·文武官犯私罪》云：“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因此，“谪戍”或可视为种种流刑的总称。

在实际中，有起谪籍而流寓者，如沐英请于朝，为平显脱伍籍，聘为沐府西宾，此后平显长期流寓昆明。也有起谪籍而后当地授任者，如张欽任左布政使时，士大夫流徙云南者不论识与不识，皆待之甚厚，“振拔淹滞，量才授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谪籍者弹冠相庆”^①。这类人中还有不少自愿附籍，成为永久性的居民，如翰林学士陈士瑞，洪武初“以误直谪戍，寓居普坪里，带经而耕，长子、孙世居普坪矣”。再如金华人刘福成善看风水，正统初王骥征麓川、侯璉征贵州，皆“用其占候，颇多灵验”。平定后授官，刘福成辞官而愿附籍宜良^②。以谪戍转流寓的，还有巨族富室、僧侣等众，并不限于谪官。“明代为谪戍而流寓云南省的，各府县地方志上不乏此种记载，如明初的傅友德家属，当傅友德死后，被分戍云南，辽东。在云南的一支，子孙旺盛，明代末年的傅宗龙就是他的后人。宋濂的儿子宋慎，也在洪武时坐胡惟庸党徙临安卫，又徙石屏，滇人称其子孙为学士后人。南京富户沈万三，洪武时举家被充军云南，今滇中尚有其后人。其他如御史施武，参知政事姬思忠，进士刘寅，翰林周志宏，都是因罪谪戍云南而落籍滇中的。今保山金鸡村有大户蓝，自言为蓝玉后人，因玉获罪，怕株连，乃改蓝为蓝。以上都是避徙谪戍的移民。”^③

洪武十七年，朝廷开始移中土大姓来云南，当时各府皆设有卫所，

① 诸葛元声《滇史》，云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4版（第300页）。

② 天启《滇志》卷十，古永继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430页）。

③ 秦佩珩《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求是月刊》1980年第3期。

但屯伍空虚，朱元璋欲充实之，故巨族富民、各色人等一有过犯就被遣戍云南。这些人有的是朱元璋定罪，如有一天他对李善长说：“湖广、江西、直隶府州县六房，有主文老先生书写，积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书，尽数起取来京，俱发云南卫充军。”有的人也并不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不过是秋粮违限，造图册违式之类细故。更有巨富被罗织罪名遣戍者，如吴兴大户沈万三被遣入云南，起因即由于朱元璋闻其极富，每欲借故杀之而取其才，马皇后进言说沈万三虽富，未尝为不法之事，为什么要杀他？朱元璋听从了马皇后之言，沈万三才得以免死，徙云南^①。建文间太平知府刘有年因靖难之初不迎王师，获罪安置昆明，后以平交趾之功起擢为按察佥事，卒于官^②。上面种种情况《沧海遗珠》所载诗人未必都有所涉及。还有，并非所有被判流刑者均可起谪籍甚或被赦免，此非本文所涉范围，不赘。

可能由于上述情况，云南方志中的流寓传，几乎等于流刑传，《沧海遗珠》所载21位诗人的入滇身份也大致如此。《滇史》载云南于“洪武初置省，流寓谪戍甚多”^③。《永昌府志》云：“考流寓者自当明始，而谪戍居多焉。”^④天启《滇志》曰：“前《志》云：‘流寓虽无与宦迹，而流风余韵有足传者。’又云：‘以贤人君子之壮游，以大姓徙，以微文戍，皆关吏治。’……录于《流寓》也亦宜。”^⑤看来流寓与谪戍，在一般人看来含义或有交叉，而流寓所包括的范围更广。但方志所载流寓和谪戍，身份区别是很明确的。《流寓》只载官吏，不包括巨族富民和僧侣，雍正《云南通志·流寓》所载如此，天启《滇志》则把《流寓》传列入《官师志》。

在滇云的岁月中，不少流寓谪戍官吏以道德文章名垂青史。雍正《云南通志·流寓》（卷二十三）赞曰：“精诚所贯，薄日月而感风雷”，“稽彼芳踪，顽廉懦立”，“与苍山、滇海并垂不朽”。《永昌府志·流寓》的这段序言，我们今天读来仍怦然心动：“天涯牢落，羁旅间关，何代无之，亦何地无之也。然于牢落之中能使其身虽没而名存，后之人思慕之，

① 以上见诸葛元声《滇史》，云南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② 天启《滇志》卷十，古永继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③ 诸葛元声《滇史》（第290页）。

④ 《永昌府志》卷五十一《流寓》，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30册第293页）。

⑤ 天启《滇志》卷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若而人必非泛泛于世者也……或以文章寄兴，或以忠介全身，或暂寓而仍归，或久居而不返，悉皆卓越，时流并重而不朽者。任其漫灭，无稽可考乎！”或许，这也就是云南诸多志书专列《流寓》传和沐昂辑选《沧海遗珠》的初衷。谢肇淛的《滇略》（卷六）云：“国朝以迁谪流寓入滇者，不可胜数。”他胪列了明代迁谪流寓云南者数人，认为其中最著名的有学士王景常、武功伯徐有贞、修撰杨慎。其余为山阴韩宜可、崞县刘寅、山东高莘、德兴祝璠。但这些人并非都是文学名家，《滇志》、《滇史》、《云南通志》等所载明代谪戍者能称诗的也不过十数，《沧海遗珠》则集中了谪滇诗人共 21 家的作品，成为明初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以作家个人论，杨慎之于滇云，其功彪炳千秋，故笔者考谪戍，以《沧海遗珠》和杨慎为重，并附系“杨门”诸子于杨慎后，其他较著名的谪戍作家则稍论列之。

一、《沧海遗珠》考论

（一）与编者和诗集相关的问题

沐昂编选的《沧海遗珠》（以下正文中简称《遗珠》），载录了明初迁谪流寓云南的 21 位诗人之作，是一部被誉为善本的诗歌总集。在《四库全书》本《沧海遗珠》目录后四库馆臣按云：“其去取颇为精审，在明初总卷之中犹可称善本，非万历以后诸选声气标榜，珠砾混淆，徒灾梨枣^①者比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沧海遗珠》条）则称：“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本书第一章提到，这部诗集曾经盛行一时，为朱彝尊编《明诗综》所取材，其所选计有王景 1 首，王璠（汝玉）5 首，张洪 1 首，曾烜 2 首，郑经 3 首，范宗晖 2 首，平显 2 首，施敬 11 首，刘叔让 1 首。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则几乎全收^②。

① 古人刻书多用梨木和枣木做书版，后世便以梨枣为刻书的代称。徒灾梨枣即白白地浪费书版。

② 袁嘉谷《滇绎·沧海明珠》条，李春龙、刘景毛《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1 页）。

《遗珠》所载录的诗人均为明初谪戍云南者，它的编者、黔宁王沐英之季子沐昂（1379年~1445年）为当时云南都督。明初作家作品散佚甚多，往往不可考，谪戍者更是如此，而《遗珠》恰恰以此为辑录对象，所以尤显珍贵。杨慎说，《沧海遗珠》为杨士奇（“三杨”之一）所赏，而“其诗与《鸣盛集》及《选粹编》埒工媲美”^①。这从文学的角度肯定了《遗珠》的成就。滇云史志对谪戍者及其诗固有所载录，但人数之多虽然超过《遗珠》，就诗家而论，却不可能如《遗珠》这样集中。然而《遗珠》对所录诗家的生平记载极为简略，人们对编者和这个总集的认识也还有疑须辨。笔者先汇集各种文献，对《遗珠》所涉问题进行补充考订，一时不能完备者，则留待来日。

《遗珠》共四卷，于所载诗人姓名之下各注其字号里居，卷首正统元年杨士奇《序》称其集为都督沐公所选，又说沐公字景颢，是黔宁王的仲子，佐其兄黔国公（沐晟）为朝廷镇抚西南一方。并称《遗珠》载诗300余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惟昂字景高，不字景颢，疑其初字。”并推测景高至洪熙元年后，避明仁宗（按朱高炽）之讳，改高为颢，史载未及详察。而杨士奇以第三子为仲子，“则疑误以黔国公为长也”。沐昂确实为黔宁王沐英第三子，《提要》所说是。对其名字清末云南学者袁嘉谷作过一个考证，认为沐昂本字景颢，《诗经》“颢颢印印”，昂印同音，名与字相合。《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本传都作沐昂，字景颢（按天启《滇志》亦作景颢），故不存在避讳改字的问题。杨《序》说《遗珠》载诗300余篇，袁嘉谷说实有270篇。按，《提要》亦相沿300余篇的说法，但笔者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计，包括一题下有多首者，《遗珠》实载诗275首。《提要》又说《遗珠》所录凡朱经、方行、朱絳、曾烜、周昉、韩宜可、王景彰、楼璉、王汝玉、逯昶、平显、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张洪、范宗晖、施敬、僧天祥、机先、大用20人之作，袁嘉谷已指出《提要》误21人为20人^②。《提要》还说“二十人皆无专集”，此言亦不确，实际上见于文献载目者，方行有《东

① 《溪渔诗集序》，天启《滇志》卷二十四《艺文志》，古永继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鸣盛集》为明代林鸿撰，《选粹编》为何人所编？笔者不详。

②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0~711页）。

轩集》，楼璉有《居夷集》，王汝玉有《青城山人集》，逯昶有《方外集》、《遼光古诗》、《遼光古集》，平显有《松雨轩集》，张洪有《张宗海集》，杨宗彝有《贵竹稿》。

杨慎《溪渔诗集序》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与当时流行的选本为参照，皆极言《遗珠》之珍贵，对其文学史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慎说，开国以来文运隆兴，诗道昌盛，编选诗集者不止十数家，但只有刘仔肩、王偁二人所编差强人意。但“仔肩过略，偁录虽精且详，而犹未免于有遗也。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择其粹者。”“皆前选所不及者。”《提要》则说：“以其为刘仔肩、王偁诸家诗选所不及，故名曰《遗珠》。……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刘仔肩，字汝弼，洪武初被荐入京，集一时之诗选编为《雅颂正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雅颂正音》条云，这个诗集所选上自公卿，下至僧侣共五十余人，刘仔肩自己的诗作亦附其中。所选之诗每人寥寥数首，因为是时所选诸人的别集皆未编成，刘仔肩随得随录，因此未能赅备。不过明初诸家无专集行世者，颇借这个选集而略存梗概。王偁（1370年～1415年），字孟扬，永福（今福建省永泰县）人。明成祖即位征至京师，充《永乐大典》副总裁，坐解缙党下狱死。著有《虚舟集》五卷。杨慎和《提要》所说他编选者为《皇朝诗选》，已佚。杨慎和四库馆臣对《遗珠》的评价具有代表性，这部诗歌总集在明初同类文献中居上乘。

（二）《沧海遗珠》所录 21 位诗人的生平及在滇行实

滇云方志对《遗珠》所收录的诗家多有记载。如诸葛元声的《滇史》说，云南自洪武初置省以来，流寓谪戍者甚多，“其显名者不止王（景彰）、韩（宜可）二公”，接着胪列了马莘、逯昶、楼璉、平显、傅天锡、曾日章、刘有年、毛铉、胡粹中、朱士林、陈士瑞、寇克仁等 12 人^①，其中为《遗珠》所收录者有 6 人。天启《滇志·流寓》载通省 45 人，其中为《遗珠》所收录者有 8 人。其他各种方志所载详于下文。谪人高古，清芬可挹，古籍当载，今更堪传。下面笔者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遗珠》而参以其他文献，考订和补充 21 位诗人的生平行实，以其在滇事迹为主，不明谪滇处所者亦予标明，并不限于《遗珠》编定的次序，

^① 诸葛元声《滇史》，德宏州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0～291 页）。

大致以年代和安置地区考列之，《遗珠》所载各人诗篇的数目，包括一题下有多首者。

1. 流寓澄江府 1 人：

朱经，《遗珠》载：“字仲谊，杭人，号玩斋。”录诗 17 首。“朱”诸籍作“邾”，“仲谊”亦作“仲义”。《滇绎》（程本立条）云，邾经为元之进士流寓滇南，《遗珠》以其为首，“其余皆寓滇能诗者。《四库》录其书而称之”。^①《明诗综》（卷十六）云：“盖明初徙滇者也。”《千顷堂书目》（卷十七）、《御选元诗·姓名爵里二》著录邾经有《玩斋稿》。《御选元诗》更为具体地说邾经“尝寓澄江”，并作《澄江棹歌》。澄江府，其府治所在地河阳县距会城昆明 60 公里。按邾经此诗为歌行体，见于王原吉的《梧溪集》（卷五）之《谢邾仲义进士寄题澄江旧稿》后，未见载于《遗珠》，与《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本传所言不符^②。邾诗曰：“谁道澄江净如练，我视澄江真若沔。”这个“澄江”会不会是泛指澄澈的江水呢？笔者认为邾经既入《遗珠》，又有王原吉之诗和诸文献印证他确曾流寓云南澄江，所以不存在泛指的可能性。邾诗又云：“我朝诗派因中州，气节首推刘静修。宋季陋习兹一洒，天运亦复诗家流。杨赵马范虞揭欧，金华莆田谁与俦。”可见邾经以元代遗民自居。王原吉名逢，至正间被荐而未就任官职。《梧溪集》卷五《谢邾仲义进士寄题澄江旧稿》如下：

释褐平生友，郎官辟共辞。
复形椽笔梦，过诵棹歌诗。
楼蜃云霞错，沙鸥雾雨悲。
归舟阻习险，士雅莫吾期。

邾经的《澄江棹歌》对元末诗歌流派的研究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诗录如下：

-
- ①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2 页）。
② 《列朝诗集小传》邾经本传曰：“王原吉《谢邾仲义进士诗》云：释褐平生友，郎官辟屡辞。诗见《沧海遗珠》，知其后曾入滇也。”见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9 页）。

半山昔拜少陵像，谓公诗与元气侔。后五百岁无继者，元气茫茫散不收。我朝诗派因中州，气节首推刘静修。宋季陋习兹一洒，天运亦复诗家流。杨赵马范虞揭欧，金华莆田谁与俦？乱来风雅久衰落，喜向澄江闻棹讴。澄江席帽同羊裘，风尘之表从天游。每和君山老父笛，不换华顶仙人舟。有时击节惊阳侯，百怪莫敢窥十洲。鲸波可蹈惜沉剑，鳌峤欲蹋思连钩。澄江浪高江月浮，江神迎棹风飏飏。云机上割天孙锦，底用枯槎横斗牛。放歌濯足银河秋，洄沿不为澄江留。谁道澄江净如练，我视澄江真若沔。此日相逢东海头，东海纤尘生我眸。醉击珊瑚碎蓬砾，笑委鲛珠轻持殿。俗淫世靡吾所羞，孤凤默默群鸟啾。夏舡一扣海能小，祖楫载誓天何尤。澄江棹歌歌未休，凝碧管弦非所忧。君诗非予得称好，赠言请视今汪周。

2. 天启《滇志》（卷十三《官师志·流寓》）载安置、谪戍云南府（府治在昆明）者6人，其中逮昶下文考之，另5人如下：

朱琳（**琳**），《遗珠》卷一载：“朱琳，字士林。”录诗17首。天启《滇志》载朱士林名琳，江苏泰兴人。洪武间以诗累安置。

曾烜，《遗珠》卷一载：“字日章。”录诗12首。《御选明诗·姓名爵里一》载其事迹稍详：吴江人，洪武间以岁贡授黄陂（今属湖北武汉）知县，考选最优，升迁翰林院侍读，同修《永乐大典》，曾奉使交趾（越南）。天启《滇志》载：“洪武间昆明安置。”曾烜有诗《赠日本僧演此宗》云：“生从日本精三藏，老向云南礼六时。”可见他在滇时与日本僧人演此宗有交往。

楼璉，《遗珠》卷二载：“字士连，金华人。”录诗3首。《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附于方孝孺传后。传谓楼璉尝从学于宋濂，方孝孺死后楼璉受命拟诏，惶惧而自缢死。天启《滇志》载楼璉以明经入仕，官至广东道御史，后召还，著有《居夷稿》。雍正《云南通志》云：“洪武间谪戍云南府，后诏还。有《居夷集》。”《千顷堂书目》（卷十八）载楼璉有《居夷集》五卷，下注“谪戍云南时所作”。《御选明诗·姓名爵里一》有传。宋濂《文宪集》（卷二十四）有《楼母娄氏墓版文》。

平显，《遗珠》卷二载：“字仲微，虎林人。”录诗19首。天启《滇志》载为杭州人。洪武初应孝弟力田，为广西藤县令，降主簿，不久谪戍。博学能文。西平侯（沐英）请于朝，脱除伍籍，聘为沐府西席。所著有《松雨轩集》。平显名列“平居陈郭”之首，本书有专考，请参阅。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三）有平显传，载其事迹与《滇志》大致相同。《列朝诗集小传》（乙集）载其卒年为74岁。按沐英卒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他为平显请脱伍籍定在此前。建文四年（1402年）平显尚在云南作《汤池渠记》^①，他大约于景泰二年（1451年）离滇，在此流寓半个多世纪，卒年当不止于74。《明诗综》（卷二十二）小传、《列朝诗集小传》本传云，张宗海（洪）序其集，以为仲微沂长江、径洞庭、道夜郎，谪昆明，其为歌诗，风格怪变豪放，得于远游之助。平显在滇时和日本僧人演此宗有交往，其诗《寄演此宗》云：“秋风起江汉，纤月在西南。影落清滇水，凉生白石龕。唱酬蔬笋气，梦寐葛藤谈。未遂依禅寂，徒惭雪满簪。”

胡粹中，《遗珠》卷三载：“名由，以字行，山阴人。”录诗17首。山阴，今浙江绍兴。天启《滇志》云：“楚府右长史，洪武间安置。”在滇事迹不详。《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本传云，胡粹中治毛诗和春秋三传。永乐初为楚王府右长史，在楚王门下20年，悉心辅导楚王，及其逝，府中之人皆涕泣。著《读史笔记》、《元史续编》行于世。胡粹中做楚王府右长史，当在起谪云南之后。永乐帝在位22年（1403年~1424年）。此楚王（楚昭王）为朱元璋庶六子朱桨。洪武三年封（1370年），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武昌府。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薨。《元史续编》共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有载。

3. 天启《滇志》（卷十三《官师志·流寓》）载谪戍临安府（今建水）2人：

王景彰，《遗珠》卷二载：“王景彰，以字行，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录诗9首。天启《滇志》云王奎字景常，初名景，字景章，以避讳改今名。松阳（今浙江省松阳县）人。洪武初任怀远（今安徽省怀远县）教谕，擢山西右参政，以事谪戍临安。博洽多才，诗文高古，滇士多从之游。后召还，预修《高庙实录》，迁翰林侍读，永乐间升学士。著有《南诏玉堂稿》。同书卷十八《艺文志》载其《云南稿》书目。二集均未见。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三）所载事迹略同。《列朝诗集小传》本

① 其文曰：“汤池渠，肇始于洪武之丙子（按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时西平惠襄侯沐公在镇。……越二年，公薨（按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壬午夏（按建文四年，1402年），……将校黎老追慕公德，咸愿镌石纪颂，丐铭于平显。”（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页）

传载建文初预修《高庙实录》，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讲，充副總裁官。靖难后进学士，永乐六年（1408年）卒。同书乙集《韩副都宜可》条云韩宜可与王奎同谪临安，王奎“踰十年，复起为左副都御史，卒于官”。《遗珠》有《贺西平侯大人平越州》诗，按沐英洪武十年（1377年）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云南，平定后为镇守总兵，追封黔宁王，长子沐春袭西平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平越州。

韩宜可，《遗珠》卷一载：“字伯时，山阴人。”录诗11首。《明史》卷一百三十九有传。天启《滇志》载洪武间为山西布政使，以事谪戍临安。为人心性纯实，有诗名，一时士大夫多尊礼之，使子弟从其受学。升都御史。著有《南云稿》。

临安文学盛于韩宜可和王景彰，当地百姓为二人立生祠供祀，祠名二贤祠。

4. 谪戍大理府5人：

刘叔让、逯昶、天祥、机先、大用等5人谪戍大理府，时间应在洪武初期。

刘叔让，《遗珠》卷三载：“广陵人。”录诗4首。诸诗选仅载刘叔让为扬州人，生平不详。其《夜雨述怀》云：“十年世事浑如梦，一夜雨声都是愁。南诏羁栖伤短鬓，东湖寥落忆扁舟。”《忆弟》诗云：“渭北书长绝，滇南泪不干。”据诗中所称“南诏”，刘叔让应谪戍大理府。南诏全盛时期的疆土虽然包括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但其都城始终在大理，所以后来南诏一般指大理而非云南全境。滇南在明清时期也泛指全云南。

逯昶、天祥、机先、大用等四人，《遗珠》称后3人为日本僧人，载于第四卷，而把逯昶除外，载于第二卷。云南方志只有万历《云南通志》载逯昶为日本僧人，天启《滇志·官师志》则把逯昶载入云南府流寓传中。所以，逯昶是否为僧人，又是否为日本僧人，存疑。下面分别考订这4人的事迹。

逯昶，《遗珠》卷二载：“字光古，覃怀人。”录诗21首。雍正《云南通志》载逯昶为覃怀人，洪武间迁谪大理，后落籍。天启《滇志》载逯昶为怀庆人，通经术，能诗赋。洪武初谪滇，著有《方外集》。万历《云南通志》所载“四僧塔”（卷二《大理府志·古迹》）云：“日本四僧塔在龙泉峰上，逯光古、斗南，其二人失其名，皆日本国人，元末迁谪大理，皆能诗善书，卒学佛化去，郡人邻而葬之。”对此《新纂云南通志

·明初之日本僧》（卷一百五）考之甚详，并说“逮”字疑为“逮”字之误^①，此说是。但纂者接下来的两个说法就未免自相矛盾了：

其一，《新纂云南通志·明初之日本僧》引逮昶诗数例以证其为僧人。《宿山中寺》云：“喜为老僧留，同坐风雨夕”；《德公院》云：“老僧不出门，林下乐清旷”；《游寺》诗云：“新茶僧采得，更汲涧泉饮”；《月堂室中闲题》云：“扰扰红尘里，无如僧最闲”。撰者认为这些诗中的“僧”皆逮昶自称，又引《晚宿王衡家》^②，两相折中，订其“亦僧亦俗”——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合理。《明诗综》引《静志居诗话》云：“光古诗学晚唐，句如：‘潭净开天境，山昏著雾巾。’‘树枝猿挂折，花片鸟衔来。’‘僧舍竹松院，人家瓜菜园。’‘云来群壑暗，日下半川明。’‘秋色老栖树，夕阳明在山。’令贾岛佛见之当亦点头也。”《诗话》这段评论着眼诗禅，亦可为逮昶亦僧亦俗的旁证。除万历《通志》之外，《遗珠》和诸文献皆未把逮昶定为僧侣，而天启《滇志》把他编入《官师志·流寓》。此外，逮昶卒，机先有诗《挽逮光古先生》，被安置于昆明的朱士林亦有诗《挽逮光古先生》。“先生”的称谓一般不用于僧侣，而僧俗都以此称逮昶，也证明他并非僧侣。但《滇志》和《千顷堂书目》著录逮昶的作品皆有《方外集》，可见他与佛门也不是完全无关。笔者赞同“亦僧亦俗”的说法，但尚有一疑：《遗珠》卷四载大用《挽逮光古》诗云：“论交三十载，死别抱长悲。”倘若逮昶并非日本僧人，那么他和大用的三十载交情始于何时？《新纂云南通志·明初之日本僧》考证明初的胡惟庸一案，牵涉到的日本僧人全被发送到云南来守御，此时或为逮昶与大用及其他日僧结交之始？

其二，《新纂云南通志·明初之日本僧》以“惟明无覃怀州县，疑为倭国地名”而认定“万历《志》谓光古为日本四僧之一，当无误也”。此说不仅与上说相抵牾，而且不确。《遗珠》和雍正《云南通志》载逮昶为覃怀人，天启《滇志》载逮昶为怀庆人，此外还有《明诗综》（卷十二）和《千顷堂书目》（卷十七）载逮昶为修武人。按以上文献，逮昶共有三个籍贯：覃怀、怀庆、修武。其实这三个地方不妨看做一个。《尚

① 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五《宗教考五·佛教五·明初之日本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五册第522~524页）。

② 《晚宿王衡家》：“应役城中久，何能得避喧。登楼山绕县，出郭树连村。僧舍竹松院，人家瓜菜园。晚来投旧馆，童子笑开门。”

书·禹贡》(卷一)云:“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覃怀”为古地名,是夏代的称谓,今河南焦作一带古时以覃怀著称。清代陈廷炜《姓氏考略》载:“夏有地名覃怀,居者以地为氏为覃氏。”《明一统志·怀庆府》(卷二十八)曰:“《禹贡》冀州覃怀之地……本朝改为怀庆府,领县六。”“郡名覃怀(按古名)、河内(按汉代名)。”《明会典》(卷一百二十)曰:“怀庆府有河内县,下有万善马驿、覃怀驿。”以上文献说明,明代虽未设覃怀州县,却并非不沿用这个地名。不独史家,明代诗人亦常称这一带地区为覃怀。《忠肃集·横望巡检司》(卷十一)云:“孤标中断分南北,半是覃怀半泽州。”《明诗综》(卷十四)载陈伯康《寄邳县喻知县》,诗云:“覃怀临别处,每憾太匆匆。”修武位于河南省西北,殷商时代名宁邑,得名于武王伐纣途中遇雨在此地临时驻扎,练兵修武之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始设修武县,属三川郡管辖,今与覃怀同属焦作市。可见,《新纂云南通志》云“惟明无覃怀州县,疑为倭国地名”,并据此定逯昶为日本僧人是不确的。

《新纂云南通志·明初之日本僧》考逯昶诗之收载,说万历《通志》卷四载《丽江雪山》、卷十三载《大理荡山》、卷十四载《就关晓月》,皆为《遗珠》所无。又,文献载录逯昶的诗文集,除《方外集》外还有《千顷堂书目》(卷十七)著录《逯光古诗》五卷,《明诗综》(卷十二)著录《逯光古集》。《遗珠》载胡粹中《挽光古逯先生》诗云:“诗板刊成应自校,草书零落有谁收。”不明所指何集,但观诗意,逯昶的诗集应已刊成,今未见,或佚。

天祥、机先、大用3僧,《遗珠》和《列朝诗集小传》仅注“日本人”三字。

机先,《遗珠》卷四载其诗18首。《长相思》云:“长相思,长如许,千种消愁愁不舞,乱丝零落多头绪。但将泪寄东流波,为我流入扶桑去。”《金马朝晖》云:“岂料长为南甯客,朝朝相对独为翁。”从其诗意看,机先为日本滴僧无疑。《雪夜偶成》二首其一云:“画角声残曙色迟,雪花如掌朔风吹。吟中二十年三昧,未了梅花一首诗。”《高峽泛舟昆明池》云:“不到昆明三十年,重来今日已皤然。”^①可见机先流寓苍洱的时间长达30年以上。《挽逯光古先生》云:“昨日来过我,今朝去哭君。

^① 天启《滇志》卷二十八《艺文志》第十一,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6页),《沧海遗珠》未见载。

那堪谈笑际，便作死生分。”可知机先逝于光古之后。胡粹中《挽鉴机先和尚》诗曰：“日出扶桑极东处，云归滇海最西头。”可知机先歿于昆明。

天祥，《遗珠》卷四载其诗 11 首。雍正《云南通志》谓“不知何许人，《大理志》载其二诗”。《赠李生》云：“异域无亲友，孤怀苦别离。”和机先一样，天祥为异国僧人无疑。《榆城听角》道：“十年游子在天涯，一夜秋风又忆家。”可知其流寓大理多年。《梦里湖山为孙怀玉作》云：“杭城一别已多年，梦里湖山尚宛然。三竺楼台晴似画，六桥杨柳晚如烟。青鸟鹤下梅边墓，白发僧谈石上缘。残睡惊来倍惆怅，可堪身世老南滇。”由此诗可知天祥曾寓杭州，身老滇南。《暮春病怀》云：“落花满地雨丝丝，九十春光又别离。行乐送春犹有恨，那堪多病过花时。”此诗“九十”可解为春光已过十之九，亦可解为年寿九十。若作后一解，与“可堪身世老南滇”相吻合，则其寿高可能逾九十。

大用，《遗珠》卷四仅载其诗《挽逮光古》1 首。从诗云“论交三十载，死别抱长悲”看，他与禄昶相交甚长，禄昶歿时他尚在大理。

5. 不明谪所者 8 人：

方行，《遗珠》卷一载：“字明敏，号东其，先黄岩人。”录诗 32 首。《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附《方国珍传》曰：“行，字明敏，善诗，承旨宋濂尝称之。”方行为方国珍之子，《滇绎·沧海遗珠》条云，从方国珍降者皆徙滁州，不知方行何以入滇？袁嘉谷又说：“其先为黄岩人，盖有讳意也。”^① 著有《东轩集》一卷。

周昉，《遗珠》卷一载：“字原亮，新城人。”录诗 2 首。《寄杨子东》云：“钱塘旧友知谁在，万里滇南见子东。”凌云翰《柘轩集》（卷一）有《为杨子东题竹石扇面》。《列朝诗集小传》所载事迹与《遗珠》相同。

王汝玉，《遗珠》卷二载：“名璩，以字行，蜀人。”录诗 21 首。传在《明史》卷一百五十二，附于邹济传后。其里居为江苏长洲，年 17 岁中举，永乐初授应天府学训导，擢为翰林五经博士，历迁右春坊右赞善，预修《永乐大典》，仁宗在东宫时特加优宠。群臣应制撰《神龟赋》，汝玉夺得第一，解缙次之。后牵连解缙案，死于狱。洪熙时赠太子宾客，谥文靖。著有《青城山人集》。诸史皆不载王汝玉谪戍云南事。又，《遗

^{①②}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1 页）。

珠》载其里居为蜀，《滇绎》云“疑误”^②。按《升庵集》卷三《周受庵诗选序》云：“嘉州杨孟载（基），青城王汝玉。”《姑苏志》（卷五十二）云，其先世为蜀之遂宁人，六世祖王极仕于宋朝，为吏部侍郎，侨居吴中后落藉长洲。王汝玉之集题名《青城山人集》，是以蜀中原籍称，《遗珠》所载无误。汝玉为明代前期著名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青城山人集》条）引《静志居诗话》云：“其诗不费冥索，斤斤唐人之调。”并说吴人徐用理集永乐后诗家 330 人，以其压卷，“观其诗，音节色泽皆合古格”，但遗憾确实有模拟而不能自出机杼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八）则云：“学诗于杨维桢而墨守唐音，不踰尺寸，不能如维桢之自为。”不过四库馆臣在这两篇文章中也公允地说，元末诗风绮靡，王璉独毅然向古人学习，可说特立，再说不能以七子的流弊来衡量明初诗人。王偁《虚舟集》有王汝玉所作序。

杨子善，《遗珠》卷三载：“天台人。”录诗 7 首。《列朝诗集小传》云：“别本作杨子东，误也。”生平事迹不详。

张洪，《遗珠》卷三载：“字宗海，居人。”“居人”一般指家居者或居民，此处不详何指。录诗 5 首，有《拜谒黔宁王庙》，黔宁王庙在昆明。《明诗综》（卷十九）、《御选明诗·姓名爵里一》有传。张洪为常熟人，永乐初授行人（外交使节），曾出使缅甸。洪熙初召入翰林，改修撰，致仕。《东里集·诗集》（卷二）有《送张宗海修撰致仕》，《文敏集》（卷七）有《寄致政修撰张宗海》。张洪著有《南夷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八《南夷书》条）云：“是编乃永乐四年，缅甸宣慰使那罗塔劫杀孟养宣慰使刁查及思栾发而据其地，洪时为行人，赍勅往谕，因采摭见闻，记其梗概，所载洪武初至永乐四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一《使规》条）云：“明张洪撰，永乐四年，洪以行人司行人奉使往谕缅甸，著有《南夷书》，已著录。此书亦是时所作。”《滇考》卷下《缅甸入寇》载：“永乐四年，缅甸与孟养刁木旦仇杀，勅行人张洪持节往谕，那罗塔遣使乞宥，许之。”《新纂云南通志·轶事》（卷二百六十三）载其轶事甚详。《明诗综》（卷十九）引《静志居诗话》云：“有《张宗海集》一册，予在史馆曾见之，无足采者，仍录《东门行》一首。”

范宗晖，《遗珠》卷三载：“以字行，四明人。”录诗 15 首。四明今属浙江余姚。范宗晖生平事迹不详。《次喜雨诗韵》、《谢赐衣》、《鸣凤歌》等诗显然是与沐昂唱和之作，从这类诗作数量之多看，诗人大概被

安置于云南府。

杨宗彝，《遗珠》卷三载：“名彝，绍兴人。”录诗 10 首。《列朝诗集小传》（乙集）载：“杨彝，字宗彝，会稽人。”明代王绅《继志斋集》卷五《杨宗彝诗集序》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春，他因事赴南诏，和杨宗彝曾有过一晤：“道经普安（属贵州），适宗彝杨先生过予于官舍。”贵州普安为人云南通衢。王绅说宗彝宦游四方 20 年，当时自己尚年幼，所以并不认识他。直到入蜀，才闻知其名。如今相会于万里之外，遂握手言欢如故交。王绅又说，杨宗彝“继出其所著《贵竹稿》为示”，“且请予序其端”。那么《贵竹稿》已成，但未见史籍著录，或佚。王绅还描述了他对《贵竹稿》的观感，说从形式看“音韵沉雄，体裁严正，流丽而不至于放，平实而不失于俚，殆有古作者之风焉”；从内容看则“自其平生出处历履，感遇悲喜，一发于诗以寓其志”。评价颇高。

施敬，《遗珠》卷四载：“字孟在，钱塘人。”录诗 23 首。《列朝诗集小传》所载事迹相同。生平不详。

（三）《沧海遗珠》的主要内容和风格

对《遗珠》所录 21 人的生平行实及在滇事迹之补充考订大略如上，事有详有阙，有的可能永远湮灭，难以钩沉。

虽说《遗珠》所录诗人的谪戍地并不完全在云南府，但作为首府，这里是迁客骚人的必经之地，所以从《遗珠》所载部分诗题看，编辑者沐昂在其中起到了聚集这批诗人的重要作用。《滇绎·沧海遗珠》考云：“宗晖之诗题曰《谢赐衣》，方行之诗题曰《谢山中惠炭》，杨宗彝之诗题曰《谢惠华阳巾》，平显之诗题曰《谢惠朱寅仲画》、《谢寄符》诸类，皆不言所谢之人。细玩诗意，即谢沐氏。范宗晖《次喜雨诗韵》，胡粹中《次韵》诸诗，不言所次何人，而无非次沐氏者，盖全集多木氏私交之作也。”^①袁氏的推测有其合理性。据天启《滇志·官师志》（卷十）载，沐昂为人“孝友和易，御人一以诚信，不以利害为趋舍，凡所举动，皆合人情”。^②永乐中，云南右布政使陈逊（福建浦城人）卒于官所，沐昂

①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0~711 页）。

② 天启《滇志》卷十，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1 页）。

亲为其治丧并归葬之^①。平显由沐英亲自请于朝而脱其伍籍，又以沐府西宾的身份长期流寓云南，与沐昂当有师生之谊。《遗珠》载平显谢赐诗中有《谢惠朱宣仲画》、《谢毡衫》等，显然是对沐氏的恩德表示感谢。

《遗珠》中诗人们为沐氏歌功颂德的诗作也不少。有的诗是借题发挥，如范宗晖的《谢赐衣》道：“君不见，夷门羸，三千人中身独荣。信陵当日尚未遇，安得千古遗芳名。”显然他把沐氏比做信陵君了。《次喜雨诗韵》则对沐氏为民祈雨的举动加以颂扬：“惟公镇南服，莅政诚有为”，“致斋祷群祀，雨降不愆时”，“老怀深有感，因之播声诗”。范氏又有《鸣凤歌》道：“黔宁公子国之祯，远镇南服为干城。奇材异彙重题品，山川草木俱增荣”，“请从席上赋长句，愿备乐府歌升平”。这类诗显然是颂歌。王景彰的《贺西平侯大人平越州》一诗，从“大人平越州”开篇而结束于“圣主万年垂大统，海山无地不梯航”，歌颂了沐氏为朱明王朝开国立下的功勋。不能说这类诗完全是表面文章而不发自内心、出于事实，但颂歌声声，难免阿谀奉承之嫌。《遗珠》中也有同僚之间的唱和，如朱琳有《拳毛騮歌次王汝玉韵》，杨宗彝有《次松雨平先生韵》。从后者“露下梧桐客梦醒，梦中犹记在滇城”，“何时更剪西窗烛，重把新诗与细评”等句看，滇中唱和延续到他们都离开云南之后。胡粹中有《挽鉴机先和尚》，朱士林有《挽逮光古先生》，可见当时云南异地滴居的诗人间亦有交往。

《遗珠》所收不独诗人们在滇云的歌咏，但咏滇诗为数不少，所以袁嘉谷说此集中“滇中山水歌咏最盛，谈滇掌故，乌可忽之”^②。韩宜可的《五华山图》描绘了昆明胜景五华山的巍峨壮丽，“五华之山山上头，俯视东海如浮沓”虽出以夸张之笔，却很贴切地表现了首府名山之首的气派。“翠萼影落中天晓，玉柱光含大地秋”一联更以点睛之笔，成为五华胜景题咏的名句。平显的《忆滇春》显然作于离滇之后，诗人以深长的忆念，勾画了云南首府旖旎的风情，令人联想到柳永的《望海潮》。在诗人笔下，无论是“颗金螺贝马蹄盐，万井高甍截画檐”的市井风貌，还是“风花献媚熏青眼，雪絮飞香点紫髯”的春色，都传神地表现了春城独特的风韵。胡粹中的《梦游昆阳海口》以“怪石行惊马，轻风稳送舟”

① 事见天启《滇志》卷十《官师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

② 袁嘉谷《滇绎》，《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页）。

描写滇池山水之美，有其独到之处；施敬的《曹溪夜泊》以“空山孤驿鼓逢逢，明月流辉满大江”写螳螂川的非凡气势，亦有自出机杼之妙。即便是思乡怀亲的伤感，在诗人们的笔下也时现滇云山水之美。施敬的《登碧鸡山寄陆伯瞻刘子伟》云：“碧鸡山顶登临处，一片苍烟迷海树。回首章台若个边，青天不尽山无数。欲倩西风吹雁书，拂云遥寄故人居。书中草草无多字，但道相思会面疏。”山高海阔，西风故人，细腻的情思，鲜明的景物，把迷离惆怅的乡愁渲染于纸上，将诗情随意洒落在滇云的山水之间，使人倍觉其乡愁之深长，亦倍觉滇云山水之奇绝。杨子善的《书怀》与此同调，开篇“舵楼空阔望京华，芦荻江枫岸岸花”两句，很自然地把京华与滇云连接起来，天涯沦落之悲暗含其中。胡粹中的《次韵二首》其二则从季节的变化，抒发思乡怀归之情：“昨夜霜初重，他方叶又黄。蛩声悲月冷，客意怯风凉。孤屿渔村外，荒邮野戍傍。因思旧游处，鱼稻满江乡。”整首诗的情调充满了寂寞和伤感，但意象透出的那种凄美感觉，则又是滇南特有的秋夜风物了。

台阁重臣杨士奇在《遗珠》付梓时所作《序》中，对此集的整体艺术风格作过一个概括：“余阅其诗，大抵清楚雅则，和平婉丽，极其趣韵。莹然夜光明月之珍，可爱可玩而可传也。”《遗珠》中当然不乏具有台阁风格的作品，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同的意象可以造成诗歌不同的气质和艺术风格，谪戍滇云的生涯无论短长，总会在诗人们的笔下留下不能抹去的痕迹：“卷雾远来天万里，压风高卧日三竿。客过坐席真温厚，独愧才名亚冷官。”（平显《谢毡衫》）“美醪能远致，尘抱豁然开。起向窗前坐，风从竹下来。莫思身外事，且进掌中杯。饮罢复高卧，冥心若死灰。”（胡粹中《谢惠酒》）“夜分灯烬漏声迟，掩卷茫然不自支。三月莺花春去后，半窗风雨客愁时。相如未遂题桥志，季子犹持刺股锥。辛苦人生成底事，姓名留得世间知。”（朱缙《夜坐有感》）“何处偏能断客肠，西风吹雨到池塘。都将万迭青山恨，散作离愁一夜长。”（曾烜《秋夜》）“途穷不肯轻垂泪，道在长甘固守贫。”（王汝玉《客怀》）“客床寥落情无赖，月满空梁强自吟。”（杨子善《忆乡中诸故友》）“万里移家入瘴烟，故乡音耗若为传。衡阳自古无来雁，况去衡阳又八千。”（施敬《南行途中寄钱塘亲友》）人生失意之悲，游子他乡之感，即令得到沐氏的青睐和抚慰，又如何能够释怀！谪戍诗人在滇云的作品，承载了太多如此沉重的情思，又怎么可能尽是一派和平婉丽之风，而无酸楚激越之气呢？

考述至此,《遗珠》所载 21 位诗人的生平和谪戍云南的事迹,以及诗集的一些相关问题已大致清楚,然而仍有未决之疑。如有少数诗人的生平事迹不详,有的诗文集存佚情况不明,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二、杨慎的滇云岁月、文学思想和创作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大礼议”被判“永远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他的到来使远处边陲的云南诗坛,成为嘉靖时期全国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揭开了云南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事实就是如此无情:谪戍云南是杨慎个人的不幸,却是滇云文学的大幸。

(一) 杨慎的滇云岁月

杨慎(1488年~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授翰林修撰,预修《武宗实录》。《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昆明碧鸡山高峣杨升庵纪念馆

据说，在杨慎谪滇的漫长岁月里，世宗曾不止一次问起过他的情况，但每次都被朝臣以老病搪塞。杨慎听说后干脆任情自放，以狂狷之行来表现内心的郁愤^①。如果说轶事不过是传闻，那么世宗圣旨有案在录，足以说明杨慎的处境不可能改变。《明史·刑法二》（卷九十四）载：“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明史》卷二百二《唐龙传》载：“大礼大狱及诸建言获罪者，廷臣屡请宽，不能得。会九庙成，覃恩（广施恩泽），龙录上充军应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丰熙、杨慎、王元正、马录、吕经、冯恩、刘济、邵经邦而已。”《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嘉靖十六年二月辛亥”条亦载：“刑部奉诏，例先后录上充军应赦者一百四十二人……得旨：马录、吕经、冯恩、杨慎、王元正、刘济、丰熙、邵经邦不宥，余并释之。”杨慎不幸逝于世宗前，注定了他永世没有赦还的可能。

杨慎以流刑的最重一级被逐出朝廷来到云南永昌府，然而他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有限^②，倒是流寓于安宁和高峣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他把这两个地方视为故乡。《晨发高峣柬丘月渚杨墨池》云：“高峣亦吾庐，安宁亦予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乡陌。”“一身四处家，浮生百龄迫。”（《升庵集》卷十六）据王文才考证，在流放滇云的30多年间，杨慎曾七次返蜀，并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借奉戎役之名寓居泸州，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古稀之年被押解回滇（《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当时云南巡抚游居敬撰写的《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说杨慎于己未岁（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卒于昆明高峣精舍，周复俊《升庵先生七十行戍稿序》的说法与游居敬之序相吻合^③。《滇略》（卷二）所载杨慎卒地亦在高峣，其文曰：“高峣关在昆明县东云津桥之北，旧有城。嘉靖初，成都杨慎谪戍永昌，来往滇池，相其地卜筑焉。乐其胜概，为作十二景诗。后竟卒于此，今其庄亦荒废。”

在滇云的岁月中，杨慎的学识之博瞻，才情之超迈，人格之高洁，皆为人景仰。他犹如一轮明月，以万里清辉笼罩了嘉靖间的云南文坛，

① 参阅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升庵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雍正《云南通志》卷三十有《杨慎逸事》，未及此。

② 杨慎于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至永昌，春季即移居安宁云峰书院。嘉靖十六年（1537年）以来数寓昆明西山高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始迁高峣定居，其间仅短暂回过永昌。同上书，第64、67、69页。

③ 详见丰家骅《杨慎卒年新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云南文学。杨慎去世后，游居敬在《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中生动地记载了杨慎与从游文士相处的动人情景。游居敬说杨慎“不以学问骄人，藏智若愚，敛辩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与人相接，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每日来拜访者络绎不绝，还有人带着酒肴前来求教，以致于杨慎门下靴履常满。滇云士人、乡绅大夫提到他“无不敛容，重其行谊”。这篇文章还记叙了杨慎在滇时期得到职官的尊礼：“前巡抚黄铁桥公、巡按郭公为择安宁州云峰书院以居先生，黔国沐敏静公处以别墅，巡抚白泉汪公题其碑亭，巡抚擢司寇箸溪顾公为创广心楼于高峽，歌以纪之。”杨慎泛滇池，登太华山，游苍山洱海，探奇挹胜，所到之处都有著述，人们争相与他结交。杨慎又工书法，人们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也要辗转摹拓，几乎传遍天下。海内博学之士和德高望重者“千里神交，邮书相讯，述古好文。至于临歿，无杂思焉。其庶几古之所谓豪杰者乎！”^①

杨慎平生著述和文学创作多半完成于云南。《列朝诗集小传》本传说他因长期贬谪边地，书不易得，援引典籍多凭记忆，故舛错较多，甚至杜撰古人言语。这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却无损于杨慎的声望。事实上有人作《正杨》，亦有人作《正正杨》，可见有的舛错或不尽然。杨慎在滇云的文学创作尤擅诗、词，所著《升庵诗话》和序跋，则集中表现了其文学思想。

（二）杨慎的重要诗学观形成于云南

杨慎的诗学观集中表现在《升庵诗话》和其他书信序跋中。《升庵诗话》单刻始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诗话补遗》约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三十五年（1556年）刻于滇中，与张含论诗的《千里面谭》也刻于滇中^②，具有总结意义的《山带阁诗序》则作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可见，漫长的滇云岁月，是杨慎重要诗学观的形成时期。

杨慎少年时代即以诗文知名，并得到李东阳的赏识，他进士及第出于李东阳门下。然而，在创作上他并不追随茶陵诗风。杨慎又与前七子

^① 游居敬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

^② 参见王文才《杨慎学案·升庵著述录》，据此可了解杨慎著述成于滇、刻于滇的情况。

的领袖何景明交好，虽然他对前七子不无好评^①，但是在七子派复古之风盛行时，无论创作还是诗论，他都独树一帜而不随流俗，并对七子派的复古论有所矫正。杨慎与何景明在文学思想上有时甚至可谓针锋相对，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日承手书，论近代诗人，而猥以不肖厕之空同（李梦阳）、大复（何景明）、迪功（徐祯卿）之间。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岂敢当，岂敢当！”^②可见，曾有人把杨慎和前七子的三个重要人物并列，但他并不以此为荣，而是以表面的谦逊，表达了其内心的不认同。

李调元的《升庵诗话序》说杨慎“作诗不名一体，言诗不专一代，兼收并蓄，待用无疑，而说者或以繁缛靡丽少之”。此论一则说明杨慎诗论表现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而不要有所偏废，二则说明当时人对其诗有“繁缛靡丽”的批评。前一点是杨慎一贯的主张，后一点则缘于杨慎从诗歌发展史的事实出发，推崇六朝、初唐诗并实践之。钱谦益把后一点完全归结为杨慎与李东阳的关系，实未尽然。他认为杨慎年幼时即以《黄叶》诗为李东阳赏识，状元及第又出其门下，其“诗文衣钵，实出指授”。其时前七子在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海内为之风靡”时，杨慎乃“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③。事实上，杨慎在整个文坛为前七子的复古风气所裹挟时固不随之，在前七子退出诗坛后的嘉靖末期，他仍然坚持对六朝、初唐的推崇，这就不是一般门户之见可以解释的了，而应当从他对诗歌流变的认识上去找原因。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作的《山带阁诗序》为代表，杨慎对他的六朝初唐论作出了总结。在这篇《序》中他表达了对“近日士林多宗杜陵之矫健高古，不为无因，而蹈袭其字，剪裁其句，与题既不相似，与人亦不相值”^④这一现象的反感。直指“近日士林”，显然针对后七子的风气而发。联系上文杨慎《答周木泾

① 如杨慎说：“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张沧洲为赤帜，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而识者皆以为傍门。至李、何一出，变而为学杜，壮乎伟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三十四李梦阳小传引）

② 云鸿印刷社本《升庵遗文录》卷中书牍类《答周木泾论诗书》。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④ 此序见于朱曰藩《山带阁集》，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印本落款为“嘉靖乙卯六月金伏白诗社通家杨慎序”。

论诗书》所说的“近代诗人”，可知杨慎对前后七子剿袭之风的批判态度亦是一贯的。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从序言起就诋毁杨慎，即因他们的论诗之旨完全异趋。可见说杨慎的诗学观针对七子是有根据的^①。《山带阁诗序》进而说明自己之所以推崇六朝、初唐诗风，是因为这两代的诗歌并非如李白、韩愈所误导的那样没有价值。滇云时期的杨慎在对诗学源流的认识上不仅继续推崇六朝、初唐，亦推重“周雅楚骚”，并以此为诗学之正源。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杨慎的《五言律祖》刻成时，云南安宁文人、师事杨慎的张应台为其作《跋》说：“刻成，俾台跋之，并记所闻于先生于末简云。”张应台闻于杨慎的是这样一番话：

律诗非古也，其周雅楚骚之衰乎！然而窥六甲者、首制辨四声者竞鸣，亦如贡赋之不可复井田，郡县之不可为封建矣。虽然，古意不可不存也。昔人叹虞伯生^②徒见朱子以后六经，不见朱子以前六经；亦叹今之学诗，徒知杜子美以后诗，不知子美以前诗。盖六朝犹近汉魏，汉魏则近风雅，等而上之可也，从流忘返不可也。此先生编辑之雅意。或谓六朝世宦政秕，宜所不采，过矣。《板》、《荡》之什，固晚周之余音；《怀沙》之篇，乃楚狂之裔咏。恶可以时代捐哉！（《滇文丛录》卷二十一）

从这番话可见杨慎论诗歌发展源流，以“周雅楚骚”为正，所谓“六朝犹近汉魏，汉魏则近风雅，等而上之可也，从流忘返不可也”。从流忘返者谁？显然是“今之学诗，徒知杜子美以后诗，不知子美以前诗”的七子派。杨慎又说“近世学杜，而此样风致划尽，盖亦偏矣，善诗者必兼之”^③。“兼之”是杨慎论诗所坚持的核心主张，但“兼之”还是有所限定的，杨慎心目中的对象除了“周雅楚骚”还有六朝、初唐和杜诗。他以“周雅楚骚”为正源，以六朝、初唐和杜诗的某些方面为标准，构成了其“学乎其上”的诗学观。简言之，这个标准在审美上是“天然”，即

① 杨慎举例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韩愈《荐士》：“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这个问题可参阅余来明《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04页），笔者部分赞同其看法。

② 虞伯生，元代诗人虞集的字。虞集诗歌与揭傒斯、范梈、杨载齐名，称“元诗四家”。

③ 《云南丛书》本《张愈光诗文选》卷二《离夕有赠效垂拱体》。

“取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而不是摭拾师法对象之皮毛，实际上流于以“短钉生涩为工”，最终导致“渐流于不通”^①。这个标准又是“清新”：“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②天然、清新，正是对七子派模拟雕琢之风的有力反拨。杨慎推崇唐诗但反对学诗者动辄言唐诗，对唐诗中“极恶劣者”多有指摘。他所列举的例子或可商榷，但其矫正当时流风之旨是明确的。他欣赏和学习杜甫，也批评杜甫，如说其七绝“一则拘乎对偶，二则汨于典故。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汨则儒生之书袋，而乏性情”。故杜甫“虽号大家，不能兼善”^③。就杜甫的七绝而言，杨慎的批评不为无据，如杜甫的《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全为对偶的绝句，的确是截取律诗当中两联的对仗而成。又如另一组绝句《解闷十二首》，其中夹杂着许多典故。但这类诗在杜甫的作品中毕竟只是少数，有时批评家为了强调某一方面难免夸大其辞。杨慎对杜诗流变的分析，最可见其独特的诗史视角。他说：“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这个观点发前人和时人之所未发，然而他认为这不是杜甫的过错，而是“效之者之罪也”^④。杨慎不仅不反对学唐学杜，论诗还往往从唐诗着眼，他之所以推崇六朝诗，亦是认为唐诗源出于此。他说：“汉代之音可以则，魏代之音可以诵，江左之音可以观”，而“有唐诸子效法于斯，取材于斯”，这才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昧者顾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干，从潘非渊也。”^⑤杨慎多次提到六朝诗与唐诗的渊源关系，可见他并不是从个人的好恶或门户之见看问题。

杨慎对宋诗批评，亦立足于对七子派一味尊唐、尊杜的不以为然。他认为宋诗整体上成就虽不如唐诗，“然其中岂无可匹敌者”？所谓“可匹敌者”，即宋诗中颇有带着王维《辋川绝句》余意的一类^⑥。更确切地说，是指宋诗中有主性情之正而含蓄蕴藉的佳作^⑦。杨慎还举了一个有趣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六十《四言诗自然句》。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五十八《清新庾开府》。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唐绝增奇序》。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选诗拾遗序》。

⑥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五十七《宋人绝句》。

⑦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四十八《唐诗近三百篇》、卷六十《诗史》、卷五十四《韩翃诗》等。

的例子来证明尊唐抑宋之荒谬。他说，自己曾把宋人佳作混入唐诗中让何景明分辨，何景明竟断然回答“唐诗也”^①。杨慎以此说明偏执是多么地可笑和可怕。他不仅公允地对待唐宋诗之争，对唐代诗歌他也肯定初、中、晚唐的佳作而不单单推崇盛唐，对明诗他亦肯定了洪武、弘治两个时期的成就。这些，都是以辩证的眼光看诗史的结果。再者，杨慎关注上述问题固然针对当时的流行风气而言，却都是建立在“一代之兴有一代之文”^②、“同能不如独胜”^③和“唐人诗主情”^④这一基本认识之上的。杨慎以发展观论诗，故不专主一代一体；以独创论诗，故力排剽袭雷同；以主情论诗，故力破理学之桎梏。由杨慎论诗的高见卓识，不难看到后来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说，公安“三袁”的文学代兴说、性灵说等文学思潮，是如何在前贤的影响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交汇的。

基于其诗史观，杨慎对古诗和六朝诗歌都进行过认真的学习，对古乐府和《古诗十九首》都有过拟作。《梅花落·序》说其古乐府“乃援旧题以成新曲”，或自题这类诗为《新曲古意》，可见其意不在模拟，而在创新。从《秋夕效六朝体》、《小春红梅效徐庾体》、《红蕖引用李长吉体》、《玉台体四首》等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杨慎真实的用意。

总而言之，谪戍滇云时期，杨慎对中国诗歌发展史及明代诗坛的流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对明代诗坛的流弊有现实的针对性，对他个人而言，则可说是一空依傍，师心创意，取得自成一家诗歌成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贬谪滇云的人生变故，迫使杨慎体验了另一种人生况味；久处民风淳朴的边地，则让他洗去了早年受六朝、初唐诗歌较深影响而带有的“繁缛靡丽”之风。可以说，杨慎在滇云的创作，才真正进入了“独胜”之境。

（三）杨慎滇云诗词创作的基本风貌

描绘滇云的人文历史和旖旎风光，抒发被贬谪边地的抑塞不平之气，以及和滇云文人的师友之情，是杨慎滇云诗歌创作的三大主题。

①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五十七《莲花诗》。

②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七十一《论痴符》。

③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四十八《同能不如独胜》。

④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七十一《唐诗近三百篇》。

杨慎长期寓居安宁、高峣，多次漫游并居停苍洱，他对这些地区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的描写，在浓郁的诗情画意中给人身临其境之感。《滇海曲》（十二首）以滇池为中心意象而兼及大理，融写景抒情、历史沧桑、个人身世之感于一体，大气磅礴而又沉郁飘逸，堪称历代诗人咏滇诗的压卷之作。在这个组诗中，“梁王阁榭”尚在，“铜柱铁桥”依然，但千秋功过，已成霄壤。从“益部雄都”到“武侯征路”，平边定远的历代功业令诗人感叹万端，然而“孤戍平沙望大荒，边愁海思入苍茫”——“帝乡”与“楚道”的距离，才是诗人内心最深的郁结。“使者乘槎曾不到，空劳武帝御楼船”，在辽远的边陲，只有四时美丽的风光和温暖的人情，可以安慰谪臣有志难骋，天涯漂泊的痛苦心灵。每当这样的情绪涌上笔端，诗人总是转向对滇云美丽风物的种种描写：“湖荡鱼虾晨积场，市桥灯火夜交光。油窗洞户吴商肆，罗帕封颐楚妇妆。”这是首府汉夷杂处的情形，商贸兴盛的风情。“苹香波暖泛云津，渔樵樵歌曲水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雪浮秔稻压春酒，霞嚼槟榔呼早茶。”“孔雀行穿鹦鹉树，锦莺飞啄杜鹃花。”高原水乡的万种风情，在诗人笔下被如此生动而多彩地描绘出来，而诗人抑郁的心境，也似乎被暄暖的生活气息和美丽的景物所激扬。《元宵雪》以“娥月隐春城”，“人世即瑶京”的美丽想象来描写华灯辉映中春城晶莹剔透的景象，《春望三首》以“采芳亦有江南意，十里春波远泛花”把滇池之春与江南对比，《新春始泛歌》中“螳螂川水青如苔，漕溪寺花红满台”的鲜明画面，构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滇晓》、《春泛晚归》、《安宁温泉》等诗，也都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人赋予昆明最贴切的“春城”美称，春城也慰藉了诗人灼痛的心灵。《滇海曲》组诗把眼前美景和历史感慨交织起来，清丽的词采中流动着苍凉之气，《滇海竹枝词》则以清新流畅的民歌形式，谱写了一曲滇池渔歌：

罗汉孤峰祇树林，梁王辇道海中心。海垠青青堪牧马，海眼只今无处寻。（一）

东浦彩虹悬水柱，西山白雨点寒江。烟中艇子摇两桨，空里鹭丝飞一双。（二）

第一首起句表明诗人立足于山巅之上，俯瞰茫茫滇池的独特视角。第二句以“梁王辇道”这一既实又虚的喻象，巧妙地把山水连为一体，展现

了滇池空阔浑涵的形象。接下来诗人顺着视线的移动，把目光自然地投向山下，轻轻点染水滨的无垠之绿，最后收束于海眼无处寻的传闻，俏皮而富有余味。第二首描写滇池雨后的美丽景象，诗人开篇从高远处落笔，“水桩”这一俚语，使彩虹的形象显得鲜明而亲切。和上一首不同，这里的山水连接了白雨，而雨被诗人写得那样空明轻透，扁舟渔人和一双鹭丝相映成趣，山水之美在这里用语言来呈现，却胜过水墨渲染的画图。

被贬谪边地的愤懑，使杨慎在滇云的诗歌创作情调郁勃不平，风格悲凉哀婉，愤懑之情往往寄托于各种比兴之中。在《七十行戍稿·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中诗人云：“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虽然明里只能这么说，但诗人的牢骚既不可能、也不愿意隐藏。早在杨慎来到云南之初，就写下歌行体《垂杨篇》表达内心的愤懑。桥旁路边的一株杨柳，寄托了诗人由帝京被贬谪到僻壤的身世之感。这株杨柳在“灵和殿前”曾占尽风光，却遭人妒忌而横遭摧残，被“攀折荒亭委路尘”。今昔对比，荣枯异境，杨柳即是诗人的化身。杨慎晚年的诗篇《咏箐底香花》云：“琼枝本是天边种，零落遐荒四十霜。”这在箐底散发芬芳的香花，亦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南枝曲》以峭堡边古梅为寄怀对象，其小序曰：“予平生所见梅树，此为冠绝。惜乎生于穷山绝域，而不得高人韵士之赏也。玩叹之余，作此曲焉。”诗歌手法虽出之以比兴，诗意却很显豁明朗，诗人“绝世独立谁相怜”的感叹，不会使人产生误会。诗人也会直抒胸臆，如《南中谪居五咏·东望楼》云“越乡悲南冠”，“穹谷无足音”。在诗人看来，自己的境遇简直就和囚犯一般凄凉。《七十行戍稿·寒夕》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内心的伤感和实际的困苦：“东西垂老别，前后苦寒行。旅鬓年年秃，羁魂夜夜惊。春鉏胸内贮，石阙口中生^①。读书有今日，曷不早躬耕。”诗人的愤激之情，在这首诗里喷发而出。

如果就一般的想法而言，杨慎在云南得到那么多职官的庇护和文士的拥戴，寓居各地都有人为之提供楼台馆舍，生活应当是很安逸的，自我感觉也应当是不错的。仅看看他诗歌中的这些题目，也足以让一些人产生艳羡：《赠嵩明太守罗果斋》、《刘虚湖封白石载酒过高峽》、《十二

^① “鉏”同“锄”。石阙，石门。此句意为内心愤激犹如以石臼捣物，以锄头锄地，但已无话可说，如同口中有一道石门把守。

月二日张龙山、谢高泉、敖梅坡、余九崖、杜晴江、梁一江、潘东溪携酒过访高峽》、《潘东溪都阆惠暖床》、《太守董约山访予高峽海庄，胜言寻甸山水之嘉即事》、《杨林病榻罗果斋太守远访》。但我们姑且不论一个封建士子，在中了状元之后应有的抱负和荣耀，只要考虑到因“大礼议”被祸而终身不得赦免的现实处境，就不难理解杨慎抑郁的心境了。《春兴八首》组诗以诗人登楼远眺，晴川万里，山河秀丽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诗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天涯游子悬双泪，海畔孤臣谪九年。虚拟短衣随李广，汉家无事勒燕然。”（其一）“忆昔衣冠侍帝庭，常陪鹓侣翥仙冥。”“梦回仿佛钧天奏，肠断萧条海角亭。”（其四）“宣室鬼神思贾谊，中原将帅用廉颇。难教迟暮从招隐，拟把生涯学醉歌。”（其八）可见，嬉游非诗人之意，重返朝庭才是他的向往。然而事实是如此残酷。由于其谪戍成为“永远”，杨慎几十年来一直心怀隐忧，始终有一种惴惴然的惶恐，如上文所引《七十行戍稿·寒夕》云：“旅鬓年年秃，羁魂夜夜惊。”事实证明并非他多虑，《七十行戍稿·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直陈了一个真实事件：“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诗人70岁寓居泸州时，竟然还被当时云南巡抚王昺派四指挥使其械系回滇！

在漫长的谪戍生涯中，壮志难酬的郁愤，往往伴着思乡的惆怅，和着秋雁、流水、风霜、雨雪弥漫在诗人心头，形成杨慎滇云诗歌创作中时隐时现的悲怆之音。《滇池泛舟见新雁》：“忽见行行雁，来应自故乡。”《赋得千山红树图送杨茂之》：“故人辞我故乡去，滇树遥遥接巴树。”虽然在这艰辛旅程的起头告别妻子黄娥时，诗人已经预料到从此“故园千万里，夜夜梦烟萝”（《江陵别内》），但实际的经历，仍让他愁肠百结，乡思难堪。因此，杨慎的诗充满了怅恨悲愁，越到晚年，其诗歌的意境就越是萧瑟。正如杜甫的诗所言“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① 杨慎的《七十行戍稿》弥漫着垂老漂泊的凄风苦雨和内心的不甘与无奈，格调之悲怆，不下于漂泊西南时期的杜甫诗。

与云南文人的交往及与他们亦师亦友的真情，是杨慎滇云岁月中最重要慰藉，也是他终身所珍惜的财富。绝不仅仅缘于人们对他的崇拜，人的心灵是相通的。困厄中的杨慎，时时表现出对真情的渴望，而云南

^① 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宋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人民也慷慨地给予了他这份真情。《赠王民望》五首是杨慎写给云南诗人的“致歉信”，仅从小序，我们也能感受到诗人的殷殷情意，详见下文王民望（廷表）事迹。《留别安宁滇城诸友二首》一则说“垂老西来日，天涯此会稀”，再则说“垂老东还日，天涯此别稀”，结以“相思幸相问，处处有鸿飞”，依依惜别的深情真实而动人。杨慎与嵩明诗人贾惟孝结交，并一再赠之以诗^①，丝毫也没有文坛宗师的架子。如果说这只是日常的交往，那么知己之感和生死与之的信任就非同寻常了。昆明诗人胡廷禄逝后，杨慎为其作《祭在轩胡公文》，哀挽之情固是题中之义，但“君诗可传，君词堪讽，藏诸名山，副在洛诵”的知己之感，不是可以泛泛道出的。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六月，杨慎在重病中写下了一篇凝重的七言律诗《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这是“杨门六学士”中的大理李元阳、永昌张含、昆明唐铎等3人。诗中说：“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滇云有人堪托是诗人不幸中之大幸，而受之者又何尝不是三生有幸！这份情谊成了云南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除了与文士交往，杨慎也与当地的其他人结下了感人的情谊。《沐五华送鸡》云：“海上天风吹玉芝，樵童睡熟不曾知。仙翁住近华阳洞，分得琼英一两枝。”馈送珍肴或许是寻常之举，令诗人感到慰藉的是温暖的情意。

杨慎的诗歌众体兼备但并非各体皆擅，他尤擅于七言绝句和歌行体，这两种诗体在他笔下可谓尽现其妙。杨慎的七言歌行佳作甚多，意境恢宏，章法巧妙，形象明朗，语言清新，音韵流转自如，融六朝之古朴，初唐之流丽，盛唐之气象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境界。其咏滇诗的代表作如《赋得千山红树图送杨茂之》、《海风行》、《为唐池南题秋江远眺图》、《卧月引为钱节夫赋》等都极富于感染力。杨慎的七绝蕴藉清新，情致深远。这固然与他接受了云南民歌的影响，并擅长随题赋形，摹形达意有关，但我们还要看到，这也是诗人诗学观在创作中实践的结果。杨慎认为，唐人之诗“欲求风雅莫如绝句，唐人之所偏长，而后人力追莫嗣者也”^②。正因为唐人在这里留下的创新余地太小，一方面加大了后继者创作的难度，另一方面诗人却更可以弛聘才情。在绝句创作上求创

① 《升庵集》卷十九有《癸卯岁再会东亩》、《三会东亩》，表现了杨慎对贾惟孝的深切友谊。《杨林两隐君集》转录了这几首诗并载贾惟孝的《高峽见梅忆升庵》。

② 《升庵集》卷二《唐绝增奇序》。

新，杨慎走了向云南民歌学习的路子，上面提到的《滇海曲》组诗和《滇海竹枝词》，可说是其接受民歌影响而对绝句风格加以变化的典型例子。杨慎在谪戍滇云前就编过《风雅逸篇》，谪戍之后又辑了《古今风谣》。明代诗人比较重视向民歌学习，杨慎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位。文人的蕴藉和民歌的爽朗，融为杨慎七绝蕴藉清新，情致深远的独特风格。与其说这是他对唐人绝句的“力追”，不如说是其诗主性情、主天然清新观点的又一实际表现。对照上文所引他对杜甫绝句拘乎对偶，汨于典故的批评，可见其绝句着意并成功地避免了这样的毛病。

杨慎有词二卷，其中描写滇云风物的作品或含蓄蕴藉，或妙趣天成。含蓄蕴藉者如《何满子》组词以“红雨”、“风外杨花”（其一）抒发客里乡愁，以“带雨梨花”（其三）寄托离愁别恨，《山花子·咏红边分心小朵山茶》用“绝代佳人空谷里”比喻山茶，等等，这类词风格相对婉约。妙趣天成的一类，最能代表杨慎咏滇词的成功之处。如《风入松·途中遇雪》描写滇云雪景的“一种风流堪画处”，通篇纯用白描，夜雪晓行，鸡声玉树，溪桥鱼竿，笛里落梅，种种情景在词人笔下随意点染，韵趣旁逸，无雕琢之迹。《折桂令》“枕高岗”、《四块玉·高峣水泛夜归》中那风清气秀，人情温暖融洽的滇池渔村，亦被杨慎以词的形式表现得情趣盎然，流畅自如。杨慎赞美滇云的词作以《渔家傲·滇南月节词》为代表。这一组词对滇南一年十二月的美景、节日、风土人情的表现，以及用《忆江南》词调填的《滇春好》，风格也为词体中少见。

杨慎不但擅长以词体白描美景，也长于用词体白描心理状态，如《沁园春·乙丑新正》云“悲叹岁月，丹心成灰”；《踏莎行·甲午新春书成》云“去年花对断肠人，今年有肠无处断”。《江月晃重山·壬寅立春》其二写道：

金马九重恩谴，碧鸡二十春风。江花江草每年同。君不见，顛顛已成翁。白发戴花休笑，紫髯说剑犹雄。欲笺心事向天公，賒美酒，长醉玉壶中。

当然杨慎的词作并不都是白描式的，相反我们更多地感觉到词人风致。《庆春泽·安宁元夕》描写佳节殊景，风物明丽清美，虽然全词渗透的词人心酸，开篇即已流露出来，全词给人的感觉却颇为含蓄：“鱼市笙歌，螳川灯火，又看滇海元宵。”一个“又”字极为有力地传达了年复一

年，面对此景此情之难堪。良宵美景在他人是“一刻千金”，在词人却是“玉漏迟迟”，只不过长得徒增伤感而已。下阙自然地转向对惆怅之情的抒写：“叹他乡异节，回首销魂。今夜相思，玉人何处吹箫。”乡关远隔，亲人千里，愁恨并非酒所能安慰，“梦回时，酒醒灯昏，月转梅梢”，结句的凄凉与开篇的闹热，都是词人真实的感觉，但有了景物的映衬，情怀的直抒也就不浮不泛了。意象语言的清浅与情感表达的沉郁，在杨慎这类词中的表现往往是自然和谐的。

杨南金的《升庵长短句序》说：“太史公谪居滇南，托兴于酒边，陶情于词曲，传咏于滇云而流溢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①这并非夸大其辞，以杨慎在云南的影响之大，这完全可能是事实。

“杨门六学士”中的唐铎把杨慎置于词的发展史上，与同时的李梦阳、何景明、郑少谷、徐祯卿等相比较，认为杨慎“固当世之雄也”。唐铎说，就词而言，杨慎比之前代则“其思冲冲，其情隐隐，其调闲远悲壮而使人有奋厉沉寂之心；其寄意于花鸟江山，烟云景候，旅况闺情，无怨怒不平而有拳拳恋阙之念。将平其气，敛其材，忘于兴而出于自然者，亦不知其所以然矣。其魏晋以上古乐府，《离骚》之流，风雅之变乎，而知太史之雄也。”^②在这段评论中，唐铎表明了几点：其一，杨慎的词作有别于艳科而令人起奋厉之心；其二，杨慎的词作亦有温柔敦厚之质；其三，杨慎的词作是《离骚》、风雅之流变。就第一点而言，闲远悲壮是杨慎词的双重格调。后面两点与杨慎的文学主张和学源一致，可见是杨慎在词的创作中对其文学主张的实践。

三、杨门诸子与嘉靖云南诗坛之繁荣

杨慎在明代文学家中以学问渊博而著称，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谪戍滇云的漫长岁月中，他对云南文学的发展及其在全国文学中地位的提升，都起到了无人可以比并的作用。杨慎在宗派林立的主流诗坛上置身其外而保持相对独立，但在云南情况恰恰相反，可谓一

① 《云南丛书》本《滇文丛录》卷二十一。

② 《升庵长短句序》，《云南丛书》本《滇文丛录》卷二十一。

代宗师。滇云从杨慎游者不只是“杨门六学士”，所以笔者以杨门诸子称之。以杨慎为中心，以杨门诸子为主体，以其他追随者为外围，云南诗坛形成了群星丽天的景象。杨慎在嘉靖云南诗坛上的中心地位，并不是他的主观行为所致，而是势所必然。在杨慎到来之前，云南诗坛并非一片沉寂，如《沧海遗珠》作家群和“平居陈郭”，就是主流文学在边陲辽远的声响。然而嘉靖四年（1525年）杨慎到来，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逝去，三十余年间他在云南文坛上的主导地位，使云南文学上升为全国文学在西南的一个重镇，这种情况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其发生有独特的背景。嘉靖前期的全国文坛，由于“大礼议”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使原本聚集在京城的诗人群体在短时期内发生大规模强制性流动，迅速分散至全国各地。……‘议礼’事件对于明代嘉靖前期的主要影响在于：在短时期内完成了结构更替。一方面，一批此前已经在诗坛占据重要地位的诗人，由于被罢官、贬谪、流徙，短时间内迅速退出中心诗坛，如杨慎、薛蕙等人，并促使中心诗坛主导风尚群体迅速转化以及主导风尚区域的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因为政治事件而发生的迁徙，促进了地方诗坛迅速发展，使嘉靖以后诗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云南诗坛是其中明显的例子”^①。在此后的云南文学史上，杨慎也有深远的影响。仅以咏升庵成为诗歌的一大题材，即足以说明这一点^②。杨门诸子均非等闲之辈，他们追随杨慎，不是对其声名崇拜就可以解释的，而是杨慎的人格、学问和创作成就所产生的辐射。

下面笔者先考述“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然后再考述其他从杨慎游者。上文说过，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六月，杨慎在重病中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这是“杨门六学士”中的大理李元阳、永昌张含、昆明唐铎等三人。诗云：“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由此可见，滇云从游文士在杨慎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环绕这个在明代、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永不赦免的状元，在当时云南形成了著名的“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安宁诸友”等文学群体。正如著名文学史家郑振

① 余来明《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

② 请参阅王文才著《杨慎学谱·交游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版，此不赘。

铎论到杨慎时所说，“在云南，很有些人集于他的左右”^①。

“杨门”之称见于史载者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如下三条：

1. 《升庵集》卷三十《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自注：吴高河懋尝以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铜为杨门六学士，以拟苏门秦、黄、晁、张、廖明略云。余曰：“得非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然余之遭妬，中害而卒，不得还者，竟以此不欲言其人姓名，如柳子厚传河间云。噫！

2.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杨士云……其诗原出白沙定山，近取裁于杨用修。同时吴懋以给事及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铜为杨门六学士。六人皆滇产也。^②

3. 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五：杨升庵先生在滇，有张半谷含辈从游，时谓“杨门六学士”，以比黄、秦、晁、张、诸人。半谷即愈光，余则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铜。又有吴高河懋为七子，以拟廖明略。升庵谓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时盛事是也。……升庵客滇，游其门者自‘六学士’外，又有隐士董难。难字西羽，太和人，常辑转注古音，著《韵谱》。《滇志》列《隐逸传》，曾见其题《玉局寺》一诗极佳……风格宛似升庵。

按以上记载，“杨门六学士”之说起自吴懋，杨慎加于订正，入于“杨门”者实有七人，“六学士”中无吴懋，加上吴懋则为“七子”。《居易录》谓“六学士”之外又有董难，则为八人。但无“八子”之说。在滇从游于杨慎者实不仅此八人。详见下文。

王士禛《居易录》提到的廖明略，据祝尚书《苏门“后四学士”考论》，宋代韩洙《涧泉日记》卷上有载：“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四人，文学史上称为“苏门四学士”，“后四学士”以廖正一为首。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元祐二年（1087年）除秘书省正字，绍圣二年（1095年）知常州，入元祐党籍，贬监玉山税，卒。^③《东都事略》（卷一一六）载：“……轼门人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四十一引。

③ 见祝尚书《苏门“后四学士”考论》，《江海学刊》（南京）2006年第4期。

黄、秦、张、晁，世谓之‘四学士’。每过轼，轼必取密云龙湔以饮之。正一诣轼谢，轼亦取密云龙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亚于四人者。”宋代晁公武亦曰，廖明略元祐中召试馆职，苏轼时在翰林，见其对策大奇之。当时黄、秦、晁、张在苏轼门下，号“四学士”，苏轼待之甚厚，每来必命侍妾朝云取密云龙茶，家人以此知之。一日苏轼又命取密云龙，家人以为是“四学士”，窥之，是明略来谢。^①可见廖正一乃苏轼所取士，故与苏轼关系亲密，在当时的声望，仅亚于前“四学士”。廖正一等四人必须及于苏轼之门，且在与苏轼的关系上，同黄、秦、晁、张等“四学士”有可比性，才有资格称“后四学士”。杨门诸子与杨慎的关系或疏或密，若以简拔和功名论，显然都与杨慎无关，但若就从游受知而论，则与前后“四学士”有相同处。至于王士禛说吴懋可拟廖正一，则只能从“拟”字去理解，而不能胶着了。董难本未列入“六学士”或“七子”之列，另当别论。

下面主要梳理以上8人从游杨慎的主要事实和创作风貌，其人互见于本书者，除与杨慎交游之事外其他事迹从略，反之则稍详。

张含（1480年~1567年），生平和创作详见本书第七章《文学家家族摭论》之一《永昌府张氏：张志淳、张含、张合》，此处只涉及他与杨慎的交往。张含与杨慎为世谊，他随其父张志淳宦游时，以弱冠之年和年仅十二岁的杨慎订交，成为终身最为相知相契的朋友。天启《滇志》（卷十四）张志淳传记载，张志淳与杨慎之父文忠公（杨廷和）交好，一日会饮于其寓，杨慎侍宴，杨廷和问知张志淳也有一子相随，嘱次日携张含至，遂与杨慎订交。杨慎有《南园先生集序》及诗歌《南园张公过家君小饮，灯下较象戏，余侍命咏纪之》，诗下注“时年十二”。按杨慎生于弘治元年（1488年），小于张含8岁，其《寿禺山张愈光七十序》曰：张含“生于成化庚子（1480年），兹嘉靖庚戌（1550年），盖七秩有一矣。”

《升庵集》（卷二十八）《招张愈光》注“癸亥岁，时十六”，此为杨、张二人唱和的最早记录。至杨慎嘉靖三年（1525年）因“大礼议”被谪戍永昌，嘉靖四年来到云南，则如天启《滇志》（卷十四《张志淳传》）所言，“与含剑盖合”。此后杨慎寄寓滇中各地，始终与张含保持着联系并相互唱和。据简绍芳的《升庵年谱》，嘉靖十二年（1533年）杨

^①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廖明略〈竹林集〉》条。

慎游大理诸处，曾会张含于霁虹桥（古兰津桥）并刻诗志别。同年孟夏张含亦来大理会杨慎，作《写韵楼歌》，二人在这一年两度相会。张含有诗《己亥秋日寄升庵八首》，诗云：“滇海离筵晚共舟，别来山月两经秋。”己亥为嘉靖十八年（1539年），可见嘉靖十六年（1537年）张含曾复会杨慎于高峣。据张含诗《癸卯冬于连然与升庵为别，今十年矣》，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他和杨慎会于安宁。《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有“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语，则张含这年秋北上，冬晤升庵于高峣。《太史升庵遗集》卷九《莲池夕泛偕张禹山胡在轩唐池南》小注云“壬子岁作追录于此”，据此杨慎与张含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曾在昆明同游。此后无二人交往的记载。张含的组诗《寄杨升庵八首》之三云：“二十四年金马路，海风山月不胜秋。”之七云：“二十三年滇海上，此生端合老江湖。”据此，杨、张在滇的交往唱和长达二十四年之久。他们不仅唱和，也探讨诗艺。杨慎居滇时，在二人不能聚首的日子里，就用信函的方式讨论。张含把杨慎寄给他的这类书信先后刻为二卷，即《千里面谭》。卷上末尾附有杨慎函，曰：“慎近多病，不多作诗，而喜谈诗，然无可与谈者。千里又与吾兄隔，暇日书《千里面谭》一卷，以代一夕之话，必有以教我也。”^① 闻知张含欲刻第一卷，杨慎又寄去续书一卷，可见他对张含的欣赏，亦见二人学谊之笃厚。杨慎亲手点定张含诸集，合为《张愈光诗文选》五卷，《云南丛书》收入。

唐铎字文荐，又字池南，云南府晋宁人，嘉靖元年（1522年）举人，与李元阳、张含之弟张合为乡试同年。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知定远县（在安徽）。唐铎为官果决严明，不避权贵，授御史巡按湖广。考选最佳，转河南按察司佥事，在任上以得罪权要致仕，归乡后殫精著述。唐铎的诗歌代表作如《盘龙寺忆孙松山（继鲁）中丞》风格刚健，不事雕琢，诗中“郁郁松千树，何年却向东”的歌咏，表明了自己同样刚正的个性。《河南通志》（卷七十三）《艺文志》载其《百泉咏》，这首诗以想象丰富，气势雄浑取胜。陕西黄帝陵正南面陵前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个大字，旁题“大明嘉靖丙申十月九日滇南唐铎书”。丙申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唐铎应曾宦游陕西，又有《池南按陕集》可证，此书明清诸志未载，见晁氏《宝文堂书目》。唐铎当为陕西巡按，

^① 见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著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397页）。

但这事迹不见于唐铨诸传记。

唐铨为“杨门六学士”之一，杨慎有唐池南“从余为诗”^①之语，又有赠唐铨诗二首：《为唐池南题秋江远眺图》、《登海宝寺望侍御唐池南别业因赠》^②。唐铨从杨慎游当在其致仕后，此前他只是拜访过杨慎。唐铨在《升庵长短句序》中叙述了他和杨慎的文学交往：“升庵太史之寓滇中也，池南子尝过之，既睹其辉而览其芳矣。太史不以池南子之愚且闇也，授以近稿。……池南子病归，伏枕席者、阻门者、阻舟车者。池涵一水，云掩千山，迂回百里，倏忽三年，于太史悬悬也。太史亦不以池南子之迂且踈也，有便辄通刺并以长短句投之池南子，恍如太史之神处而默契也。”唐铨还转述了杨慎的话：“抑闻太史每语人曰：‘池南子是能知诗者，吾差有取焉。’”这篇序也表明了唐铨的诗学观。他说：“夫人情动于中而有言，言发于外而为声，声比乎章节而成音，孰非心也。”并说诗歌的声音、律节，皆源于性情自然（“心”），而气、材、兴三者皆具才可以言诗。唐铨以此为标准评论杨慎的词，说这正是所谓“昌其气，达其才，融乎其兴者”，所谓“本乎性，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出于自然者”^③。因此，他把杨慎置于诗歌发展史上，与同时代的李梦阳、何景明、郑少谷、徐祯卿等相比较，认为杨慎词是“黄钟大吕，希世之音”。这篇序言对我们理解杨慎的词有所裨益。简绍芳《升庵年谱》戊申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载，杨慎在这一年春天到晋宁，与唐铨同游海宝寺、盘龙寺^④。杨慎曾说见到云南提学彭纲的《咏刺桐花》诗三句，自己原以为“彭公此诗本四句，命吏写刻于匾，遗其一句，复诵之，自觉意足，乃不更改，余闻之晋宁侍御唐池南云。”^⑤

胡廷禄（？~1554年），字在轩，昆明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与两次任云南巡抚的顾应祥和大理的杨士云同榜。他任南户部尚书时，曾与吕泾野、邹东郭讲究正学。任河南按察副使时，肃宗南巡渡河，因嫔舟后至而受牵连被削籍。归乡后胡廷禄隐居城郊，足迹不至公门，惟以著述自娱，其同年顾应祥两度抚滇，胡廷禄有意避之。顾应祥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六十《应真》。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十四、卷三十一。

③ 《滇文丛录》卷十八，《云南丛书》本。

④ 转引自王文才《杨慎学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五十九、《诗话补遗》卷三《三句诗》。

廷升离云南时亲临其庐，廷禄不得已而出见之。

胡廷禄的诗歌多散佚，从《送永昌周生绍稷会试歌以壮之》一诗，可见其人品和风格：“东扫倭，西来胡，乾坤何事非吾徒。青钱首中乌台选，即上春官计褒贬。风霜万里不辞寒，固知君子铁作肝。君不见，董仲舒，公孙弘，两生射策皆第一，至今人品谁第一？”据报道^①，2007年8月16日在河南省信阳市发现一块古代石碑，1935年修的《信阳县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该碑是明代嘉靖年间胡廷禄的诗碑，字体为汉隶，古朴浑厚。诗为七律一首：

清酒重阳一滴无，葡萄独醉执金吾。
将军大树雄三楚，野老扁舟挟五湖。
燕雀有情鸿鹄远，江山依旧旅人殊。
寒云菊蕊同今夕，淮水西头月色孤。

该诗的落款为嘉靖己亥元月九日，这是嘉靖十八年（1539年）。据县志记载，这块诗碑原先镶嵌在城东岳飞祠的墙上，岁月变迁使之成为铺路石。报道说：“胡廷禄为明代嘉靖时期信阳州的副使，是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骠骑是名号，袁骠骑可能是信阳驻军的首领。该诗反映了历史上两位地方官不为人知的友谊和信阳楚风淮水的画面。”这段话中的“袁骠骑”等话头语焉不详，胡廷禄则是河南按察副使，而非信阳州副使，州这一级没有这个职位。查《重修信阳县志》（卷四），此诗题为《醉别袁骠骑》。

胡廷禄乡居时最重要的交际是杨慎。作为“杨门六学士”之一，在升庵谪滇初期胡廷禄即前去探访，致仕后从其游而切磋诗艺。杨慎在《祭在轩胡公文》中说：“乙酉（嘉靖四年，1525年）之春，余谪滇云，君来温泉。”又说胡廷禄罢官归乡后深居闭户，竹松为伍，“步绝公府，于我独亲”。杨慎还追忆了二人的交往，曰：“昆明池上，高峽水滨。或来或往，匪日匪旬。我倡君和，东主西宾。雪飞琼树，风起青苹。篇裁绮致，思入清新。”^②从这篇文章可见二人志趣相投。简绍芳《升庵年谱》载己酉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杨慎居高峽时，夏秋常与胡廷

^① 根在中原——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网页：《信阳发现明代胡廷禄诗碑》。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九。

禄等滇中士大夫同游滇池，结有《池赏诗社集》（转引自王文才《升庵学谱》）。是集未见。《升庵集》卷十九有《与胡在轩简西岱泛舟至柳坝晚归》，卷三十三有《自滇归高峽留别胡在轩》，应是这段时间的同游诗。《自滇归高峽留别胡在轩》之“滇”疑为滇池，这首诗的结句云：“相望片帆程，相忆能來否”？可谓情意深长。

杨慎之外，胡廷禄在乡里和段綬的交往最为密切。段綬字朝聘，昆明人，嘉靖戊子举人，屡应春试不第，更加发愤向学。在京与周洞岩论慎独之旨，一时名士如谢高泉、万履庵皆与其缔交。段綬自视甚高，归田后独与胡廷禄游。胡廷禄卒后段綬诔之曰：“始待益于外来，终取足于天则。”自此闭门不出，宦滇官员欲求一见而不可得。所居之处低下狭小，罗汝芳题曰“颜巷”。

王廷表（1490年~1554年），字民望，阿迷（今云南开远）人。正德甲戌（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上命勘宁夏台谏之狱，王廷表不避权贵，后改四川佥事，罢归乡里。王廷表著有《钝庵读史》及删后诗集《桃川剩稿》，其谈经之作《皇统》及《钝庵读史》较为人称道。

杨慎谪滇居安宁时王廷表曾六次拜访，杨慎有诗《赠王民望》五首，致歉而定后约，可见二人交谊。小序云：“钝庵王民望，自临安千里来访予，信宿而别，期与池南唐子、午衢段子会于晋宁为盘龙、海宝之游，值予阻疾，不果行。作此以寄，且订后期。”组诗其二曰：“言笑豁相思，有约当后期。”^① 戊申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春天杨慎至晋宁与唐铨游海宝、盘龙、生佛诸山陀（见王文才《杨慎学谱》引简谱），并无王廷表与之的记载，显然“后期”之约未果。

嘉靖十三年（1634年）王廷表迎杨慎于阿迷，建状元馆居之。简绍芳《升庵年谱》甲午（嘉靖十三年，1634年）载王廷表迎杨慎住状元馆之事，王文才对此考之甚详^②。廷表之父王颖武《状元馆记》曰：“予命儿廷表迓至家……为馆居之，日与儿廷表读书，多所著作。”杨慎《王钝庵墓碣》云：“迎慎于阿，建馆居慎者数月”。《庠师王公墓表》曰：“慎随廷表宪使君行至阿迷，拜先生于庭，盖坐春风又一月而归安宁。”按杨慎称王颖武为“庠师”，大概出于自谦，指此行“盖坐春风又一月”。王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十九。

② 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5~86页）。

廷表与杨慎同游阿迷时作诗三首：《杨用修至集乐耘别墅》、《同用修水泉有怀》、《游观音寺时用修欲返安宁》^①。

王廷表作于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年）的《刻丹铅余录序》^②，还记录了他和杨慎的一段文字交往。其文曰：“廷表访升庵子于连然，获《丹铅余录》，读之未竟也。寻升庵子持以过表订卷耳，题闽蜀抡材卷。”《四库全书总目》有《经义模范》一卷，不著编辑者姓名，但前有王廷表序，称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年）访杨升庵于滇，得《经义模范》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刻云云。

王廷表对杨慎的文学评价主要有两点：其一，杨慎的诗歌创作成就得之于途穷、山川奇秀之助、取典籍菁华为材三者的成全。他早在未及第时诗名即已扬于海内，但谪滇之后益老益工，入玄入妙，可媲美于杜甫的夔州之作。杨慎于书无所不读，于诗则自汉魏六朝及盛唐诸家，长篇短章，无不口诵，故其诗“必可传可知矣”（《桃川剩集·南中续集序》）。其二，杨慎的词“至音神解，奇藻天发，率意口占，警绝莫及”。这是王廷表在与前人和同时佳作相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宋人无诗而有词，诸名家擅场绝代。至元代曲盛而词又亡，本朝诸公于声律不到心，惟高启、刘基词“号为琤琮”，但比之杨慎犹有未及，故“杨子词为本朝第一”（《桃川剩集·长短句跋》）。王廷表对杨慎谪滇时期诗词创作的评价，既看到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激发因素，又看到了作家的才情和学养，并且具有文学史意识，可谓全面而深刻。

《云南丛书》本有王廷表的《桃川剩集》，《滇诗丛录》载其诗12首。相传王廷表与杨慎在阿迷曾各作《梅花百咏》诗，《滇诗丛录》载王廷表《疏梅》、《矮梅》诗2首，后引袁嘉谷的《卧雪诗话》云：“余于庚戌游阿迷，访得钝庵百梅诗，携入浙录副本藏之，即将原本寄滇。辛亥改革，副本失。归滇，壬子有诗云：‘又见乡人拥翠岚，渔兄樵弟话天南。只嗟失却梅花卷，孤负时人老钝庵。’癸甲之际，滇刻丛书幸复得见原本，升庵百梅七律，钝庵百梅五律，皆叠韵也。叠韵至百，必不能工，今选二首以存其略。”录王廷表这两首咏梅诗如下：

① 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97～598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丹铅余录》。

应嫌春太密，淡著两三枝。脱略半窗影，离奇几叶诗。常筛明月色，不隔远山姿。相对惟宜竹，萧萧风雨时。（《疏梅》）

偃蹇竹篱内，香盈咫尺枝。当窗不碍月，席地可寻诗。养拙才虽短，复春香更姿。守株惟待暖，傲骨岂趋时。（《矮梅》）

梅花在中国士大夫笔下是高洁人格的象征，从这两首诗中，亦可见王廷表孤高淡远的情志，清朗飘逸的诗风。

李元阳（1497年～1580年），字仁甫，号中溪，大理人，白族。嘉靖元年（1522年）云贵乡试第二，与晋宁唐铎为同年。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选庶吉士。在“大礼议”前期因议礼不合上意，谪分宜（属江西省），因政绩卓著，拜监察御史，独立不阿，仗义执言。做过江阴知县和荆州知府。致仕后家居40年，84岁无疾而终。“元阳倜傥有奇节，文章德行，皆为中外崇重”（《滇略》卷六）。元阳为御史巡按闽中时，含官污吏望风而解印绶，与高崧同称“两御史”。居乡撰修《滇志》，著有《中溪家传稿》十卷，《云南丛书》收编题为《李中溪全集》，《丛书集成续编》收入第142册，题为《中溪家传汇稿》。

李元阳宦迹既远，交游甚多。“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皆列入其名，尤与杨慎交游近。其《浩然阁记》云，嘉靖九年（1530年）他曾与杨慎同登浩然阁。杨慎亦有《游点苍山记》言其事，云：“寓感通寺二十日，撰《转注例》（即《转注古音》），元阳题曰写韵楼。”据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杨慎嘉靖七年（1528年）寓大理，李元阳是时丁忧告归，或于此时与杨慎订交。其《游石宝山记》记又载：“嘉靖辛卯（十年，1531年）暮春，成都杨修撰约予同游。”李元阳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致仕，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杨慎寓大理，二人又同游点苍山水间，李元阳并为杨慎作《刻檀弓丛训序》。杨、李同游见于记载者仅此两次，但二人的交谊始终未尝稍渝。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元阳作《寿升庵先生六十序》，嘉靖二十八年冬（1549年）李元阳撰《升庵先生七十行戍稿序》，他说：“嘉靖二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泸至滇，涉路三千，历日四十，澆淅衣^①成诗百余首，题曰《七十行戍稿》，寄点苍山且命序之。”李元阳是升庵临终诀别诗所诀三子之首。嘉靖四十一年

① 澆淅衣：指路途辛苦，汗渍风吹雨淋。“澆”，音 jiàng，把泡过的米滤干；“淅”，象声词，形容轻微的风雨声。

(1562年)李元阳重游石宝山,写下了《重游石宝山记》、《登石宝山》,并在昔年与升庵同住的兴教寺凭吊升庵,作《兴教寺海棠感旧》诗。

李元阳的交游在文学上声名甚著者,除了杨慎还有李贽(详见本书第二章《宦滇职官的咏歌》)和唐宋派的两个代表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遵岩集》(卷二十二)有王慎中的《与李中溪书》三封,其二云“想念无已,而绝无滇行之便”。《荆川集》(卷五)有唐顺之《答李中溪御史书》,书云“兄之使闽也一年矣,辱以书下问者且数四矣!”一年数封书信,可见李元阳对唐顺之非常关心。同卷《答江五坡提学书》又云:“李中溪使来辱手书,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经注疏》,此大惠也。”《中溪家传稿》有诗《期唐荆川不至》。李元阳的其他至交,如翰林院检讨、四川任少海与其交游时间最长,李元阳有诗《出京留别任少海李伯华二吏部》、《闻任先生自蜀命驾入滇见访,夕至,感旧兴怀,因有此作》,后一首诗记录了二人暮年相逢的感慨。诗云:“苦忆三巴任太史,一别咸京四十年。”“消息纵真疑是梦,幡翁八十路三千。未论鸡黍寻前约,垂老相逢岂偶然。”

李元阳是明代云南著名的诗家,而《明诗综》卷四十五、《御选明诗》卷二十七皆只录其《冬夜》一首,《明诗综》并引何穉孝语曰:“此诗有蘧伯玉及时勉学之意,非流连光景者。”一首诗远远不能体现李元阳的创作成就。赵藩说,综其生平、学识、趣尚、出处、交游等等,“就集中诗文求之,十可得其八九”^①。《李中溪全集》的胡僖《序》,也对李元阳诗歌的内容作了一个概括:“今读所为诗歌,半属山水幽趣,非亲至其境者不能。”李元阳性情幽雅,其乐多在山水之间,以《江楼》为例:“独坐无人处,烟光江上楼。波纹风更细,莺语柳初稠。绿野残阳在,江明片雨收。登临何必赋,把酒看风流。”此诗情怀澄澈,意境清幽,词旨隽永,语言清丽,颇可代表李元阳山水诗的风格。诗人善于以不同的旨趣,创为多样艺术韵味,所谓“心与境俱融”(《泛洱水》)。如《登石宝山》之峻爽,《秋怀寄林退齐四首》之沉郁,《登台》之苍凉,《宁海泛舟别升庵》之惓惓,而关怀民瘼的诗,如《农家苦雨不得刈麦》风格古拙,《闻武定事》跌宕愤激。历来选诗者偏爱其山水诗,但反映现实也是李元阳诗歌的重要内容,不应忽略之。

^① 《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42册)《中溪家传汇稿·重刊中溪汇稿序》,台北新文本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31页)。

李元阳的散文似苍山十八溪，或曲折，或顿挫，或奔湧，或飞动，成就颇高，代表作如《游石宝山记》和《重游石宝山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叙写石宝山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其中穿插人事的追忆，可谓触绪而发，一波三折。《游石宝山记》全文仅只四段，却有无限风光。开头一段从石宝山缘崖而雕刻的各种佛教石像着笔，慨叹其“既示天巧于不可致诘之中，复示人为于不可措手之处”，巧妙地埋下一伏笔：此乃“天壤间一段奇事。如于编籍中见之，鲜不诋其谬妄”。第二段转入对人事的记叙，追忆嘉靖九年（1530年）与杨慎同游之事。同游所见，仅简叙石崖之上的灵泉，以及各种奇石的状态。第三段以“下山，夜宿兴教寺”一句，不着痕迹地引出对佛教何时始于中国的学术讨论。问题由客人开门见山地提出：“兹山佛像，出自天成。然则混沌之初已有佛寺，而谓始于汉明帝，然乎？”文章写到这里，与开篇形成内在的呼应，再向下延伸，纵然是离景而作论说，也紧扣文脉，使学术论说虽然引经据典，却不致索然无味。主人的回答侃侃而谈，以刘向序《列仙传》即“谓于佛书中得二十四人，则中国之有佛，不自明帝始也”为据，再引《列子》所述孔子之言，曰“丘闻西方有大圣人”，以证“春秋时已知有佛矣”。复引《诗经》之有“缁衣好贤”，证明“衣缁，唯佛教为然”。最后得出“佛生于周初，其徒已为中国所贤，章章明矣”的结论。作者在发完议论后不忘听者，有“升庵抚掌然之”一句为照应。接着以“予今别兹山三十年，升庵已物化”承上段，以山寺僧人因重修而请自己作记，不着痕迹地牵出另一桩旧事：其弟曾同游并劝修葺佛寺，而今斯人已逝，言犹在耳。文章结束于感叹，余味无穷。全文议论纵横，旁征博引，然而格局总在对石宝山的记叙之中，步步为营而挥洒自如，语语精心但浑朴自然，深得唐宋古文之神韵，令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苦心，显示了李元阳在散文创作上的功力。《重游石宝山记》另辟蹊径，主要以石宝山沿途风景系以人事，忆怀旧游。结构和内容虽有异于前文，记叙却依然精彩。前后二记对读，可领略李元阳散文起伏顿挫，波澜层叠的奇趣。

有人评论李元阳的散文说：“殆十八溪之所以为文，而谓非得溪山之助不可也。”^①这个评论很贴切。自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以“得江山之助”论《离骚》风格之成因以来，山水与文学的关系，成了人们认

^① 周钟岳等编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之《李中溪全集》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识作品风格的一条定律。如《新唐书·张说传》曰，张说“既谪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黄庭坚《书自作草后》则说：“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偃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①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然而把这条评论倒过来，说不是李元阳之文得苍山十八溪之助，而是十八溪被其运于笔下，因而成就了其文章自然天成的风格，真是别有会心。其实李元阳在其文章中也多次发表过对山水与人文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山水与人文之间具有一种对应关系，所谓“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这种关系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山水可以助人益文：“足迹遍天下而后其文益奇，虽其才本天纵，而山川风物固有以佐之。”^② 二是人文可以助山水成名：“山水之系人文，尚矣！”“地以文显，景因人胜，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③ 李元阳的论说，是对刘勰以来山水与人文关系理论的发展。

杨士云（1477年～1554年），大理喜州人，字从龙，号弘山，一号九龙真人（按《滇略》本传为“九龙山人”）。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给事中。以养母乞归，不复出，屡补官皆辞疾不就，乡居20余年，闹市罕见其面。有《杨宏山先生存稿》十二卷，赵藩得之于杨士云的后裔，光绪末年付李根源用铅字排印行世，卷首有赵藩《序》。民国初年复刻，收入《云南丛书》本^④。但赵藩论诗绝句《杨给谏士云》曰：“遗书六卷曾搜得，留待云仍付校刊。”究竟是杨士云还有未刊之作呢，还是赵藩此诗作于刊刻《杨宏山先生存稿》十二卷之前？存疑。李元阳的《户部左给事中弘山先生墓表》载其事迹甚详。简绍芳《升庵年谱》载杨慎“丙申（嘉靖十五年，1536年）至喜州，访给事杨弘山士云”（转引自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集》卷五十四《韦应物苏州郡斋燕集诗》云：“是日中秋与弘山杨从龙饮，读之以为千古之一快，几欲如贯休之撞钟矣。”二人同游似即此行。士云有诗《升庵先生至榆》曰：“卧病青山旧，龙钟白发新。相逢一笑后，又别几回春。簷燕去来数，江花开落频。泠然仙驭至，喜得挹清尘。”据此则二人相识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山谷集·别集》卷十。

② 以上引文见《中溪家传汇稿》卷六《送元罔马大夫之任序》。

③ 《中溪家传汇稿》卷五《玉湖游录序》。

④ 周钟岳等编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艺文考四》（第317页）。

数年，不只一见。杨士云的《题升庵悠然亭》应作于安宁，《雨后望西山有作》则应作于高晓，可见杨士云曾到过安宁和高晓拜访升庵。杨士云的诗风格清新明快，如《洪圭寺见山茶》：“繁霜十月见花开，山北山南未放梅。半夜月明星数点，长明灯照碧莲台。”这首诗的视角、立意和意象皆有独到之处。诗人先写茶花凌霜而开，竟然先于寒梅，立意已很新颖，又以明月下的点点星光，犹如长明灯映照着碧莲台，巧妙地状写月下茶花的朦胧意态，意象优美而比喻贴切，山寺茶花的清高气质蕴于其中，意味深远。

在文学观念上，杨士云重视诗画形象的寄寓性，他说：“图之作，殆思之且寓望也；象有意，辞有旨，诗之所由作乎？”^① 作画缘于有所寄寓，诗歌的创作亦因诗人内心有情意要表达，故“象”中有“意”，“辞”中有“旨”。杨士云还在《书〈啾鸣集〉后》中提出了“和鸣”说。《啾鸣集》是大理诗人张云鹏的作品，杨士云认为诗人在仕途上“阅历多变，发之声诗者，和平温厚”，此即“和鸣”。他认为诗人所遭遇的坎坷，以人胜为变，以天定为常，惟其“可常，可变，弗激，弗沮，发之声诗者，一写性情之正，斯多变而和鸣也。和鸣则其鸣也大矣”^②。杨士云的“和鸣”说既吸收了孔子中和之美的因素，又吸收了韩愈不平则鸣说中的愤激之情，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吴懋，字德懋，号高河，大理人，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年）举人，历官知府，著有《乘槎集》、《南霞集》。文献记载他与杨慎交友的事实，只有《升庵集》卷三十《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自注和王士禛的《居易录》卷二十五提到其为“杨门”诸子之一，并为杨慎所认可。吴懋的《写韵楼歌》表达了对杨慎的景仰之情。诗云“公本天人遇尘世，名山今续旧游踪”，当指嘉靖十五年（1536年）杨慎复寓写韵楼之事。

董难（1498年~1566年）虽不列于“杨门”，但他与杨慎的关系和杨慎对他的推重，并不亚于列名者。董难字西羽，号凤伯山人，世居太和。自幼聪敏，6岁即娴熟对偶，长大后手不释卷，曾习举业，终因酷好吟咏而废之。董难深得杨慎器重，据说杨慎“每考索群书，必曰‘董生，董生！’”杨慎游寓荡山写韵楼辑《转注古音》，惟董难可以侍其笔墨。王廷表譬之如子云（扬雄）与侯芭（扬雄的得意门生）。董难有诗《秋

① 《云南丛书》本《杨弘山先生存稿》卷十一《苍山别图诗序》。

② 《云南丛书》本《杨弘山先生存稿》卷十一。

兴八首》，得到杨慎的欣赏并为之作序。杨慎在沧洱间游历，必要董难相随，并对人说：“西羽时有奇思，山水间的不可少此人。”^①可见董难的学问和诗歌，深得杨慎的称许。所著有《韵谱》、《凤鸣集》，皆佚。《滇略》（卷六）张含传后附其传云：“时太和布衣董难者，字西羽，亦以诗名从慎游，寓荡山一楼，辑《转注古音》，不乐仕进，以终其身。”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载其《百濮考》。其诗善为古韵，格调质朴，如《点苍山》：“极目望点苍，芙蓉有天阙。下有百尺松，上有千年雪。”其诗亦有晚唐之音，如《玉局寺》：“杜鹃枝上春可怜，杜鹃声里雨如烟。萋萋满目芳草碧，杳杳一发青山悬。忽悲陇麦客游次，却忆楝花风信前。惆怅池塘绿阴树，警心一曲南薰弦。”

以上是对史称“杨门六学士”、“杨门七子”诸人及董难的考述，下面略考滇云游于杨慎之门的其他文士。

杨慎寓于安宁长达20年之久，其《送刘霞峰之官安宁》诗云：“云峰精舍学宫连，我住中间二十年。”^②杨慎在安宁交游颇多，门人不少。康熙《安宁州志·流寓》（卷三）载：杨慎“喜安宁山水清旷，遂寓焉……从游甚众，若邱月渚、杨墨池、张松霞辈，皆出其门。”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杨慎和他们亦师亦友，留下了感人的诗篇。杨慎的《腊八日与墨池野酌迟丘月渚》抒发了安宁文士给他带来的慰藉：“散步谪仙桥，严寒酒易消。云容将变朔，风信已鸣条。只为朋从好，浑忘旅寓遥。清吟迟月渚，剪烛永今宵。”^③《毛园萃芳亭与沈中白丘月渚同赋四首》则是他们欢聚的见证^④。分别后杨慎很怀念和安宁友人相聚的时刻，如《正月十一日宿禄丰，寄丘月渚、杨溪山、张见梅、杨墨池》所抒发的情怀：“客星无定影，惊鹊又迁枝。避地仍多阻，还家未有期。东桥花月夜，南浦蕙风时。携手难同赏，劳歌寄所思。”^⑤当杨慎迁居高峣而“又携孤剑征，去作点苍客”时，仍不忘看望安宁诸友，其后又致柬深情地描述了他们多年的知交：“高峣亦吾庐，安宁亦予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乡

① 李元阳《董君凤伯墓志铭》，见方树梅辑《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② 此诗《升庵集》未载。据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考证，云峰精舍在安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十八。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三十五。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十九。

陌。飞屐频登临，披衣数晨夕。别离今几时，重到感畴昔。儿童已长成，宾从尽衰白。联榻情绸缪，晤语慰衰瘠。”^① 杨慎六十五岁时曾欲返蜀不还，行前还作了《留别安宁滇城诸友》二首^②。诗曰：

垂老西来日，天涯此会稀。
马蹄声特特，雁阵影飞飞。
南海情偏厚，东坡语未非。
海庄岑寂地，车辙满荆扉。

垂老东还日，天涯此别稀。
关山归马地，江水钓鱼矶。
秉烛情何尽，衔杯泪欲挥。
相思幸相问，处处有鸿飞。

“海庄”为高峣精舍之别称，据此，杨慎寓居此处后安宁诸友还来相访。从这两首诗中不难感受到，安宁诸友在他心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惜乎安宁诸友史载不详，我们仅能从杨慎留下的诗篇中，约略窥见他们的身影。

阿迷除“六学士”中的王廷表外，与杨慎交游甚密的文士还有叶瑞。《续修建水县志》（卷八）《文学·叶瑞传》载叶瑞字应期，号桐冈，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任石门（属湖南）县令，以终养乞归，累荐而不赴任，与同郡杨肃庵、王廷表交情甚厚，时相唱和。叶瑞的著述甚多，有《崇节录》、《河洛解》、《律吕书》，他评点《左传》、《国语》、《文选》尤精严。清代曹树翘《滇南杂志》云：“杨慎至临安，寓主事叶瑞家，今其巷称太史巷。至阿迷寓王颖武馆，曰状元馆。”《续修建水县志》（卷八）《流寓·杨慎传》云：“与阿密王廷表、建水叶瑞文字交密，常过临安，寓城东太史巷及燃灯寺巷。”^③ 杨肃庵名僕，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官吏科给事中，以参政致仕归乡。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十六《晨发高峣東丘月渚杨墨池》。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十九。

③ 以上转引自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昆明沐九华，生平不详，其兄弟与杨慎皆有交往。杨慎诗曰：“难忘易识是君家，为爱君家好棣华。”^① 杨慎又有《祭沐九华文》，曰：“我之与君，两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勋建牙。君家兄弟，奋藻联葩。顾我于逆旅，慰我于天涯。步王孙之绿草，折放臣之疏麻。命驾于滇社之馆，载酒于昆池之槎。或会宿于仙村，或倡和于太华。投分绸缪，情文交加。三纪于兹，百龄期赊。何露薤霜蒿之■，游水舟壑之谿。怅宿离之不贷，悼单阙之日斜。玉树棣华之屡丧，愍凶遭厉之纷拏。死生契阔，九原之遐。阻于城府，莫纾輶车。陌楮飏雪，莲酒流霞。洒泪遥奠，灵其歆邪。”^② 从开头四句，可以推知沐九华兄弟大约出于沐氏家族。一般人不能与杨慎有两世通家之好，“昭勋建牙”者，在云南非沐氏莫属。“建牙”本谓出师前树立军旗，引申指武臣出镇地方。称“君家先人”，显然沐九华兄弟非沐氏嫡系。从文中对与九华兄弟交谊的回忆看，杨慎谪滇之日与他们颇多交往，既同游山水，又唱和诗歌。沐九华逝时杨慎并不在滇中，故前有“步王孙之绿草，折放臣之疏麻”以言送别，后有“死生契阔，九原之遐。阻于城府，莫纾輶车”说未得送丧。那么杨慎此时在何处呢？据“悼单阙之日斜”句，正当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第七次返蜀，寓居泸州。单阙是卯年的别称，杨慎又说“三纪于兹，百龄期赊”。自他嘉靖三年（1524年）被判谪滇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大约“三纪”——前有嘉靖十年（辛卯，1531年）、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年）。

杨南金，《滇略》卷六本传载其字本重（按号两依），邓川人（按大理府浪穹县，今洱源县），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年）进士。杨南金为泰和（属江西）令时，民间有“三不动”之谣夸赞其品德。即“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挠不动”。升监察御史，当时权奸刘瑾威震中外，其党凌辱属官，杨南金不为权势所屈，解冠带曰：“不作此官便了，岂可屈于权奸乎！”即日挂冠出都，刘瑾使人追捕不及，除其名。嘉靖初起用为湖北提刑按察使，不久谢病归乡。杨南金性情持重，不苟言笑，但扶良善，恤孀寡都竭力为之。年80余岁而卒，乡人为之立祠堂。杨南金与杨慎的交往，当缘于其谢病归乡后杨慎的浪穹之游。杨慎有诗《邓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十七有《忆沐九华兄弟》，卷三十六有《沐五华送鸡》。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九。

川杨少参两依庄》：“名公妙年辞京华，飘然归来乘云槎。天上乌啼御史府，海边龙卧神仙家。东山老子兴不尽，南华真人生有涯。空余蟠胸济世策，日对邻叟谈桑麻。”^① 从中可见杨慎对杨南金的敬佩，并可见杨慎对其怀才不遇的不平。

简西岱，西蜀人，长期寓滇，是杨慎在云南交往最为密切的知交，《升庵年谱》的撰写者。“慎之生平事迹，赖此而详，读者欲求撰人事略，却不甚著。”^② 西岱弱冠之年即以布衣客游滇中，寓居昆明。杨慎居昆明西山碧峒精舍时与其过从甚密，相交最笃，在云南与杨慎唱和及评较文艺，亦以西岱为最，张含尚且有所不及。杨慎的滴滇生涯实际上相当寂寞，天涯沦落之悲，并非其声名带来的一些交游可以完全抚慰，像简西岱这样的朋友本来不多，张含又远在永昌，长期不能见面，可以想见当年简西岱的友情，对于杨慎来说是多么重要。《升庵集》有多首诗歌表现诗人与简西岱的交谊。同游的欢乐固然不少，如《与胡在轩简西岱泛舟至柳坝》（卷十九）描写了载酒泛舟的逸兴。但在杨慎笔下，朋友带来的心灵慰藉更重要，《高峽卧疾喜简西岱至自滇城》（卷十八）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杨慎这样描写病中听到朋友来临时自己的欢欣：“隔户闻来履，移灯坐对床。”远远就能辨出来人的脚步声，只有自己相当熟悉并热切盼望的人，才能带来这样的喜悦。移灯对坐，促膝谈心，是知己的会心境界。在最初的喜悦和体会了“澄心”至乐之后，即使相互“点鬓”而惊讶于各自霜飞黑发，也未减去相见的喜悦，主人的病情亦因朋友的到来而顿减。“天涯故人少，且愿驻飞航”，客人尚未离去，主人的落寞惆怅之情已弥漫胸中。简西岱年约六十归乡，数年后卒。他将离滇时，杨慎有《甲寅新正六日送简西岱登舟》（卷二十七）以赠，诗云：“金兰意气昔论文，燕坐朝霜竟夕曛。千里驱驰来楚道，十年羁旅共滇云。交游落落晨星散，踪迹悠悠水国分。江北江南从此隔，何时何地再逢君。”据此知杨、简在滇交游十载，杨慎引之为金兰交，即情同兄弟。西岱归时杨慎大恸不已，可见他们的友情之深笃。杨慎《赠简西岱》（卷二十一）云：“才藻媲刘珊，经术拟杜环。鸿仪浑物外，马迹遍人间。砚沼三江狭，诗囊五岳悭。好吞云梦泽，莫擘少华山。喜枉黜谿径，慵攀虎豹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升庵集》卷二十六。

② 见王文才《杨慎学谱·升庵纪年·西岱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有关简西岱的事迹，请参阅该《事略》。

关。綦维过信宿，琼玖照衰颜。”杨慎对简西岱的才学、人品都很欣赏，这是他们友情的基础。

除了现实的交游，杨慎在云南还和一些诗人有错代神交。他留心寻访过一些作家散佚的作品。《升庵集》卷五十七的《平居陈郭》条，是云南府明初作家群“平居陈郭”最早的记载。杨慎曾寻访过郭文的诗作，在其著作中还多次提到郭文，他的推重，使郭文成为明代前期云南在外界声名最高的诗人。嵩明诗人兰茂之弟兰廷瑞也受到杨慎的关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兰隐士廷瑞》条，称兰廷瑞“诗出杨用修集”。杨慎的《丹铅余录·总录》（卷八、《摘录》卷十八）有《兰廷瑞诗》，其文曰：“滇中诗人兰廷瑞，杨林人也。予过其家，访其稿，仅得数十首。”若非杨慎寻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记载，兰廷瑞的诗将很难存世。杨慎也推重兰茂和另一嵩明诗人贾惟孝，并作过三首诗赠与贾惟孝，第一首相当于兰茂和贾惟孝的合赞。

总之，杨慎在云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不止于文学，从时间上看也不止于明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杨慎，云南文学史将出现一个大空白，嘉靖云南文坛或许也不会如此精彩。

四、程本立等谪戍诗人论略

除《沧海遗珠》所载者和杨慎之外，明代谪戍云南并以诗文名显者择要胪列于下。

程本立（？~1402年），字原道（按《滇绎》程本立传载字寓道），号巽隐，浙江崇德（今属桐乡）人，洪武九年（1376年）以明经荐为秦王府引礼舍人，丁母忧告归，复补周府礼官。坐祀事不敬^①谪云南马龙他郎甸。建文初征入翰林，燕王入都时自缢，殉建文帝。《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一）曰：“少有大志，读书不务章句。与海盐沈寿康友善”，“乡人称为孝隐先生”。滴滇时遇事不避艰险，曾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至大理、鹤庆、丽江、永昌一线，仗其安抚。《明史》卷一百四十三有传。

程本立著有《巽隐集》四卷，诗文各二卷。朱彝尊曰：“建文诸臣，文莫过方希直，诗莫过程原道。希直之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为苏子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朱睦㮮《革除逸史》卷一。

瞻；原道之诗，刻意杜陵，下亦不失为陈简斋也。”^① 四库馆臣云：“本立文章典雅，诗亦深稳朴健，颇近唐音。”^② 从学源和程本立诗歌的大体风格来看，上述评论不错，但观程本立谪滇时期的作品，“刻意杜陵”之迹显然淡化。

袁嘉谷尤为欣赏程本立的咏滇诗，云：“余尤爱崇德程本立之诗，善写滇风景。”^③ 他列举了《晚至晋宁州》等八首诗为例以证其说。《巽隐集》中有不少咏滇诗，描绘了谪滇生涯给诗人带来的种种观感和心情。在程本立的心目中，这里并不只是蛮荒瘴疠之地。在《昆明池》一诗中他豪迈地说：“登临未必南荒恶，瞻恋其如北极遥。”^④ 程本立的确很善于描写滇云风光，善于捕捉最能体现其特征的景物。如《过晋宁州》以“落日孤城小，轻烟一水斜”写傍晚时分晋宁的景象，风格宁静而悠远。同一时分的景物，在《鹤庆驿会吴人冯广文闽人林税使》一诗中的描写却因地而异：“日落忽闻牛背笛，川平始见鹤州城。”耳中声与眼前景，浑然一体地渲染出驿道上的田园观感。下面两句亦很巧妙：“秋风千里莼丝滑，暑雨三山荔子生。”诗人在驿中所会之人一个是吴人，故言莼菜，另一个是闽南人，故言荔枝，真是把三山五岭的风物集于尺幅之中。再如《江头绝句》：“山影东西合，川声日夜流。片云还作雨，九月未成秋。”“蕉叶碧逾净，榴花红更明。知秋惟蟋蟀，唧唧草间鸣。”滇云的气候特点，被诗人如此自然地呈现在片云一花之中，毫无雕琢之迹。

滇云神奇的风景也总是勾起诗人深切的乡愁，但出之于程本立笔下的诗歌，往往洗去了一般谪人消沉的气息。如果我们只摘出其中的一些句子，或许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过赵州》：“妻子谁能免相忆，他乡虽好莫淹留。”《自姚安出普湖》：“远客谁无乡土念，悲笳吹动不堪闻。”《早发禄丰驿》：“若为看见梅花发，忽乱乡愁入故园。”《邓川驿》：“山水不殊人事异，中原归计正茫然。”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诗人乡愁的抒发，皆以滇云或秀丽或温馨，或雄阔或奇崛的山水、人家为背景，那么这些诗歌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诗人与众不同的胸襟。如《过赵州》的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十八引《静志居诗话》。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巽隐集》条。

③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袁嘉谷《滇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2页）。

④ 以下所引程本立作品，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巽隐集》。

前六句：“青山环抱水争流，行尽云州又赵州。四野耕耘多乐岁，诸蕃斥堠不防秋。过桥花竹前村近，入谷松萝小寺幽。”显然，“他乡”与江南“故乡”类似的风光打动了诗人的情怀，但引起的是亲切感而不是悲情。《过云南》^①这类诗，则表现了诗人被壮观景象所激发的豪迈之气：“眼明百里眺晴川，洗我悲辛一迥然。山气成云无五色，石光如镜有千年。荷戈戍士终怀土，卖剑居民尽力田。自古华夷归混一，今人未必重开边。”再如《大理》：“西南形胜此山川，蒙段偏安五百年。圣主龙飞无僭窃，王臣虎拜有旬宣。登临已觉心神豁，战伐安能骨肉全。多幸远民皆赤子，夫耕妇馌戴尧天。”在这些诗篇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因谪降而曾经低抑的心境，终被山河之美和神圣的使命感所取代，从而转化为崇高的人文情怀。如《白崖关晓行》云：“宇宙有生俱是客，江湖无日不忧君。”《江头绝句》云：“人情悲异土，物色似吾家。土俗诸蛮异，人心一理同。”中国传统文士忧国忧民的品质，使诗人的咏滇诗情志深沉，而滇云山川之奇丽，则使其意象颖脱，在其总体创作中自成一格。

程本立的文章自出机杼，如《云南西行记》之纵横捭阖，《方舟记》之巧譬善喻，《拙斋说》之说理透辟，《送太学生杨伯善序》之自然舒展，都表现了他善于记叙和论说的特点，风格也不尽追求典雅，而是适应内容的需要，发挥文体之所长。如《送太学生杨伯善序》为送别之作，因对象是即将远行的太学生，所以作者巧就滇池之名开篇，在主客问答中勉励学生胸怀大志，如有三百里深阔，浩浩汪汪的滇池一样，厚积薄发，志存高远。文章戛然而止于受教者谢曰：“幸从观水，得闻学术，敢不以其言自勗。”从头至尾循循善诱，使人如沐春风，融学问、哲理为一体而丝毫没有说教之感，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陈谦，字以逊，别号禾斋，苏州人，谪戍昆明。有《禾斋集》。

童菩，字德善，号蒲石生，鄞县（属浙江）人。能诗，所著《蒲石集》佚。先后与董菩同时寓滇者，有姑苏陈谦、贵池（属安徽）苏理（有《信庵集》）、长沙元曦（编有《中都四子集》），他们皆长于诗。陈谦为“平居陈郭”之“陈”。

刘有年，字大行，沅州人。洪武中以明经荐监察御史，不久因辞官养母而忤旨，罚服劳役于通州站。建文中起用为太平知府，虽耻为俗吏，却大有政绩。后以不迎燕王之师被安置昆明，黔国公知刘有年贤能，让

^① 按此“云南”为当时的云南县，即今祥云县。

其子师从之。平定交趾（越南）后刘有年被擢升为按察僉事，卒于官任。天启《滇志》和雍正《云南通志》所载大略相同。刘有年有《寓轩》诗曰：“乾坤问气中，物各有所寓。俯仰观宇宙，万里森然具。鸿雁翔朔南，蜉蝣寄朝暮。轩居悟深情，于焉几居处。啸傲心独明，其中传真趣。”^①这是一首言志诗，诗人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所寄托。鸿雁高飞而不受南北之限，蜉蝣生存却不过一日之间。在寸心之内把握自己，啸傲天下，就能感受到人生的真趣。诗人表达了不肯顺时从俗而秉持忠节的品格。

郑旭，字景初，闽县人。洪武十一年以学行荐为国子堂仪，太祖幸临太学，亲选才德兼备者十人做太子傅，郑旭名居第二。后因蜚语而谪云南20余年。建文时起用为高安儒学训导，卒于任上。郑旭精心经学，著有《诗经总旨》、《初学提纲》、《咏竹稿》等。《咏竹稿》，《福建通志》（卷六八）、《千顷堂书目》载为一卷。天启《滇志》和雍正《云南通志》所载大略相同。

王县，字梦云，号芸窗，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博通经史，尤工于诗。正统间入云南代父从戍，滇人延为塾师，教诲乡里子弟有方，子弟皆知向学。著有《芸窗吟稿》，见载于天启《滇志》、雍正《云南通志》。

毛铉，字鼎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洪武中以事安置永昌府（按天启《滇志·流寓》转载安置于云南府），后被荐授国子学录，升翰林院侍读。据《万姓统谱》（卷三十三）载，毛铉秉性方直，平生不妄交友，风度恬远，邈视名利。擅长诗歌，诗备汉魏以下诸体，为文高简，有古法。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录有毛铉为“金齿八景”所作的题咏八首。诗为五言古体，诗题分别为《神坪赏花》、《汉营走马》、《温泉晚浴》、《龙祠望云》、《蕉洞游春》、《渔村钓月》、《澜沧晓渡》、《鸡村观稼》^②。其诗剪裁有度，风格明朗清新，在全篇风生水起之间，往往把八景的特点熔铸在某一对句中，但汉魏古诗的浑然之美遗韵犹存。如《蕉洞游春》：“石花三月开，色比春花好。”这是对洞中春色贴切的比拟。《渔村钓月》：“皎皎山吐月，泐泐水增波。”由山月倒映于水波而生“钓月”之思，想象奇妙。《鸡村观稼》：“时当九月秋，百谷如黄云。”若非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三。天启《滇志》稍有异文。

② 陈文撰，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卷九，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436、437页）。

在哀牢山俯视原隰，不能出此妙喻。如果说这类景致比较小巧，那么《澜沧江》以其雄浑大气，形成这首五言古诗的独特风格：

两山高插云，岿然若天岸。
草树绿相缪，仰视天一线。
中有一长江，江流急于箭。
乱石舐其中，喷激成飞霰。
客子何问津，鸡鸣夜将旦。
仆夫相顾愁，舟楫恐失援。
天明涉此险，来作边城翰。

全诗如同一幅写意山水画，从不同的角度勾勒澜沧江的天险奇观，山水与人情又达成一种内在的呼应，从而避免了纯客观的描摹，诗风古朴，难以句摘。《温泉晚浴》对滇南风俗的描写则谐趣横生，如当中一段写道：“其流汇二地，男女各异浴。争浴讥裸呈，欢笑声相逐。浴罢纵杯盘，列坐歌夷曲。晚行偶见之，含羞掩吾目。”这里有善意的调侃，也有新奇感的表达。

史谨，字公谨，江苏昆山人。洪武初以事谪居云南，不明具体谪所。后荐为应天府推官，降补湘阴县丞，不久罢归，侨居金陵。著有《独醉亭集》。《独醉亭集》有三卷，为史谨自编，以体裁分，不题卷数。自武当八景以下93首，则题曰遗稿，疑为史谨去世后其后人掇拾晚年所作，附于集末。其中有《雪酒为金粟公赋》诗，金粟道人为元末顾阿瑛的别号，以此则其元末明初之作亦在其中，所载题画诗居多。四库馆臣评曰：“其诗不涉元季缛靡之习，亦不涉宋季酸腐之调，平正通达而神采自然高秀，在明初可自为一家。偶桓选《乾坤清气集》，号为精鉴，其论诗多否少可，而此集有送桓诗及题桓家揽胜楼诗，二人契分颇深，则谨之诗格可见矣。”^①按，偶桓字武孟，号海翁，因盲一目，又自号瞎牛。太仓人，洪武中官荆门州吏目。《乾坤清气集》录元代诗而分体编次。其中汪元量、瀛国公、元好问等上达金、宋之末，张以宁、危素等下涉明初。^②

查《独醉亭集》，卷上有《送偶武孟》，卷中有《览胜楼为偶武孟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九《独醉亭集》条。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乾坤清气集》条。

赋》和《送立恒中上人》。集中作于谪滇时期的诗歌有《云南》、《观出猎》、《东郊行》（卷上）；《九日游云南太华寺》、《澄江府》、《日晷为布政张斌赋》、《寄题平仲微松雨轩》、《万松轩为杨宗彝赋》（卷中）；《经人鲊瓮》、《谒黔宁王庙》（卷下）。诗人为谪滇时交游而作的三首诗，张斌为明初云南布政史，平仲微（显）和杨宗彝为《沧海遗珠》收录者。《寄题平仲微松雨轩》云：“绕屋长松数里深，楼船载雨忆登临。钱塘水阔吞鲸海，天目山高冠虎林。草色帘栊烟淡淡，秋声楼阁翠沉沉。欲期剪韭思重到，三十年来负此心。”从诗意看，二人交情久长。

徐有贞，初名理，字元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天顺改元，因迎接英宗复辟有功，特进柱国武功伯。以罪谪戍金齿（永昌），居住在归休庵一小室中，执爨守城，如同行伍。雍正《云南通志》载徐有贞“以论诬杀于忠肃罪而编金齿”，不确。其诬杀于谦在前，谪金齿则因忠国公石亨等人的弹劾。天启《滇志》曰：“在金齿时，士民咸敬慕之。”谪居三年赐还。徐有贞学问无所不通，人品却为人诟病。著有《武功集》。《明史》卷一百七十一有传。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其诗文有所抑扬，论其人品颇有微辞。如说他干略本长，见闻亦博，因而其文奇气坌涌，但其学问不足以支撑其辩。又说集中如《文武论》、《制纵论》及《题武侯像出师表》诸篇多杂纵横之说，为“学术之不醇”。又说“遗编具存，固不必尽以人废也”。四库馆臣对徐有贞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观《武功集》，四库馆臣的评论虽鄙其为人，持论却比较公允。但如《瓶中梅》这类诗即小见大，或有可取：“南枝先著数花新，带雪分来自可人。谁道一瓶如许小，就中全贮世间春。”（《武功集》卷一）

明代谪戍云南的诗文家声名较显者大略如上所述。显然，影响较大者为明前期的《沧海遗珠》诗人群和嘉靖时期的杨慎及其追随者。这当中有的人湮灭不闻，有的作品散佚不存，或有笔者取舍不当之处，待他日有所发现再进行补充。

第六章 明季遗民作家考论

1644年3月朱明王朝覆灭，李自成、福临相继登基，一年之内北京紫禁城里坐过三个帝王，中国使用了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等三个年号。这一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王朝，开始了史称南明的这段历史。弘光政权存在仅一年即告灭亡，其他南明政权先后建立：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年号隆武；1646年其弟朱聿𣏲在广州即位，年号绍武；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次年取年号为永历。在各种反抗势力的支持下，还有其他一些王室被拥立，如潞王朱常淓在杭州、益王朱慈烺在抚州、鲁王朱以海在绍兴、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先后即位，然而所有南明政权都不可能挽历史的狂澜于既倒。

在诸多南明政权中，以永历王朝的影响最大。但这个政权建立后内讧不断，四处流亡。1646年与永历政权联合抗清的农民军领袖、大西王张献忠战死，以其所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主的大西军残部向南转战，1647年孙可望入滇。永历十年（1656年）孙可望秘谋篡位，李定国拥桂王进入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降清。永历十二年（1658年）岁末吴三桂兵临云南，次年正月攻下昆明，桂王向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方向逃亡，李定国率军设伏于磨盘山（腾冲东部怒江西岸），意欲一举歼灭吴三桂的追兵，却因内奸泄密而失败，骁勇将帅先前已死十之八九，此战精锐更是损失殆尽，桂王逃入缅甸。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军伐缅甸索桂王，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桂王移交清军，次年四月桂王及其子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①

在南明这个艰危扰攘、风雷激荡的历史时期，云南实际上成为中华之畿辅，神州之正朔，全国精英荟萃之地。秉持气节之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忠君爱国的信念，其中一些人追随永历帝进入云南，而滇云

^① 以上南明史实综述据清代黄宗曦《行朝录·永历纪年》、清代邵廷采《西南纪事·桂王由榔》、《西南稀见方志文献·云南府志》卷五《沿革》等文献。

士人在这个历史关头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中有的人逃禅为僧，有的人遁迹山林，有的人漂泊他乡，但都心怀对故国的追思和眷念，恪守士传统情操，以各自的才性，在滇云文学史上写下了或低徊掩郁，或慷慨悲壮的诗章。诗人们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作，带有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心理特征，而无损于今天中华民族团结之大局。对此我们要历史地看待，才能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分上下二卷，共著录 152 人，上卷载录滇人 93 人，下卷载录流寓 54 人，补遗 5 人。

上卷所载滇人名录为：文祖尧、文俊德、艾廷献、杨开泰、杨先声、杨定国、邹良彦、杨祐、张相度、郝太极、段暄、温如孔、杨斌、陈玺、施德裕、胡璇、宣廷试、宣廷宾、向于宸、熊之龙、辛和国、熊化、陆与进、尹天任、赵炳龙、赵廷瑄、张如凤、杨永言、张应星、杜其渐、郑重、高明、杨正芳、孙光豫、王伯昇、陈甲才、陈佐才、解鳌、李正雄、胡宗元、胡一清、高泰翟、陆天麟、俞观、李任明、邹应扬、何星文、何蔚文、何素珩、刘联声、高应雷、陈王廷、马明阳、李思揆、朱昂、孙桐、王琦、高桂枝、熊才、唐华、于迁、郭之建、赵必登、张琮、袁润（附仆哈二、哈明）、方世瑜、吴鼎占、段敏政、杨惟峻、张国正、杨运升、张撰、李亨、施心极、刘芳远、孔之裔、杨愉、李恪、包璿、段珮、李元捷、读彻、普荷、洪如、行脚、思明、奄和尚、水月和尚、铁道士、施神仙、武风子。

补遗 5 人为：赵之炎、曾高捷、钱澄之、方以智、犁支。

本书此章在以上名录中选择文祖尧、高应雷（及赵炳龙）、陈佐才、读彻、普荷、王琦、陆天麟、郭之建、张国正等以诗称名者数人，考论其行实和诗文创作，何蔚文已录入文学家族，此处不叙。

一、高应雷创作行实系年

综 论

高应雷（约 1621 年～约 1673 年），昆明人，明清鼎革之际流寓于湖南溆浦。光绪十五年（1889 年），高应雷在溆浦处馆的舒氏后人舒立濬（文泉）至滇，遍访高氏后人而不得，偶遇剑川诗人赵炳龙的后人赵介

石，得到赵炳龙的《高澹生诗文钞序》，淑浦方面才知道高应雷入淑始末。亦因舒立濬携来高应雷在淑的诗文遗集，在《澹生诗钞》四卷散佚二百多年后，滇人方得重睹其诗文，并得知高应雷流寓下落。现存于《云南丛书》的《高澹生诗文钞》^①，即为淑浦舒氏保存并回传，最后交由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赵藩编刻，其中多半是高应雷在淑时期的作品。这是滇云文学家与内地文学交往的一段佳话，也是云南文学史上的一宗宝贵财富。

高应雷字澹生，永历十一年（1657年）乡贡。师从云南提学、黄冈人何闾中和剑川白族诗人赵炳龙，与赵炳龙亦师亦友。赵炳龙的《高澹生诗文钞序》说：“澹生昔尝从余问诗，又序余诗。”“知余与澹生者，莫不谓两人为诗，有沆瀣之通，淄澠之合。”赵氏曾于崇祿十三年（1640年）到昆明专访高应雷，并与之相处3年。

据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在何宏中和赵炳龙归隐于沧洱后，他曾有过四次漫游，其间拜谒两位恩师，生则拜人，死则祭奠。第一次漫游是永历四年（1650年）十月，高应雷与同门蒋昱焘、傅传绪裹粮出游，足迹遍三迤，访赵炳龙于向湖村舍，访何闾中于苍洱书院。第二次漫游是永历五年（1651年），高应雷东游澄江、临安（今建水县）、昆峨（今宁洱县）、曲靖诸郡邑，岁末由嶧山（在今峨山县东北）返回昆明。第三次漫游在永历六年（1652年），历时14个月。这一年高应雷与诸同门欲到苍洱拜访何闾中，未至而闻其卒，诸生祭奠后同游鸡足山等地，驻足于剑川，再访赵炳龙于楸园，之后沿大理游蒙化（今巍山）等四大郡，而后返昆。第四次漫游在永历八年（1654年），高应雷再过洱海，拜何宏中墓，并与诸同门饮于蘧庵书院，访求何宏中遗文。

永历十一年（1657年）是高应雷人生的一个转折，这一年他“慨时势之日非，思得一当以报国”（赵藩《高舍人传》），结束游历生涯而举乡贡。永历十二年（1658年）高应雷奉命赴辰州（明代设府，治所在今湖南沅陵）。三月兵陷，永历十四年（庚子，1660年）高应雷隐居义陵（即湖南淑浦），在舒氏馆授生徒以维持生计。从其《寄别向元素》、《是岁谋归昆明方有此赋兼柬向元素明经》、《别文蔚之湘城》等诗看，高应雷居淑浦期间曾谋归昆明，不知何故未能成行。康熙十二年（1673年）高应雷为自慧大师作塔铭，是其行迹可考的最后记录。观其言，此时高

^① 该节引用高应雷生平史料和作品，除专门注明者外均出于此，下不重注。

应雷仍在溱浦，以后不知所终。

康熙十一年（1672年），高应雷之仲弟高一生以《澹生诗钞》四卷邮致赵炳龙，赵炳龙为之作序，这个本子佚。200多年后，高应雷在溱浦处馆的舒氏后人舒立潜，于溱浦书楼中发现其诗文遗集，撰《书赵云升高澹生两先生遗集合钞后》，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携集来滇。今存《高澹生诗文钞》二卷，有赵炳龙之序及赵藩所作《高舍人传》。集中有高应雷赠赵炳龙诗10首。赵氏文字迭经兵燹，存者不及十分之一，现存《云南丛书》本《居易轩遗稿》中未见高应雷序，与高应雷有关的诗则仅存《采菊二章寄高澹生》、《石兰三章念澹生也》、《滇水行寄澹生义陵》等，第二卷中《高澹生诗文钞序》载高应雷生平大略及其与之交往始末，尤为可贵。

赵炳龙是高应雷平生相交最契的师友，在高澹生流寓溱浦的时日中，二人有书信往来。赵炳龙的《月下忆别高澹生》写得哀惋动情：

送君船上时，寸衷郁如结。
船去翻悔余，胡无一言别。
亭亭两岸山，锁愁青不绝。
浩浩大江流，波声善呜咽。
黄竹摇晚风，归途草烟热。
惨淡入岑宇，书囊未忍揭。
薄暮方彷徨，寒虫思先切。
生平耻独醉，罕对月如雪。

诗人由此时的天各一方，追忆当年别离时的情景，说送行时的伤感，才分别已翻为悔恨，而今思念深切，却只能以孤独的清醒面对痛苦。同样的明月夜，由于故人悬隔，感觉也就两样。在诗人的笔下，友情的流露是那么真诚而深婉，足见赵炳龙对高应雷的情谊，实胜于一般的师生。

高应雷现存的诗文，大多为鼎革之后隐居溱浦期间所作，充满了对亡明的怀念和对故乡、旧友的思忆，还有生活困苦、壮志难酬等复杂心情的表现。

乐府体的《将进酒》大概是高应雷早年作品不多的录存，表现了诗人内心的郁勃不平之气：

进酒君前君莫辞，君不自醉当醉谁？浮云悠悠月沉海，春花落尽秋风吹。当今豪富五侯宅，五侯门下多横客。当今赫弈三公权，三公子孙未必贤。君不见，刘一石、李千钟，昂昂笔墨凌秋空；又不见，文君寡、长卿穷，相逢得意春风中。霜裘满博蛾眉笑，酒瓮压霜花映红。

诗中所说的刘一石和李千钟皆为虚指，实是官禄。诗人感叹人生的进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是前定于不可选择的身世：三公子孙未必贤，却可以居高位而食俸禄；寒士纵有高才，却只能屈居下僚。这样的现实，固然使有报国之心的人不能不感到郁闷，时世的变乱，更让诗人感到忧愤。流寓溆浦时的《弹愤歌》笔调更为郁勃不平：“屈平幽愤湘江岸，君山缥缈云飞断。似有湘灵石上啼，山鬼乘狸夜召唤。羁旅之愁天不闻，名节之坊我何惮。长啸还登翠远楼，烟起芦滩日将旦。”楚湘的山水，屈原的身影，和着楚辞特有的幽愤，交织着诗人的羁旅客愁，化为长啸之悲，孤臣失路的痛苦，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谪仙歌寄李素元》则强烈地表现了漂泊流寓的悲苦：“南州播客来输酒，别云不作鲛人啼。”然而在痛苦中诗人的气节仍坚不可屈：“豺狼道上羞分食，萝薜林中僭著书。”从这些诗中，我们既可感到明季诗人流离转徙，无以为家的苦楚，又分明看到激荡在其内心的忠义之气。

时光在乱离中无情地流逝，诗人报国无门的痛苦日益强烈。《自寿》云：“天耶戏人生此尘，悠悠老我四十春。萍踪浪荡湖南北，剑囊萧条塞上身。”《赋得楚江有游客》四首之四云：“楚江有游客，四十消鸿心。”《元旦辞友邀往城市观灯启》云：“十年狂客，频惊羽燧之传。”《寄别向元素》云：“凛凛十年气，愁看湘水流。”在这些诗歌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诗人“慨时势之日非，思得一当以报国”^①，却又无路可走的沉痛情怀。隐居教席十年，在漂泊中痛感报国无门，年华虚度，而滇乡动乱频仍，母老家贫，归养无路，欲诉无语，《心感》表达了高应雷这种复杂的心情：“有心只自悲，难复对人说。说之人转疑，笑我痴以拙。银汉天迢迢，秋波日如雪。如何一叶槎，漂流自伤别。”诗人以无可告语的悲哀，刻画了内心深处不可消解的孤独感。后半段虽出以浪漫的想象，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感到其忧伤之情。

客居异乡的孤独，在每一个节令或节日，都能引起诗人对故里的思

^① 赵藩《高舍人传》。见《云南丛书》本《高澹生诗文集》。

念。《辛亥立春即事》道：“四海孤身客，春官又入年。”“暂饱东人席，傭书得几钱。”《清明节》小序曰：“我独无家，躬违拜扫。”诗曰：“吁嗟十载瞻云处，雁羽翛翛飞不去。”诗人的字字行行，都倾诉了对故乡的思忆和归心。《故园秋色十二章怀归也》、《滇人曲》、《花朝歌》等诗虽忆故乡风物的美好，但字里行间，仍可感觉到诗人的“感慨系之”。高应雷在溱浦有《有所思五章寄楸园先生》、《鹤思归吟寄楸园先生》等多个诗篇怀念其师友赵炳龙。《临高台寄楸园先生》道：“回首白云天渺茫，不知身是南州客。霸业王图涕泪多，柏梁铜雀空嵯峨。”明亡后身如飘萍的深痛，壮志难酬的沉郁，在对师友抒发时倾泻无遗。然而即令是在漂泊无依的情境中，高应雷仍然在砥砺自己的气节，《自励寄楸园先生》抒写了与赵炳龙师友相随、同气相求的情怀，表现了高洁的情操和壮志难酬，思念故乡的心境，真可谓柔肠百结，语短情长：

岂以出游远，而为同俗深。
同者适有时，丈夫无媚心。
苒苒惜流岁，依依怀故林。
困穷励贞操，先民垂德音。

明亡后寓居溱浦，高应雷在舒氏馆中以教书维持生计，《高澹生诗文钞》中的《有泉六章勉舒文蔚》、《南山五章寿舒九摇》、《萧萧者竹五章饮舒在之书馆》、《慎汝过河三章雨中送文蔚》、《同在之棋饮》、《雨夜念文蔚》、《别文蔚之湘城》等诗，应当是高应雷为舒氏门生或族人而作。《别文蔚之湘城》集中表现了师生情谊：“自此相思入林云，梦怀想见君颜色。”

高应雷现存的诗歌以古体居多，兼有少量五言律诗。形式的选择，是抒发内心情感的需要。古体居多，正吻合应雷鼎革后流寓时激荡悲愤的心境。赵炳龙在《高澹生诗文钞序》中评论道：“如击燕市之筑，如鼓雍门之琴，又如湘累泽畔之行，谢翱西台之痛哭。”赵炳龙为之作序的诗文集虽佚，但是澹生诗的这一风格在现存诗篇中仍然明显可感，以《弹愤歌》和《哀义陵》为代表。《弹愤歌》感情激越，想象神奇。《哀义陵》歌咏现实，不仅摹写了当时的乱象，还兼叙了乱后的情境：“兵荒剥损十六秋，天地之厄古所异。”“历今五载勉开荒，岁岁添兵未减粮。”溱浦舒云槎《题词》谓此诗“尤可想见当日情事”，可见其纪实性之强。

高应雷的散文以《何遽庵先生行记》和《与强子任同年书》、《寄同社书》为代表，诗序中亦有好文章，游记和启简则乏善可陈。《何遽庵先生行记》以真挚的感情，记载了何闲中一生的重要事迹及其与自己交往的始末，既是珍贵的史料，又是感情充沛的记叙文。《与强子任同年书》和《寄同社书》则倾诉了自己漂泊生涯的痛苦、欲归不得的无奈。这些都是了解高应雷思想感情和生存状态的重要文献。

高应雷诗文的艺术性，以《花朝歌》及《序》为代表。这个作品作于明亡后流寓溆浦时期，序文有南朝优秀骈文的自然流畅，而无其过分雕饰的弊病，清新深情，婉曲有致。如写滇中春日的明媚风光，可谓满纸生辉：“滇中风高土暖，每花朝节，则百花齐发，稍后者，惟杜鹃、牡丹。”在平实的叙述中，昆明早春的气象生动地呈现在纸上。接着，文章把笔触集中于昆明城外的一二个赏春景点，继续点染烂漫的春色：城西“为黔国花园，名卉缤纷，穷宇内之奇丽”；北门外20余里，金汁河、银汁河“左右皆桃林，或间以樱桃、海棠，锦灿霞铺，苍汉俱红”；至东南郭20里间，则“素馨挽架，茉莉搀篱，匝地香葩，蜂蝶亦醉”。下文由景及人，春光更显得动人：“届期，则国中罢市，红翠出游，舞妓歌童，丝管迭韵。碧鸡、金马之胜，固不逊曲江、锦城也。”然而作者所描述的美妙春色，都只使下文抒发的思乡情怀显得更为沉痛：“余十载天涯，动怀曩迹，但恐故园戎马，风景未必长妍。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诗人以乐景衬哀情，在如此强烈的反差中，诗中的美妙风景，更深刻地表现了内心的痛苦。其诗曰：

东风吹醒花神睡，四十五日魂犹醉。昆明池上春融融，乱莺咽尽枝头泪。山晓碧鸡人卖花，玉娥朝起立屏纱。招呼子弟浓妆束，十里香尘斗宝车。纷纷出郭花低笑，笑揭车帘问年少。欲问不问仰看花，炯炯春波意深照。公子翠裘青玉骢，障泥簇簇摇春风。碧桃树下张油幔，两队舞衣花映红。须臾紫陌争来往，丝管入云风递响。舞者唱者醉者哗，花鸟之间乐渊广。此情长记少年豪，风景忽复生牢骚。楚州芳草连陂绿，不见碧山千树桃。羁魂昨夜归南国，梦饮花前花万色。杜宇乍啼风晓寒，醒后一身归不得。欲踏平芜何处春，酒瓢闲挂碧苔新。山亭耐瘦频题竹，羞见赏花先醉人。

诗抒写对故乡春日的回忆，在回忆中诗人似乎暂时抛开了悲愁苦痛，只

有字里行间那轻微的叹息，让人感到山河依旧，风景全非的惆怅。“乱莺咽尽枝头泪”描绘春日花上露水，“炯炯春波意深照”形容看花人的眼波，“山亭耐瘦频题竹”以“耐瘦”比拟茂竹挤压下山亭的窄小，都很贴切而新颖。全诗无论是意象的色彩，还是流溢的情调，都显得明快欢畅，文采之清丽，音韵之流转，直追初唐歌行。

创作行实系年

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1岁。

云南府昆明县人，名应雷，字澹生。其作于义陵的《自寿》诗曰：“悠悠老我四十春，萍踪浪荡湖南北。”《赋得楚江有游客》四首之四曰：“楚江有游客，四十消鸿心。”按，高应雷于1660年隐居义陵，居10年。《元旦辞友邀往城市观灯启》曰：“十年狂客，频惊羽燧之传；千里棘人，永切风霜之恨。”赵炳龙《高澹生诗文钞序》和赵藩《高舍人传》，皆说应雷隐于湖南溆浦10余年后不知所终。按，其诗文可考的最后行迹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白慧大师塔铭》。

高应雷有同胞兄弟三人，其行一，仲弟名一生，季弟名字不详。仲弟从其游溆浦，《再游树橘园记》：“戊戌春，予偕仲弟一生游树橘园。”《游碧潭记》：“偕仲弟一生。”季弟在昆明。《与强子任书》：“三舍弟在省，知荷提携，词谢非能尽。”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20岁。

高应雷从赵炳龙、何阎中游。剑川赵炳龙来访，与高应雷相处三年。

赵炳龙《高澹生诗文钞序》曰：“崇祯庚辰，余游昆明，澹生馆之松华别墅，复移宝珠寺僧寮，朝夕谭艺与处凡三年。”“澹生昔尝从余问诗，又序余诗。”“知余与澹生者，莫不谓两人为诗有沆瀣之通，淄澠之合。”赵藩《高舍人传》曰：“（澹生）从云南提学黄冈何公、楸园游，学大进。”

《剑川州志》本传载赵炳龙字文成，号云升，又号楸园。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金沧道杨畏知聘司记室，随其效力于桂王朱由

榔，由杨畏知荐授吏部文选司主事，迁户部员外郎。孙可望杀杨畏知后，赵炳龙愤而回乡，归隐于剑川向湖村之楸园，筑居易轩，以弹琴赋诗自娱，鼎革之后足迹不到城市。吴三桂胁以伪命，避居石宝山中不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卒。著有《居易轩诗文钞》八卷。按，《高澹生诗文钞》中有淑浦舒立濬（文泉）《书赵云升高澹生两先生遗集合钞后》一文，其文载赵炳龙后人赵介伯曰：“我前人农部云升公《居易轩遗集》，因经兵燹失其全稿，其与澹生赠答之作尚留传数篇。”又曰：“乙丑（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濬自滇专足走取澹生先生遗集来付介伯，合《居易轩遗集》为一编，并嘱多写副本，遍藏名山，使与点苍、鸡足峙存万古。”舒立濬所说高、赵二人的合编集未见，亦未知最终是否成编，现存《居易轩遗稿》二卷，收入《云南丛书》。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载何蘧庵名闳中，号蘧庵。湖广黄州人，登进士。万历九年（辛巳，1581年）春以苑马寺卿升云南澜沧兵备。福王弘光元年（1645年）冬沙定州乱，黔国公沐天波遁入叶榆（今大理）^①，何蘧庵督兵佐杨畏知平乱。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四月兵败，隐于山林，后复出，再于永历六年（己丑，1649年）半僧半隐于沧洱东城，建蘧庵书院。

南明桂王永历四年（庚寅，1650年），清顺治七年，30岁。

第一次漫游。高应雷与同门蒋昱焘、傅传绪出游，足迹遍三迤，访何蘧庵于苍洱蘧庵书院。

赵炳龙《高澹生诗文钞序》：“沙贼乱定，归正者方秉权，饰弓旌以饵士，澹生不苟就，裹粮出游，足迹遍三迤。尝一再至洱海，省故提学何蘧庵先生，又视余于向湖村舍，留楸园者七月。”赵藩《高舍人传》：“孙可望入滇灭沙定州，遥附末帝而实持两端，饰弓旌以饵士，舍人不苟就，裹粮出游，足迹遍三迤。”按“沙贼乱定”，指沙定州陷云南事，乱起自乙酉（弘光元年，1645年），平定于己丑（永历三年，1649年）。详见冯甦《滇考》之《沙定州陷云南》。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庚寅十月，门人高生应雷、蒋生昱焘、傅生传绪，各挟琴篋，游学苍洱间。涉榆水，访鸡足，由宾

^① 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二百九十五载沐天波遁入永昌（今保山）。

川便道趋洱海谒先生。先生各醉以酒。”

南明桂王永历五年（辛卯，1651年），清顺治八年，31岁。

第二次漫游。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辛卯，应雷东游澄江、临安（今建水县）、昆峨（今宁洱县）、曲靖诸郡邑，岁杪返嶲（山名，在今峨山县东北）、明（昆明）。”

南明桂王永历六年（壬辰，1652年），清顺治九年，32岁。

第三次漫游，外出共14个月。与同门拟访何蘧庵于苍洱，未至而得其死讯，祭墓后复游鸡足山，渡澜沧江，入北胜州，缘燕子崖，出顺州，抵鹤庆，访赵炳龙于剑川楸园，停留7个月后，沿大理向西，历游蒙化（今巍山）等四大郡而后返昆明。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壬辰仲春，复招蒋生昱焘、傅生承绪，更约张生于闾、任生允怀，往就先生教。三月十七日抵洱城清海铺，道遇庠生李生秉俊、万生日圣。泣而告曰：‘先生于去冬登玉楼作赋矣，呜呼！天不欲造就诸士欤，何夺之速也！’招其灵而哭之，因讯先生临终情状，而后与承绪等祭墓。是岁高生应雷复游鸡足山，渡澜沧江，入北胜，缘燕子崖，出顺州，抵鹤庆，息篋于剑川楸园，谒云升师。居七月，偕友人严生敦培浴浪穹温泉，遂沿叶榆而西，历游蒙化、景东、顺宁、永昌四大郡，出外凡十有四月，趋归昆明。”

南明桂王永历八年（甲午，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34岁。

议举春闱未果，第四次漫游，到苍洱拜祭何闾中墓，并和同门饮于蘧庵书院，访求先师遗文。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甲午议举春闱，未奉题允，雷赧不应命，复隐于榆，再过洱海拜先生墓。偕万生日圣、李生秉俊饮先生书院中，索其遗笔。”

南明桂王永历十一年（丁酉，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37岁。

是岁李定国奉永历帝朱由榔入滇，招揽人才，高应雷举乡贡。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丁酉岁闱试，门人领荐者十一人，应雷、允怀、秉俊与焉。”

赵炳龙《高澹生诗文钞序》：“举永历丁酉乡贡。”

南明桂王永历十二年（戊戌，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38岁。

授官赴辰州，三月兵败，居止不明，境况似乎差强人意。辰州，明代设府，今湖南省辰州县。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丁酉岁闾试……明年应雷奉命辰州，三月兵陷。”

高应雷《再游树橘园记》：“戊戌春，予偕仲弟一生游树橘园……时予未濒危。”

赵炳龙《高澹生诗文钞序》：“举永历丁酉乡贡，授中书舍人，从军趋黔楚。己亥（永历十三年，1659年）师溃，隐淑浦，授徒以自给。”

赵藩《高舍人传》：“慨时势之日非，思得一当以报国。李定国奉末帝至滇，舍人应举授官，从军趋黔楚。己亥，师溃于辰州，独身逃免，乃隐淑浦不复出。”

赵氏所叙高应雷授职事和兵败事，与其自叙相差一年。“隐淑浦”之事自叙在三年之后。

南明桂王永历十四年（庚子，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40岁。

与仲弟一生客居义陵，为舒氏西宾，教私塾以维持生计。再游树橘园。与黄州胡君茂会晤。

高应雷《何蘧庵先生行记》：“庚子客义陵，偶于句侯署中晤黄州胡君茂让者，先生故交也。剪烛梧窗，备谈哀苦，间述先生死，相对而泣。……悲者，以先生之学、之名、之寿而殡于异乡，妻子家人未详其生；幸者，先生之死，高生能言之胡君，胡必归报其家人。”按，何蘧庵卒于苍洱书院中，高应雷等弟子及其友赵炳龙，皆不知其在乡里是否有子嗣，乡里亦不知其下落，至此方明情况。赵炳龙《居易轩集·何蘧庵先生传》云：“先生之后人不可复问，及昆明高生应雷自义陵以书来，始称先生有嗣子可以承家云。”

高应雷《再游树橘园记》：“庚子乱后，偶托足于行竹溪，溪之居人传橘园西去仅十里，兴勃勃欲往会。”

高应雷《寄同社书》：“今在义陵三年，教六七童子，仅可博兄弟口粮。两仆出民家作苦工，日觅一饱，苦寒苦热。回忆少年时螺

峰访梅，宝珠咏雪风景，犹依依昨日也。”

《高澹生诗文集》附录舒立濬《书赵云升高澹生两先生遗集合钞后》：“先生……当鼎革时避乱来溱，授徒于大潭及潭头坡两乡以存活。”

按，从以上材料看，戊戌三月兵陷后，高应雷没有立即隐居溱浦，而是在庚子年间永历朝覆灭后才归隐的。溱浦在今湖南省怀化市东北部沅江中游。西汉置义陵县，东汉废，唐改置溱浦县，历五代、宋、元、明、清及中华民国而建置未改。建国后初属沅陵，而后属芷江、黔阳专区，1981年1月至今属怀化市。

清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43岁。

有客自滇中来。

高应雷《寄同社书》：“近有人自乡中来，云昆明池及西山皆无恙，惟自南薰门以至出郭……二三十里间尽为草场……果如斯言，仆之田庐知不可复问矣。”“回首故园，膺肉俱颤。”“今在义陵三年。”

清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50岁。

与二弟高一生居义陵。

高应雷《清明节》诗序：“我独无家，躬违拜扫。”诗曰：“吁嗟十载瞻云处，雁羽翛翛飞不去。”“儿孙无禄不成列，惟仲与季私往还。”

清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51岁。

遣二弟高一生返滇，自己独居义陵为塾师。

高应雷《与强子任书》：“仆近来善病，颇厌粱肉。地方齷齪，无可泻忧，亦无余财问医药。日训童子章句楚音，聒耳甚烦，然舍是无以治生，复益劳碌。今四节则乡思沉痛，兄弟经夕不寐，泣下沾襟。……今尽典衣囊，约得银十六七两，暂遣舍弟归侍老母，仆行踪尚未可知。”

高应雷《辛亥立春即事》：“四海孤身客，春官又入年。”“暂饱东人席，傭书得几钱。”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52岁。

二弟高一生以《澹生诗钞》四卷邮致赵炳龙。

赵炳龙《高澹生诗文钞序》载此事，落款为“壬子秋日楸园老人书”。其文曰：“昆明高子一生，以其兄《澹生诗钞》四卷邮致楸园，复述澹生之意，必得一言于简首。余病目收视，令两儿子递诵于侧，兀坐听之，阅八日事毕。”

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53岁。

为白慧大师作塔铭，其人去年驻足淑浦。此为有年代可查高应雷行迹的最后记录，其后下落不明。

高应雷《白慧大师塔铭》：“壬子与其徒照灯游淑川、柳溪、澄、淑，人遂止于淑，期奉师以终身焉。居一年而师且长逝矣。既葬，澄将勒铭，请诸雷，雷因笔其说，以应所请。”

清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

《高澹生诗文钞》付梓。

舒立濬《书赵云升高澹生两先生遗集合钞后》载其事，落款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朔日淑浦后学文泉舒立濬书后”。舒立濬为淑浦舒氏后裔。其《书赵云升高澹生两先生遗集合钞后》曰：“一日过笈云楼，袖一帙，首尾霉烂，中间蠹损者各十数番。出以语吾叔云槎公，曰：‘此胜园逸老滇中高澹生先生遗集也，先生之出处今不甚详，当鼎革时避乱来淑，授徒于大潭及潭头坡两乡以自存活。闻竟终老客中，每求其墓而不得。幸其集流传吾乡而无副本，倘或失之，可惜也。异日重修邑乘，其有关于淑者，当录入《艺文》而志先生于《流寓传》中。”按“胜园”应为“胜国”之误。这篇文章又说，舒立濬于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来滇，遍访高应雷后人而不可得，偶遇赵炳龙的后人赵介伯，抄来高、赵二人赠答之作数篇和《高澹生诗文钞序》。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舒立濬专程来滇，取高应雷遗集付赵介伯。据赵藩《高舍人传》，舒立濬将高应雷诗文交给他，准备与赵炳龙的《居易轩遗集》合刊。但不知何故未刊二人合钞，今存《高澹生诗文钞》四卷，有赵炳龙之《序》及赵藩所作《高舍人传》，李坤付印并作《序》一篇，言舒立濬钞存有古

今体诗百余首，杂文十余篇付赵藩。现《高澹生诗文钞》如其数，其中有高澹生赠赵炳龙之诗数篇。另赵氏文字迭经战乱存者不及十分之一。现存《居易轩遗稿》中与澹生有关者仅《采菊二章寄高澹生》、《石兰三章念澹生也》、《滇水行寄澹生义陵》等。《高澹生诗文钞序》载高应雷生平大略及其与之交往始末，尤为珍贵。

二、文祖尧创作行实系年

综 论

文祖尧（1589年~1661年），云南府呈贡县人。字心传，一字介石，晚年自号日月外史。天启辛酉（1621年）拔贡，授四川名山县训导，行事为人作风严正，推崇实学。崇祯末年选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学正，修文庙、治祭器，日常训导诸生以圣贤之道，每日以课程督促诸生，考其勤惰或奖掖或摒退之，一时人才大兴，三吴士大夫争相延请他为儒师，人称滇南先生。不久甲申变起，继而南明弘光朝覆亡，文祖尧弃官遁迹于中峰寺，依云南呈贡籍苍雪大师而居，后来又迁居昙阳庵，以青乌术为生。其间他曾数次谋归滇南故乡都没有结果，直到辛丑（1661年）间才得以上路，前后寓居娄东（太仓别称）17年。17年来文祖尧



文祖尧像，选《云南丛书》本《文氏三遗集》

以崇高的品格和学问，赢得了娄东和吴中士大夫的推重。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梅村）赠诗两首、序一篇，《文氏三遗集合钞》附录之，篇

目为《送文子博以苍公招同住中峰寺》、《县阳观访文学博兼读苍公旧咏有感》、《文先生六十寿序》。在文祖尧“还乡之日，士大夫竞为诗文赠行”^①。八月，文祖尧来到湖南桃源，在病中听到缅甸之变（吴三桂军逼缅甸索永历帝事），忧愤至极绝食以殉亡明，卒于归舟中，时年73岁。文祖尧的死讯传到娄东，娄东士人改其生前所居县阳庵为思贤庐祭祀之。

文祖尧的作品，《云南丛书》本今存《明阳山房遗诗遗文》，收诗文集一卷，并收其子文俊德《醉禅草》、其孙文化兴《晚春堂诗集》，定名为《呈贡文氏三遗集合钞》。《滇诗略》录其诗44首，《滇南诗选》录其诗5首。《明阳山房遗诗遗文》并非文祖尧的全部作品，如《新纂云南通志》载其《离忧集》二卷书目，说这部书已经刊行，因清代乾隆时抽毁违碍书籍而被禁毁^②。赵藩对文祖尧著述的存佚情况也有所考证，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明阳山房遗诗遗文》中的遗文一卷，多是讲义日课之类，文祖尧的文学成就在诗歌。在明亡后流离转徙的生活和弥漫内心的凄风苦雨中，诗人以沉郁苍凉的诗歌格调，呈现了传统士大夫崇高的精神境界。

鼎革之际，文祖尧的诗歌尚多吟咏仕宦路途的落寞，不过时世之艰危已隐约可见。《京邸书愁》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入京调选后，诗道：“几回欲上江南道，多少艰危把辙停。”^③此时诗人显然已经感觉到大乱即将来临。调选之职为学正，《补任偶成》写道：“年已逾服政，官仍调广文。”按“广文”即“广文先生”的简称，唐代国子监设广文馆，有助教、博士指导监生修业，明清时期以此泛指清苦闲散的儒学教官。被调任太仓州学正虽然远非显达，诗人却颇感自得。

甲申之变后，文祖尧的诗歌表现了亡国的强烈怅恨悲愁，如《己丑除夕》写道：“孤踪万里外，鬓发六旬过。”己丑为1649年，时已入清，诗人垂垂老矣，背井离乡的孤独形象清晰可见。但个人的遭遇并不是这个时期诗人内心最深刻的痛苦，我们看看其七言古诗《悲歌七首》的小序，就可以感受到诗人痛苦的真正渊藪。他说：“上以悲烈皇生不逢辰，

① 清秦光玉《介石先生传》，《云南丛书》本《文氏三遗集合钞》，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甲寅年（1914年）刻本。本节所引文祖尧作品亦出于此。

② 《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周钟岳等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四册第323页。

③ 《文氏三遗集合钞》，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甲寅年（1914年）刻本。

下以慨当事罔克尽职，自身之流离，不暇计也。”明亡后痛定思痛，诗人这组诗歌的第一首为总领，下面六首每首皆以“嗟我朝廷”起句，分别批判“相职”、“司马”、“大将”、“名流”、“禁城”、“忠良”等类平时为国家所倚重，到国难当头时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人。诗人把沉痛的情怀寄于苍凉的意象，抒发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对亡国的无奈和悲愤，表现了一个普通士人心系天下兴亡的胸襟。文祖尧这时期的诗作充满了不能释怀的故国情结和凭吊亡朝的郁愤，以《焚冠》为代表作。诗曰：

纱帽风霜历几时，庄严当日汉官仪。
一朝倒置谁知惜，几处欢弹我自悲。
懒挂东都同俗变，化为清气与云随。
从兹烈烈冲霄去，涂炭休教得浼之。

故朝遗老内心的悲凉和沉痛，在诗的前二联已倾泻无遗，后二联则一变而为壮怀激烈，令人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崇高的气节。《感时》云：“故园飘零事已违，门庭虽是主人非。”在这类诗歌中，明显地寄托了诗人对故朝的深情和无奈之感。

在数年漂泊异乡的岁月里，文祖尧一面倍感国恨乡愁的煎熬，一面感慨年岁渐老，来日无多。这复杂的情绪，表现为其诗歌中最为常见的两重情调——怀旧和思乡。这两种情怀的煎熬日愈强烈，简直到了触景即发的境地：“境僻几忘新岁月，山深犹见旧衣冠。”（《丁亥元旦》）“客舍良宵短，今宵更若何。”“正苦归途远，哪堪去日多。”（《庚寅除夕》）“几年依古寺，今日又初春。”“万里家何处，惟馀一仆亲。”（《壬辰元旦》）“独抱蓴鲈兴，思归未有年。”（《秋郊夕眺》）难以压抑的怀旧思乡之情，洒满了诗人寄迹的深山古寺，僧舍野途。国已破，家万里，年复一年思归，却年复一年失望，这深沉的痛苦在《辛卯除夕》一诗中表现得更为集中：“送腊曾无酒，冲寒独有梅。一年今夜尽，万里几时回。入望云山阻，伤情岁月催。愁心视炉炭，相对欲成灰。”读到尾联，诗人欲哭无泪的惨怛之情，似乎穿透了岁月的帷幕而直击读者的心。以上诗歌全作于明亡之后：丁亥为1647年，己丑为1649年，庚寅为1650年，辛卯为1651年，壬辰为1652年。这类诗歌又往往作于送旧迎新之际：除夕和元旦。不仅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有流年似水，前途未卜的浓重感

伤。在这样的情境中，诗人得到家书的狂喜，胜过当年在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的杜甫。《癸巳季秋闻家信志喜三首》（1653年）其一道：“数载乡音绝，悄悄望眼穿。忽闻一雁到，宁止万金传。”其二道：“万里苦间关，十年一信传。”在诗人笔下，盼望家书的急切，得到家书的喜悦历历可见。他是这样迫切地直抒其情，所以无须借助任何修辞手段，其情已浸透纸背，感人至深。

文祖尧有一首以金钱为题材的诗比较特别，诗题为《钱肆偶成》，诗如下：

孔方兄与世人亲，更比同胞觉倍真。
自古几人嫌有臭，于今尤信果通神。

太仓学正的职位不会有丰厚的俸禄，可以想见诗人生活的清贫。从娄东诸生的送别诗、序中，可以看到明亡之后诗人以青乌术为生，衣食虽无忧，却并不富有。但在文祖尧诗篇不多见的题材中，诗人表达的不是对金钱的崇拜，而是对现实中金钱魔力的郁愤。他有力地揭露了金钱的世态真相，我们不难品味到其中饱含着自己的辛酸。

文祖尧既擅长古体，亦擅长作格律诗。清代张登瀛说：“今读古今体诸什，原本三唐^①，其忧愁幽怨，抑郁哀思，直可以续《离骚》而近《国风》、《小雅》。千载而下，犹见其心，宜乎陈确庵之称为百世师也。”^②按陈确庵，名陈瑚，娄东文士，文祖尧归乡时曾时作《奉赠介石先生》，语出于此，见《文氏三遗集合钞·附录》。张登瀛的评论，就文祖尧诗的内涵和气韵而言，概括可谓得当。但说到诗人对前人的继承，则未免流于套语。对于文祖尧这类以诗歌抒发心声的诗人来说，具有时代色彩和个人的气韵才性，即能表现其个性特点——至于艺术性能否与前人相比则另当别论。文祖尧诗歌的自出机杼之处，在于直抒其情，沉郁拗峭，不待文字工巧而以气度浑然取胜。作于明亡次年的《乙酉元旦》比较有代表性。在这首诗中，诗人开篇以“老雨岩霜一岁过，入春烟景

① 后世诗家论唐诗有“四唐”说，即以初、盛、中、晚四段分期，也有人把中唐归于盛唐和晚唐，则谓之“三唐”。

② 《滇南诗略介石先生诗跋语》，《文氏三遗集合钞》本，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甲寅年（1914年）刻本。

近如何”一问起句，为下文张本，笔势看似平淡，实已暗传拗怒之情：新春新岁带来的伤感，不是通常的岁月流去之悲，而是山河依旧，人事全非的深刻痛楚。第二联写诗人望中所见和身之所感：“北溪冻解寒将退，南浦梅舒暖渐多。”大地的景象似乎挟带了春天的喜悦，但接下来诗人笔触一转，写出“人事忽惊新岁月，梦魂犹认旧山河”一联，世事变迁的惆怅，故国遗老的孤忠，在这一个转折中被强烈地传达出来。在这个有力的顿挫之后，尾联“东风莫愁无消息，转眼依然见太阳”，以从阴霾中透出光明的景物，流露了诗人内心的一线希望，余韵悠悠。全诗感情的表达顿挫有力，遣词平易却气格沉厚，形成了一个深远的意境。《金陵感怀》亦较为突出地表现了文祖尧诗风的特点：

天作钟山久毓灵，櫜枪倏尔变常经。
 龙蟠陵土惟荒草，虎踞金甌暗晓星。
 父老犹能言旧内，英雄谁复泪新亭。
 多情独有长江水，兀自朝宗不改形。

这首诗借古抒情，蕴含了诗人对故朝的深情和不变的气节。首尾两联情调拗峭，中间两联用典，语气看似平稳，沉郁之情却暗藏其中。诗人的一腔遗民忠气，化作其诗歌的独特韵调，不拘何体，时时流露。对于文祖尧来说，形式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娄东人士既看重文祖尧的气节品格、育人之功，也看重其诗歌成就，更把其诗歌和人格看作一体，从《文氏三遗集合钞·附录》的吴伟业（梅村）等人赠与文祖尧的送行诗、序及其交游赠挽诗文中，可见他在娄东文士中的影响。

文祖尧的长子文俊德和孙子文化兴皆为诗人，《文氏三遗集合钞》是其一门三代诗人的见证。文氏一门不仅气节高尚，也是文学家族名家。文祖尧子孙的创作和事迹，万揆一的《呈贡学者文祖尧及其后裔》^①一文论之甚详，请读者阅其原文，此不赘。

^①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64~68页。

创作行实系年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年），1岁。

文祖尧，云南府呈贡县人。字心传，一字介石，晚年自号日月外史。据《文氏三遗集合钞》秦光玉撰《文介石先生传》，文氏先世为宋文信公之后，籍隶江西吉水。洪武年间，其远祖文龙随西平侯沐英入滇，以军功授武威将军，世居晋宁。成化时文祖尧的曾祖父文浩弃武从文，始徙居于呈贡。

祖尧的祖父名繡，父名国华，三代均为儒官。国华育有二子，长子名绍尧，贡生，选江西吉安府教授，次子即祖尧。

祖尧有子二人：长子名俊德，字士宾，一字秋水，明末诸生，乡里称为文善人，著有《余生随咏》、《醉禅草》。次子名成德。

祖尧有孙五人。出于长子俊德者二人：化兴，贡生；化远，举人，官居湖南溆浦知县，著有《晚春堂诗》八卷。出于成德者三人：化熙、化孚、化周，皆为廪生。秦光玉《文介石先生传》曰：“自曾、玄以下，皆能以文学世其家。”

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33岁。

入京选贡，授四川名山县训导，操履严正，敦崇实学，修《进修日程》颁布诸生。

作七言律纪行诗《过盘江小葛第三桥》，自注曰：“俗名铁索桥。”《过葛镜桥有感》小引曰：“黔水之险，盘江为甚。”

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55岁。

入京调选，七言律《京邸书愁》曰：“几回欲上江南道，多少艰危把辙停。”

补江苏太仓州学正，作五言律《补任偶成》曰：“年已逾服政，官仍调广文。”作五言绝《饭足窝》，自注曰：“癸未冬，余承乏太仓广文，戏题官舍曰饭足窝，因书此于座右。”又作五言古诗《饭足窝解嘲》。

在太仓修文庙、整治祭器，训导诸生以圣贤之道，颁布诸生以

《儒学日程》，考其勤惰而奖掖或开除之。广种桃李，一时人才兴起，三吴士大夫争相延致，人称滇南先生。

游杭州西湖。作七言绝句《夏日杭州道中喜柳》、《再过西湖有感》。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南明福王弘光元年，56岁。

在太仓学政任上。

四月，李自成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亡。

五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改元弘光。

六月，李自成退出，清王朝定都于北京。

清世祖顺治二年、南明唐王隆武元年（乙酉，1645年），57岁。

南京福王小王朝覆灭。

文祖尧弃太仓学正职，听从苍雪（读彻）招而遁迹中峰寺，着僧服，以青乌术为生。作《中峰次苍法师法会元韵》，诗曰：“纷纷戎马遍中华，漫说风云及鸟蛇。偶值横流沉苦海，须知救劫有昙花。望洋嗟叹终非岸，回首皈依便是家。曾记给孤留盛事，黄金布地等泥沙。”

吴梅村作《送文学博以苍公招同住中峰寺》，诗曰：“西风驱雁暮云哀，头白冲寒到讲台。莫问间关应路断，偶传消息又兵来。一峰对雪茅庵在，二老论心石壁开。探取梅花枝上信，明年移向故园栽。”观其诗意，祖尧曾拟次年返乡。

定居昙阳庵。按娄东文人顾士璉《文介石先生思贤庐记》曰：“滇南先生之寓于昙阳庵也，始于顺治乙酉之闰六月。”《送介石先生归滇序》曰：“乙酉夏金陵破，先生不乐仕，遂去官，侨居州城之昙阳庵。”又道其“侨寓荒庵者十六年”。但吴梅村《送文学博以苍公招同住中峰寺》曰“西风驱雁”，又曰“探取梅花”，其入住中峰寺当在秋季，那么定居昙阳庵当在次年春季。吴诗和顾说居昙阳庵时间不一，存疑，姑系于此年。

作七言律诗《焚冠》，诗曰：“纱帽风霜历几时，庄严当日汉官仪。一朝倒置谁知惜，几处欢弹我自愁。懒挂东都同俗变，化为清气与云随。从兹烈烈冲霄去，涂炭休教得浼之。”

作七言古诗《悲歌》七首，《序》曰：“昔杜工部乾元中寓同谷

县，有歌七首，盖甲申之后，予哀痛之，亦仿为七歌，上以悲烈皇生不逢辰，下以慨当事罔克尽职，自身之流离，不暇计也。”

时与陆世仪（桴亭）等诸友为讲学会，又间与娄东人士为佛会（陆世仪《送文介石先生序》）。衣食无忧，唯苦家乡音讯隔绝。

清世祖顺治三年、南明唐王绍武元年（丙戌，1646年），58岁。

居县阳庵。有七言律《寓县阳庵》。

作五言律《丙戌除夕》、《丙戌元旦》。

清世祖顺治四年、南明桂王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59岁。

至娄东陆世仪处讲《易》。陆世仪有《丁亥年二月廿六日，滇南文介石先生同不隐、圣传、虞九诸友至小斋讲易》。

作七言律《丁亥元旦》，诗曰：“境僻几忘新岁月，山深犹见旧衣冠。”

清世祖顺治五年、南明桂王永历二年（戊子，1648年），60岁。

六十寿。吴伟业（梅村）作《文先生六十寿序》，曰：“先生年六十，弟子请一言寿于先生。”

与江南名士会讲义。《诚恒敬讲义》曰：“戊子岁会讲义，诸君今日之会，有桴亭（世仪）先生主盟，又有石隐、圣传、虞九诸先生赞襄。老夫幸际嘉会，深幸圣贤之学几绝复矣。”

清世祖顺治六年、南明桂王永历三年（己丑，1649年），61岁。

作五言律《己丑除夕》，诗曰：“孤踪万里外，幡发六十过。”

赴嬾公之约于迟林泉，有七言律记其事，《序》曰：“己丑初夏赴嬾公约，从娄水过兰江来吴越，棲迟林泉，经五阅月，见山川依旧，时事日非，相对欷歔，不胜今昔之感。嬾公因赋诗见赠，勉步元韵奉酬，敢曰庚歌，聊以寄慨云尔。”自注云：“公姓杨，名永言，余同乡人。”

清世祖顺治七年、南明桂王永历四年（庚寅，1650年），62岁。

作五言律《庚寅元旦》，曰：“萧萧僧舍客，衲破未知贫。”

作五言律《庚寅除夕》，曰：“客舍良宵短，今宵更若何。”“正

苦归途远，那堪去日多。”

清世祖顺治八年、南明桂王永历五年（辛卯，1651年），63岁。

作《独立小像赞》，落款曰：“日月外史文介石自题，时年六十有三。”

得平安家书。据陆世仪《送文介石先生序》，吴郡有孝子黄向坚入滇迎其二亲归，并带回祖尧家书，于是始知阖门无恙。

作五律《辛卯除夕》、《寿王烟老和西田招隐元韵》。按“王烟老”即王时敏（1592年~1680年），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太仓人。其祖父王锡爵曾为首辅，其父王衡也是高官。他本人以祖荫仕太常寺少卿，人称“王奉常”。明末江南画家称“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王时敏位居首，读彻曾赋七律十章为之祝寿（见《南来堂集》）。

清世祖顺治九年、南明桂王永历六年（壬辰，1652年），64岁。

作五言律《壬辰元旦》，诗曰：“几年依古寺，今日又初春。”“万里家何处，惟馀一仆亲。”

清世祖顺治十年、南明桂王永历七年（癸巳，1653年），65岁。

作五言古诗《癸巳秋过南郊有感》。

作五言律《癸巳季秋闻家信志喜》三首，其一曰：“数载乡音绝，潜潜望眼穿。忽闻一雁到，宁止万金传。亲友多巢覆，儿孙独瓦全。幸免忧身后，聊堪慰目前。”按，赵藩、秦光玉《文氏三遗集序》皆谓明季大乱，流寇至呈贡，相戒勿扰文善人家，所以文氏一门幸免于难。祖尧之子文俊德在乡里有文善人之称。其二曰：“万里苦间关，十年一信传。”

清世祖顺治十五年、南明桂王永历十二年（戊戌，1658年），70岁。

吴伟业（梅村）访祖尧于县阳庵，作古风《县阳观访文学博兼读苍公旧咏有感》。诗曰：

先生头白发垂耳，博士无官家万里。讲席漂零笠泽云，乡心断绝昆明水。南来遗老为苍公，说经如虎诗如龙。大渡河头洗白足，

一枝柳栗栖中峰。与君相见砉然笑，石床对语羈愁空。故园西境接身毒，雪山照耀流沙通。神僧大儒都并出，雕题久矣渐华风。呜呼！铜鼓鸣，庄蹻起，青草湖边筑营垒，金马碧鸡怅已矣。人言尧幽囚，或言舜野死，目断苍梧泪不止。吾州城南祠仙子，窈窕丹青映图史。玉棺上天人不见，遗骨千年蜕于此。先生结茅居其旁，归不归兮思故乡。尽道长沙军，已得滇池王。伏波南下开夜郎，乌爨孤城犹屈强，青蛉绝塞终微茫。忽得山中书，苍公已化去。支遁经台树陨花，文翁书屋风飘絮。噫嘻乎，悲哉！香象归何处，杜宇啼偏哀，月明梦落桄榔台。丈夫行年已七十，天涯戎马知何日。点苍青，洱海白，道路虽开亦无及。（《文氏三遗集合钞·附录》）

观其诗末之意，此时祖尧拟归仍未果。

按此诗《吴梅村全集》题目、文字略有出入^①。

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南明桂王永历十三年（己亥，1659年），71岁。

滇黔道通，家书频至皆报平安。

作七言律《己亥春初寻梅遇雨》。

清世祖顺治十七年、南明桂王永历十四年（庚子，1660年），72岁。

得家书，再度谋归。据陆世仪《送文介石先生序》，江南大乱定，祖尧得家书，知滇中岁饥，“独文家力耕独得不馁”。吴中有仕宦于滇南者四五人，“闻先生归，皆愿奉先生以行，且具饮食。而一时之人久滞归滇者，闻先生名亦皆辐辏先生。自此从容襦被，自吴抵滇。”

清世祖顺治十八年、南明桂王永历十五年（辛丑，1661年），73岁。

启程返乡，至此前后共流寓17年。作七言律《留别娄东诸友》，诗曰：“苦历流离十九年，寸心只恐愧前贤。”按：“流离十九年”与任太仓学正时间不合，疑为约数。下文盛敬《序》同。

秦光玉《介石先生传》：“侨居十七年。还乡之日，士大夫竞为诗文赠行。”《文氏三遗集合钞》附录《万里赠行卷》，娄东诸友生

^①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253~254页。

赠诗、序者有：

陆世仪（桴亭）《送文介石先生序》，载文祖尧后期行实较详。

盛敬（圣传）《送介石先生还滇南序》，叙与文祖尧交往：“先生以崇禎癸未司铎吾娄，则敬之左右先生已十有九年矣。中遭丧乱，晦迹昭提，敬亦焚弃笔砚，从先生以隐。先生则赠我短章，赐我嘉册，为我相土以妥秩祖先。”“先生年七十有三，敬五十馀二。”

顾士璉《送介石先生归滇序》载文祖尧行实：“娄牧数敦礼不得见，亦不罪之。”“先生精青乌术，为予相地，戊子冬葬先母，庚子冬葬先父，明年春先生适行。”“来娄不一载而去官，侨寓荒庵者十六年。”“予追随杖履有年。”

除以上诸人外，赠诗和序者，尚有陶鸿祚（愚古）、顾铎（雅俦）、龚日焜（德章）、龚挺（无竟）、王育（石翁）、唐瑀（仙佛）、郁法（存斋）、郁植（东堂）、曹允斌（孝般）、陆允纯（宗程）、曹有武（祖来）、宋龙、张泳（汉思）、许焜（舜先）、张闻升（耳玄）、嘉定陆元辅等人。

文祖尧第11世孙文大章《敬附启者远祖》曰：“归滇之日，江浙士夫及门人如顾斯士、江虞九、吴梅村辈送行诗文长卷，咸丰丁巳之变在省城遗失一轴，被毁一轴，光绪中叶在呈贡遗失一轴。”（《文氏三遗集合钞·附录》）

八月，祖尧抵达湖南桃源，病中闻缅甸之变，悲愤绝食，卒于舟次，终年73岁。

按关于文祖尧的死因还有死于痢疾一说。娄东士人顾士璉《文介石先生思贤庐记》曰：“会有同乡人施孝廉寄孥（子女）于先生，先生受托，复于庵之西偏构椽以居之，贍数年，囊橐为竭，回滇日并挈为伴。至桃源县，孝廉子先患痢，先生染其病而卒。闻孝廉已抵家而先生之孤棺得回与否，不可知矣。”

按缅甸之变：即永历十三年桂王逃入缅甸后，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缅甸迫于吴三桂大军的压力交出桂王，桂王被执归昆明。据黄宗羲说顺治十八年冬季天兵逼缅，缅人执永历帝献于师，挟至云南省城外草萍驿，吴三桂夜杀之，两宫、世子皆不免^①。邵廷

^① 清黄宗羲《行朝录·永历纪年》，《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李春龙、刘景毛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采则记载次年桂王缙于滇都（按昆明），并杀王子^①。昆明五华山山下有“逼死坡”，即永历帝被迫自缢处，立有石碑。

秦光玉《文介石先生传》载，祖尧之孙文化兴迎祖尧灵柩归葬于呈贡黄土坡，与段孺人合葬。《文氏宗谱》载段氏未随同赴任。按，《滇系》、《滇诗略》谓国变后祖尧孺人郭氏仓卒携女赴水死，文祖尧有五言古诗《挽节烈郭孺人》。当以此说为是。

清圣祖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

娄士人闻文祖尧逝，改其县阳庵旧居为思贤庐以祀之，私谥贞道先生，比之为管幼安（宁）、陶元亮（渊明）。

顾士璉《文介石先生思贤庐记》曰：“先生自乙酉辛丑在庵凡十七年，自壬寅闻讣，住持僧彻如、惺如即以西偏三屋为先生影堂，书帛设几，筵于其中越三年矣。癸卯秋，门人顾士璉等易木主以祀之，私谥曰贞道先生。……入其室则思其人，思其人则论其世，故题之曰思贤庐，并记先生之始终于庵。”

《江南通志》：文祖尧，字心传，云南人。崇祯时为太仓学正，缮文庙，整祭器，淳淳训诸生以圣贤之道。已而弃官寓荒寺，寻归，卒于道。诸生即寓室为祠，曰思贤庐。^②

太仓州立祖尧祠于州学东祀之。《江南通志》：“明学正文祖尧、李学正祠在州学东祀。”^③

文祖尧的著述，赵藩《文介石先生父子遗诗序》（《文氏三遗集合钞》）曰：“先生所著书曰《儒学日程讲义》四十卷，《春秋析疑》二卷，《周易阐微》四卷，《南都纪闻》二卷。俱未梓而佚。惟《明阳山房诗文》六卷、《离忧集》三卷已刊行。乾隆中抽毁违碍书籍，仍付劫烬。今此二卷之存，已历二百余年，得逃于鼠蝨兵火之厄。”《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载其《离忧集》二卷名目，曰：“是书已刊行，因清乾隆时抽毁违碍书籍，仍付劫烬，惜哉！”

《云南丛书》本《文氏三遗集合钞》存文祖尧《明阳山房遗诗

① 清邵廷采《西南纪事·桂王由榔》，《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李春龙、刘景毛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② 《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五《职官志·名宦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江南通志》卷四十《輿地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遗文》，有诗文各一卷，并收其子《醉禅草》、其孙《晚春堂诗集》，定名为《呈贡文氏三遗集合钞》，又附录《万里赠行卷》、《交游赠挽诗文》，吴伟业（梅村）的《送文子博以苍公招同住中峰寺》、《县阳观访文学博兼读苍公旧咏有感》、《文先生六十寿序》也附录其中。

《滇诗略》录文祖尧诗44首，《滇南诗选》录其诗5首。

三、明季第一诗僧苍雪

明季云南的两大诗僧苍雪（读彻）和担当（普荷），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成名于江南的苍雪在外界声望尤高，有“第一诗僧”之美誉^①。明季云南诗人与外界的交往，多由其引荐。

（一）苍雪生平事略

记载苍雪生平行实的主要文献，有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文学史家钱谦益的《中峰苍雪法师塔铭》（《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六，以下简称《塔铭》）、《滇诗拾遗》卷五苍雪小传及《送唐大来入滇》诗下附传、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五《仙释》苍雪小传、近人陈乃乾的《苍雪大师行年考略》（以下简称《考略》），等等。钱谦益的《塔铭》实为诸传所据，《考略》则详于交游，其他诸传皆可相互参证，苍雪自己的诗文集《南来堂集》亦有可证实者。笔者系其诗文，对诸传相抵牾者辨之，阙则补之，大体勾勒苍雪生平大略。

苍雪（1588年～1656年），云南府呈贡县人，俗姓赵，法名读彻，自号苍雪，又号南来。其父碧潭为都讲僧，其母杨姓。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苍雪生。其《赋岁朝诗自序》云：“余生戊子，迄今新正，俄半百世，历四朝。”四朝当指万历、天启、崇祯、南明。泰昌和天启为同一年。雍正《云南通志》载其幼年祝发于昆明妙湛寺，《塔铭》说苍雪“幼时侍鸡足水月禅师”，此为祝发之后事。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苍雪20岁，离滇入吴，20余年间

^① 见本节之（三）。

泛游名山胜水，参拜高僧法师学习佛理。《塔铭》说他“叩印《楞严》于天衣，受十戒于云棲，受满分戒于古心律师”，但最重要的，是参学于清凉宗的传人巢、雨二法师。清凉宗源远流长，但其发扬光大，与滇南二僧有关。《塔铭》说胜国时苍山再光瑞师表明《华严玄谈》，辑《会玄记》，开键启轮，蔚为教宗。万历中，苍雪法师自滇到吴中，闻雪浪法师晚棲望亭，欲往投之而雪浪歿，师从于其弟子巢、雨二法师，终成一代大师，钱谦益称为“一灯再焰”（《塔铭》）。巢、雨二师有“巢讲雨笔”之称，各擅一长，苍雪、汰如（与苍雪同为入室弟子）兼而有之，天下将他们四人并称为“巢雨苍汰”。多年后苍雪路过望亭，写下了《过望亭雪浪师翁饭僧处》一诗，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尚良多感慨：“负笈曾经暂息肩，开堂难话旧因缘。庵门破尽无人住，野岸重来一泊船。秋晚登坛当此日，水流断路是何年。儿孙恐不知行脚，指点遗踪在目前。”^①

天启七年（丁卯，1627年），苍雪驻足于苏州中峰寺，时年40岁。《赠邻寺僧》曰：“我年四十住中峰，尔亦经年恰与同。愿尔古稀我再见，恐无百岁住山翁。”先是苍雪和汰如相约开讲传法，汰如住华山，苍雪住中峰，一年两期，轮流开讲，东南佛教于此大盛。但汰如在首讲第一期之后即化去，由苍雪独力荷担讲坛。清凉宗所属经论又不仅《华严》，故苍雪兼讲《楞伽》、《楞严》、《唯识》、《法华》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所谓千灯一镜，交互映彻。潘耒《遂初堂别集》卷一《中峰讲院兴造碑》云：“中峰讲寺创自支公，废兴不一，明季始还为梵宇，一雨法师肇开讲席，苍雪法师继之。雷轰雨霏，法化大行，吴中讲堂，惟中峰、华山二刹最盛。”

从驻足中峰寺到明王朝覆亡前的10余年间，苍雪传法的步履遍及江南名寺。《江南通志》卷四十四《輿地志·寺观·苏州府》载：“清远寺在府莲华峰东南，本名华山寺，明僧鹿亭结茅于此，后讲僧一雨卓锡（按僧人居留），法嗣汰如、苍雪二僧相继兴建殿宇，櫛庵、正志继之，长松夹径，寺门幽绝，有华山初地坊。”《林蕙堂全集》卷十一载：“湖州府知府吴绮撰《募修香界庵疏》：‘锡山揽胜，古有草庵。金地从新，兹名香界。盖清江刺史亲荷锄以诛茅，而苍雪大师自浮杯而证果者也。’”《南来堂集》有诗纪其讲法行止，如《雨中望崑山不得上时同诸子赴云间

^① 本节所引苍雪诗，出自《云南丛书》本《滇诗拾遗》卷五和《续修四库全书》本《苍雪和尚南来堂诗集》。

讲席》、《辛巳春道开以汰兄遗命请予续讲华严第二期解制》、《甲辰春娄东海印庵法华讲期解制》。

“南来声光未坠于地，师之力也”。苍雪在中峰寺不仅因主持讲坛而声名远扬，而且他还善于经营管理。据说苍雪气度恢宏，奋以起衰兴废为己任，以身作则，种菜开流，施主布施的收入，纤毫不入于私囊，铢积寸累到二十年，才能够修葺大殿，又得众信徒协力捐助，经年殿成^①。汪琬的《尧峰文钞》卷二十《中峰晓庵了法师塔铭》的一则记载，可为以上记载作旁证：其铭说法师始至时，“一室萧然，食无盐豉，卧无袴裯，披无楮絮”，而其恬然处之，益加努力开源节流，加强管理，寺中气象一新，远近众人盛传，曰：“苍雪法师复出矣！”可见，苍雪的经营才干颇有口碑。

1656年（丙申，顺治十三年），苍雪应邀主持宝华寺讲席，这时他已老病乏力，讲至第二卷末，因气力不支而命其弟子代讲，旋即卧病不起。钱谦益《塔铭》曰：“示化宝华，实丙申闰五月廿二日，世寿七十。”实为69岁。归葬中峰寺。苍雪逝前作《遗诫十首》，其中《宝华山楞严讲期末竟病中自解序》曰：“丙申暮春，宝华山见月师弟以楞严讲期见招，予以老病辞。于端阳后一日勉尔扶病就道，十八日登座讲至二卷末。十日蝇糝不进，命弟子辈代之，更不复振，聊以自嘲。”

（二）苍雪在江南的交游

苍雪不仅博通佛法，而且兼擅诗、书、画，他成名于江南，颇受江南文士崇仰，在江南期间，不仅成就了华严宗大师的地位，以得道高僧的身份被邀于各名寺升坛说法，而且与钱谦益、吴梅村、董其昌、陈继儒、毛子晋、唐宇昭等名士交游。这时期云南本土诗人涉足江南者，亦通过他的引荐得以结识江南名士。

钱谦益（号牧斋，1582年~1664年）与苍雪相交甚深。在苍雪逝后他回忆说：“余老归空门，与师结契尤笃。”（《塔铭》）钱谦益不仅为苍雪的诗集作序，而且在他圆寂后为其作塔铭。苍雪有诗《过访钱虞山北归》，表现了他和钱谦益在长期交往中结下的深厚友情。诗曰：“廿载藤溪路不忘，重过溪上认茅堂。东山高卧人依旧，南国同声喜欲狂。天宝

^① 以上见潘耒《遂初堂别集》卷一《中峰讲院兴造碑》。

衰时空叹息，少陵老去独悲伤。多情只有衔泥燕，犹自寻常绕画梁。”

明末清初另一著名诗人吴伟业（号梅村，1609年~1672年）和苍雪之交谊极其深厚，《梅村集》以《赠苍雪》冠首，并赞扬苍雪在江南传法时的盛况：“独游东海上，观者如墙堵。伽文开十诵，广舌演四部。设难何衡阳，答疑刘少府。”梅村又有《赠苍雪若镜两师见访》、《谢苍雪赠叶染道衣》等诗。苍雪圆寂后，吴梅村还写下多首诗歌，以表达他对这位来自滇南的佛学大师之怀念和尊敬。《过中峰礼苍公塔》其一云：“尚记山中约，谁传海外逢。平生诗力健，翘足在何峰。”其二云：“道在宁来去，名高定有无。凄凉看笔冢，遗墨满江湖。”其三云：“慧业谁能继，宗风绝可哀。”《哭苍雪法师》其一云：“得道好穷诗正变，观心难遣世兴亡。”其二云：“说法中峰语句真，沧桑阅尽剩闲身。宗风实处都成教，慧业通来不碍尘。白社老应空世相，青山我自笑诗人。纵教落得江南梦，万树梅花孰比邻。”这些诗中既有对苍雪道行的赞美，亦有对其诗艺的倾倒。

陈继儒（1558年~1639年），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与苍雪交好。《南来堂集》有两首写给陈继儒的诗。《陈眉公》云：“东余久寒白石盟，谈虎能使四座惊。一自淹留蒋山寺，风回远梦安期生。樵斧烂作烧丹土，书灯炤入机杼声。桃源莫谓即避世，人间无处无浮名。”《留别眉公先生》云：“买得荒田也种瓜，结庐多半想东畬。鸟鸣得意不离树，容到无言只看花。二十年前曾住脚，九千里外偶还家。茫茫沧海从兹别，何日逢君话岁华。”从此诗看，苍雪当于驻足中峰寺时，就开始了与陈继儒的交往。陈继儒的《偶庵草小序》曰：“扈芷自西蜀走吴，顾独与董玄宰、章青莲、徐九玉、眉道人为诗友，尝与苍雪、匡云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粥，余为煮蔬蒸菌，留连者九旬始去。”陈乃乾先生的《苍雪大师行年考略》考定此事为天启三年。

从《南来堂集》中的诗看，明代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汲古阁主毛子晋（名晋）与苍雪之交情亦不浅。集中有《赋赠毛子晋壬午赴试南场》、《过昆湖访毛子晋》、《赋得天寒有鹤守梅花次毛子晋》，可见苍雪对其人的关注。《祝毛子晋五十》则表现了苍雪对其人的赞美和深刻了解：“阁高汲古千云居，下临直视疑无地。家富惟藏万卷余，龙宫仙岛开幽秘。一声如鸟叫春初，半百年来忽已是。傲骨侯门懒曳裾，称觞海内同邻比。月斜客散夜堂虚，静悟生前原是自。那有神仙不读书，草号农夫能识字。何须海宝更求珠，所需莫不皆如意。”据毛晋的《野外诗卷·

送法润禅师载〈华严忏仪〉还南诏》小引，丽江土知府木增请毛晋刻书，即经苍雪介绍。据《苍雪大师行年考略》，苍雪临终时把山茧袍和时文集交付给了毛晋。若非交谊深厚，苍雪断不能有此举。

明末江南画家称“四王”，苍雪与位居其首的王时敏过从甚密。《南来堂集》有《游东园偶拈四绝呈王烟老》，其一曰：“林下归来信有年，可中何事不超然。逢人只说王摩诘，故认名园作辋川。”又有《寄王奉常烟客》：“东门种瓜地，蒔菊到西田。人老笔椽下，云生砚瓦边。此生馀世外，一往悟生前。笑指空庭树，谁来问画禅。”江南士大夫素有雅集之风，看来王时敏不时邀请诸名士雅集，东门看瓜，西田赏菊。西田是常聚之地。不止于赏菊，《南来堂集》有《次韵王奉常烟客首夏西田杂兴三首》为证。但江南名士贺苍雪60大寿之后西田的一次赏菊盛会，在当时参与者的笔下留了不少记录，当为西田雅集中影响最大的一次。陈乃乾先生的《苍雪大师行年考略》崇祯十四年载：“读彻五十四岁，王时敏五十寿，请读彻，读彻赠诗数首。十年后，顺治八年，时敏六十寿，读彻又赋七律十章为祝。顺治四年正月初二日，读彻六十生辰，天下大学者同聚中峰寺，赋诗祝寿者达五十余人，读彻不及一一谢答，作七律一章总酬之。之后，应邀随王时敏至太仓西田家中赏菊。”《南来堂集》尚存《丁亥秋王奉常烟客西田赏菊和吴宫詹骏公韵》，《梅村集》（卷十一）亦有七言律诗一首，其题曰《丁亥之秋，王烟客招予西田赏菊。踰月，苍雪师亦至。今年予既卧病，同游者多以事阻。追叙旧约，为之慨然，因赋此诗》诗道：“露白霜高九月天，匡床卧疾忆西田。”“旧游多病难重省，记别苍公又一年。”

滇南诗人游于外者与苍雪多有交往，有的因地缘，有的因其名望而拜访订交，再由苍雪引荐给江南名士。

时任太仓学政的云南府呈贡县诗人文祖尧，在南明弘光小王朝灭亡后（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弃学正而从苍雪遁迹中峰寺，时年57岁。他在《中峰次苍法师法会元韵》中写道：“曾记给孤留盛事，黄金布地等泥沙。”

云南府晋宁州的著名诗僧担当，在出家前与苍雪交往的时间虽不多，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二人诗文集集中均有互赠的诗歌。苍雪为担当所作诗，于二人在江南同处时期有《丙寅白门送唐大来明经应试》、《暮秋怀唐大来时闻在白下》。丙寅为天启六年（1626年），白下为南京。这是担当与苍雪订交初期，担当那时名唐大来。在他赴京应试前，苍雪以《丙

寅白门送唐大来明经应试》给以勉励。诗曰：“如君才思自风流，山色江南已尽游。痛饮几回当白月，好诗多半在红楼。不禁桃叶频催渡，暂借芦花一系舟。走马长安春雪遍，到时应换黑貂裘。”担当落榜后南游，苍雪作《暮秋怀唐大来时闻在白下》加以安慰：“但得衣边孤剑在，不愁囊底一钱无。”崇祯元年（1628年）担当还滇，苍雪有《送唐大来还滇》诗，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小艇难禁五两风，鸡山有路几时通。殷勤为我传乡信，结个茅团在雪中。”担当还滇后苍雪又作《同陈百史分韵怀滇中唐大来》，表达了对他的怀念及对其怀才不遇的同情：“幸得一人识，不孤千里明。”有苍雪这样的朋友，一生坎坷的担当也差可自慰了。数年后苍雪从友人处得到担当书信，大概知其已经出家，作《王公子升如自滇至吴得唐大来书问》：“秣陵廿载得亲朋，浪子何当远念兴。数字随风传万里，两心相见只孤灯。寒鸡宿野啼霜早，奔马荒田嗅冻冰。回首惊魂知未定，艰危吾亦过来曾。”诗中充满了关怀和慰勉。

宁州（今华宁县）世袭土知府、诗人禄洪（字霄宾）在鼎革前与苍雪交往甚密。崇祯三年春（1630年）禄洪入卫京师，次年夏天，他收到苍雪所寄江南名士在虎丘开浣花大社即席所赋诗篇，恨不能参与，作诗一首以“寄用续貂”^①。其诗曰：“江左名区想至今，遥闻上巳共登临。坐分涧石千人满，引到流觞几曲深。此会长安传社草，并谁声价动词林。风尘我已愁为客，抚剑空成塞上吟。”当苍雪驻足中峰时，禄洪在滇中又有《寄苍雪法师》，诗曰：“终夕少微垣气接，有怀遥忆路重重。莲花捲舌棲双树，贝叶题书寄半峰。俗子顿能开蚁劫，征人渐觉入龙种。何年飞锡云涛谷，负石还将供夜舂。”从这两首诗看，禄洪对苍雪仰慕弥深。

（三）苍雪诗歌的创作成就

苍雪诗现存雍正元年刻本《南来堂诗集》四卷，僧正脉和圆鼎的《跋》都说此非原编。圆鼎《跋》曰：“著作颇定，尽贮中峰，不意忽遭烈焰之厄，无复存矣。兹编乃其门人后辈身后蒐辑之文。”《滇诗拾遗》

① 其序曰：“余以庚午年春入卫神京，及辛未夏，苍雪师自南中寄至。上巳日，陈季采开浣花大社于虎丘，即席送陈古白、林若抚分游两都诗。读之神飞，恨不能睹其山水人文，得附诸君子社末。勉尔效颦，寄用续貂。”（《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四）

卷五本传说：“著有《南来堂集》，予得之门人赵永鑫，永鑫得之曹瀛。其集有徐波、钱谦益、陆汾诸序。予既钞副本，又于袁氏《明诗略》外选其诗一百三十首。”《南来堂集》见录于《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明诗综》卷九十一录诗7首。

对苍雪诗歌的创作成就，明清名家评价很高。吴伟业《梅村诗话》说：“苍公诗清深苍老，沉着痛快，当为诗中第一，不独僧中第一也。”清代王士禛在其著述中亦不止一次推崇苍雪，并说：“近日释子诗，以滇南读彻苍雪为第一。”^①又说：“师贯穿教典，尤以诗名。”^②

多年来修道于深山古寺，行脚于水云之间，幼年出家，青年离乡，晚年遭遇故朝覆灭之乱，这样的经历，使苍雪以一代高僧，虽在诗歌中满载了对山水的审美感悟，对友情的惓惓，但他对故朝的哀悼，亦非寂不可见。

诗人笔下的山水形象，既大气磅礴又生动细腻，使人不能不为之倾倒。我们且看七律《黄山》中的两联：“三十六峰齐下拜，几千万仞有谁登。雪翻海浪漫天去，云驶江流出峡奔。”显然，无论是山之雄伟壮丽还是云之旖旎烂漫，诗人出手都给人以不凡之感，意象苍劲而不失清丽，灵动而不失雄浑。苍雪的诗歌也善于细致地描摹景物，意象尖新，韵味浓厚。如《和徐州来梅花诗》写梅花：“斜摹月影春如醉，冻断花须夜不温。”《岁暮山中怀二楞师》（其三）写山寺斋居：“墙头正缺峰尖补，窗口初开月半衔。”第一例以“月影”之虚对应春夜“如醉”之感，而寒气既能“冻断花须”，春气自然就“不温”了。摹象虚而实，抒情实而虚，景物如在目前，却要会心才能领略。第二例如工笔细描，语语如在目前，却流布着一种空远的童趣：小窗半月，缺墙峰尖，画境是诗人与自然交流的心语，怀人之情，氤氲于画面之中，又散发于画面之外。

山水诗不可能不见情，但写景显然是苍雪的重心之所在，而他的送别诗和怀人诗则相反，以情为主，景只是情的生发。观览苍雪的众多诗作，这类诗歌的数量之多，令人感叹其情感之丰富。在苍雪笔下，西湖的暮春景色被拟人化了：“远山羁客泪，落日酒人心。”（《暮春西湖上》）在诗人怀念友人时，西风也会哭泣，伤感中透着洒脱：“西风挥泪尽，秋色满金陵。”（《同陈百史分韵怀滇中唐大来》）此外《送许韵还清凉山读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渔洋诗话》卷上。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池北偶谈》卷十三《南来诗》。

书》曰：“春雪无声到地消，梅花何意向人撩。”春雪见而未见的轻灵飘洒，梅花有意无意的撩乱人意，其实是送行人的惆怅，正如《雪公应讲还山投诗留别如韵奉西州》云“落叶风来寒到骨，散花雪过白于眉”——风寒到骨，雪白于眉，是一怀离情没着没落的表现。

时势变乱，僧侣亦不能遁离苦难。明亡后的苍雪情怀抑郁，《金陵怀古》三首和《乙酉积雨纪事一百三十字》，表达了他对亡明的哀悼和对时艰的忧虑。苍雪又有焚笔之举，并题诗《焚笔》四首以纪之，抒发了亡国遗民的万千思绪：“卧榻任教狮睡下，此身堪可寄孤云。”（其一）“谁信落时摇五岳，拔山力尽莫能扛。”（其二）“交友诗朋从此散，不须更作绝笔书。”（其三）第四首为总结，全录于下：

如椽只合付烟炊，尽有摩挲没字碑。
躬自耕来馀破砚，笑看贫到弄无锥。
卓天枵腹成何用，投地封侯尚可为。
耻与尖头收角技，人间今日满羲之。

这组诗歌或隐约或明了，流露了诗人在改朝易代时局中的种种心境：故朝既亡，身同孤云般无所归依的无奈；时世艰危，力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痛苦；知交朋辈，凋零于不同人生选择的惆怅；遁世躬耕，耻为新朝效力的孤傲——在特殊的历史阶段，种种感触齐集诗人笔下，折射出史书所不能显现的历史情怀。在《金陵怀古》这个组诗中，诗人多半用六朝典故来影射时事，但最终还是不能隐忍，在最后一首中明显地表示了对亡朝的哀悼：“石头城下水淙淙，西望江关合抱龙。六代萧条黄叶寺，五更风雨北门钟。凤凰已去台边树，燕子仍飞矶上峰。抔土当年谁敢盗，一朝伐尽孝陵松。”在一些作品中，诗人的自我形象和处境，亦可从字里行间品味出来，如《久寓菩提庵留别若镜净目二友》：“水寒有骨冰三尺，夜落无声雪一林。”《再到罗树园》：“几多世路无容足，暂到园林可当家。”五古《乙酉积雨纪事一百三十字》则详尽地描述了鼎革之际的现实：

积雨涨秋江，白浪高于屋。鱼虾入釜游，鸥鹭借簷宿。孤处塔影浮，远水孤帆矗。田畴白弥漫，菜畦时界绿。腐草化为萤，芽谷重生谷。晚稻扑鼻香，半亦付樵牧。老农望天嗟，抱手坐枵腹。人头尽葫芦，柳发

前来秃。烟花湿难炊，灶妇掉头哭。小儿不解事，犹自索糜肉。无由陟高岗，时或散心目。吴其为沼乎，岂复念今日。相见竖眉横，痛自展书读。

天灾所造成的民生疾苦固然令诗人感到忧心忡忡，但郁积于心头的家国败亡之痛更令诗人无法释怀。

在诗歌艺术上，苍雪深得诗禅三昧。他律绝皆擅而尤在律诗上见功夫，诗歌风格清新自然而豪健浑厚。《梅村诗话》说：“当其得意轩昂，抵掌慷慨，击案自谓生于此证不二法门。禅门学诗，总一参悟。”^① 赵藩更明确地指出了苍雪的学诗之道和诗禅境界：“证到诗禅最上乘。”（《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僧读彻》）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早就走上了诗禅合一的道路。对于诗僧而言，这样的接受可能会更加自觉一些，或说是更加直接一些。事实上，禅宗对古典诗艺的影响是从外到内的，而古典诗歌的意境理论，亦得益于禅宗接受思维的影响，宋代的“以禅喻诗”论即其一端。严羽的《沧浪诗话》阐明，禅机妙悟关键是“不落言筌”，“言在此而意在彼”，离弃文字，直探心源。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诗辨》）在创作过程中，诗禅关系往往表现为心物关系和动静关系。就心物关系而言，诗人把“我”和观照对象融为一体，出之于笔下的艺术形象，蓄蕴着诗人的某种主观心境或精神。我们且看苍雪的创作实践，即可看到吴梅村和赵藩对其诗禅评价的独具只眼。《入林》：“入林不知深，但觉衣裳冷。新绿满空山，低头不见影。”《杂诗》：“天气秋晚晴，坐看西山色。前溪有故人，草深行不得。”在这两首诗中，“我”被消解于万物，万物无不含蕴着“我”的悠远情思，即诗歌由物象组合的画面，无一不是诗人心境的印证。其实，这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无我之境”。苍雪的诗为此提供了又一例证。苍雪的诗亦擅长用以动出静的手法创造意境，如《清秋》：

敝衲初添补，绳床小睡成。
不知微雨过，但觉晚凉生。

^① 《过中峰礼苍公塔》四首其一“诗力健”注，《吴梅村诗集笺注》第294页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风日淡无色，湖山碧近情。
萧萧桐叶上，历历是秋声。

秋天到来的感觉是深微的，而这深微的感觉，通常示人以静穆之感。但诗人偏偏以微雨过后，晚凉暗生，风上桐叶，发出历历秋声等动态来表现，但种种动态传达出来的，是清秋时节那静谧的境界。又如《再至崇川》：“地尽应临海，天寒欲授衣。月随秋水上，人共夜潮归。一犬无聊吠，群鸥自息机。桥头灯火里，犹记旧僧扉。”这首诗描绘秋夜之宁静，但这静不是一片枯寂，而是从月上、潮起、犬吠、灯明等物的动态中渗出。禅中之“静”本来就不是指客观之境或艺术作品中景物的静态，而是指创作主体始终以意中之静来对审美客体进行静默观照，故外部世界的生命气息越是浓郁，就越能显出主体内心的静谧安详。所以，物象饱蓄着动感，意境则呈现为静美。在诗歌意境的具体表现中，这是艺术辩证法的运用，即所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神藏于静，精出于动。”^①在这类诗歌中，直观的画面本来就出于诗人恬淡的心境，高明的诗人即令现身，也不会打破意境的这种静态美，苍雪的《秋夕游山》就是这样一首诗：

手携三尺杖，随步入深松。
水落涧边涧，云含峰外峰。
临桥将见月，近寺忽闻钟。
坐到清凉处，苍烟起万重。

184

诗歌一开篇诗人游山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当中两联描写诗人望中所见，用以动出静的手法，构成画面的互补关系：水落而云驻，山涧幽深，峰重峦叠；月将上而未上，钟鸣山寺，游客惊觉。在这样的情景中，所有的动态都只会让人倍感秋山之静寂，而这恰恰生成于秋山的勃勃生机之中。尾联仍归结到游山者，坐看烟起，物我两忘，诗人意趣的悠长，使诗歌余味绵绵，意境深邃而悠远。

诗禅表现于绝句相对容易，表现于律诗则相对较难，但苍雪恰恰擅长以律诗为此境，故深得“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禛之欣赏。《香祖笔

^① 《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记》(卷二)曰:“七言律联句神韵天然,古人亦不多见。……释读彻‘一夜花开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凑泊。”在《渔洋诗话》(卷上)中王士禛称“近日释子诗,以滇南苍雪为第一”时,再次以此联为例,又加了“乱流落叶声兼下,听彻寒扉不上关”一例,赞扬“皆警句”。这是以苍雪的诗为神韵说的典型例子。够得上称“有神韵”的诗,在王世禛眼中没有几代、亦无几人能够达到。由此可见苍雪诗歌的造诣,特别是诗禅的造诣,确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一般说来,苍雪诗的风格如行云流水,但其豪健雄放处,如同挟了海雨天风,颇有几分李杜之风,其山水诗尤其如此。如《秋夕游黄山》:“鬼斧神工巧断开,嶙峋石壁倚天隈。浪声似欲推天去,潮势真堪挟海来。岭畔晴空飞雨雾,涧中白日走风雷。拟寻大士知何处,独立槃陀最上台。”包括成语的运用,在全篇没有一字难解,没有一句滞涩,而海浪、奇石、天风、潮势却以壮观的形象、磅礴的气势呈现出来。即令在对仗中,苍雪也能做到收放自如:“诗才鹏翼垂天大,酒胆鲸鱼入水深。峭壁与人同卓立,流风到我又狂吟。”这是七律《泊采石矶谒太白祠》中的第二三两联,如果仅以对仗工整和平仄合律考之,那就未免低估了苍雪的才情。意象既新警而语言又不佞屈聱牙,诗风既健爽而摹状又很贴切,要做到这一步,还要兼顾格律诗的特点,这是很不容易的。格律往往使人感到束缚,因束缚而容易流于小气,要既遵此道而又生出大气之感,就不是平庸之辈所能为之的了。苍雪诗中的这类例子很多,即如为王世禛所激赏的“山在月中时出没,花临水际半虚无”(《同大同马吴公达本月夜泛舟入山访赵隐君兼探梅花》)、“水落涧边涧,云含峰外峰”(《秋夕游山》)都如此,不赘。

附:

(一) 钱谦益《中峰苍雪法师塔铭》

清凉一宗,自长水晋源,不绝如线。胜国时,滇南苍山再光瑞师表明《华严玄谈》,辑《会玄记》,开键启鑰,蔚为教宗。万历中,苍雪法师自滇适吴,得法巢、雨,为雪浪之元孙,一灯再焰。人谓滇南万里,邈若天外,两师代兴,交光继照,岂非华严法界中分身接踵,乘愿轮而至者耶?师自号苍雪,又自号南来,非偶然也。师滇省呈贡赵氏子,父

碧潭，为都讲僧，母杨氏。师幼从鸡足山水月道人为沙弥，管书记。年十九，慨然远游，孤筇万里，叩印《楞严》于天衣，受十戒于云棲，受满分戒于古心律师。闻雪浪晚棲望亭，往参焉。浪歿，巢松浸开讲甘露寺，师年廿余，古貌稜然，敝衣下座。除夕，奋笔呈诗，大众惊异。依一雨润于铁山，与汰如河师并为入室弟子。雪浪之后，巢讲雨笔，各擅一长，二师殆兼有之，诸方所谓“巢雨苍汰”者也。师谓《华严》一经，经王法海，非精研疏钞，不能涉其津涯，穷其奥窔，遂与河师住华山，师住中峰，一岁两期，践更周遭，东南法席，于斯为盛。河师首唱一期，顺世而去，师遂独力荷担，讲第二期于华山，讲《问明品》于中峰，讲第四期于慧庆，讲第五期于昭庆，讲第六期于锡山。甲午岁，至第三地，病笃辍座，人或劝其且止，师曰：“我与汰兄炷香发愿，人天鉴知，敢背舍乎？”师于《贤首》、《清凉》诸书，专门讲演，淹通纯熟，大乘经论，如肉贯串，处处同其义味。自大钞外，讲《楞伽》一，讲《楞严》、《唯识》二，讲《法华》及《中》、《百》、《门》三论一。千灯一镜，交互映彻。他宗别子，函矢如，靡不推为鲁灵光也。丙申夏，应见月律师请，讲《楞严》于宝华山，老病人扶，气息支缀，登座开题，圆音落落。至第二卷末，命弟子代讲。无何，遂不起。人谓有护法神冥加，实愿力所持也。病剧，作《解嘲诗》十首，有曰：“如是我闻应未及，奉行信受已先膺。”又曰：“刹竿倒却门前久，大厦将倾赖木叉。”又作《辞世偈》曰：“我不修福，不生天上。亦不作罪，不随地下。还来人间，生死不怕。有一宝珠，欲求善价。别开铺面，娑婆世界。”师之戒地坚，脚跟实，临行正定，如旅还家。视世之过头查舌、问影织空者，岂可同日道哉！师面目刻削，神观凝睇，所至贤士大夫，希风礼足。博涉内外典，赋诗多新警句。住中峰，建殿买田，伽蓝一新。在他人以为能事，师未尝有所作也。示化宝华，实丙申闰五月廿二日，世寿七十。见律师护龕归葬，塔在中峰寺后二百步。嗣法弟子七人，闻照、书佩等为上首，而佩具状谒铭。余老归空门，与师结契尤笃。每执手语余：“魔外昌披，法眼渐灭。”黯然欲泣者久之。尝告其徒：“风雪当门，孤立不懼者，虞山一人而已。”然则师之铭，非予其谁？宜为铭曰：师之南来，启明东庙。烟水无涯，点苍积雪。照耀东南，如涌日车。弹指说法，华严楼阁。重重开遮，悲愍末法。泪如春雨，我何求耶？鸡足之山，有大比丘。守佛袈裟，我勒斯铭。印正法藏，埃彼龙华。（《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六中）

(二) 吴伟业《梅村集》为苍雪而作及与之有关诗歌

1. 《梅村集》卷一

赠苍雪

我闻昆明水，天花散无数。蹑足凌高峰，了了见佛土。法师滇海来，植杖渡湘浦。藤鞋负贝叶，叶叶青莲吐。法航下匡庐，讲室临玄圃。忽闻金焦钟，过江救诸苦。中峰古道场，浮图出平楚。通泉绕阶除，疏岩置廊庑。同学有汰公，两山闻法鼓。天亲偕无著，一朝亡其伍。独游东海上，从者如墙堵。迦文开十诵，广舌演四部。设难何衡阳，答疑刘少府。人我将无同，是非空诸所。即今四海内，道路多豺虎。师于高座上，瓣香祝君父。欲使菩提树，偏荫诸国土。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一履游中原，五岳问诸祖。稽首香花岩，妙义足今古。

2. 《梅村集》卷七

昙阳观访文学博介石兼读苍雪师旧迹有感

先生头白发垂耳，博士无官家万里。讲席漂零笠泽云，乡心断绝昆明水。南来道者为苍公，说经如虎诗如龙。大渡河头洗白足，一枝椰栗栖中峰。与君相见砉然笑，石床对话羈愁空。故园西境接身毒，雪山照耀流沙通。神僧大儒却并出，雕题久矣渐华风。呜呼！铜鼓鸣，庄躄起。青草湖边筑营垒，金马碧鸡帐已矣。人言尧幽囚，或言舜野死，目断苍梧泪不止。吾州城南祠仙子，窈窕丹青映图史。玉棺上天人不见，遗骨千年蜕于此。先生结茅居其傍，归不归兮思故乡。尽道长沙军，已得滇池王。伏波南下开夜郎，乌爨孤城犹屈强，青蛉绝塞终微茫。忽得山中书，苍公早化去。支遁经台树陨花，文翁书屋风飘絮。噫嘻乎！悲哉！香象归何处，杜宇啼偏哀。月明梦落枕榔台。丈夫行年已七十，天涯戎马知何日。点苍青，洱海白，道路虽开亦无及。

3. 《梅村集》卷八

(1) 赠苍雪若镜两师见访

孤云所宿处，清磬出层阴。高座惟斯道，扁舟亦此心。寻秋逢讲树，到海发禅音。月色霜天正，吾师诗思深。

(2) 谢苍雪赠叶染道衣

娑罗多宝叶，煎水衲衣黄。不染非真色，拈来有妙香。足趺僧相满，手绽戒心长。一笠支郎许，安禅向石傍。

4. 《梅村集》卷十

过中峰礼苍公塔

下马支公塔，经声万壑松。影留吟处石，智出定时钟。尚记山中约，谁传海外逢。平生诗力健，翘足在何峰。（其一）

明月心常湛，寒泉性不枯。鸟啼香积散，花落影堂孤。道在宁来去，名高定有无。凄凉看笔冢，遗墨满江湖。（其二）

慧业谁能继，宗风绝可哀。昔时存马廐，近代薄诗才。鹿走谭经苑，鸦飞说法台。空悬竹如意，落日讲堂开。（其三）

故国流沙近，黄金宰堵坡。胡僧眉拄地，梵夹口悬河。传法青莲湧，还家白马驮。他年乘愿到，应认旧山河。（其四）

5. 《梅村集》卷十一

丁亥之秋，王烟客招予西田赏菊，踰月，苍雪师亦至。今年予既卧病，同游者多以事阻，追叙旧约，为之慨然因赋此诗。

露白霜高九月天，匡床卧疾忆西田。黄鸡紫蟹堪携酒，红树青山好放船。杭稻将登农父喜，茱萸遍插故人怜。旧游多病难重省，记别苍公又一年。

6. 《梅村集》卷十二

送文学博以苍公招同住中峰寺

西风驱雁暮云哀，头白冲寒到讲台。莫问间关应路断，偶传消息又兵来。（其一）

一峰对月茅庵在，二老论心石壁开。拣取梅花枝上信，明年移向故园栽。（其二）

7. 《梅村集》卷十三

哭苍雪法师

忆昔穿云到上方，飞泉夹路筍舆忙。孤松半榻霜颠白，清磬一声山叶黄。得道好穷诗正变，观心难遣世兴亡。汰公塔在今同传，无著天亲共影堂。（其一）

说法中峰语句真，沧桑阅尽剩闲身。宗风实处都成教，慧业通来不碍尘。白社老应空世相，青山我自哭诗人。纵教落得江南梦，万树梅花孰比邻。（其二）

四、从俗世到僧侣的担当

明末诗人担当的一生，经历了由俗世到僧侣两重境界，其前期作品《脩园集》和后期作品《槪庵草》在艺术风格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面目全非，而是率真本我这一形象的逐渐凸现。与其文学创作实践相适应，担当的文学观念亦非一成不变，他比较重要的诗禅、形神、复古论发轫于《脩园集》，成熟于《槪庵草》。

担当（1593年~1673年），云南府晋宁州人，俗名唐泰，字大来，法名普荷、通荷，世称担当和尚^①。据担当的《自述》诗^②，其先世为宋代名臣，浙江人，明初徙于滇之晋宁。担当的祖父唐尧官为嘉靖、万历年间著名诗人，嘉靖四十年（1561年）解元，屡赴春试皆落榜，于是绝意仕进。父唐懋德，号十海，以举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入仕，官陕西临洮同知。著有《十海诗集》。母郭氏。弟唐华，字六湛，著有《顶莲集》。

担当的著作，乾隆《晋宁州志》除著录《脩园》、《槪庵》二集之外，又有《担使者合刻》。《滇诗拾遗》卷五担当小传云：“予得其《槪庵草》于李庶常坤，庶常得之倪孝廉隆德。按袁氏《诗略》称其诗七绝尤为擅场，今所得凡五卷，乃无七绝，盖佚矣。除《诗略》已选外，为录八十四首。”《云南丛书》本收有《担当遗诗》，为方树梅先生访得合刻本校删后编次。迄今收录担当作品及生平资料最完备者，为余嘉华、杨开达先生编校的《担当诗文全集》^③。据此，担当诗文生前刻印过的有：1. 《脩园集》七卷，收录担当50岁以前的作品，自署滇中唐大来著。集后有方树梅先生辑录的担当赠徐霞客诗30首，为第八卷，前有李维楨、

① 方树梅《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982页）。

② 《云南丛书》本《滇诗拾遗》卷五，《担当诗文全集》未收录。

③ 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所引担当作品除另注明者外，皆本于此，担当纪年大略参阅所载方树梅《担当年谱》而有所增补，下文不再一一出注版本。

陈继儒、董其昌《序》各一篇。2.《樾庵草》七卷，自署鸡山僧通荷担当著，并标明“自崇祯壬午（1642年）起”。书中有担当的自序和跋，《跋》后标有“通荷时年七十六识”。3.《拈花颂百韵》，署担当和尚著，为门徒广厦记录，前有自序，序末题“康熙癸丑中秋月，八十一僧通荷担当自撰”。4.《罔措斋联语》，署“鸡山僧普荷担当著”，前有担当自撰的题辞。5.序、跋、评论等文章30余篇（则）。以上各项共计2107（则、篇）。诚如校点者所言：此书的特点“首先在于‘全’”，不仅以上四个集子全部录入，还录入了佚诗数十首、佚文30余篇。同时校点者也以审慎的态度说明“全”是相对的：尚有《樾庵草》卷二、卷五缺页的大约8~10首诗未见；担当76~80岁的诗作，除《拈花颂百韵》外亦未见；散见于各地方志或其他文集的诗文、担当在画上的题诗、题句亦未收集完全，只好待日后增补^①。我觉得该书的《附录》亦好，收录了方树梅先生的《担当年谱》及历代诗人咏担当的诗歌、传记、画记，知人论世，对全面研究担当均有参考价值。

担当诗歌对其一生经历的反映并不复杂，如果据其《自述》诗来加以概括，主要有三个阶段，两种光景：“聊此借公车，实纵五岳游”——宦游；“不履长安道，终养可力周”——奉母尽孝；“隐于鸡山岑，足遂缚于滇”——终老禅林。从俗世到僧界，是担当人生的一道分界限，但就其诗歌风格而言，这道分界限并不像文学史上有的作家，如曹植、李后主的前后期作品那样明显。当我们说一个诗人的诗歌艺术时，主要指其现实个性在诗中的表现，也即自我形象，再就是其诗歌的独特风格。

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够表现鲜明的自我形象，担当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却很清晰：世事浮沉，人情冷暖，山吟水啸，嬉笑怒骂，一切都来得那么率真本我，有几分洒脱，有几分狂放，有几分萧疏，有几分沉郁。即令他出家后的作品，也在个性的随意挥洒中，挟带着对时世和人生的种种感慨和深刻体验，因而也就不失其本性。可以说，担当出家前结集的《偃园集》和出家后书写的《樾庵草》，正是其人生两重境界——由俗世到僧侣的写照，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渐浸渐浓，凸现纸上的独立孤介之个性，磊落坦荡之情怀。从《偃园集》到《樾庵草》，我们看到诗人的自我形象犹如乐曲的变奏，在不同的阶段重现，犹如老树经霜，日见

^① 《担当诗文全集后记》，《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50~552页）。

苍劲，却不会看到它被岁月改变得面目全非。

担当是诗家，又工书画。《滇南诗选》（卷二）载其友人浪穹（今洱源）何文蔚之诗二首：《谢担当画》和《担当过访赋赠》。《谢担当画》这样评价担当的画风：“我闻庄子写风手，调调刁刁纸上吼。担当画师墨更奇，散作黑风君见否。扫笔泠然似有声，摧折倒拖一枝柳。”《担当过访赋赠》可说是为担当画像，并兼评其诗歌及成就：

夕阳僧影淡，一笑菊花秋。
老尚多奇癖，狂犹忆壮游。
有心追正始，大胆议名流。
高吐滇云气，同盟主执牛。

何文蔚将担当的个性归结为“淡”、“奇”、“狂”，并将形成的根源推及魏晋，认为这一个性格特点贯穿于担当的一生，确为高论，与其诗画风格也是一致的。魏晋风度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政治中，却内化为中国士大夫的一种独特气质而积淀下来。具有这种气质的文士，固然受其所处时代环境的激发，但也不乏对这一文化传统的认同和感应，担当的情形正是如此。大观楼长联的撰写者、清代名士孙髯翁的《吊担当上人》，总结了担当诗酒风流的人生及其诗、书、画成就：

黑水青天外，苍山古雪边。
儒生而墨者，酒客亦诗仙。
仗锡来鸡足，春花叫杜鹃。
画中三两笔，仿佛义熙年。

“义熙年”为晋安帝（东晋）司马德宗的年号，可见孙髯翁也认为担当在各方面都继承了魏晋风度。赵藩把诗、画、人三者看做一体，全面地评价了担当的个性与风格：

儒衣僧帽无非寄，剩水残山哪是春！
一种荒寒真率意，诗如其画画如人。^①

① 《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僧普荷》。

对于追求真性情的诗人而言，现实中的自我与艺术中的自我，往往是合而为一、难分彼此的。所以，我们不妨先简括担当生平的重要行实，以印证其诗歌中的自我。

（一）俗世：《脩园集》时代的担当

担当的《脩园集》时代开始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前一年唐大来（在这个阶段我们以其在俗的名字称呼之）补博士弟子员，次年随父宦游，时年14岁。这是他在漫游中结交，也在漫游中成长的时期。天启六年（162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34岁的大来由南京赴北京会试^①，落第。他郁愤于“俯就明经役，牖下不可留”，故“聊此借公车，实纵五岳游”（《自述》）。此游他谒见并拜李本宁和董其昌为师，执弟子礼。

李本宁（1547年~?），名维楨，湖北京山人。以博闻强记称名于世，著有《大泌山房集》。《脩园集·赠李本宁先生》曰：“小子负笈来，万里游门墙。愿以读书老，藹然袭馥芳。千秋有吾道，天壤生馨香。”

董其昌（1555年~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属上海）人。《脩园集·董玄宰先生以手迹见贻赋谢》曰：“我在门墙廿余载，未能具体空彷徨。”大来赠李、董二人的诗，都表明了其作为弟子的身份。

这时期大来还拜访过江南名士陈继儒（1558年~1639年）。其人与同郡董其昌齐名，字仲醇，号眉公、麋公。

在这段游历中，江南诸名士为大来的《脩园集》作序，并对其诗的特点及地位作了评价。

李本宁之《序》先追溯了他和大来一家的因缘，并肯定了杨慎、张愈光（含）之后，大来在云南诗坛上的地位。李本宁指出其诗“独能作开元、大历以前人语”，并点出其源为“正始之音”，已透露了大来复古诗风的端倪。他又肯定了大来诗“法古而不袭迹，卑今而不吊诡”的特

^① 明代会试得中者称贡士，别称明经，与唐代取进士的名经科有别。苍雪《南来堂集》有《丙寅白门送唐大来明经应试》，可见担当此行是去应会试。《滇诗拾遗》卷五小传云担当“天启中明经进士”，误。

点，可见《脩园集》时代的担当，已在法古中追求出脱古人。^①

陈继儒之《序》说董其昌欣赏大来的作品以至于爱不释手。“万里论交，遇合亦已奇矣”。他还谈了赏读《脩园集》的体会，并说即令长吉（唐代诗人李贺，字长吉）、玉川（唐代诗人卢仝，自号玉川子）再生，“能惊四筵，岂能惊大来之独坐乎”？李贺以“诗鬼”著称，卢仝诗则以怪奇为特点，由此可见陈继儒对《脩园集》风格的定位。他对大来的评价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真磊落奇男子也！”^②

董其昌之《序》说他结识大来，是在休假回故里时。那时大来应会试之后从京城来江南，以《脩园集》为谒见之礼。“读其诗，温淳典雅”，“有‘四杰’之藻”和“少陵之法”。董其昌嘉许大来为“求之六馆而不得者”，既与中原才子并驱争路，又得当代钜公助其词坛，风光“不减昼绣”^③——换言之即不亚于富贵还乡者。看来董其昌此语还含有慰勉大来

① 李维桢曰：“滇人唐廷俊，举乡书第一，研精古辞赋之业。其子孝廉世修，仕南郡丞，以父所著赋一卷，俾予序，已从南郡移临洮，绝不相闻。今余以事入郡中，有郡丞子大来明经，过余旅舍。谬以余一日长，执门弟子礼，出其囊《脩园集》诗视予。余谓杨用修先生居滇，滇士尸而祝之。所与论诗，则张愈光为最，然先生于唐诗中自成一家，愈光亦不能越其范围。今滇无杨、张两君子为倡，子独能作开元、大历以前人语，清而不薄，婉而不伤，法古而不袭迹，卑今而不吊诡。后来之彦，如子诗典雅温淳，指不数倭也。……中原人士，当有闻正始之音而深嘉属和者，即不悦里耳，何伤乎？”按唐廷俊即担当的祖父、云南著名诗人唐尧官。《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陈继儒曰：“唐大来才名噪滇中，以明经入对大廷，游于吴楚。楚中本宁太史，以及吾乡董宗伯玄宰，脍炙其文不释手。万里论交，遇合亦已奇矣。而大来顾独深沉于诗，赏读其《脩园集》，灵心遁响，丽藻英词，调激而不叫号，思苦而不呻吟，大雅、正始而不入于鬼诗、童谣、俚语、方言之俳陋，即长吉、玉川复生，能惊四筵，岂能惊大来之独坐乎？……大来神用清审，志意贞立，当安奢煽祸，贵竹为梗，大来从岭右间茧足万里，访眉道人于空山。余震惊相劳，苦不得怡，而大来谓吾友天下士，方自此始。真磊落奇男子也！”《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 董其昌曰：“余既奉旨求遗书，事竣还里，而滇中太学唐大来自辇下至，以其诗为贄。读其诗，温淳典雅，不必赋《帝京》而有四杰之藻，不必赋前后《出塞》而有少陵之法。余所求之六馆而不得者，此其人也。……大来颺游万里，观国之光，与中原才子并驱争路，又得代兴之钜公如云杜者助其词坛，不减昼绣。”《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会试无果之义。按“温淳典雅”，冯甦《碑铭》为“温厚典雅”。“六馆”为国子监之别称。

大来这时期的交游中还有一位著名人物，他就是苍雪。大来访苍雪于中峰寺，与其订交并同游虎丘。其后因老母在堂，年老力拙，自己又无兄弟，大来结束了游历，回乡奉养母亲。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大来46岁，这一年他在家乡结识并资助了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徐霞客。查《徐霞客游记》，这一年有不少关于唐大来的记载，如：“唐君为予作《瘞静闻骨记》，三易稿而后成。已乃具酌演优，招杨、赵学博及唐大来、黄沂水昆仲同宴以饯。”“晚向晋宁矣，已而见唐大来寄来行李书画。”“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赈^①焉。大来为余作文书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②赈。”在《徐霞客游记》中还可看到大来与其他省内文士的交往，如：“乃计复为作书，令顾仆往晋宁谢唐君，别方生，并向大来索陶不退书。陶讳珽，有诗翰声，向官于浙。前大来欲为作书，闻其已故，乃止。适寓中有高土官从姚安来，知其犹在，皆虚传如眉公也，故复索书往见之。”按，陶珽是姚安人，号不退，李贽为姚安太守时入其门下。徐霞客对大来还有甚为详尽的记叙，如说唐大来诗、画、书俱得董玄宰（其昌）三昧，他先前曾得到陈继儒的书信，要他到滇时访唐大来并“幸善视之”。在云南徐霞客囊中已罄，难以前进，得到大来资助，感叹道：“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③《脩园集》有《徐霞客足迹游遍天下未已，及入滇犹必穷极西南名胜，许以助之二首》，并收编有唐大来赠徐霞客诗30首，从其《先生以诗见贻赋赠》看，徐霞客亦有诗赠大来。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唐大来声名素著，在省内外朋友的心目中有侠义之风。

《脩园集》时代的唐大来，在诗歌中已经形成了鲜明的自我形象。此集包括他自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14岁至50岁共36年间的作品。

大来作于14岁的《白云谣》，即以有别于一般少年的风格，初显其高远情怀：“天何高兮，白云丽之。崇隆者德，万年戴之。”《春兴八首》

① 赈：音 jìn，指赠送远行之人的路费和礼物。

② 青蚨：传说中的虫子，比喻金钱。

③ 以上引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霞客游记》。

(其三)则宣称：“我辈何多让，人间第一流。有瓢还可弃，怀刺岂堪投？”《侠客行》读之只觉英气勃勃，扑面而来。诗曰：“遇着便倾囊，街头酒一觞。与君相许处，腰下剑生光。”李白的同题诗曰：“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两相比较，大来诗有李白之豪爽。《出门》表现了同样的气魄：“既为男子当自强，挑弧棘矢志四方。我有两足胡不可，何必重嗟川无梁。”在这些诗中，活跃着一个傲视天下，志存高远的诗人自我形象。

《长安写怀》当作于大来入京应试落第之后，但胸襟气度并不因失意而稍显萎顿，反而更显超迈。诗曰：“文章争驾汉，山海直趋燕。忆旧追贤达，知非愧昔年。不为簪组缚，独立藐云天。”心境的转换，有时似乎只在诗人一念之间；昨天的向往，可能会成为今天的敝屣。《偶占》云：“划破小乾坤，湖山任吐吞。自逃麟凤网，不识帝王门。”“丈夫行与止，举足是昆仑。”陈眉公《偃园集序》称大来为“磊落奇男子”，诚哉斯言。《言志》十一首一再表明其逃禄之志：“但守夷门托此生，不劳虚左漫相迎。”(其三)“卜居无策厌求神，所志从来独耐贫。不用犇蹏^①追霹雳，肯将轻翼逐风尘。置鸡岂忍供佳客，赐帛犹堪遣不宾。断以此心常自许，未须妻子更谆谆。”(其四)“谁当应马堪求市，我合为龙正可潜。他日是非无布被，此生事业有鱼盐。”(其五)“不与江河共陆沉，常留砥柱在山林。”(其七)“天下游来一布袍，不乘金马气犹豪。壮图已自抛鸡肋，小嚼何曾想雉膏。水国岁华偏耐冷，山人门第不嫌高。谁馀一纸承明诏，屑屑从今已惮劳。”从这些诗歌看，唐大来似已把功名利禄勘破，然而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仕途淹蹇的事实，那么未免把封建士人的心态看得过于简单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妨把这类表白看做一种精神的自我调节，这样才能理解为何有的士人会在自以为机会到来的时候，做出让后人诟病的事来。即如唐大来在出家之前做出“妄翼沙定洲”的举动，就决非其“振奇好事”的性格所能完全解释，而只能从传统士人无不希望用世这一心态上去找原因（详见下文）。否则我们也同样不能理解，为何李白会在晚年追随永王李璘，以至被流放夜郎。其实诗人也需要不断坚定自己的信念，才能做到“君子固穷”，身当历史的多事之秋更是如此。《自遣六首》曰：“莫逐狂澜去，婆婆老是乡。扞心愁可解，戢翼患难防。衣袖贫犹短，笔锋老更长。肯随人弃掷，一任

① 犇蹏：犇，音 bēn，疾驰。蹏，音 dì，用蹄子踢踏。

我飞扬。”（其一）“有骨难摧折，生涯差自强。”（其三）“自能空大块，何必薄浮云。”（其五）这个组诗显然是《脩园集》的后期作品，意气更张扬，情调也更沉郁了。

《脩园集》时代的唐大来也有闲适的自我形象，如《游盘龙寺》：“花枝催我出郊垌，晓雨东来杖不停。踏石有蹄存马迹，种松无爪作龙形。二千人里几僧榻，四百年来一祖庭。古意寂寥峰缥缈，夕阳收尽影还青。”这里没有一丝激愤之气，古意寂寥，心神悠远。《王昌龄等三诗人诣旗亭赏酒，欲以伶讴为品鹭美之》则表现了大来对盛唐风流的倾慕：“千古风流欲抗衡，拟从歌妓定时名。果然都中红牙选，妙过传胪第一声。”在这首诗里，我们不难看到诗人对科举制度的讽刺。无论是闲散的踏春，还是遥想前辈风流，率真的大来，磊落的大来，都毫不掩饰地把所思所想表现在字里行间，虽然我们今天可以说，有的情趣并不可取。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大来50岁。作《壬午五十生日》。诗曰：“人生宁有几春秋，忽过半百不自由。从此日月但西坠，何处江海非东流。诗书凭谁可尚论，子孙于我无后忧。窃喜腕与年俱老，独让右军岂一筹。”气韵依然豪放，但华年已逝的惆怅不免流露其间。《脩园集》收录作品止于此年，其后是《概庵草》时代。

（二）僧侣：《概庵草》时代的担当

1647年（顺治四年）唐大来55岁，这一年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从无住禅师接受戒律，结茅鸡足山。

关于担当出家的时间，文献有三个纪年可考：

其一，担当自己编定的《概庵草》卷一云：“自崇祯壬午起。”按此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一般认为此集是其出家后之作。笔者认为作者自署的这个时间，不一定是其出家的确切时间。

其二，冯甦《碑铭》载担当逝于癸丑孟冬（康熙十二年，1673年），并说“僧腊三十有七”。据此则担当出家在崇祯九年（1636年），这显然过早。

其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遗民之逃禅》认为，冯氏塔铭的“三十七”乃“二十七”之误，遂定担当出家之年为顺治四年（1647年）。笔者赞同此说，下面申述理由：

陈垣锁定的担当出家时间切合他逃禅的情况。诸多记载无论对担当

出家的时间有无明确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其出家的原因是忧于中原变乱。中原变乱即明、大顺、清鼎革之际，若说担当出家早于此，理由不足。其《自述》诗也说：“母跻八十一，坐脱返自然。余欲续旧盟，时事纷多端。”“旧盟”指担当当年游江南时，在会稽显圣寺受戒于湛然云门禅师而未落发为僧，此时道路不靖，难践前约。所以《自述》接着说：“虽有尚平志，其如杖难前。回首念垂白，益复增怅焉。五女无一子，似续徒潜潜。发愤出火宅，剃染事竺乾。干戈日未靖，余志日益寒。隐于鸡山岑，足遂缚于滇。”可见，担当出家，还不只是忧心时局变化，其中也有对无子的失望。“火宅”是佛家比喻红尘的用语。从诗意看担当并未立即出家，而是观望了一段时间的。再者，史载担当全家三百多口人被杀，未尝不与其助沙定洲为虐有关。陈垣锁定的担当出家时间，与《明季南略》所载担当为沙定洲主谋之事吻合。《明季南略》卷十七《孙李构隙始末》载：“沙定洲据云南，请乡宦大学士王锡袞相见，王不屈。贡生唐泰为沙定洲谋主，劝定洲杀王，并杀诸乡绅，云南大乱。”^①沙定洲乱云南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至四年（1647年）。赵藩已看到这一点，并在《鷓巢识小录》中引证了《明季南略》的这段记载，而后进一步论证说：“后人记担师事皆讳之。余以为崇祯之末，中原鼎沸，烈皇殉国，而滇亦伏莽蠢动，沐天波庸沓，任奸罔利，政令不行。担公振奇好事，妄翼沙定洲者，倚其兵力，或能代沐氏以扶明社，而不知沙非其人也。流寇旋入滇，沙败走，死。担师逃之鸡足山，逡巡数年，始剃发为僧。盖明祚之后，既已绝望，乃遂空门一往，歌哭兴亡，晚节皎然，不欺其志。君子观过知人，原其心正，不必讳其事也。”赵藩所言合乎情理，担当此事其他史籍虽未见载，亦不能以孤证轻易否决之。一般来说孤证不成立，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从史料来源看，《明季南略》的著者计六奇曾遍访实查于滇南，这条记载得之于当时亲历者的口述。他在该文后特别注明：“此云南鹤庆闻图轸所述，虽不雅劲，而叙事颇觉详明。”如果说这样的记载尚不可信，那么司马迁《史记》中这类口头采访的记载，就统统都失去了历史价值和意义。但人们的认识正相反，认为这恰恰是《史记》成为信史的原因之一。还是赵藩说得对，“不必讳其事也”。至于担当在自己编定的《樾庵草》卷一云是集录诗“自崇祯壬午起”，不足以为其出家日期之证，除了上述理由外，诗人自己对此讳莫如深，也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4页）。

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计六奇（1622年~?），字用宾，江苏无锡人。他一生困顿，然而作为明朝遗民富有民族情感，执教私塾之余，留心明朝史事，撰成《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两部史著。《明季南略》十六卷，记事上起南明弘光元年（1644年）五月福王政权成立于南京时，下迄清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病死于福建时，记载了南明福王、鲁王、唐王、桂王政权之时事大略，故名《明季南略》。作者自谓“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二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既可独立成编而又前后衔接，是姊妹篇。“二略”撰写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至八年，后来又经过长期润饰补订，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左右才最后定稿。“二略”不仅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具有见闻真实的特点，而且撰写者还参考了《通纪》、《野乘》、《遗闻》、《甲乙史》、《国难录》、《幸存录》、《粤事记》等著述，摘录了邸抄、抄白、京抄、京报、讨逆单、北来单等，并实地走访，搜集了许多口碑资料入书。这样，就使“二略”保存了明清鼎革时期十分丰富的史料，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极有参考价值。计六奇在《明季北略自序》中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编撰目的，在于记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总结明朝覆亡的经验教训。因此，书中还保存了大量有关明末农民起义与抗清斗争的史料，对清兵征伐时的残暴行径多有揭露，对至死不屈的抗清志士大力表彰。“二略”大体按年记事，但又与传统的编年体史书不尽相同。两书皆编年不编目，而每事又各标事目，还往往夹杂有关人物的传记、章奏和诗文，以及一些虽与时政无关，而作者认为值得记录的人和事。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记载失实、言过其辞的情况和较为浓厚的天命观思想。然而瑕不掩瑜，其价值是为人公认的^①。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担当卒，享年81岁。担当这年孟冬逝于点苍山写韵楼，诸传所载大抵无异。陈佐才诗曰：“吊我忘年友，老死在山间。”^②这“山间”与写韵楼应无歧义。关于担当的终年岁数，王士禛所撰《居易录》（卷二十二）有一条异文，备录于下：“感通寺在府南十里点苍山麓，摩腾竺法兰建。杨升庵先生寓止寺前之小阁，题曰写韵

① 本段摘编汤勤福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374页）。

② 《担当诗文全集·附录》陈佐才《清明过榆关至班山吊担当老和尚便道过榆城》。

楼。四壁皆公墨妙，启窗则鸡足雪山横亘云表。明末滇诗人唐泰大来薤染，号担当和尚，亦寓此楼。寿九十余而化。”“寿九十余”可能是山川阻隔，信息不畅而误传。

《樵庵草》时代的担当自我形象，多了几分沉郁，有时甚至是愤激。陈佐才《暮春日至班山为担当老和尚扫塔并阅所刊诗集》曰：“惟徐黑黑篇中字，知是先生白白心。”滇云诗人以形象的比喻，道出了对这时期的担当之深刻理解，也印证了担当一贯的率真个性。

逃禅的担当对儿女情可以释怀了，他说：“但有牵缠皆可离，何必常挥儿女涕。”对人生的得失宠辱，他也能更为洒脱地对待：“佩纫蕙兰衣薜荔，如今宠辱不足奇。”（《释怀》）如果说往昔曾有过建功立业的理想，那么这一切在《感怀八首》一类诗中，都被担当随意挥洒，更为彻底地化作了超迈豪情：“昔时台阁多晴色，今日乾坤一醉乡。”（其一）“懦夫不愧乘羸马，王佐何妨隐卧龙。”（其七）“吾侪有志恁峻岫，天地峥嵘在此身。金紫消沉嗟物采，布衣宽缓混风尘。冯欢何必弹双铗，韩信真能屈一臣。自是丈夫多远略，不游伊洛便西秦。”（其八）担当的这类情怀，其实还带有许多凡尘意气，而非禅家的四大皆空。青壮年时代唐泰的孤傲，多半来自传统士人的风骨，而老来勘破世情的担当，其孤傲却来自与命运的抗争：“偏与时违聊复尔，不随人转亦何妨。”“尺短寸长忘计较，昨非今是少商量。”“蝴蝶梦回心已冷，蕙兰佩断手犹香。为耽小歇抛愁垒，愧把浮名系热肠。”（《老来》）就连《雨蕉》这样的小诗，也能让人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挣扎：“老去多春梦，尘情苦未消。怪来连夜雨，只是打芭蕉。”然而不变的侠骨，在这时期的诗中依然明显可感：“羨君豪气送君行，倒海风来不必惊。海浪即能吞日魄，蛟龙无胆啮田横。”（《送侠友》）诗人对名利的唾弃也更为彻底了：“枕破孤峰我独尊，千旌空自到衡门。名缰只好绳羸蹇，禄饵焉能钓大鯤。”（《代隐者辞聘二首》其一）这是为人代拟呢，还是诗人自画？读者不难得出答案。这时期担当的友道也是奇倔的：“天地感二至，丈夫以声气。声气苟不乖，投好宛相契。闭户同造车，出门无异辙。”（《万耜庵》）世人营营苟苟，相交以利，而诗人的交友之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偶占》以恢谐的笔调，向世人宣告自己决不向世俗屈服的狂狷个性，这时诗人已进入古稀之年：“春来无日不狂游，折得名花插满头。一自为僧天放我，而今七十尚风流。”诗人的一篇《自赞》文，很清晰地表现了《樵庵草》时代诗人狂放不羁的自我形象：

担当老，担当老！足健而跛，目健而眇。口似箝弓，手如鹰爪。须弥非大，芥子非小。好则也好，了则未了。法席掀翻，禅床推倒。且在粪堆里打眠，漆桶中洗澡。遇富贵若避冤仇，见烟霞如获至宝。本来面目，有甚奇巧！莫与人知须悄悄。渴来时茶一瓯，饿来时饭一饱。不担不得，担之不甚草草。漫言结社参禅，且学敲门贾岛。

对《橛庵草》时代的担当个性，有人用“云中一鹤”来形容。唐南溪（曷）曰：“应从书画悟禅机，心印传家妙入微。跳出昆明劫灰后，云中一鹤独高飞。”诗下小注云：“明钱公士晋抚滇，称担公为‘云中一鹤。’”^①按方树梅《担当年谱》之“崇祯六年”纪：“巡抚钱士晋额旌：‘云中一鹤。’”而其他人亦曰：“非仙非佛世莫测，说书说剑谁为俦。”^②“云中一鹤”不是俗世的闲适，而是精神的放逸不羁。这个比喻说中了暮年担当的一个侧面，却不完全。实际上现实中的担当及其诗中的自我形象，始终未能脱尽疏狂之气而彻底归于恬谈，这正是其诗始终有激情的重要原因。

（三）担当的文学观及其创作实践

从《脩园集》到《橛庵草》，担当不变的是在诗中表现自我形象，改变的是人间世路，在人生阅历加深的同时，其文学观也在发展变化，与诗歌艺术的日臻成熟相互呼应。担当是诗人，同时也是艺术理论家。他的诗画理论在《脩园集》中已有表述，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见解上看，显然都成熟于《橛庵草》时代。在担当的诗歌理论中，比较重要的是诗禅论、形神论、复古论，并且他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思考上，而是实践于诗歌创作中。所以他的理论与他的艺术风格之表现，一向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忽视他的艺术理论，就不能透视他的艺术风格。

先说诗禅论。《担当诗文全集·附录》有太和杨有孚（暉吉）的

① 《默斋先生论诗溯及先池南副史担当和尚暨药州大尹皆曷远祖诸父行也因拈绝句十二首奉柬钞二》，《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

② 《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担当向予索大来画甚殷赋以寄阅》，其诗曰：

担当尘脱四十年，迫欲一见大来画。
大来墨泼潇湘间，担当目空岱华外。
不著笔处是担当，大来着笔终狡狴。
本来面目无我看，是一是二真潇洒。

这首诗意味深长，虽为画论，但未必不可作为诗论来读。诚如宋代山水画家郭熙所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林泉高致·画意》），担当既是诗家也是画家，创作中对此有很到位的把握。陈佐才称担当书画“山色自从诗里看，水声时向画中闻”，亦抓住了其诗画一体的创作特点^①。笔者试对杨有孚的这首诗略加阐释：从首联看，担当晚年曾向朋友们索要其早年的画作，这时的担当和早年的大来虽为一人，实际上已同而不同了。担当和大来之不同，在于大来有迹可寻，而担当已经脱迹而去。即担当已进入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而大来落笔虽兴会神到，却还在山水之间；担当和大来之同，则表现为无论是大来还是担当，都追求物我为一的极致，所以总体上浑无挂碍，潇洒自如。其实说白了，这也就是中国古典诗画艺术中的“禅趣”境界。关于此，我们在对苍雪诗的分析中已论述过，若与担当相比较，和苍雪的典雅含蓄不同，担当诗以直白如话的语言，表现出别样意趣。而这，不仅有异于苍雪，也有异于诗歌史上其他以诗禅著称的诗人，如盛唐的王维。再者，和苍雪不同，担当对诗歌通禅的理解，不仅有较深的理论研究，而且表现于其文学实践。

担当在《樾庵草·风响集序》中对诗禅问题提出了切实的看法。他首先区分了诗与禅的不同在于，如果二者“皆以偈颂为能事”，“但知禅而不知诗者，难与言诗，虽文亦然”。那什么是诗禅呢？他说：“诗文而通禅，不过镜花水月，在若有若无之间，非是句句不离僧相之谓诗文。”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诗文通禅，不能误以为是学其形式，而要重视营造产生联想的艺术空间，把握离形得似的道理。这样就能“说偈颂而无偈颂气”，“说理事而不为理所障”。诗禅如何相通？这是宋以来诗坛论辩之大端，担当对这个问题的阐释亦可谓简单明了。《樾庵草·诗禅篇》

^① 《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页）。

与《风响集序》可以互为印证。诗曰：

太白子美皆俗子，知有神仙佛不齿。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从此作诗莫草草，老僧要把诗魔扫。那怕眼枯须皓皓，一生操觚壮而老。不知活句非至宝，吁嗟至宝声韵长。洪钟扣罢犹泱泱，君不见，严沧浪。

显然，在担当看来超以象外、超以文字之外便是禅，亦便是诗，离此作诗即是“诗魔”，亦是“理障”。《为香雪作画》对此有更为明确的阐释：“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不及一日千里，在超超物表者，索我于笔墨之外也。”《题画四首》又说：“过人邱壑总难登，应接还须策短藤。三昧在于无墨处，不须画里觅痴僧。”超以物象之表，存于笔墨之外，正是艺术思维要求创作主体呈现于诗画的特点。它要求人们重视艺术形象本身具有的兴发和动人情怀的作用，创作始于触景感物，生发于主体情志，形成于创造意象、意境，最终达到抒情写意的目的，传神入化的境界。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表和文字，则只能得其形似而不能入化。不能入化，则不能进入艺术的审美极致。中国古典艺术思维理论既发轫于庄子，亦得助于禅宗，最终汇聚于意境，举凡有所创造的诗画家无不追求之，这也是诗禅相通的缘由。担当的诗禅论，无疑是对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论的发展。

探究担当对诗禅的理解，我们不妨将其题画诗中颇有价值的形神论联系起来。《题画》云：“世人写山川，汨汨化工死。只欲肖形似，支离画之理。阿谁著此笔，形似焉可拟。”他认为，写山川如果只求形似，则失其化工，那必然不能超于物表而得其神。反之，胸怀虚淡，则能“宛在无极前，古意生片纸”，艺术意境也就产生了。所以，“于兹忘形似，幽趣自翩翩。”（《题无方画》）。《题高秋甫画》云：“此翁未入蜀而得山之险，未游粤而得石之奇。将谓师前代，前代无此师。将谓师己意，己意焉能为。吁嗟万古化工一块墨，若无作者不淋漓。淋漓若于化工等，鸟啼花落总顽痴。惟是用墨不用墨，顾陆三昧在于斯。”担当再三提到“化工”，即一再强调成功的作品，应求神韵笔墨之外，超乎物表之上，离形似而传其神。

担当的诗歌创作为其理论之实践。清顺治七年（1650年），58岁的

担当作《三驼图》并题诗云：“伯驼仲驼与叔驼，三个驼驼集一窝。偶然相逢抚掌笑，直人何少曲人多。”80岁时他又作《三驼图》，署“八十翁担当老人”，其题画诗云：“叔瘞仲瘞与季瘞，三个瘞瘞是一窝。偶然相逢抚掌笑，直人何少曲人多！”这年再作《绘释图》，署“八十翁普荷”，题识曰：“这三大士，同口出气。一串穿来，心心相遇。佛在心头，不来不去。入四空天，出人间世。因果无差，在人有志。念佛为先，参禅犹次。我乃佛茅，代佛授记。在家出家，如是如是。”在这几首诗里，佛理、事理得到透彻的解析，而“三个驼驼”、“三个瘞瘞”、“三大士”不过为其“物表”而已。可见要能够寓理于其中，索我于笔墨之外，则“说理事而不为理所障”，也就达到了“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的境界。

我们同时看到，担当诗歌的上述艺术效果，与他的诗歌语言之俚俗有关。这一风格是《脩园集》时期就形成的，只要从中略举一二例，即可见其一斑。《题曝背图》：“野老推诚想至尊，欲将一曝答深恩。谁知天下多寒色，日照山龙未必温。”《题画八首》：“世事茫然谁不然，渔人三两笑喧天。风波都付马上去，平稳无如此破船。”（其七）这两首诗总体上比较文雅，不似后期题画诗那样俚俗化。不过《樾庵草》中也有《题试茶图》这样介乎雅俗之间的作品：“不去花前学举觞，必先谷雨采旗枪。世人慎勿轻茶童，万事无如水味长。”从担当的诗歌可知，诗禅并不总是表现为神韵或空灵之格，它也可以是直白俚俗的，这只是诗人不同风格的呈现而已。有时，诗体的选择也会影响到诗人的表现艺术，如担当以绝句为体的写景诗中，就有不少空灵之作。《听三塔寺钟同友人赋》以深远的情思，表现了绝句尺幅万里的韵致：“拨开古雪又相逢，携手同登十九峰。可奈峰多愁不减，廿年心事一声钟。”踏千年积雪再次观览奇峰，本已不胜惆怅，远方塔寺传来的“一声钟”，把意境推向悠远绵延，禅趣就这样渗透于看似无心的艺术技巧之中。《滇曲》以同样的特点取胜：“界入南滇迥不同，一年天气半西风。杜鹃声里春犹浅，吹遍人家落叶红。”诗人点染西风落叶，拈来杜鹃啼春，“南滇”气候之“迥不同”自然显现，此所谓“皆神到不可凑泊”者。《天生桥倚怪石，激水成珠，须瓣宛然，昔有人题为不谢梅，因赋》空灵有味：“寻春莫问路高低，根蒂从来不染泥。寄语浩然休浪踏，荡舟轻稳过驴蹄。”此梅非梅而似梅，一着痕迹，即离神韵甚远，担当此作妙在得天趣。

除了诗禅问题和形神问题，在担当的文学思想中，复古论也占有明

显的地位。

《脩园集》中的《子夜歌二十首有引》流露了担当以复古为宗旨的思想端倪。他说：“余为乐府，其《子夜歌》最多者，非侈于情词也。若以侈情而为一家言，不过拾香奁诗余之残唾已耳，于泱泱大雅何称焉？”以南朝“侈情”的《子夜歌》推求与大雅相称之旨，担当可谓别出心裁。然而体式和一般复古论者或许殊途，复古的宗旨却已表明。所以担当接着感慨近代诗人“饶工近体，薄古体”，“专以尖新隐僻，诘屈聱牙靡然相向，藐何、李为旧物，耻七子为叫号”。其结果，自然是“究其温厚之旨，谁不茫然”。就复古而论，担当心仪的偶像是前七子的领袖“李何”。他引述何景明的观点即以《雅》、《颂》，以所谓“性情之正”为旨归，而摒弃“今之朝学呻吟，而暮建旗鼓者”。实际上，何景明和李梦阳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在复古理论方面都有所不同。相对而言，李梦阳更多地接受了汉魏乐府的影响，而何景明则更多地学习唐代歌行和近体诗。如果说李梦阳的诗论偏重于汉魏乐府，那么何景明则在崇尚乐府的同时，也强调学习“初唐四杰”的词藻富丽，音节可歌。但以推崇汉魏盛唐为其复古主张的立足点，李、何二人殊途同归，并没有太大的分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担当以何景明为典型，与其批评时人“饶工近体，薄古体”并不矛盾。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不妨说担当在这篇小引中所表达的文学复古思想，与李、何还是有所不同的：李、何以汉魏盛唐为旗帜，担当则不重近体也即不重盛唐。关于担当的复古，李维桢（本宁）在《脩园集序》中说：“先生（按杨慎）于唐诗中自成一家，愈光（按张含）亦不能越其范围。今滇无杨、张两君子为倡，子独能作开元、大历以前人语。”李维桢认为担当的复古范围在汉魏而不在盛唐。

在《概庵草序》、《陈翼叔宁瘦居集序》、《风响集序》等文章中，担当集中表述了他的复古诗学观。我们看到，产生于《脩园集》时期的文学复古思想，在《概庵草》时期得到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这一方面是因为担当文学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古思潮，在明末一度兴起之影响。《概庵草序》是担当自序，尤为值得注意。我们不妨以此序为基础，分析担当后期文学观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有两点最重要，分述于下：

其一，以复古为宗旨则诗存。《概庵草序》开篇即说：“诗以代言，重复古也。”担当认为，诗歌关乎世运，如果诗歌流而趋下，那么复古就成为要务了。诗至明代而“尚带宋元习气。至何、李崛起，大雅正始，

复还旧观，至七子而再盛”。但解人不易得，排击七子者以庾（信）、鲍（照）和近体为号召，使人易就，但天下风靡从之则诗亡。其间虽有唐（顺之）、陈（子龙）二老起衰振雄，力挽狂澜，风气“还醇”虽有几分指望，但有几人知道其中的意义呢？

其二，复古的途径在哪里？担当认为，诗人要“培养元气之思，重加塗埴”。他说要成为“解人”并“还醇”大雅、正始之旧观，就必须要有学养，“养”者非他，是重视大雅、正始。而“明季作家，大率重才轻养，犹学仙者知有还丹而不言火候，自误误人，非小，可不慎哉”！重才轻养，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自误误人。如果“舍大雅、正始谓不得不流而趋下”，那么世运是无从说起的。由此担当总结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宗旨，他说：“惟是匡扶运会，大丈夫皆有其责。聊就我所学，就我一家言。”诗人自选《榭庵草》，除去年来患难焚溺者之外，又除去有类偈颂者、有类香奁诗余者、有悲歌慷慨触时忌者，“不啻十去其九矣”。担当自序说此集为其年逾七十而编，又说自己的取舍标准“无他，专为复古计矣”。且不论担当是否删削尽了“悲歌慷慨触时忌者”，可以想见，晚年认为已经自立门户的担当，以恢大雅、正始之音，更确切地说，是以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其衡量是否成就一家之言的标准。在《陈翼叔宁廋居集序》中担当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并提出了“惟诗必由天授”的观点。何为天授？他认为首要标准是“无心而成”，即如“三百篇”那样不做作。“若夫捻须而得，费尽推敲，只顾新人耳目，不存大雅于将来，近日之诗是也。”这无疑表明了其复古宗旨根源之所在。“天授”的第二标准是“侠以气胜，不事穿凿，自成一家之言”，如陈佐才的诗。具体说就是“声韵谐，情景相协；思路正，纤巧不施”。这一点虽然仍离不开恢复大雅、正始的宗旨，但“自成一家之言”，表明了担当的复古理论是以创新为旨归的。担当的复古理论与明代前后七子同而不同，其诗歌之所以能够自成一家，正是他有益地汲取了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并进一步努力发展的结果。

从《儵园集》到《榭庵草》，现实中的担当、诗中的自我形象、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观，这几者之间呈现的清晰联系，既表明了担当做人 与作诗的一致性，也表明了担当的文学成就和文学观，是在其人生体验和创作实践的发展变化中完成的。而这，正是一代文学名家产生的基础。

（四）担当和苍雪诗之比较

担当和苍雪都是明代云南成就较高的诗人，因此我们不妨把他们的

诗风加以比较。《滇诗拾遗》评点云：“苍公诗自在流行，与担当诗境界各别。”^①“苍公涵养性灵，故其诗活泼；担公带气负性，故其诗生峭。二公殊诣如此。”^②这是以个性论诗，符合文学创作中主体与客体对应关系的一般规律。这种差别的形成，从诗人的个性看，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担当为僧前曾继承家族传统而奉儒笃学，又走过科举之路，有用世之心。其二，担当之出家实为乱世和无子所致，情有所不得已，故其作品始终免不了一抹气性。对于苍雪而言，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所以就总体而言，担当的诗歌使气任性，风格豪放奇峭，苍雪的诗歌则含蓄内敛，风格典雅清奇。下面以他们的同题诗为例略加比较。

雁荡山的大小龙湫，古往今来都是诗人笔下的胜景，苍雪和担当都曾以此为题材，描绘过这一奇观。录如下：

君不见，大龙湫、小龙湫，瀑布水从天上流。倒白翻青看不足，烟飞雾卷寒飕飕。风来一截藕丝断，映日纷纷五色线。长空忽作吼雷声，大点雨珠打人面。我欲穷源不可得，凉风踈踈生两腋。耸身直上青云端，长啸一声天地裂。（《苍雪和尚南来堂集》卷一《瀑布》）

曾闻雁荡真奇哉，有瀑飘从天上来。既非木虬翻雪雹，亦非铁马走风雷。大抵也是倾银河，小雨霏微舞弱波。昔有一老观不足，一生在此空摩挲。我来绝倒未半响，竖起强项能高仰。细者喷珠大辊球，袅娜轻盈几千丈。缕烟串雾缓相抛，败絮残棉乱未纺。依稀霖霖散成霞，约略缥缈飘作幌。果然侧耳不闻响，潇潇洒洒骨俱爽。君不见，柔沫牵来无断痕，我身欲化为冰魂。少焉辄欲生头角，一股倾湫还倒岳。不须霹雳能上天，聊在人间蜕个壳。（《脩园集·雁荡瀑布》）

苍雪的这首诗以凝炼的语言，自出心裁地表现了瀑布的形象。如果说从开篇的概括性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李白的影子，那么对具体观感的描写，就可以看到苍雪表现客观事物的功力了：“倒白翻青”不仅仅是单纯的色彩感觉，而妙在写出了瀑布的飞腾之态，“烟飞雾卷”的气势也很自然地渲泻于纸上。与此相映衬的是瀑布在风中如藕丝，映日时彩线缤

① 《云南丛书》本《滇诗拾遗》卷五苍雪《瀑布》评。

② 《云南丛书》本《滇诗拾遗》卷五担当《嗟哉行》评。

纷的另一番柔美景致。两般美感的交错和呈现，完成得如同行云流水般自然。这样的艺术效果，纯客观的描摹不可能达到，而诗意的想象，必然来自诗人对美的感悟和表现能力。担当这首诗笔意恣纵，气势磅礴，意象在奇崛中透出飘逸，语言在俚俗中带着清雅。两位诗人开篇都使用了瀑布自天而来的意象，但苍雪以描叙起，担当以感叹出，一“流”一“飘”，起势已然有所不同。在接下来的描写中，虽然担当也采用了大小、刚柔意象对比交错的手法，但笔力显得比苍雪更为浑厚朴拙。比如，苍雪的“长空吼雷”到了担当的笔下，就是“铁马走风雷”；苍雪的“烟飞雾卷”到了担当的笔下，就如同“败絮残棉乱未纺”。二诗在结穴处，皆以诗人的自我形象与瀑布对应，但苍雪虽然想象飞身云端，意象却是人间化的，而担当的想象虽落人间，意象却更为浪漫神奇。凡此种种，多为二人含涵性灵和使气任性的不同个性所致。

再以普陀山为例，苍雪和担当有同题诗《普陀山》，苍雪的为律诗，担当的为古风。苍雪这首风格自然雄浑：“鬼斧神功巧断开，嶙峋石壁倚天隈。浪声似欲推天去，潮势真堪挟海来。岭畔晴空飞雨雾，涧中白日走风雷。拟寻大士知何处，独立槃陀最上台。”显然，苍雪诗的气势被镕铸于工整的格律之中，而担当的古风则如走马奔雷，虎虎生风：“不见沧海才有天，一见沧海便茫然。等闲只说天包海，天在海中如浮块。”“雨如天漏失其乡，雷如天怒吼中央。一任魂飞与胆慄，舟师叫骇无主张。东西南北俱掣电，纵有前荷那得见。忽而澎湃忽砢砢，纵横混许鱼龙战。风止微茫通一线，回舟转舵疾如箭。”

虽然以一二首诗来诠释苍雪和担当诗歌风格的不同未必恰当，但不妨在参照中感悟两位著名诗僧的个性特点。

担当继承和发展了其祖父唐尧官以来的家传诗学，取得了比唐尧官更大的成就。晋宁唐氏还有一人值得一提，即担当的外甥朱昂。朱昂字子眉，著有《借庵诗草》。《滇文丛录》小转载其工诗而善画山水，以布衣终身，靠卖画自给。孙髯翁《海光寺记》说朱昂本名源，字禹游，是担当的外甥。阖门百余口俱遭寇难，担当携至鸡山，从学诗画，释名把茅。还俗后名昂。《滇南诗略》载其诗60首，张履程曰：“古体高视阔步，出《选》入唐；近体气格苍浑，音韵沉雄。”江濬源则说：“性情神韵，皆得杜之宗旨，自然清新，又兼王孟之胜，子眉真是大家。”

附：

1. 担当《自述》^①：

我祖质肃公，曾为宋名臣。垂老乞骸归，家于浙之濬。题标友恭里，历代产哲人。明初徙滇晋，祖训儒术真。本支世相衍，世膺美丝纶。迨杀忝无似，性僻喜素修。尚论慕隐沦，欲为执鞭谋。勉黽事纸笔，横襟在千秋。俯就明经役，牖下不可留。聊此借公车，实纵五岳游。为不霑一命，遍将名胜搜。交游极环宇，咏歌满沧州。放浪莫知返，常遗高堂忧。嗟余鲜兄弟，定省无与俦。及归牵母衣，每闻筮仕愁。慷慨呈公具，厕向当事投。愿学古沉冥，永以布衣休。不履长安道，终养可力周。母跻八十一，坐脱返自然。余欲续旧盟，时事纷多端。虽有尚平志，其如杖难前。回首念垂白，益复增怅焉。五女无一子，似续徒潸潸。发愤出火宅，剃染事竺乾。干戈日未靖，余志日益寒。隐于鸡山岑，足遂缚于滇。因览一大藏，不啻“三百篇”。山川容我老，吟弄年复年。欲焚焚不尽，耻为木石愆。谁知秋蝉鸣，响在声之先。有耳听莫解，不诬为骚禅。老夫一悠哉，忽复归浑元。

2. 方树梅《担当年谱序》^②

担当大师，晋宁唐氏儒家子，名士、侠僧、大诗家、大书画家，昔人金称之。以其为名士侠僧而诗书画三绝，海宇驰誉，金碧有光矣。余为师乡后学，景仰其为人。夙昔搜其生平行实，薄有所得。壬辰季夏迄仲秋，就师卓卓可传者，谱之以质国人。师之诗学得力于其祖五龙山人，志在复古，薄袁、谭之伪体，祧汉、唐之正宗。身丁阳九，感慨悲歌，隐轸凄恻，时时流露于楮墨间，无僧诗蔬笋气，新奇而不险怪。《关山月》乐府有云：“欲报朝廷甘自弃，女流饶有丈夫气。若得挥戈建大功，妾愿居孀尔尽瘁。”从古诗人，靡不以从军为苦，而师遁入穿门，于三百年前，有今世从军爱国思想，妇人以其夫战死为荣。作斯壮语，以勸征夫。此师之可传者一。有明书家，以玄宰首屈一指，究不能脱台阁之气，师虽出其门下，运笔清挺，含意超逸，以玄宰之风格，得羲、献之神味，青出于蓝，雅有山林隐逸趣。此之可传者二。师之画一山一水，一树一石，以胸中之丘壑，写笔底之沧桑。自题画诗：“尚留一干坚如铁，画里

① 《云南丛书》本《滇诗拾遗》卷五，《担当诗文集》失收。

② 《担当诗文集》附录四，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8 ~ 589 页）。

何人识董狐？三昧寄于无墨处，不须画里觅痴僧。”“陵谷虽无前日影，老僧只点旧时苔。”自道其苦衷。钱芷汀谓“有感之无声诗”。赵石禅老人评师画云：“兴象自然，旨与物化。”又云：“纯任自然，不泥成法。超以象外，空色两忘。他人无此识，亦无此胆。”可谓担师知己。此师之可传者三。师之诗书画造诣如是优越，是以特表而出之。至其出处志尚，余就所见所知者，按年胪列，纬以当时大事，以为知人论事之助。览者消其简陋奚辞焉。

五、陈佐才等诗人的风骨

陈佐才和陆天麟，是鼎革之际云南遗民的代表作家。他们和流寓外地的昆明诗人高应雷、呈贡诗人文祖尧一样，在明王朝覆灭后，用诗歌表现了这个特殊时代的生存状态和爱国心声。“雨泣风号，常为吊客”——陈佐才《自挽诗》中的诗句，道出了这时期文士的普遍心态。遗民诗人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困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他们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表现的风骨，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发扬，有其不应抹杀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陈佐才，字翼叔，蒙化（今巍山）人，生于1627年，卒于1697年^①。所著有《宁瘦居集》、《宁瘦居续集》、《叫天集》、《是何庵集》、《石棺集》，编为《陈翼叔诗集》，收入《云南丛书》本。民国34年（1945年）刊印过《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不分卷。

陈佐才与担当交情甚笃，担当曾为其校刊《宁瘦居续集》并作《序》，他则有《题担当和尚画》，表达了对担当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倾心欣赏。诗曰：“信手能传诗外意，阅来瘦骨也清凉。昔游山水知多少，不及先生纸半张。”担当的作品诗有画外音，画传诗外情，诗画风格一致，陈佐才不愧为其友人，评价精当。

陈佐才曾做过黔国公沐天波部下的把总，一个职位极低的基层军官，但他以忠臣、遗民自励，在明亡后不仕，与同邑於迁、於暹和晋宁担当往来。为表示其风骨，南明亡后他凿石为棺，镌《自挽诗》于其上。诗

^① 张秉祥《陈翼叔的生卒年》，《昆明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曰：“明末孤臣，死不改性。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① 这首诗直抒胸臆，风格悲壮，集中表现了鼎革之际忠臣义士对气节的秉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陈佐才诗歌的代表作。

像《自挽诗》这样直抒胸臆的作品，在陈佐才笔下有很多。这是压抑不住的痛苦，情不自禁的抒发。沐天波被缅甸杀害后，陈佐才写了两首挽诗来表达自己的哀悼：

逆旅凄凉莫可状，故人不至遥相望。何来一叟抱琵琶，忽啼忽笑街前唱。唱到沐氏孰忍闻，子南父北死于君。教人向北向南哭，南山北山起愁云。（《听说小传哭沐黔国父子》）

风吹阿瓦黑云屯，一将横戈独拥门。战败酋兵力未竭，身经乱矢气犹存。淋漓滴血完臣节，片片分尸报主恩。碧草黄沙迷汉路，残黎何处吊忠魂。（《阅缅录再哭沐黔国天波》）

诗人一哭再哭，说明他感愤激荡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简直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诗人在哭中想象沐天波在缅甸的忠勇壮烈之死，由说书人引起的哭，则是百姓同泣，天地同悲。沐天波为黔国公沐英第十三世孙，生当乱世，命运坎坷。崇祯三年袭位，当时年仅12岁。沙定洲之乱，沐府被袭，沐天波被迫逃亡。其妻曰：“吾家累世重臣，身为命妇，当死宗庙。”于是怀抱幼女自焚。其母闻之笑曰：“若能如此，无忧矣！”亦自焚。孙可望、李定国等入滇，遣人招天波，天波执义不赴。扈从桂王朱由榔入缅甸，诸臣多傲慢无礼，独天波在颠沛流离中执君臣礼甚谨。缅甸谋献朱由榔，诱其至木城，天波察其有变，挥流星石锤杀数十人，最终遇害。其子忠亮被俘，绝食十日而死^②。陈佐才曾为沐天波的部下，这份感情自然非同寻常，但诗人为其痛哭不仅只是个人的感情，其中饱含的亡国之痛，远远超出对故主的哀悼。除了沐天波，陈佐才还有其他吊诗。如《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容》云：“羨君归去早，不见兔几年。”这显然是吊明之作，元代以生肖纪年，诗人在这里以“兔几年”暗指满清入主中原，明朝覆亡。《吊沅江世守那公》的用意就更为明显了，诗序说，清兵攻城时那公坚守，城破不降，举家300余口登上城楼，那公着朝

① 本节所引作品，出自《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四。

② 以上沐天波事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云南通志》卷十七。

服北拜毕，举火自焚，清兵也感叹其忠烈。诗人说：“余吊之者，恐史书编不到之意也。”可见陈佐才的吊诗，是有意为亡明忠臣留下一份记录。

除了自抒胸臆，时代的变乱，在陈佐才笔下通常以借古喻今的手段来表现，咏史诗《万人塚》二首即为明末时事的写照。据《旧唐书·杨国忠传》，天宝年间唐王朝曾先后两次派大军征伐南诏，20万众弃之死地，无一生还。《南诏德化碑》载南诏王阁逻凤收而祭葬之，人们称为万人塚。在这两首绝句中，陈佐才以凝重而感伤的笔调，描写了万人塚之凄惨阴森，实为影射鼎革之际的世象：“鸱枭啸聚天下曙，冷风吹磷照人路。闲花野草似含哀，箭射刀伤死战处。”（其一）“血化为水肉化泥，骨自成堆魂自迷。唤醒百千阴鬼泣，只须一个哀猿啼。”（其二）或许这样的题材更适合以古风的形式来表现，而绝句的紧凑和轻灵，较难展开悲情的抒发，但陈佐才集中了令人觉得“可惨亦可怕”（《滇诗丛录》点评）的一系列意象，熔铸成色彩阴郁的意境，传达出沉痛的情怀，从而形成了许多长篇不能达到的效果。传统的比兴，也是陈佐才痛吊亡明常用的表现手法。臣是孤臣，鸟为孤飞；孤臣无家，孤鸟失巢——《失巢鸟》在人和鸟的联想中，婉曲地描写了自己彷徨无依的痛苦：“何不远飞去，飞去又来啼。孤鸟天未晚，群呼日已低。共是失巢鸟，相依一树棲。”《秋海棠》以另一种比拟，表达了生不逢时的感慨：“虽有海棠名，虽有海棠姿。花开春不见，花落春不知。最是风流种，偏逢冷淡时。”这两首诗都写得很含蓄，但诗人有时也不惮直接抒发愤激之情，如《梅坞》：“乱离二十载，城市几家存。教我依谁住，梅花共一村。”一样的孤独感，但明显不同于《失巢鸟》的哀婉。梅花孤高的个性，实为诗人气节的象征。

陈佐才的诗歌有不同的风格，随感情表达的需要而变化。诗人的吊明之作情怀沉痛惨凄，如上面分析过的哭沐天波，但他表现英雄气概时则笔调矫健遒劲，《边行》和《侠客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一首刻画边关壮士的形象。不同于自古边塞诗多半以西北、蓟辽为背景，诗人写出了云南边地的特点：“边关万里隔邦畿，瘴雨蛮烟过客稀。壮士从来有热血，深秋不必送寒衣。”我们似乎看到一个热血沸腾的壮士，独行于瘴雨蛮烟之中，英勇地守卫着边陲。这是云南的边塞诗，为中国边塞诗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如果我们将《侠客行》和李白、担当的同题诗对读，就能看到陈佐才的独创性——他在更为短小的篇幅中，浓缩了侠客的精神和形象：“挥尽千金济困民，只携一剑走风尘，不知杀过多少人。”

陈佐才也会表现风情，但旖旎中流露着清刚之气，《拟子夜歌》就是这样的一首诗：“郎乃读书子，竟将笔砚焚。日来常看剑，想是要从军。问郎何喜妾，喜妾似芙蓉。妾亦喜秋水，而不喜春风。”这首诗的风格明显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诗从女性的角度来抒情，前面四句从女主人公的眼里，写一个准备投笔从戎的书生形象，英武之气横生。后四句侧以一问，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风骨。诗虽写一对小儿女的情怀，却摒弃了吴歌的柔靡之态，这一别出心裁的描写，源于诗人气度的高华。

前人评价陈佐才的诗歌成就，或曰似杜甫，或曰似李贺，或曰似晚唐，或曰得古乐府之髓^①。在明代诗歌崇尚汉魏盛唐的特殊语境下，或许批评家认为这是对一个好诗人的好评，但实际上有意无意地贬低了陈佐才诗歌的成就。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们否认诗人向前人学习，而是说一定时代的文学批评，有时难免流于套语，我们不必完全当真。下面笔者以诗为例，对前人的这些批评一一进行辨析。

《春夜》云：“何以酬良夜，抱琴理旧弦。一更已酒醉，三鼓就花眠。斜月低于树，远山高过天。来年此处佳，有耳听流泉。”这首诗以优美的意象和悠闲的心境，写出了春夜的清朗温馨，诗人超乎尘埃的韵调，造就了一个意味深远的意境。我们不妨说这首诗似盛唐之音，然而我们也分明感到诗人的自我形象活跃于其中，使全诗流溢着勃勃生机，这就不是外在的“似”所能概括的了。实际上陈佐才这首诗无论从意象的选择，还是从感情表达的流畅度，抑或是从语言的清新明朗上来看，都鲜明地表现了诗人的创造力。再如《江边别友》：“杨柳岸边轻雾锁，芦荻港口系艇舸。吹残沧笛起渔樵，唱罢离歌分尔我。我自西行尔自东，谁怜送旅两蓑翁。滴破绣心一夜雨，飘零归梦五更风。”如果说此诗似晚唐，也未必不可，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诗人的自我感情被寄寓在贴切的物象之中，从而形成了这首诗感伤迷离的意境，其语言之自然而凝炼，结构之紧凑而舒展，亦非“似”所能概括。

一般说来陈佐才的诗风是典雅的，但他亦能出之以浅俚之格。《山

① 许又浑：“声调最远，品格最高，造意幽深，出常情之外。其诗有与盛唐相类者，亦有与晚唐相类者。”危焕如：“翼叔诗有不从文字中得来，极浅近是极深远，极粗俗是极风雅，得古乐府之髓，细味自知。”陆玉书：“奇处似杜少陵，怪处似李长吉。君之诗，吾滇不能有两。”又曰：“诗中有古人曾及者，君能及之；有今人不能言者，君能言之。敬服。”见《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四集评。

居》一诗意象之寻常可比陶渊明，而俚俗过之，但同样在平淡中表现出意趣：

门外古柳拖嫩绿，斜遮老叟白茅屋。
村荒不闻卖花声，睡起之时饭已熟。

首句以古柳发出的一抹新绿，不着痕迹地写出初春的景象，与下句构成一幅白描的画图。后两句看似随意，却深化了意境，诗人恬静悠闲，远离尘世的情怀现于言外。绝句的佳构和空灵，在此诗中都得到了良好的表现。《春怨》出以重迭的意象和句式，体现了陈佐才诗以浅俚蕴深趣的特点：

轩中柳自柳，树中鸦自鸦。
闺中妾自妾，山中花自花。

诗人学习民歌的重章叠句和不避语词之重复，巧妙地在一首小诗中生动地表现了春喧恼人，闺中少妇百无聊奈的意绪，却无一字道破其情。这就不只是“得古乐府之髓”了，其变化之功显然可见。

楚雄诗人刘联声的《吊陈翼叔石棺》曰：“戮力边疆势已乖，横空石槨早安排。文章不用黄沙盖，忠义何须碧草埋。尘海百年风浩浩，泉台千古水潏潏。九原无限英雄骨，高卧云根孰与侪。”^①这首诗恰当地概括了陈佐才生前英雄，却格于形势的无奈和身后垂于青史的必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和忠义之气的深远影响，可谓盖棺之论，陆玉书（天麟）则说这样的诗人“吾滇不能有两”。

陆天麟，字玉书，宁州（今华宁县）人，贡生。在孙可望入滇之时，陆天麟携家避地，转徙于澄江、临安（今建水）等地，甚至卧病山寺，乞食荒村，受尽困苦，直到晚年才定居于江村，与二三明亡后出家为僧的旧友徜徉于山水之间，互以气节相砥砺，不仕。乡人林槐钞得其遗诗二卷，上卷为《樵隐集》，下卷为《百噫草》。卷中纪年，自永历庚寅年（1650年）起至康熙庚戌年（1670年）止，共有诗190余首，总名为

^① 《楚雄历代诗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刘联声，字毅庵，楚雄人，明永历丁酉（1657年）举人。著有《脉望斋诗草》、《滇都纪事》等。

《烟坪诗钞》^①，已收入《云南丛书》。另有《卖雪诗》一卷，佚。

从不同的角度凭吊亡明，是陆天麟诗歌的主题。这些诗歌可谓触绪而发，触目成感，往往以故朝遗迹为意象，寄寓沉痛的情怀。咏通海茶花诗深寓吊明之心。题曰：《通海茶花第一株，闻明季诏取入京，其花开，复赐还里。至梨阳、梅子，哨堡役弃于篱畔，其花复开，为路人折几尽，赋此志感》。一株茶花固小，在诗人眼里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诗曰：“佳人空谷久流离，过客犹寻半老枝。已是斧斤难免后，可怜风雨薄情时。当年不愿先皇顾，到底空余故老悲。烟火虽然无一点，红妆冷落淡胭脂。”诗人用比兴的手法，以“佳人”这一意象，描写了前朝名花在倾覆时刻流离无主的命运。茶花与故老，实为一体。如果说茶花是间接地为自己写照，那么《咏宿鸟》就是直接以孤臣遗民的形象自况了：“已是倦飞还，羽毛宿后闲。不知枝上梦，饮啄在何山。”《经五华废宫》三首为哀吊永历帝而作，自注曰：“五华本梵刹，孙可望改创为宫，后迎永历帝驻蹕于此，可望率兵犯之。”第一首谴责历史上的跳梁小丑，表达了自己的愤恨：“无端宫殿如传舍，有恨豺狼误跳梁。”在历史的烽烟散尽后，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惟有“寒鸦似解人间事，群噪哀声集禁墙”。这一描写，把诗人在明亡后的孤独凄凉之感表露无遗。第二首的前四句直陈自己对历史的感慨和批判：“鹊巢须信属于鸠，跃马公孙不自筹。敢有六宫镇粉黛，难容万乘历春秋。”第三联感叹昔日繁华不再，尾联收于无可奈何的惆怅之中。第三首进一步以汉宫的衰败隐喻现实，感叹五华宫的惨淡景象：“雨助青苔埋玉辂，风吹黄叶补金铺。”永历帝当年的一切谋图都虚留在绝塞，“当年战伐图”飘零于废宫，空剩一个凭吊之地，让诗人倍感凄凉：“瓦碎琉璃佳气散，旁人犹说帝王都”。遗民对故朝的依恋和伤感，或明或隐地表现在陆天麟诗中，与陈佐才的吊亡诗形成一种强烈的呼应。陆天麟推崇陈佐才的诗歌，除了对其才能的“敬服”外，当然也有同声相应的感奋之情。

陆天麟与二三志同道合的友人相互砥砺气节，其中流寓于云南的江

^① 张士儒《明末遗民陆天麟及其诗歌》说：《烟坪诗钞》二卷（按：“坪”误，应为“萍”，今据刘家逵选本订正），上卷为《樵隐集》，下卷为《百噫草》。据宁州（华宁）林槐注云，上卷的写作时间是“明永历庚寅至乙未作，即前清顺治七年（1650）至十二年（1655）”，下卷是“前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至康熙九年庚戌（1670）作”，其间，从顺治十三年（1656）至十六年（1659）未见著述。见《昆明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南诗人吴石峰为其挚友。石峰在明亡后出家为僧，陆天麟有多首诗提及二人的友情。《赠吴石峰先生》自注云：“时石峰有句町^①之行，作此送之。石峰尝疏李定国独揽威柄，命系狱，及出狱后，遂薙发为僧。”诗曰：“敢言不讳众人师，跋扈将军亦道奇。下狱犹能三抗疏，出关不为五歌噫。路迴楚道孤云冷，身历秋风拄杖知。岂为袈裟能隐遁，要津先据莫迟迟。”诗中赞扬了挚友的气节，《吴石峰偕汪扶倩、朱方谷过敝村问路，诗以送之》则表达了对挚友的深情：“休嗟摇落久，天末未离群。客路愁淫雨，僧装怯冷云。乱中惶曳杖，僻地暂论文。此去须珍重，前山烟水分。”诗中有慰勉，有叮咛，更有对知己的珍惜。听到吴石峰归里的传闻后，诗人结思成梦，又写下了夜梦与吴石峰谈诗（原无题），设想“遥拟金陵深隐处，六朝往事怨无穷”。

作为遗民，陆天麟不仅抒发自己对故朝的感怀，也关注现实民生，写下了鞭挞现实的诗篇。《感圈田》痛斥官吏跑马卷国，夺民生计的现实：“疲氓无计可谋生，山下春田半惰耕。一纸墨圈千里大，虾蟆连夜叫官声。”一面是百姓无计谋生，一面是官员凭一纸之文就圈地千里，任凭春田荒芜。虾蟆的叫声就是百姓无言的抗议，民生的写实和尖锐的讽刺，表达了诗人的愤慨。《逐猎》是一首乐府诗，诚如前人说：“得少陵《石壕吏》神味。”^② 诗曰：“逐猎人如虎，群呼酒食齐。此山偏野兽，何室剩家鸡。妇女踰墙去，婴儿戒夜啼。王侯多肉味，宁用不情禽。”《野兽》一诗也有强烈的现实性：“珍惜千端味，翻然野兽奇。庖厨无不满，山谷更多思。一箭当筵笑，千家破产悲。古人事田猎，未必似今时。”陆天麟在这两首诗中对现实的尖锐批判，使我们不禁想起白居易的《红地毯》、《买花》等新乐府诗。前者云：“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后一首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税。”陆天麟诗中的警句“一箭当筵笑，千家破产悲”，堪与白居易诗对现实的鞭挞相比。昆明李坤的《烟坪诗钞序》云：“读其诗，闵其遇，觉杜工部《间关入蜀》仿佛似之。”^③ 此以杜甫为参照，指出了陆天麟诗歌的现实意义。

① 《辞源》本条注：句町“汉西南夷之国，今云南蒙自道之地。古句町国，汉武帝置县，仍封其夷人为王，后王莽降其爵为侯。句町故城在今通海县东北”。《辞海》修订版本条注：“古县名，句一钩。古句町国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治今云南广南县境内。南朝梁废。”

② 引自《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四。

③ 引自《云南丛书》本《烟坪诗钞》。

王琦，字玉振，一字石玉，昆明人。其父王来仪是万历年间举人，官应州知州，著有《晴川集》。王琦明亡之际隐居山野，筑鹤丛斋，并用以钤印。其人善书法，墨迹淋漓遒劲，有李北海之风（按李北海即唐代书法家李邕，公元678年—747年在世）。王来仪诗《赠马生超伯山居》云：“佳人卜筑爱山深，路转层峦见翠岑。过雨烟消看霁色，遥峰月上淡尘心。酒狂济胜难从简，愁思撩人自莫禁。多少名山千古事，畏途应悔未抽簪。”诗歌借送人山居，抒发了自己对官场的不满和对隐逸的向往。王琦之隐居，可谓有渊源。《滇诗丛录》录王琦诗13首，谓从其书法册子中抄出，有残缺者，略补缀之。从《偕玉润游虎丘不果，因忆余曾两赏山茶，感而追赋》一诗看，王琦曾有过江南之行。王琦的诗歌风格萧疏平淡，颇有禅意。如《失题》：“屡有寻春约，诘朝新放晴。溪山留胜迹，花鸟伴闲情。既醉石犹我，在山泉自清。携筇忘远近，随意步芳蘅。”

张国正，字永和，昆明人。才识雄博，流寇入滇闻其贤名，迫其为官，隐遁陇亩之中，崇尚气节者与之交谈则终日不倦，否则正色拒之。著有《垆亩集》。

郭之建，字用皇，昆明人。不乐仕进，居椽树园中耕耘力田，尝袖书于密林中读之，每有所得辄发为诗歌。诗佚。

以上数人为明季云南遗民中的代表诗人。他们以各自的风骨和才性发为诗歌，与全国遗民文学遥相呼应，汇成了明季滇云的一曲正气歌。

第七章 文学家族摭论

文学家族，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如“三曹”、“三苏”、“大小谢”、“大小晏”等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所以他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又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明代云南文学史上也不乏文学家族，故作此论。要说明的是，这一章略去了云南府的文学家族，如嵩明兰氏（兰茂、兰廷瑞），晋宁唐氏（唐尧官、唐懋德、唐泰、唐华），呈贡文氏（文祖尧、文俊德、文化兴）。笔者认为：一来兰茂、唐尧官之于隐逸，文祖尧、唐大来之于遗民，其影响更为突出，故把他们分别论列于隐逸作家和遗民作家中；二来云南府外的文学家族，除永昌张氏外资料比较分散，故专为一章，以期引起人们对文学家族的关注。

一、永昌府张氏：张志淳、张含、张合

明代永昌府的治所，在今天的保山市。永昌张氏既是名门望族，也是文学名家。“明保山张侍郎志淳与子含、合，一门文事，著录哀然。”^①“世皆羡眉山父子文章之盛萃于一门，求之吾滇，若南园之后，禺山、贲所各以文章门业著称，殆可颉颃苏氏。”^②张含（禺山）不仅是其家族，也是云南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诗人。其父张志淳（南园），其弟张合（贲所）在文学史上也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堪比宋代“三苏”。

张志淳著有《南园集》、《西铭通》、《谥法》、《永昌二芳记》、《南园

① 赵藩《重刊南园漫录序》，张志淳《南园漫录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李根源《重刊南园漫录序》，张志淳《南园漫录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漫录》、《续录》；张含著有《禺山诗文选》、《李太白诗选》；张合著有《贲所文集》、《宙载》，但由于滇中兵火频仍，多半久佚不传。赵藩搜求得《禺山诗文选》旧刻本，付李根源刊行，李根源亦搜求到内府抄本《南园漫录》，重刻于昆明。张志淳的《永昌二芳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有存目，《南园续录》十卷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详考；张含的《禺山诗文选》收编入《云南丛书》，题名为《张愈光诗文选》，《李太白诗选》原刻本卷首有杨慎序，考辨李白里籍事迹甚详，《云南丛书》二编收入；张合的《贲所文集》已佚，《滇南诗略》录其诗五首，《宙载》原先云南仅有传抄本，李根源自江苏国学图书馆所藏刻本抄得副本，收入《云南丛书》二编^①。

周钟岳在《永昌府文征序》中说：“汉通西南，永昌置郡最早，而边陲文教亦于是肇兴。今史籍所载可称述者，如西汉之《兰（澜）沧歌》，为声诗之始；蜀汉吕凯《答雍闾檄》，文辞茂美，上薄《西京》。唐宋而还，蒙段割据，声教睽隔，箴焉无闻。元明复隶版图，文学亦駸駸与中原比美，而以南园、禺山、贲所、协卿、懋敬诸先生为称首。”除了张氏家族和这里胪列的其他人，永昌在有明一代还有汤琮等五人竞相唱和。总之，在云南府之外，永昌府是云南文学较繁荣的地区之一。

张志淳（1457年～1538年），字进之，自号南园野人。“其先江宁（南京）人，洪武中迁金齿司”^②。张志淳天资聪颖，六艺皆通。他是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选为户部侍郎。在任时启用贤人，门无因私事而干谒或托人情者，功业气骨，皆为时人推崇。历官户部侍郎，谢病归。关于张志淳致仕的原因，四库馆臣云：“（志淳）官至户部侍郎，坐刘瑾党，勒致仕。其名见《明史》焦芳传中。然无事迹可见，疑亦康海、王九思之类也。”^③近人缪尔纾的《张志淳传》明确记载，张志淳曾抵制奸臣张縠升迁，后来刘瑾专政，张縠得势对他进行构陷，张志淳因此而被弹劾，致仕归乡。李根源说：“明之中叶，贤否并进，各树党援，苟争逐于利禄，则有误国家而不恤者，纪纲之不振，明事所由坏也。先生立

① 以上张氏父子著作存佚情况，摘编自赵藩《重刊南园漫录序》的正文及注释，见《南园漫录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一统志》卷八十七。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六《永昌二芳记》条。

朝正色，排斥奸党，汲引幽滞，风节凛凛不可犯，一时直声震鞞毂下。”^①张志淳致仕后以著书自娱，享年81岁。

如果从诗名看，张志淳远不如其子张含，或许因为其诗散佚较多，或许因为其《南园漫录》声名过著（此书今本仅存34则），其实他也是一个颇可称道的诗人。我们仅看关于其《春园诗》的一些史料，即可知张志淳的诗歌造诣。《滇南诗略》录其诗27首，《春园诗·原序》曰：“北地李梦阳称南园诗十倍沐、刘、杭三子，浙鄞陈沂称司徒论道德于文章，畅性情于诗律，可以为世训云。”^②《春园诗·自序》云：“南国老翁见长男含《春园诗》，病间次得百二十首，时正德己卯春廿六日也。”这120首诗今仅存27首，《永昌府文征》录之。病中次韵，一日得律诗百余首，可见张志淳的才思之敏捷和声律之谙熟。从现存的27首诗看，抒发性情，挥洒自如，语言流畅，风格清新是基本特点。《澜沧江》是一首山水诗，诗曰：

悬崖千里插江深，古木千章蔽日阴。
险极乾坤无与并，路开秦汉到于今。
拔云倚树寻佳句，历井扪参豁壮心。
遥指峰头堪暂憩，一龕灯火记观音。

此诗气势雄浑，气象开阔，与其他诗风格不同。

张含（1480年~1567年），字愈光，号禺山，又号半谷。正德二年（1507年）中举，此后数应春试落第，于是隐居乡里，为“杨门六学士”之一。《列朝诗集小传》、《滇南诗略》、天启《滇志》、《明诗综》、《御选明诗》等均有其传。《永昌府文征》录其诗875首，文39篇，可见其影响之大。

张含早年随其父张志淳宦游省外，交游极广，“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对他极为欣赏。张含以李梦阳为师，终身执弟子礼。在云南，张含是与外界交游最广的诗人之一。这除了早年随父宦游的关系，当然还和杨慎的推重有关。据张含的《结交行》和《结交歌》，在弘治、正

① 李根源《重刊南园漫录序》，《南园漫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②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诗录》卷三，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德、嘉靖年间与其结交者有 58 人之多，其中包括杨廷和、石珪、边贡、罗玘、李梦阳、何景明、文征明、严时泰、李元阳、刘节、杭淮、朱应登等人，未列入其中的还有胡廷禄、木公等，诗后皆有《爵里姓名记》，不赘，他和杨慎在滇云的交往详见本书第五章之三。张含与杨慎为世谊，杨慎亲手点定张含诸集，合为《张愈光诗文选》五卷。《升庵集》（卷二十八）《招张愈光》下注“癸亥岁，时十六”，此为杨、张二人唱和的最早记录。自杨慎嘉靖四年（1525 年）来到永昌，流寓滇中各地，始终与张含保持联系并时相唱和。杨、张在滇的交往唱和长达 24 年之久。

由于张含与杨慎非同一般的交情，历来人们对张含诗歌成就的评价，总是有意无意地和杨慎的巨大声名搅在一起，让人无端生出张含获褒因杨慎，被贬亦因杨慎的感慨。对舆论影响最大的，固然是四库馆臣的评价，但偏见并不自此始，而可谓由来已久。

我们还是先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禹山文集》）的说法。在这个《提要》中四库馆臣说，张含之学“出于李梦阳，又与杨慎最契，故诗文皆慎所评定”。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四库馆臣接着又说，杨慎序张含诗对其“推挹甚至”，而张含诗之病，在“褻积字句而乏镕铸运化之功，明人别有雕镂堆砌一派，含其先声欤”。进而再说杨慎之所以推崇张含，是因为他在云南实“无可共语，得一好奇之士，遂为空谷足音，不觉誉之过当”。因为杨慎声名太大，听闻者推波助澜，“而其贗古之文又足以骇俗目”，于是成就了张含之名，实际上张含的“涂饰之学”，与李梦阳“同一病源，各现变证也”。读到这里，我们感到四库馆臣对张含的评价，已经不是那么公允了。笔者认为，说张含有“前七子”雕镂堆砌之病，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说张含的声名完全来自杨慎的抬举，这是由于杨慎在滇中无可共语，却不是事实。我们知道杨慎在滇云得到文士们的普遍敬仰，与他唱和、过从者有“六学士”、“七子”、“安宁诸友”、西蜀简西岷等人，而杨慎长期寓居于安宁和高峣，在他漫长的谪滇岁月中，张含与之相伴的时间并不多。对四库馆臣的上述说法，清代学者赵藩在为张含诗文集所作的《序》中给予了反驳。赵藩认为张含之为诗，固“法唐以上，而归宿于杜少陵；为文，不肯作秦汉以下语，皆守献吉（梦阳）家法”，但其所具学问、才力，使他“自能运之”。其文虽有“伤涩”之病，然而“蔚然经籍之光，亦非不读书人所能句读”。赵藩对张含的诗评价较高，认为其诗“一意孤行，感激豪宕，掇皮皆真”。综其诗文，张含“于空同之门”，绝非只是固守

其法，而是“转觉出蓝”。“固当与安宁杨文襄，为有明一代滇中二大家，质之海内而无愧也。”^①赵藩的这番话，明显地有意气激荡其中，但且不说张含和杨一清是否能够相提并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赵藩的说法自有其中肯之处。

总之，时人对张含的赞美，并不完全如四库馆臣所说，完全是因为受了杨慎的影响。《明诗综》（卷四十二）载张含诗六首，并在其小传下引了众家评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张含的评价有三种情况：有完全赞美的；有持中的；有完全否定的。朱彝尊汇集于张含小传前的这些评价，可说集中了同时代人对张含的主要看法，最后他才说自己的见解。把这些评论放在一块儿，或许朱彝尊有良苦用心。下面笔者以《明诗综》为本，对这些评论略做分析阐释，以还张含应有的地位。

杨慎云：“愈光未卯^②能诗，及长，博极群书，条入叶贯，上猎汉魏，下汲李杜，弗工弗庸，弗似弗止。然工于求古，昧于适俗。寄赠穷困节气之交，万言不竭；于通达周旋之友，片言即穷。”杨慎从学源上分析了张含诗的渊源上至“汉魏”，下至“李杜”，但其师承李梦阳意在求古，并不完全和时俗趋同——这就是张含自己的才情之所在了。张含诗的内涵，杨慎认为颇有孤高之气，这就点出了张含以性情为诗，不同流俗的特点。可见，杨慎并非因友情而盲目地推崇张含，而是据实评之。杨慎之博学号称明代第一，他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到张含的学识，也可见对张含的赞美并非虚美，而是出于心悦诚服^③。

任少海云：“愈光诗险怪诘屈，不必皆中绳墨。”任少海，名瀚，四川南充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著有《忠斋稿》，和李元阳相交甚契。任氏认为张含的诗有自出机杼之妙，这是符合事实的。

王元美（世贞）云：“张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凿宛然；又如束铜钢

① 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总第四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317页）。

② 卯，音 guàn，古代儿童束的上翘的两只角辮，指年幼。

③ 如《丹铅摘录》卷三《墨庄漫录》：考妇女弓足起于李后主，予按乐府双行缠知其起于六朝。张禹山云：“《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缠屣。”又云“摇修袖，蹀利屣”，意古已有之。《丹铅总录》卷十五《张禹山戏语》：张禹山晚年好纵笔，作草书不师法帖而殊自珍诧。尝自书一纸寄余，且戏书其后曰：“野花艳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须蚁绿。太白诗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装’，渐近自然，何必金莲玉弓乎！”亦可谓善谑矣。

腹满，中外遗穆。”这个评论就比较酷刻了，说张含只会模拟，而且食古不化，显然与张含的创作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他自己的模拟之作不少，对张含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显然有失公允。

穆敬甫云：“张君藻丽精深，殊有襟度。”此人生平不详，只知与王世贞有交往，《弇州四部稿》、《续稿》有多篇诗文涉及到他，如《读穆敬甫所选明诗七言律有感，盖时辈之作在焉，又多猥及余云》（《续稿》卷十六）。穆、王二人对张含的评价截然不同。

顾玄言云：“愈光如兰津夭矫，腾逸浮空。若‘鸿雁不传天外字，芙蓉空照水中花’，‘铜柱蒹葭鸿雁响，铁城烟雨鹧鸪啼’。此例数篇非雕饰曼语。”这是一种完全肯定的评价，并举例证明之，并非凿空之语。

叶元礼云：“禺山诗如峡中女子，野花山叶，翠鬋银钗，非不饰姿弄鬓，拭粉游红，奈时作蛮语。”这是完全否定的评价，不过“奈时作蛮语”，却正是滇云作家和宦滇者作品表现的共同特点，同时也反证了张含的诗并不完全出于模拟。

《静志居诗话》曰：“禺山虽北学于献吉，然诗不尽出其流派，而一以用修为归。观其襞积字句，乏自运之神，方之用修，远不逮也。”毕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朱彝尊的见识比其他人略胜一筹。他认为张含与李梦阳虽有渊源，却并非不能自为变化。朱彝尊还指出了张含学源的流变：出于李梦阳而最终以杨慎为旨归，却因才气不足而“远不逮”杨慎。从张含诗歌创作的发展和总体成就来说，这个评价基本符合事实。

不论以上诸家对张含的评论是耶非耶，这么多明清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对其诗加以评说，足见张含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张含对自己诗才的敏捷相当自信也颇为自得，从他的《援笔成诗稿无易字，重忆升庵而作》一诗之题目，即可以看到这一点。对张含诗歌的创作论者甚众，上文辨析各家对他的批评时，笔者的观点亦已表明，不赘。

张含的文学观以创新为旨，传神为宗，他并不认为以古为则，是不可侵犯的戒律。他说，“夫学诗惟其神，不于其形”。《诗》、《骚》被称之为“经”，然而它们“何则于古”？“宋人转移机轴，言自成家，何则于古？”所以“诗必自成其家，而后可传也”。如果只讲规矩，那么难免貌相虽同，诗人的个性却被湮没了。他还说：“诗贵于神，奚于古体之同乎？”“袭句而拟者，盗；抽字而饰者，巧。盗之与巧，其曷可乎？”所以

他欣赏杨慎的作品，称赞其“神全乎内，形见于外”^①。张含的诗歌创新观念，还表现在对宋诗与众不同的评价上。关于选诗，他赞同杨慎的做法，这就是“严”——以“求精而不随”为原则，传其“精”而不传其“全”，不“精”者则不能“传”。如果学诗者以此为则，恰如济江海者得获舟楫，所以不可不“严”。这也让我们看到，对杨慎选李梦阳诗作的弃取，张含之所以由始而有疑到后来终于认同，其意义并不在于针对某一诗人，而在于张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杨慎“求精而不随”的影响。在《白泉先生集后序》（《张愈光诗文选》）中，我们也看到了张含从严“求精”而不求多求全的态度。

张合（1506年~?），张含之弟，字懋观，16岁举云贵乡试第一（嘉靖元年，1522年）。嘉靖十一年（1532年）登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职于兵部、吏部，累升湖广按察司副使，以病告归。张合生性好学，手不释卷，以书画称名。居乡时权贵登门拜访，辄拒不谈官场事。为人孝友，居官廉正，获得士林的尊重，人称贲所先生，歿而与其父并祀于乡贤祠。《永昌府文征·诗录》卷三录有张合的《履影诗》五首，李根源按云：“风怀雅抱，具有家法。倘与《南园集》均流传至今，当不让眉山父子专美于前矣。”^②下面录其诗一首：“去年仲夏到扬州，新月余光射柁楼。记得二更惊梦觉，岸边方泊绣衣舟。”这首艺术功力平平，才气明显不如其父兄。从《永昌府文征·文录》卷四所载张合的《李何精选诗序》、《空同诗选序》看，他对“李何”极为赞赏。张合的文章篇幅简短，意趣深长。如《先祖钝庵公诗记》追忆其祖父，选择其为人、诵读声、自己耳闻受教的经历，用二三事进行记叙，并抒发了自己回思往事的感慨。全文且叙且议，一笔几折，篇幅短而容量大。《贵精集序》、《跋禹山文》亦是很精练的文章。

二、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氏：木公、木青、木增

丽江土知府木氏一门，在明代出了三位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木公、

^① 《云南丛书》本《张愈光诗文选·跋杨太史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

^② 李根源辑，杨文虎、陆卫先校注《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木青、木增，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载录了木公、木青两人。作为有明一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足见丽江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这，与木氏历来对汉文化的重视密切相关。据乾隆《丽江府志》记载，木氏府中有万卷楼，楼中所藏“凡宋明各善本数万计，群书钜版，大要俱备”。木氏不仅广为搜求以丰富其藏书，而且不远万里，敦请著名刻印家为其刻书，明代江南赫赫有名的毛晋汲古阁，就曾应木增之请为其刻书。据郑伟章《毛晋代丽江木增刻书略述》，陈瑚《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卷十六）载：“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杨补有诗云：“购求万里走南北，问奇参秘来相率。”王登朝云：“万里购书尝遣币，一经遗书是生涯。”毛晋《野外诗卷》所载《送法润禅师载〈华严海印仪〉还南诏》小引亦记载了此事。汲古阁为木增所刻书即《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后来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嘉兴径山藏》的组成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日本续藏经本《华严忏仪》据此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嘉兴大藏经》之续藏经第15、16册收此经，这都是木增的功劳。毛氏又代木增刻印其自著及先人撰述，据毛晋的《释庄义序》，他代刻的还有木增的《云薏淡墨》、《释庄义》，木公的《雪山诗选》。木增的《芝山云薏集》可能也为汲古阁所刻。《云薏淡墨》后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又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5册收入^①。

木公（约1495年~1553年），字恕卿。“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年）疾终正寝，享年甫耳顺”^②。按“享年甫耳顺”，木公享年当为虚岁60。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滇诗丛录》载其字公恕；《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御选明诗》卷八十、《明诗综》卷九十三载其名公恕，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下）记载其事迹比其他诸传详细。恕卿先世为笮人，传至元代麦宗，七岁时无师自通文字，并旁通吐蕃、白蛮诸家之书。其后人麦得在颖川候下云南时“遣使问道归附，上嘉之，赐姓木，世授丽江府知府”。七传至公恕，英毅而有才干，安抚诸少数民族，常以忠顺自励。明世宗御书，对他有“辑宁边境”的褒奖。木公性喜读书赋诗，曾手抄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

① 见《文献》2009年第4期（第115~119页）。

② 方树梅辑《滇南碑传集·雪山大夫墓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等名家诗作，又“于玉龙山南十里为园田五亩，枕经藉书，哦松咏月，中土贤士大夫无以过也”。按木公袭土知府在嘉靖六年（1527年）^①，《明诗综》（卷九十三）引《静志居诗话》，称木公“韶年让爵，隐于玉龙山南，亭曰翠雪坞、曰丹霞堂、曰一镜。种桃艺竹，环以山松。又起迎仙之楼”。《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又云，木公曾以诗求正于永昌张志淳及其子张愈光（含），借助愈光呈之于杨慎，“公恕希风附响，自比于长卿之盛览，斯可谓豪杰之士也”。

杨慎选木公诗114首，题名为《雪山诗选》，并为之作序，是集编入《云南丛书》二编。《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雪山诗选》引杨慎《雪山诗选序》云：“张南园（志淳）序其《雪山始音》，愈光（张含）、贲所（张合）兄弟序其《隐园春兴》及《庚子稿》，贾体仁（文元）序其《玉壶游》诸什，予亦加中皋、梁子霄正緘其《万松吟卷》洎《仙楼琼华》序之，已传攻梓矣。中皋又属余合前数集汇选其尤总之，椠一百十有四首云。”《滇诗丛录》（卷二）录木公诗30首。赵联元编纂《丽郡诗文征·诗征》（卷一）录木公诗57首，小传后有集评，可观其诗之艺术特点。要之，有杨慎云：“其所为诗，缘情绮靡，怊怅切情，多摹拟垂拱之杰，先天之英，其秀句佳联，垒出层叠。”“体句俱新，写景入绘。”张含云：“朗润清越。”李元阳云：“行乐府章节。”

木公与永昌张氏父子为文字交，与张含交谊尤深，其诗通过张含而得到杨慎的赏识，杨慎为之编选并作序。张含直到晚年还作诗《忆旧游怀木雪山太守》，木公亦有诗《遯痴堂题寄张愈光》，《永昌府文征》录其《醉和禺山便寄集韵》^②。可见，二人不仅有同游之乐，而且有异地唱和之欢，唱和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永昌府文征》并云，木公“与永昌张禺山，蒙化左黄山相唱和，时有‘三山’之誉”^③。木公和李元阳亦有交往，《中溪家传稿》中有诗《和雪山》、《九日寄雪山世守》。左黄山即左文臣，字维良，嘉靖间蒙化（今巍山）人，土知府。喜文墨，善小楷晋书，通音律。安抚彝民百姓，为政清廉刚正^④。

① 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② 李根源辑，杨文虎、陆卫先校注《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③ 李根源辑，杨文虎、陆卫先校注《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④ 张文勋主编《云南历代诗词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钱谦益说木公以诗求正于张含、杨慎是“希风附响”，其实杨慎能如此用心地为木公选诗，是喜其诗有《古诗十九首》之深致。杨慎也指出木公诗的缺点是“多摹拟垂拱之杰”，但他认为这毕竟未掩其自然秀出之风，而且描摹如画，语句清新。可见，杨慎也并非因为与张含的关系而虚美木公。杨慎作为当时云南诗坛的盟主，而张含堪称翘楚，木公献诗请教于二人，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令有“希风附响”之意，也是文坛流风，不必因此而指责一个边地民族诗人。不过从《雪山诗选》和其他选本所选的木公诗来看，士大夫的赏音多在其典雅之风，即所谓“中土之句”。《明诗综》（卷九十三）和《御选明诗》（卷九十八、一百八）都选了《病起》、《江村》、《种柳》三首，大略可资说明。《病起》：“临晓新梳发，呼儿卷幔纱。平生行乐惯，病起即看花。”《江村》：“江上层云合，村村结暮阴。渔灯半明灭，风雨苇花深。”《种柳》：“双杨初种几经春，始见长条已拂尘。万缕绿阴堪作帐，一枝不许赠行人。”这几首诗确乎比较清雅，所以符合中原士大夫的欣赏趣味。其实如《题竹》这样的诗篇，较少摹拟之迹，还是值得一提的：“森森万竹入云高，风过依稀响翠涛。欲借清阴来入砚，任人和露写《离骚》。”

木青，字长生，一字乔岳，号松鹤，又号长春，木公的曾孙，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袭土知府。木青能诗善书，年29岁而歿，卒赠中宪大夫。其子木增刻印其诗，题名为《玉水清音》。钱谦益云：“如云‘轻云不障千秋雪，曲槛偏宜半亩荷。’‘含烟翠筱供诗瘦，啄麦黄鸡佐酒肥。’‘堤柳绿销应有恨，渚莲红褪岂无愁。’皆中土诗句也。”（《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下）朱彝尊则谓木青“诗不及曾祖而胜其子增，增篇什虽倍，然非卧子所云中土诗也”^①。《明诗综》录木青诗一首，即《移石草亭》：“万松深窈处，独构此茅庐。斲地移新竹，通泉溜小渠。琴书常作伴，木石与为居。笑杀求名者，磻溪一老渔。”

木增（1587年~1646年），木公的5世孙，字生白，《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下）附于木公传后，其传云：“雪山之诗得传中土，增之力也。国家泰阶隆平，声教四讫，嘉、万之间，酉阳、水西诸夷酋，靡不户诵诗书，人怀铅槧，而丽江实为之前茅。”四库馆臣则云，木增“以助饷征蛮功晋秩左布政使，年甫三十即谢职。天启五年，特给诰命以旌其忠。

^① 《明诗综》卷九十三引《静志居诗话》。“卧子”为陈子龙字，此不详何指。

增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①。据《邠郡诗征》木增小传，他有《云邁集》、《啸月函》、《山中逸趣集》、《芝山集》、《空翠山集》、《光碧楼选草》等六种诗文集。董其昌、陈继儒、周延儒、张邦纪、宗龙、章召鼎、梁之翰、担当、徐霞客、谭文化、戈元礼、陶潢、萧士玮、张瑞图等各为叙跋。《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云，大学士张瑞图为《啸月函集》作序，董其昌为《芝山集》作序，陈继儒为其全集作序。《芝山云邁集》木增自记则云：“不才不揣鄙陋，局于见，每于山居无事，触景写怀，偶成《云邁集》、《山中逸趣》、《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君录》以及《云邁淡墨》诸集，业经请政于名公巨卿，有序有跋。”《山中逸趣》有崇祯间刻本，前有唐泰（担当）及章台鼎序，后有徐弘祖（霞客）、鹤郡梁之翰跋^②。

上文说到，朱彝尊转引他人话语批评木增的诗“非中土诗”，但以“中土”诗风作为评诗的尺度，这本身就是偏见，不足为据。《邠郡诗征》卷一录木增诗 23 首，诗风清雅，语词平易，显现出他的“博学通禅理”（《列朝诗集小传》）。《检书》可见其庄禅学养：“万卷浑如邺架藏，青藜小阁满芸香。会心何必多探讨，独爱玄同契老庄。”《山居》则以不常见的六言诗体来表达禅趣：“纵目山谷烟云，时来清风自扫。忘情忘物忘山，不贪不嗔不恼。”《邠郡文征》卷一录有木增的文、赋。其赋往往与序并行，语言自然流畅，结构开阖自如，富于想象力，如《寿星降于府治赋序》。这篇序文描写寿星降临文笔生动：“将临时空中如剪鹅毛状，纷然飞下，竞仰视，顷侧星临矣，肉髻皓发，整衣跨鹤。”《隐居十记·玉没山记》描写“三天之柱”亦生动壮观：“光莹八表，辉映千峰，镕雪流珠，寒泉漱玉。”《隐居十记》每一篇的篇末本来都缀有小词一阙，赵联元谓“多未协律，删之”。

三、宁州土知府禄氏：禄厚、禄洪

临安府宁州（今华宁县）土知府禄厚、禄洪父子，皆有诗名。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一《云邁淡墨》条。

② 转引自《文献》2009年第4期（第119页）郑伟章《毛晋代丽江木增刻书略述》。

禄厚（？~约1621年），承传家学，文武全才，兼工书画，喜欢结交海内名流。他曾“万里论交”，请吴中名士董其昌和陈继儒为其题写诗画，和他们“以文字相师友”。陈继儒在为禄洪《北征集》所作的《序》中说：“竹居公（禄厚号）以好客闻天下，子墨名家，负笈蹑履，游其门者颇众，经旬弥岁，与其父子相唱和。竹居公赐闲寻乐，咏歌太平，自拟于陇上躬耕者流，身不出户庭也。”著有《景竹斋躬耕集》。《躬耕集》已散佚，《宁州志》仅存《烟萝园》等3首诗。禄厚共有五个儿子：嫡长子禄溥、次子禄洪、三子禄漾和庶出二子禄昌文、禄昌贤。禄厚卒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后长子禄溥袭位。禄溥袭位不久即卒，无子，其二弟禄洪袭职。此时的明王朝已是烽烟四起，危机四伏。

禄洪（？~约1633年）字霄宾，世袭土知府。著有《北征集》。崇祯二年（1629年）冬，皇太极直逼北京，京师戒严。崇祯帝朱由检急征镇守巡抚将兵勤王，当时云南巡抚王伉飞檄禄洪，命他领兵入卫京都。禄洪受檄色动，曰：“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观？赴汤蹈火，亦所不辞。”遂“提三千精锐，果粮被甲，三月（崇祯三年，1630年）出滇，六月而抵都下。至则酋骑已遁，奉温旨慰劳，命防守密云墙子岭口。”（陈继儒《北征集序》）禄洪率军纪律严明，甚为幕府所倚重。崇祯四年（1632）七月，阿迷州（开远）土知州普名声兵围宁州，禄洪奏请班师回滇，十月还宁州。城破，禄洪逃避于抚仙湖之孤山。广西（泸西）知府张继孟率兵解救（事见明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收复宁州城。次年（1633年）禄洪由孤山回到宁州，不久郁郁而逝。

《北征集》成于禄洪的勤王之役，禄洪与董其昌、陈继儒二名士的书信交往亦于此行。《北征集》初为陈继儒所选，有诗200余首。后清代陈荣昌再为之精选，收入《云南丛书》，有赋3篇，文2篇，诗54首。《滇诗丛录》录其诗14首，《滇南诗略》录其诗58首。

《云南丛书》本之《北征集》卷首有董其昌、陈继儒《序》。董《序》云：“所过名山大川，有纪游之什；所见战场古迹，有凭吊之意。皆音中宫商，声出金石，命之曰《北征集》。而复念其尊府君竹居与不佞万里论交……緘书属序焉。”陈《序》云：“往年滇中守土臣竹居禄公，遗书走云间相通，余与董宗伯题其诗画，有倪高士之风。十余年而又得禄霄宾书。”从这两篇《序》看，禄洪之父竹居公在万历年间即与董、陈有书信交往，他既“身不出户庭”，所谓“万里论交”当为神交。董、陈既题其诗画，后十余年又为其子禄洪的《北征集》作序，足征滇云人士

和江南文坛一时媿合之迹。禄洪率师北征、驻防，后因后院乱起而仓卒回师，看来也没有机会直接见面董、陈，仍是以书信相往还。《北征集》中有《塞上奉寄董大宗伯玄宰先生》，诗云：“两世论交感故知，斗山万里仰吾师。”集中还有《塞上寄怀眉公先生》。北征期间禄洪与苍雪也有书信往来，集中有《寄苍雪法师》，并对江南名士的雅集深表向往之情，寄诗和之。其序曰：“余以庚午年春入卫神京，及辛未（1631年）夏，苍雪师自南寄至，上巳日陈季采开浣花大社于虎丘，即席送陈古白、林若抚分游两都诗。读之神飞，恨不能睹其山水人文，得附诸君子社末也。勉尔效颦，寄用续貂。”浣花雅集事参见本书第六章《明季遗民作家考论》之三《明季第一诗僧苍雪》。

《北征集》的内容，如董、陈二人所概括，董《序》见上文，陈《序》则用比喻来形容读此集的感受，尤为生动贴切：“若读其《北征》诗，万卷填胸，六轡在手，轻裘缓带，羽扇纶巾，皆在其中也。”陈《序》又云，禄洪的“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三河豪杰，五陵俊人，庶几足以当之”。其赋如《砧声赋》有明显的模仿欧、苏之迹，但《战场赋》出于禄洪的亲征经历，气韵悲壮沉郁，别有怀抱。天启二年（1622）一月，永宁（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反，禄洪等奉檄征讨。此次征战，禄洪一行“假道贵筑，土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半”（《北征集·战场赋小序》）。禄洪多年后回想当时情境，痛切之情仍溢于言表。《塞上雪》曰：“盈尺自今夕，边风吹白沙。为怜穷戍冷，天雨木棉花。”此诗状景纯用白描，但以滇南特有的木棉为意象，联想新奇而贴切。再如《师行》：“二月春分折柳稀，旌旗此去故乡违。离亭丝管催弓马，不斩单于誓不归。”以柳丝系离情，情怀却不伤反壮，这就是论者所谓时有奇气了。

与董、陈二人的赞赏不同，对《北征集》截然相反的说法是：“文赋、杂著及五、七言古律，则不屑谨守绳墨用韵，于不可通者亦强押之，未免之粗疏。”^①或许这正好说明，禄洪的诗歌创作重内容而不重形式，重真性情而不拘格律。

^① 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

四、大理府白族何氏：何邦渐、何鸣凤、何蔚文

大理府浪穹县为今洱源县，是当时云南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何氏家族为白族。

何邦渐，字文槐，一字北渠，号绍渠，隆庆二年（1568年）选贡，万历中为安徽无为知州。著有《初知稿》六卷，《百咏梅诗》一卷。袁嘉谷对何邦渐的评价颇高：“文槐一时宗匠，家学尤邃。愚读其驳张璪《文庙祀典议》诸篇，卓然名笔。即《真武阁》、《标楞寺》诸诗，亦不愧吟坛巨手。”袁嘉谷并就《百咏梅诗》追溯了阮籍以来这类“联吟大篇”的发展，认为其成就以阮籍为第一，唐代陈子昂、李白、杜甫为其嗣响，“上揽汉魏，下开宋元”，此后虽有效法者，然无一人能及。白居易的铺叙尚成一体，“馀子碌碌，非滞即复，虽多亦奚以为。明人习气尤不可解，升庵（杨慎）百梅七律、钝庵（王廷表）百梅五律百首叠韵，菊花百韵与文槐之《百咏梅诗》皆属此派。惟文槐非叠韵耳。”^①袁氏此论甚为中肯。阅何邦渐的《百咏梅诗》，立意固无奇警可言，意象亦乏新颖可陈，语词更难摒弃陈言。但《百咏梅诗》“刻本篇首标云‘洱源七十九耕夫文槐何邦渐著，同邑八十五社叟宁宇寸居敬评，男何源长源受阅辑，侄何鸣凤翔凤校梓’，二老佳话，一室瑶编，终属世家盛事”^②，表明何氏为文学世家，《百咏梅诗》的主要意义在此。

何邦渐的文学成就，一般认为文为上乘，诗次之，但七律《吊杨升庵先生》在诸多同类作品中不失为佳作：

黄金市骏冷燕台，绝徼风烟怨未开。
议礼本崇家相志，批鳞都为上皇哀。
闺中春尽鹃无赖，海上云孤雁不来。
自逐旌旌如泛梗，那堪回首望蓬莱。

“绝徼”，指极远的边塞之地；“泛梗”，指漂泊无定。从语词的选择和修

① 《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三引《卧雪诗话》。

② 《云南丛书》本《滇诗丛录》（卷三）引袁嘉谷《卧雪诗话》。

辞的技巧，可见何邦渐对传统文学颇有造诣。

何鸣凤，字巢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乡试第二，授六安知州（属安徽）。著有《半留亭稿》、《嵩寮集》。《滇诗丛录》（卷三）著录何邦渐《增订百咏梅诗》十首，有学者云“《咏梅诗》已刻，其子源长辑，侄孙鸣凤校梓”^①，“侄孙”误，当为侄子。何鸣凤的诗《出巫峡》以清新明快的风格，描绘了船出巫峡时看到的春江美景，意象空灵，意境深远，颇有韵味。

何蔚文，字稚元，号浪仙，鸣凤之子，邦渐之侄孙，是何氏家族中文学成就最高者。何蔚文著有《浪楂集诗文稿》、《缅瓦十四片》、《年谱诗话》。

何蔚文的小诗清新明快，有浓郁的民歌风格。如《采莲曲》^②：

扬州女子笑声喧，采得荷花带露翻。
短桨忽停看隔浦，拾将菱角打双鸳。

这首诗把秋日少女的欢乐，表现在采莲这一水乡特有的风情中，“打双鸳”的隐喻，在诗人笔下因有水乡风物的衬托，显得更为灵动活泼，巧妙地写出了姑娘们触景而发的情思。诗人在这里并非写江南水乡，而是描绘白族姑娘在洱海边采莲的快乐情景。何蔚文的《昆明竹枝词》，是继明初诗人郭文同类诗之后出现的又一名篇（详见本书第四章《隐逸文学的兴盛》之二《“洗空势利一生心”：昆明郭文》），作品在对郭文诗进行翻新的同时，表现了诗人独特的创意。

何蔚文的近体诗也有很好的篇章，如《担当过访赋赠》以魏晋风度称许担当之为人、为诗。《点苍山》则是何蔚文山水诗中的代表作：

插汉争奇欲刺天，苍苍如此几何年？
段杨郑赵俱已矣，雪月风花犹自传。
一日一峰游不尽，两关两处望悠然。
老龙许授长生诀，引上高河踞绝巅。

① 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四《艺文考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② 以下作品出于张文勋主编《云南历代诗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诗歌起句即描绘出点苍山的雄奇不凡，继之以一问，于舒缓中现奇趣。第二联笔锋一转，从山到人，历史的感慨油然而生，拓展了诗歌的意境。据史载，“段杨郑赵”当为“郑赵杨段”，诗人为谐律而更改了排序。第三联再回到对山的描写，极写其广阔悠远，尾联收束于浪漫的想象，进一步突出了点苍山的高峻，与首联形成呼应。龙为白族的图腾，用在这里决非泛泛之比。历代咏点苍山的佳作甚多，何蔚文这一首诗结构严谨，意象新颖，风格于平易中现奇崛。可见，诗人的近体诗写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第八章 余 编

一、“平居陈郭”考

“平居陈郭”是昆明郭文和谪戍者平显、居广、陈谦的并称。这一并称见于多种典籍，但多半内容空洞而事实不清。我们先去其重复，把载录这个并称的主要史料，按年代顺序排列如下：

1. 杨慎（1488年～1559年）《升庵集》卷五十七《平居陈郭》条载：“滇中诗人，永乐间称‘平居陈郭’。郭名文，号舟屋。其诗有唐风，三子远不及也。如《竹枝词》云：‘金马何曾半步行，碧鸡那解五更鸣。依家夫婿久离别，恰似两山空得名。’又《登碧鸡山太华寺》一联云：‘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一时阁（搁）笔，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称耳。其全集予尝见之，如此二诗亦仅有也。”这是“平居陈郭”并称首见于史籍的记载，但语焉不详。

2. 清代朱彝尊（1629年～1709年）纂集的《明诗综》卷十六引录其《静志居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云：“舟屋《竹枝词》，顾仲瑛编入《玉山雅集》，则是诗元季已流播矣。用修称是永乐间人，其集既不可得，无由臆决。偶阅柯暹《东岗》附录《滇南别意诗》，则‘平居陈郭’四人之作皆存焉。平名显，武林人。居名广，海昌人。陈名谦，吴人。《东岗》跋云：郭、居皆武士中贤者。郭善诗文，征南将军都督沐继轩璘师之。居精吏事，总府辟掌簿书数十年，得官。陈官镇抚，有诗名。宣（按诸本作“显”）则松雨先生子也，黔府西塾，荐升广南府通判。所云松雨先生者，知藤县事。显，字仲微。考《东岗》，引疾去滇在景泰二年七月，《别意诗》即是年之作。郭于元时撰《竹枝》，入明八十四年，未必尚存。用修虽称见其全集，窃疑《竹枝》非集中诗。《玉山雅集》所载，当别是一人也。”此为目前所见关于“平居陈郭”记载最详的史料，亦为《滇绎》所本。《东岗集》，“岗”，诸本作“冈”。

3. 张廷玉（1672年～1755年）的《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

二·王绂传》载：“仲微名显，钱塘人，尝知滕县事，谪戍云南。其为诗颇豪放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显其一也。”记载虽然简略，但这是国史对“平居陈郭”最早的载录。

4. 近代云南学者袁嘉谷（1872年~1937年）《滇绎》下编《平居陈郭》条，对上述史料进行了考辨和增补：“按郭之诗以《竹枝》一绝最传，其隐居在今草海西隅，盖张志和之流也。顾升庵不言平、居、陈三人之名，《滇诗略》诸书皆不之及，《明史》亦含混言之。考柯暹《东冈集》附录《滇南别意诗》，则四人之作存焉。……《东冈》跋云：‘郭、居皆武士中贤者。郭善诗文，征南将军都督沐璘师事之。居精吏事，总府辟掌簿书数十年，得官。陈官镇抚，有诗名。……是平、居、陈皆流寓于滇者，与郭似不同也。’“按竹垞（朱彝尊）疑《竹枝词》之郭文非沐璘师之郭文，当未必然。但《东冈》以郭为武士，《玉山》列《竹枝词》为元诗，皆可广异闻矣。”“筇竹寺有碑，郭文撰，居广书。四人手迹，存其二焉。”^①

“平居陈郭”4人中郭文的史料比其他人稍多，下面对3个滴滇者稍作补充。平显为《沧海遗珠》所收，但所载生平甚略，仅存姓名籍贯。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三）《平显传》记载其行实较详。他在洪武间应孝弟力田，自为广西藤县令而非《诗话》所云是其父“知藤县事”。平显上任不久即因事谪滇。西平侯沐英上奏朝廷，除其伍籍，聘为西席。建文四年（1402年）平显所作《汤池渠记》，是他在滇时间有案可查的最后记录^②。其文曰：“汤池渠，肇始于洪武之丙子（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时西平惠襄侯沐公在镇。……越二年，公薨（按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壬午夏（建文四年，1402年）……将校黎老追慕公德，咸愿镌石纪颂，丐铭于平显。”《诗话》说他景泰二年（1451年）离滇，那么此人在云南流寓半个多世纪。居广和陈谦的史料甚少，除《诗话》外，《滇诗丛录》卷二仅载二人的姓名和籍贯。与“平居陈郭”有关的还有柯暹。柯暹，直隶建德人（属安徽），贡士。正统十二年（1447年）

① 1、2、3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见《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袁嘉谷《滇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版（第709~710页）。

② 天启《滇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页）。

任云南按察使^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正统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条载：“命致仕按察使柯暹为云南按察使。”著有《东冈集》。

笔者认为，“平居陈郭”这一并称得之于4人间的诗文唱和，且这4人见于史载的惟一次唱和，与当时云南都督沐璘有关，否则难以解释郭文以隐士之身份，何以和3个外来者并列。但史籍多半只载“平居陈郭”之称，而上引朱彝尊的《诗话》和袁嘉谷的《滇绎》，内容虽然稍为丰富，却颇费斟酌。《滇绎》所载此条实为《诗话》之补充，故笔者下文以《诗话》为主，以《滇绎》及别的史料相互印证，考辨4人的关系及交往事迹。

《诗话》主要有两点值得辨析：其一，“平居陈郭”是同僚，郭文与居广皆武士中贤者，郭文擅长诗文，征南将军都督沐璘以其为师。其二，“平居陈郭”4人有《滇南别意诗》这一唱和之作，附于《东冈集》后，作于景泰二年。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郭文是否曾为武士并与平、居、陈为同僚？笔者尚未找到印证，存疑。但多种史籍记载了沐璘微服寻访郭文之事，郭文“为征南将军都督沐璘师事之”应无疑。既然如此，他就有可能与作为沐府西宾的平显和署职公府的居广、陈谦交往。

第二个问题相对复杂：《诗话》关于《滇南别意诗》并《序》的记载，实际上提供了“平居陈郭”这一并称来历的重要依据，同时还可据此考证四人之间的关系，但朱彝尊对《滇南别意诗》的年代记载并不准确，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有柯暹的《东冈集》十卷，集中有《滇南别意诗序》，《滇南别意诗》集却既未见于《东冈集》附录，亦未见于任何史籍载录，《诗话》则提到其诗而未言有柯暹的《序》。《东冈集》的卷数史载不一^②，笔者不明就里，不敢妄测。或朱彝尊看到的版本附有《滇南别意诗》？

观《滇南别意诗序》，这个诗集为同寅间的唱和之作，缘于赠别当时的云南左布政史贾铨的从弟。《序》曰：“方伯邯郸贾公，自给事黄门出大理，升大参而至左方伯，舆论归之。其弟彦昭，季父子也，不远万里

① 见《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精选点校》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版（第517~518页）。

② 《东冈集》，《明史》卷九十九载录共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共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亦载为十卷。

而来省，公留数月，告还。公之同寅哀诗以赠，请余叙诸卷首。”^①“贾公”即贾铨，《明史》卷一百五十九有贾铨传。贾铨，字秉钧，邯郸人，永乐末年进士（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载永乐甲辰年，1424年），授大理知府。因王骥征麓川时馈运军需有功，平迁为云南左参政，兼署大理知府。正统十二年（1447年）擢升为云南左布政使。《明史》本传载：“正统十二年左右布政使阙，军民数万人颂铨。参赞军务侍郎侯璉等亦疏请，铨遂得擢。”这就是《滇南别意诗序》所谓“舆论归之”了。景泰七年（1456年）贾铨任满九载，当入都，军民乞留，承命还任，于天顺四年（1460年）离任。上文说过柯暹正统十二年任云南按察使。这一时间与贾铨擢升左布政使，其从弟来省吻合。《滇南别意诗》应当作于这一年，而非《诗话》所说的景泰二年。

我们再看参与《滇南别意诗》唱和的“平居陈郭”在当时的基本情况。平显时为沐府西宾，居广、陈谦署职公府，他们参与唱和原是很自然的事。但布衣郭文为何参与其中呢？笔者认为，这首先与他与贾铨的私交有关。重要的史实印证，是郭文“浮家泛宅，以诗自娱，常往来滇洱间”^②。贾铨署理和兼署大理知府长达十年，极有可能是郭文大理之游的东道主，两人早有交往。郭文参与这次唱和，二是因其与平、居、陈亦早有交往。重要的论据是杨慎说4人在永乐年间就被人们并称，而《滇绎》提供了4人交往的一个重要旁证：宣德九年（1434年）郭文撰《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居广为其题书并篆额，可见他们早就有文字交往。若无上面所说的这两层关系，郭文参与这次同寅唱和就显得比较突兀了。但如果郭文以诗名遨游于公卿间，因而和另外3个谪滇者以沐璘为契机交往并唱和，这就比较合理了。这类事情在古代隐逸诗人中并不罕见。

总之，正统十二年，作为唱和诗得主的贾铨从弟、唱和诗的作者“平居陈郭”、载录唱和诗的柯暹三方因缘际会，这就是《滇南别意诗》的唱和年代，这也是“平居陈郭”有案可查的唯一唱和记载，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明证。显然从4人在永乐间就被并称这一情况来看，他们之间的唱和应当更早。基于上述考证，笔者认为“平居陈郭”并称，缘于4

① 柯暹《东冈集》卷十《滇南别意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版（第30集第536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谢肇淛《滇略》卷六《献略》。

人之间的唱和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成，又缘于他们各自和沐氏的关系。

二、王锡袞创作行实系年

综 论

王锡袞（？~1647年），字龙藻，禄丰人。《新纂云南通志·列传》本传载：“先世华阴人，祖上从颖川侯克滇，授右卫冠带总旗。”方树梅所辑《学山楼丛书》之《王昆华遗集》（稿本，以下简称《遗集》）中有《明大学士王文毅公事实纪略》，其文曰：“字龙藻，号昆华，一号仲山，又号念昔，别号素斋。”王锡袞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为侍讲南国子监司业，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天启十六年以丁忧归乡，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明王朝立，复授旧职，王锡袞皆未到任。沙定洲作乱，王锡袞被押至首府，沙定洲逼其上疏，实际上以当时云南巡抚吴兆元之疏上之，谎奏沙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守云南。疏行而后以稿示之，王锡袞激愤异常，祈祷，只求速死，数日后卒。

王锡袞诗《明诗综》七十一载《圣驾临雍恭纪》二首，雍容平和，有台阁诗风。《滇诗略》存其《风节亭诗》一首，考《明诗综》所载《圣驾临雍恭纪》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引史料，袁嘉谷对王锡袞“则公之仪型一代，有由来矣”^①的评价决非虚言。

《遗集》载《启明桥碑记》（盘龙江），不知为何时所作。此文极尽描绘之能事而不故作惊人之语，较为平实地记载了启明桥的地理位置和修葺之史。《贵州通志》卷四十四载《渡盘江铁桥》，亦不知为何时所作，录于下：

盘江始自武浔沱，犇流万里势滌滌。两岸雄关插碧天，一线羊肠山巖嶮。浪触云流倒泻来，逆望澎湃无时辍。几载舟人登棹艰，风急沿沂心胆裂。天生英杰拯民溺，独创慈航志已决。对此江神誓此身，一片精

^①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袁嘉谷《滇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22页）。

诚鬼神彻。飞梯何须藉鳌背，金绳直嵌山之侧。横空贯索插云蹊，补天绝地真奇绝。曾闻罗浮道士作浮桥，风雨薄蚀虞飘折。又闻飞阁用石盐，百年那得坚如铁。嗟哉我公，为禹之功，臣奚止云商家之舟楫。只今南北去住无望洋，直令万裸怀明德。

王锡衮生平事迹见于史籍和方志者，据王武科编《王文毅公集》^①之第二章，计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六十七）、《道光云南通志稿》、《滇南碑传集》、《新纂云南通志》、《云南历代名人事略》、《滇南五名臣遗集》、《滇绎》、《滇系》、《南疆逸史》、《禄丰县志》、《小腆纪年》等 11 种，又有零星文献记载 30 种，王先生收罗之全，迄今无人能出其右，但仍未赅备。《遗集》之《家谱》本传记载颇为混乱，《明大学士王文毅公事实纪略》所载与《明史》本传大同小异，其余诸传也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事实。所以袁嘉谷说，史载王锡衮之事甚简，滇志尤阙。笔者主要据《明史》和《遗集》本传，参之诸史传和方志，去其重复，加以考辨，将王锡衮生平创作和行实大略系年于下。王武科先生已辨明者，笔者在系年中若有所采纳则加以注明，其余不赘。

创作行实系年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 年）

中举。见《遗集》本传和方树梅辑《滇南碑传集·明宰辅》本传。

天启二年（壬戌，1622 年）

登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明史》本传载，诸传俱载。

天启六年（丙寅，1626 年）

《遗集》本传载，赍皇太子诏回滇，周贫掩骨，义助婚丧，复命，升侍读。

崇祯元年（戊辰，1628 年）

官少詹事。按少詹事为正四品，见《滇南碑传集·明宰辅》失

^① 王武科《王文毅公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 54 页）。

名本传二。《明史》本传：“崇祯中累官少詹事。”《道光云南通志稿》亦如此载，见卷一四六，人物志之一（转引自《王文毅公集》第24页）。“崇祯中”是指崇祯年间呢，还是崇祯中期？以王锡袞崇祯十二年升正詹事看，应指前者。存疑。

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

冬十一月，向皇帝上奏章为督师袁崇焕白冤。《滇南碑传集·明宰辅》失名本传一：是月清兵入塞，陷遵化，督师袁崇焕被下狱，王锡袞抗章为其白冤，有“蓟辽督师，非崇焕莫胜”等语。疏上，帝怒，王锡袞几乎遭到贬谪，后来得到宽免。

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

任同考会试官。见《遗集》本传。按“同考”即协同主考阅卷的官员。录取卞应聘等，俱名士。见《滇南碑传集·明宰辅》失名本传二。

著《经书解义》、《溪适草》等诗文集十卷。见《遗集》本传、《滇南碑传集·明宰辅》失名本传二。

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

以洗马掌司经局。《遗集》本传载。

七月，清兵复入塞，京师震动，明廷命大小臣工言事，锡袞上疏言历年边事之失策，因任将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任用不专之故，侃侃数千言，力请以卢象昇专任边事。见《滇南碑传集·明宰辅》失名本传一。

崇祯九年（丙子，1636年）

七月，奉命典试南都，录取张旷等人。见《遗集》本传。

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

同大司马范景文纠弹阁部杨嗣昌，一时权要为之敛迹。载《遗集》本传。按其事《明史》本传、范景文本传皆不载，杨嗣昌本传（《明史》卷二百五十二）载：“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三疏辞，不许。明年三月抵京，召对。

……至明年……六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夺情入政府，又夺情起陈新甲总督，于是楷、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诋斥，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继之。帝怒，并鐫三级，留翰林。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道周，遂鐫道周六级，并同升、士春皆滴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言之，亦获谴。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按“九年”——“明年”——“至明年”皆为崇祯十一年事，嗣昌本传下续“十二年”。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

升詹事府正詹事，按正三品。见载《遗集》本传、《滇南碑传集·明宰辅》佚名本传二。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

任总裁经筵日讲，擢礼部右侍郎。

《遗集》本传：“十三年庚辰，总裁经筵日讲。”又，《明史》本传：“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孙承泽撰《春明梦馀录》（卷七）：庚辰殿试日，上御舆张盖下丹墀，遍观诸进士对策。及十六日呈进，十七日，上忽召四十人对文华殿，遂拔顺天通州魏藻德第一，鄞县葛世振、静海高尔俨俱一甲，而复拔赵玉森、姚宗衡、刘瑄、孙一脉、严似祖为简讨，命蒋德璟、王锡衮教习之。”

修《玉牒》，任《实录》总裁。见《滇南碑传集·明宰辅》佚名本传二。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

二月，帝再耕藉（籍）田。锡衮上言说，连年闹旱蝗之灾，三饷（按明末加派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迭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损耗的粮食），让农夫安居乐业。

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并乞免黄道周永戍。

崇祯帝加尊天、地、水三官为大帝，锡衮谏止，并请驱逐真人张应京，不被采纳。

给事中沈允培请增全国各地解额，锡衮上言曰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上言云：举人不中进士，有三十年未谒选者，要

确定相应的做法和制度，如果数科考不中，应准其为官。崇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按，明人科举的谒选，主要是选贡。据《明史·选举一》，此为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上疏建议，明孝宗令下部议行之，为选贡之始。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奏请岁贡入监，礼部复请从举人中选入国子监。于是举人、选贡、岁贡三者迭为盛衰。何良俊（1506年~1573年）《四友斋丛说·史四》云：“壬子年秋，余谒选至京。”何良俊为嘉靖时贡生，荐授南京翰林院孔目。万历中，工科郭如心奏请停止选贡，神宗以为然。至崇祯时又行之。王锡衮的建议被崇祯帝采纳，当为举人谒选复行于崇祯之实。

调任吏部尚书，李日宣下狱，锡衮掌管吏部事。

崇祯帝天性纯孝，曾在秋夜感念圣母孝纯太后，欲终身吃素。王锡衮疏谏，崇祯帝嘉奖他寓爱于规，进秩一等。

八月，尚书林欲楫出视孝陵，锡衮以左侍郎掌礼部事。崇祯帝禁止内臣干预外政，敕令礼官稽先朝典制以闻，锡衮等备列诸监局职掌而不及东厂，遂与提督内臣王德化辩《国朝典彙》设东厂之据，以“正史无文，故不敢妄引”驳之，崇祯帝不听，锡衮复抗疏，请罢厂，亦不允。不久解除吏部职务，值讲经筵。

按以上事见《明史》本传（括号内文字为《遗集·明大学士王文毅公事实纪略》之异文）：“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明年秋，尚书林欲楫出视孝陵，锡衮以左侍郎掌部事。帝禁内臣干预外政，敕礼官稽先朝典制以闻，锡衮等备列诸监局职掌而不及东厂。提督内臣王德化言：‘东厂之设始永乐十八年，《国朝典彙》可据。礼官覆议不及，请解臣职，停厂不设。’锡衮等言：‘《典彙》虽载此条，但系下文笺注。臣等以正史无文，故不敢妄引。’帝不听，锡衮复抗疏，请罢厂，亦不允。二月，帝再耕藉（籍）田。锡衮因言频岁早蝗，三饷迭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又以时方急才，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黄道周永戍（帝加尊天、地、水三官为大帝，王谏止，并请逐真人张应京，不纳）。给事中沈允培请增天下解额，锡衮因言南畿、浙江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举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谒选者，宜定制，数科不售，即令服官。从之。欲楫还朝，锡衮调吏部尚书。李日宣下狱，遂掌部事。帝性纯孝，尝以秋夜感念圣母孝纯太后，遂欲终身蔬食。锡衮疏谏，帝嘉其寓爱于规，进秩一等。寻解部务，直

讲筵。”

作诗《圣驾临雍恭纪》二首，朱彝尊特为说明其背景：“崇祯十四年八月，太学当释奠思陵，有诏再临辟雍。于是罢遣阁臣及分献官。时能虎山真人张应京适在都，疏请入监观礼。尚书蒋公德璟暨王公咸持不可，驳回。十七日，王公奉遣祭夕月坛，二鼓，始诣国子监。十八日卯初刻，驾自长安左门出，由崇文街至成贤街入庙门。两公导帝升阶坐御幄，内官持金饼、金瓿、金炉者六人。天渐明，行释奠礼毕，幸彝伦堂祭酒。南居仁讲书《皋陶谟》，自‘天叙有典’至‘敬哉’，有土司业罗大任讲《易咸卦》。寻命赐茶。文班自衍圣公及阁部共一十九人，武班三十八人，分东西坐。帝命礼臣将《进士题名碑》并石鼓悉摹拓进呈，又谕阁臣周、程、张、邵、朱六子不当槩置先儒之列，乃定义改称先贤云。是举也，蒋公纪之特详，今节录以证王公之作。”^①按清代王植撰《皇极经世书解》云：“《宋史·道学传》首列周、程、张、邵、朱六子，百世同称大儒。”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

充上香导引官。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二十一《祈谷》云：“崇祯壬午，上亲行祈谷，《礼记》壬午正月初五日，上常服诣太庙，以亲诣南郊视牲，預告于太祖及列祖神御前。仍钦遣礼部左侍郎王锡衮、右侍郎蒋德璟、詹事黄景昉充上香导引官。”《春明梦馀录》（卷十四）所载同。

被李日宣纳入推选阁臣名单。《明史》（卷二百五十四）李日宣本传：十五年五月，会推阁臣，日宣等以蒋德璟、黄景昉、姜曰广、王锡衮、倪元璐、杨汝成、杨观光、李绍贤、郑三俊、刘宗周、吴牲、惠世杨、王道直名上，帝令再推数人。

荐马士英。《明史》（卷三百八）马士英本传：“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十五）：“南京大震，诏逮凤阳总督高斗光，起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抚宣府，取公帑馈朝贵，坐遣戍。至是，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其知兵，周延儒力赞之，遂自戍所起用。”按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诗综》卷七十一。

十四年（1616年）曾与怀宁阮大铖同会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1632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抚。

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

丁母忧，致仕。

《明史》本传：“十六年忧归。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至。”《明史》（卷二百七十九）文安之传：“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袞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赴。”按：文安之，湖北夷陵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与王锡袞为同年。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师业。

唐王朱聿键隆武元年（乙酉，1645年）

隆武帝立，召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锡袞得敕，集滇中子弟三千余人赶赴行在。《滇南碑传集·明宰辅》佚名本传一、二皆载其事，注曰：《遗集》作“永明王立”，《明史》本传“唐王立”，互异。《滇南碑传集·明宰辅》佚名本传二并说锡袞总督云、贵、湖、川、广五省军务，趋省城。此役时间，王武科编《王文毅公集》第二章第十六节之一《趋滇赴省的时间问题》，据当时交通情况和招募可能需要的时问，推测应在1645年至1646年8月之间，有理^①。

唐王朱聿键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

十二月作《风节亭恭记》并诗（《遗集》本传）。其《记》曰：“甲申三月之役，恨不获想从地下，只以母氏慈魄，扶归未宁。”落款为“隆武二年十二月十日”。全文独表尽忠故朝之心，后附《风节亭诗》，《滇诗略》亦见载，然观其风格用语，疑为伪托：

兀坐风节亭，万苦日日至。
焚香告皇灭，堕我烈皇泪。
新君飞海甸，畀臣恢剿事。

^① 王武科《王文毅公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

臣衮血性存，封疆惭大吏。
闺中弱息流，饶有鬓发眉。
臣衮复何言，安能死魑魅。

《遗集·家谱》尚载有《自誓》二首，亦疑为伪托。

清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

卒于土酋沙定洲作乱。《遗集》本传：“丁亥四月十九日死，谥文毅，奉旨依议，因时事迫促，未获奉行。”

按土酋沙定洲作乱，王锡衮由禄丰被押解至首府，逼其写上疏，实则另上一份，谬言沙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守云南。疏行而后以稿示之，锡衮大恨，只祈速死，数日后卒于首府贡院至公堂（在今云南大学内）。

《明史》本传：“土酋沙定洲作乱，执至会城，诡草锡衮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衮大恨，愬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按：《遗集·明史本传》后有清代师范考证，言疏出于当时抚按。《滇考》卷下《普吾沙乱滇》载：“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盘踞省城，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代天波镇滇。又至禄丰，执家居大学士王锡衮置贡院，胁之与兆元传檄各郡县。”

《云南通志·师旅考》（卷十六下）：本朝顺治二年……天波遂奔楚雄，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据省城，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代天波镇滇。又至禄丰执家居詹事王锡衮置贡院，胁之与兆元传檄各州县……四年正月……孙可望等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执巡按罗国臯，声言欲捣定洲巢穴，分兵出蛇花口。定洲时自楚雄还省城，闻之大惧，遂杀故詹事王锡衮于贡院，焚南城楼，遁走临安。

雍正《云南通志·列女》（卷二十二）：妾尚氏，禄丰人。王锡衮死沙贼之乱，尚氏恐受污，与锡衮弟妇俱自缢死。

关于王锡衮之死，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的记载，事涉担当（唐泰，字大来），备录于下：

沐天波走大理府，沙定州据云南，请宦大学士王锡衮相见，王

不屈。贡生唐泰为沙定州谋主，劝定州杀王，并杀诸乡绅，云南大乱。^①

此事其他史籍未见载，从史料来源看，《明季南略》的著者计六奇曾遍访实查，这条记载得之于时人口述。该文后注：“此云南鹤庆闻图轸所述，虽不雅劲，而叙事颇觉详明。”另外可能也有后人为担当讳的因素，故不载。

关于王锡袞之死，王武科编《王文毅公集》第二章第十六节之四《文毅公殉难情况问题》辨之甚详，认为“愤懑而死”之说不可信，笔者认为其据《滇南碑传集·明宰辅·王锡袞列传》推测王锡袞被杀害于贡院比较合理。传曰：“及可望兵至，定洲败，将归山峒，遣将杜其飞劫锡袞同行。锡袞复骂曰：‘我国之大臣，岂从贼往耶？’遂遇害。”^②

清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己丑，1649年）

王锡袞之子咨翼陈情礼部，礼部奉旨赠太子傅，谥忠节，复谥文毅。载《滇南碑传集·明宰辅》佚名本传一、二。

清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年）

谥烈愍。《明史》（《附明史卷二百七十九考证后》）：乾隆四十一年赐谥诸臣，侯伟时、王锡袞、高绩、金简、李如月、任国玺、那嵩、徐极、林贵阳、蔡演、张鏐、朱东旦、郑允元、胡士瑞、李元开、林钟、周允吉、朱议棨、任斗墟、易士佳通谥烈愍。

三、论明代云南文学绝句二十首

245

异峰突起

滇云文脉隐茫荒，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4页）。

② 王武科《王文毅公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谁道从来少玉章^①！
一自朱明安有夏^②，
异峰突起雅声昌。

流韵滇风

中原雅乐固醇深，
流韵滇南亦变音。
山水人文相印证，
竹枝蛮语^③自成吟。

宦滇诗人

山重水复边城仕，
瘴雨迷蒙岂惕伤。
致力隆平华夏地，
更兼教化与文章。

安宁杨一清

四朝元老^④栋梁杨，

① 玉章：对诗文或书简的美称。

② 有夏：指中国。有为词头。

③ 竹枝：郭文的《滇中竹枝词》颇得民歌神韵，开创了云南诗人向巴蜀民歌学习的先例。《升庵集》卷五十七《平居陈郭》条云：“滇中诗人，永乐间称平居陈郭。郭名文，号舟屋。其诗有唐风，三子远不及也。如《竹枝词》云：‘金马何曾半步行，碧鸡那解五更鸣。侬家夫婿久离别，恰似两山空得名。’”此后明清两代云南诗人作了不少《竹枝词》，杨慎亦有《滇海竹枝词》。“蛮语”：《明诗综》（卷四十二）引叶元礼云：“禺山（张含）诗如峡中女子，野花山叶，翠鬋银钗，非不饰姿弄鬓，拭粉游红，奈时作蛮语。”

④ 杨慎《为大学士杨文襄公故里题碑》：“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将入相，文德武功。”

自号石淙^①故里彰。
堪与茶陵相伯仲^②，
词章功业究谁长？

沧海遗珠

滴臣诗数千秋业^③，
善本佳编是美谈。
闻道武人颇胜选^④，
明初总卷数滇南。

昆明郭文

草海宽舒且作舟^⑤，
清波明月自风流。
轩车亲访难谋面，
独把心声对景酬。

-
- ① 杨一清先世居云南安宁石淙，后游寓巴陵，卜居京口，撰述题识，皆以石淙为号，以示不忘故乡。
- ②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说：“吾师崛起杨与李，力挽元化回千钧。”（《空同集·送昌毅诗》）清代赵藩曰：“后先七子休腾踔，合与茶陵角两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大学士杨一清》）
- ③ 藪：人或物聚集之地。明初云南都督沐昂编选的《沧海遗珠》，载录了明初迁流寓云南的21位诗人之作，在《四库全书》本《沧海遗珠》目录后四库馆臣按云：“其去取颇为精审，在明初总卷之中犹可称善本，非万历以后诸选声气标榜，珠砾混淆，徒灾梨枣者比也。”
- 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沧海遗珠》条）称：“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
- ⑤ 郭文买舟筑屋，隐居于滇池草海，自号舟屋，啸咏自得。都督沐璘闻名拜访，他避之于芦丛中不见。后沐璘弃车简从再访，郭文始与之布衣订交。

杨林兰茂贾惟孝

说道杨林两隐君^①，
升庵论定固超群。
嵩明山水真灵秀，
踵继诗家百代闻。

晋宁唐尧官

可叹科名多滞蹇^②，
解元枉自取边乡。
西南壮色非狂妄^③，
古道新声意气昂^④。

新都杨慎

碧峤空对茫茫水^⑤，
精舍还飘树树花。
鹏举青天悲断羽，
滇云有幸众诗家^⑥。

- ① 杨慎《庚寅岁赠贾东亩》：“兰叟和光卧白云，贾生东亩挹清芬。何人为续嵇康传，题作杨林两隐君。”
- ② 唐尧官为嘉靖四十年（1561年）乡试解元，多次春闱落榜后绝意仕进，隐居。
- ③ 唐尧官《山茶花赋》云：“移栽上林不可得，留与西南壮颜色。”山茶花实为诗人自况。
- ④ 担当《樾庵草·读先祖〈五龙山人集〉有感》：“古道敦素质，新声变其常。”
- ⑤ 杨慎嘉靖十六年（1537年）以来数寓昆明西山高峤，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起迁高峤定居。高峤一名碧峤，内有精舍，杨慎有《碧峤精舍记》。
- ⑥ 杨慎居翰林院修撰时因“大礼议”被永远充军云南永昌，流寓安宁、高峤、苍洱，追随者众多，如“杨门六学士”、“安宁诸友”等。云南嘉靖诗坛因而成为当时全国翘楚。

永昌张含

莫逆于心数载知，
慎含剑盖岂虚词^①。
又闻涂饰空同后^②，
变化胸襟却是谁？

大理李元阳

六士杨门气韵高^③，
中溪风度最清豪。
幽情山水偏能寄，
民瘼心关也郁陶^④。

呈贡苍雪

名山胜水凭禅悟，
管把诗家壶奥^⑤窥。
笔底风云枝上月，

-
- ① 张含与杨慎为世谊，他随其父张志淳宦游时，以弱冠之年和 12 岁的杨慎订交，成为终身最相契的朋友。至杨慎嘉靖四年（1525 年）来到永昌府（今保山），则如天启《滇志》（卷十四张志淳传）所言，“与含剑盖合”。此后张含始终与杨慎保持联系并唱和。
-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禺山文集》）：“盖慎在云南无可共语，得一好奇之士，遂为空谷足音，不觉誉之过当。且慎名既重，闻者咸推波助澜，而贗古之文又足以駭（按同骇）俗目，含遂盛为文士所称。实则涂饰之学与其师（按李梦阳，号空同）同一病源，各现变证也。”此论否定了张含诗歌的独创性。
- ③ 杨士云（弘山）、王廷表（纯庵）、胡廷禄（在轩）、张含（半谷）、李元阳（中溪）、唐铎（池南）为杨门六学士。
- ④ 郁陶：忧思积聚貌。
- ⑤ 壶奥：壶音 kǔn，内宫、内室；奥，室隅。比喻事理的奥秘精微。

梅村倾倒牧斋思^①。

晋宁担当

水啸山吟只眼看，
率真放浪岂寻常。
俗僧两界身如寄，
吞吐江山意气长。

昆明高应雷

春来花发怅东风^②，
淑浦还悲楚纍穷^③。
书剑愤生忠义气，
乡愁浸纸亦英雄。

① 吴梅村（1609年~1672年）名伟业，字骏公，梅村为其号。他和苍雪之交谊极深厚，《梅村集》以《赠苍雪》冠首，并赞扬苍雪“独游东海上，观者如墙堵。伽文开十诵，广舌演四部。设难何衡阳，答疑刘少府”。梅村又有《赠苍雪若镜两师见访》、《谢苍雪赠叶染道衣》等诗。苍雪圆寂后，吴梅村还写下了多首诗歌，以表达他对这位来自滇南的大师之怀念和尊敬。钱谦益（1582年~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文学史家，与苍雪相交甚深。他说：“余老归空门，与师结契尤笃。”（《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六《中峰苍雪法师塔铭》）钱谦益不仅为苍雪的诗集作序，而且在他圆寂后为其作塔铭。

② 高应雷流寓淑浦时作《花朝歌》，其《序》曰：“余十载天涯，动怀曩迹，但恐故园戎马，风景未必长妍。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③ 高应雷流寓淑浦时作《弹愤歌》曰：“屈平幽愤湘江岸，君山缥缈云飞断。似有湘灵石上啼，山鬼乘狸夜召唤。”楚纍：屈原的代称。宋代陈与义《晚步湖边》诗云：“楚纍经行地，处处馀《离骚》。”范成大《寄题向抚州采菊亭》诗云：“落英楚纍手，东篱陶令家。”

呈贡文祖尧

甲申变起痛焚冠^①，
自励清歌正气弹。
高啸低吟悲故宇，
桃源乡望断魂寒^②。

蒙化陈佐才

精魄石棺日月昭^③，
失巢孤鸟恨冲霄^④。
诗融千古忠臣血，
吊主悲歌起素飙^⑤。

丽江木氏

万卷楼^⑥藏书万卷，
文风踵起效高华。

-
- ① 甲申之变后诗人作《焚冠》诗道：“纱帽风霜历几时，庄严当日汉官仪。一朝倒置谁知惜，几处欢弹我自悲。懒挂东都同俗变，化为清气与云随。从兹烈烈冲霄去，涂炭休教得浼之。”
- ② 文祖尧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离娄东启程返乡，时年七十三岁。八月至湖南桃源，病中闻缅甸之变，悲愤绝食，卒于舟次。其孙文化兴迎柩，归葬于呈贡黄土坡。
- ③ 蒙化，今巍山。陈佐才在南明灭亡后凿石为棺，镌《自挽诗》于其上。诗曰：“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
- ④ 陈佐才有《失巢鸟》诗，比喻自己在明亡后彷徨无主的心情。
- ⑤ 吊主悲歌：沐天波被缅甸杀害后，陈佐才作《听说小传哭沐黔国父子》、《阅缅甸再哭沐黔国天波》。素飙：秋风。
- ⑥ 万卷楼：木公素喜读书赋诗，木府有藏书楼，名为“万卷楼”，其中藏有宋明各种善本数以万计。

雪山秀句称中土^①，
玉水终非旧日花。

宁州禄氏

论交万里羨吴中^②，
檄受艰危北赴戎^③。
集咏征途多壮志，
风华岂不眷边雄。

浪穹何氏

苍洱名花雪月风，
剪裁随意兴由衷。
百梅有律真佳韵^④，
亦取何家盛事同。

① 雪山：杨慎选木公诗 114 首，题名为《雪山诗选》。钱牧斋云：“皆中土诗句也。”（《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下）玉水：木青为木公的曾孙，歿后其子木增刻印其诗，题名为《玉水清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非中土诗也。

② 临安府宁州（今华宁县）土知府禄厚、禄洪父子皆有诗名。禄厚喜欢交结海内名流，曾万里论交，请吴中名士董其昌和陈继儒为其题写诗画，并和他们以文字相师友。

③ 禄洪世袭土知府。崇祯二年（1629 年）冬皇太极直逼北京，京师戒严。崇祯帝朱由检急征镇守巡抚将兵勤王，当时云南巡抚王伉飞檄禄洪，命他领兵入卫京都。禄洪率军纪律严明，甚为幕府所倚重。《北征集》成于勤王之役，禄洪与董、陈二名士的交游亦于此行。

④ 浪穹，今大理洱源县。何邦渐，字文槐，著有《初知稿》六卷，《百咏梅诗》一卷。袁嘉谷云《卧雪诗话》：“升庵百梅七律、钝庵（王廷表）百梅五律，百首叠韵，菊花百韵与文槐之《百咏梅诗》，皆属此派，惟文槐非叠韵耳。”“《百咏梅诗》刻本篇首标云：洱源七十九耕夫文槐何邦渐著，同邑八十五社叟宁宇寸居敬评，男何源长源受阅辑，侄何鸣凤翔凤校梓。二老佳话，一室瑶编，终属世家盛事”。（《云南丛书上》本《滇诗丛录》卷四引）

禄丰王锡袞

魏阙贤臣乱世忠，
仪型一代有丰功^①。
诗篇散佚精诚在，
翰墨归高贡院^②松。

① 袁嘉谷《滇绎》评王锡袞云“公之仪型一代”。

② 顺治四年（1647年）沙定洲作乱，王锡袞由禄丰被执至首府，数日后卒于贡院至公堂（在今云南大学内）。“归高”：推崇。王锡袞诗篇多散佚，其忠节则仪型一代，人即诗，诗即人，故曰“归高”贡院，气节如松。

附 录

一、本书主要参引书目

1.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明）朱元璋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怀麓堂集，（明）李东阳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空同集，六十六卷，（明）李梦阳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见素集，（明）林俊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皇甫司勳集，（明）皇甫汸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何文简疏议，十卷，（明）何孟春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清风亭稿，八卷，（明）童轩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升庵集，八十一卷，（明）杨慎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升庵先生文集，（明）杨慎著，杨有仁编辑，赵开美、陈邦瞻等校，出版年代不详。
10. 东冈集，（明）柯暹著，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齐鲁书社（1997年）。
11. 石淙诗钞，十五卷，（明）杨一清撰，李梦阳、康海辑，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12. 杨林两隐君集，二卷、附录一卷，（明）兰茂、贾维孝著，李文汉、李文林辑，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8年（1919年）刻本。
13. 李中谿先生全集，十卷，（明）李元阳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年间刻本。
14. 张愈光诗文选，八卷，附诗文集叙跋汇录一卷，（明）张含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15. 文氏三遗集合钞，十卷，（明）文祖尧等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甲寅年（1914年）刻本。
16. 桃川剩集，二卷，附补遗，（明）王廷表撰，辑刻《云南丛书》

- 处，民国年间刻本。
17. 北征集，一卷，（明）禄洪撰，（明）陈继儒辑，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18. 杨弘山先生存稿，十二卷，（明）杨士云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19. 高澹生诗文钞，二卷，（明）高应雷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20. 居易轩遗稿，二卷，（明）赵炳龙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21. 苍雪和尚南来堂诗集，（明）释读彻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2. 陈翼叔诗集，五卷，附石棺集一卷，（明）陈佐才撰，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3年（1914年）刻本。
 23. 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不分卷，（明）陈佐才撰，陈虞佐重订，民国34年（1945年）刻本。
 24. 杨升庵寓滇集，一卷，（明）杨慎著，（近）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25. 王昆华遗集，一卷，（明）王锡衮著，（近）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26. 焚书，（明）李贽著，中华书局（1975年）。
 27. 续焚书，（明）李贽著，中华书局（1959年）。
 28. 南园漫录，（明）张志淳著，李东平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29. 担当诗文全集，担当著，余嘉华、杨开达点校，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0. 王文毅公集，王武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31. 徐霞客游记，（明）徐霞客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 滇南诗略，四十七卷，（清）袁文典、袁文揆辑，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年间刻本。
 33. 滇南诗略续刻，十卷，（清）袁文揆、袁文典辑，清嘉庆七年（1802年）肆雅堂本。
 34. 丽郡诗征，十二卷，附文征八卷，（近）赵联元辑、赵宗翰校，辑刻《云南丛书》处，（出版年代不详）钞本。

35. 滇诗拾遗，六卷，（清）陈荣昌辑，辑刻《云南丛书》处，（出版年代不详）刻本。
36. 滇诗拾遗补，四卷，（清）李坤辑，方树梅校补，辑刻《云南丛书》处，（出版年代不详）刻本。
37. 滇诗拾遗未刊稿，三卷，（清）陈荣昌辑。
38. 滇诗丛录，一百卷首一卷，（清）袁嘉谷等辑，辑刻《云南丛书》处，（出版年代不详）钞本。
39. 滇文丛录，一百卷首一卷，总目二卷，作者小传三卷，（清）秦光玉辑，（出版年代不详）刻本。
40. 滇文丛录删稿，不分卷，辑刻《云南丛书》处辑，辑刻《云南丛书》处，（出版年代不详）刻本。
41.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首一卷，（清）袁文揆、张登瀛辑，辑刻《云南丛书》处，（出版年代不详）刻本。
42. 沧海遗珠，四卷，（明）沐昂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 明词综，（清）王昶辑，金匱浦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本。
44. 石仓历代诗选，（明）曹学佺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明文衡，（明）程敏政编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明诗综，（清）朱彝尊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明文海，（清）黄宗羲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清）黄虞稷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 永昌府文征，（清）李根源辑，杨文虎、陆卫先校注，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51. 列朝诗集小传，（明末清初）钱谦益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52. 晋宁诗征，不分卷，（近）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3. 历代滇诗选，三十二卷，首一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4. 历代滇诗补编，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5. 历代滇游诗抄，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6. 古滇文合抄，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7. 续滇文丛录，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8. 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稿，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59. 云南丛书提要，不分卷，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0. 晋宁文献录，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1. 滇南学者生卒考，三卷，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2. 明末人物传，佚名，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3. 明季滇南忠烈录，不分卷，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4. 云南乡贤事略，不分卷，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5. 滇贤生卒考，不分卷，方树梅撰，《学山楼丛书》未刊稿。
66. 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不分卷，国立云南大学（1944年），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复本零本刻本资料。
67. 升庵年谱，一卷，附遗事一卷，集略一卷，寄赠一卷（清）程封撰，（近）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复本零本刻本资料。
68. 滇南名宦传，不分卷，（清）秦光玉撰，民国38年（1948年），（近）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复本零本刻本资料。
69. 担当年谱，一卷，出版年代不详，方树梅辑，《学山楼丛书》复本零本刻本资料。
70. 滇南碑传集，（方树梅辑，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71. 重葺杨文襄公事略，一卷，（明）谢纯原辑，（清）朱淳增辑，辑刻《云南丛书》处，民国11年（1922年）刻本。
72. 明滇南五名臣遗集，（清）李根源辑，出版地不详，清宣统3年（1911年）刻本。
73. 云南历代诗词选，张文勋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74. 明史，（清）张廷玉修，中华书局（1974年）。
75.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清）黄宗羲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 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明）凌迪知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 云南通志（万历），十七卷，（明）邹应龙撰，民国23年（1934年）刻本。
78. 云南通志（正德），四十四卷，（明）周季凤撰，云南省图书馆

据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三十二年（1553年）刻本。

79. 云南通志（万历），十七卷（明）邹应龙修，（明）李元阳撰，云南图书馆据天津任振采藏明万历四年（1576年）刻本传抄皮藏。
80. 云南通志（雍正），三十卷，（清）鄂尔泰监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 滇志（天启），（明）刘文征撰，（今）古永继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82. 滇略，（明）谢肇淛撰，《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李春龙、刘景毛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83. 滇绎，（清）袁嘉谷，《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本，李春龙、刘景毛点校，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84. 滇史，（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点校，德宏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
85. 滇考，（清）冯甦撰，徐文德等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86.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明）陈文撰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87. 新纂云南通志，（近）周钟岳等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88. 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今）梁公卿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89. 云南史料选编，李春龙、杨名铨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90. 苍雪大师行年考略，一卷，陈乃乾撰，民国29年（1931年）刻本。
91. 明季南略，（清）计六奇著，中华书局（1984年）。
92. 方国瑜文集，方国瑜著，林超民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93. 杨慎学谱，王文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94. 兰茂诗词新注，嵩明县文化局、兰茂纪念馆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95. 杨慎评传，丰家骅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6. 明诗话全编，吴文治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97. 国学丛谭，张文勋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98. 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年~1550年），余来明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二、按《新纂云南通志》编制别集简表

按：本简表以《新纂云南通志·集部·明代书目》为文本编制而成，以方便读者检索。对原文本中明显的错误有所辨析，地名则以明代称谓为准，与今不同者加注今名。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止庵吟稿、碧山樵唱、山堂杂稿	兰茂	茂，字廷秀，一字止庵，嵩明杨林人	是书万历《志》已著录。
玄壶集	兰茂	茂，见上条。	收入《滇诗拾遗》。
讷轩集	罗庸	庸，字孟宣，号近庵，临安（今建水）人。	万历《志》已著录。
横峰樵唱	丁嵩	嵩，保山人。	万历《志》已著录。
一庵集、草庭吟	王宗	宗，字约守，晋宁人。	《晋宁州志》录诗二首。万历《志》已著录。
钝庵稿	张曷	曷，字德远，保山人。	是书万历《志》已著录。
东轩集	施铨	铨，字文衡，昆明人。	万历《志》已著录，名《东轩稿》。
舟屋集	郭文	文，字仲炳，昆明人。	万历《志》已著录。《滇南诗略》录诗八首。
清庵集	朱克瀛	克瀛，字孔渊，号清庵，晋宁人。	《晋宁州志》录诗四首。道光《志》已著录。
朴庵集	施继先	继先，字汝孝，南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鹤轩集	张西铭	西铭，字希载，宁州人。	万历《志》已著录。《滇南诗略》录诗一首。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碧莎鸣蛙集	赵子禧	子禧,字庆夫,鹤庆人。	是书早佚。按《新纂云南通志》此载疑误。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一)著录《碧莎》、《蛙鸣》二集,万历《云南通志》著录《蛙鸣集》。《丽郡诗征》录诗一首。万历《志》著录,名《蛙鸣集》。
梅窗集	万纶	纶,字允言,保山人。	是书万历《志》名《西窗集》。道光《志》已著录。
公余清韵	丁昶	昶,字德辉,号乐善,蒙化人。	道光《志》已著录。
退食漫吟 一卷	李宗儒	宗儒,字希雍,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
永昌百咏	滕檠	檠,字秀之,永昌(今保山)人。	万历《志》已著录。
可亭集	萧景时	景时,字应元,晋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晋宁州志》录诗一首。
介轩集、东篱集	张志信	志信,字任之,保山人。	万历《志》已著录。
裨乡集	杨南金	南金,字本重,号用章,邓川人。	道光《志》已著录。
凝斋行稿	汪城	城,字维翰,腾冲卫人。	道光《志》已著录。
时轩吟稿	易经	经,字人常,腾冲卫人。	道光《志》已著录。
啾鸣集	张云鹏	云鹏,字天翼,太和人。	道光《志》已著录。
豫斋集	刘容	容,字孟仪,临安(今建水)人。	万历《志》已著录。
南园集	张志淳	志淳,字进之,号南园,永昌(今保山)人。	是书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二十七首。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石淙诗稿 十九卷	杨一清	一清,字应宁,安宁人。	是书《云南丛书》已收入。《滇诗略》录诗一百七十八首,《滇诗拾遗》录诗过三百首,朱彝尊《明诗综》录诗二十一首,汪端《明三十家诗》附李东阳录诗六首。
吏部献纳稿、吏部题稿五卷	杨一清	一清,见前条。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嘉靖间刻本,兹据以著录,云南丛书处移抄收入《丛书》二编中。《东坡居士陆楔万卷楼书目》中别有吏部题稿五卷。
张禹山诗文选 八卷、附录一卷	张含	含,字愈光,永昌(今保山)人。	是书收入《云南丛书》标名为《张愈光诗文选》。俞宪盛《明百家诗》录诗一百一十首,《明诗综》录诗六首,《滇诗文略》录诗一百一十首、文二十四篇。
李太白诗选 四卷	张含	含,见前条。	收入《云南丛书》二编,去其钟惺、梅鼎祚评,专录杨慎评语,以还本来面目。
李中谿先生全集十卷	李元阳	元阳,字仁甫,号中溪,太和人。	是书《云南丛书》收入。《滇诗略》录诗五十首,《文略》录文四十二篇。《滇南诗选》录诗五首。《滇诗拾遗》录二百一十五首。刘文征《滇志》著录名《中溪集》。倪蜕《滇小记》著录,名《中溪漫稿》,清代诸通志同。
思亲百咏	万琮	琮,新兴(今玉溪)人。	道光《志》已著录。
杨宏山先生存稿 十二卷	杨士云	士云,字从龙,号宏山,大理人。	收入《云南丛书》。《咏史诗》(卷一、二),万历《志》已著录。《滇诗文略》录诗一百一十六首,录文三十九篇。
学樵诗集	方端	端,字友正,晋宁人。	《晋宁诗征》录诗二首。
钝庵读史、删后诗集	王廷表	廷表,字民望,阿迷(今开远)人。	此《删后诗集》今未见。道光《志》已著录。
桃川剩稿	王廷表	廷表,见前条。	是书江苏国学图书馆收藏,昆明何秉智移抄,收入《云南丛书》二编。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乐天集	吴尧献	尧献,号夏云,大理人。	万历《志》已著录。
乘槎集、南霞集	吴懋	懋,字德懋,大理人。《大理府志》:懋,号高河,官至顺庆府通判。	是书万历《志》已著录。
岐山稿新志	张凤翀	凤翀,字文彬,宁州(今华宁)人。	天启《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十一首。
清隐诗集	官惠	惠,蒙化(今巍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
报春望云卷	郭廷珪	廷珪,字朝信,号菊野,蒙化(今巍山)人。	《滇诗略》录诗一首。道光《志》已著录。
绣衣集 一卷	陈表	表,号草池,新兴(今玉溪)人,寄学晋宁。	《新兴州志》录文三篇,诗一首。
破碗集	孙继鲁	继鲁,字道甫,号松山,昆明人。	《万历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一首。
牧羊山人集	黄明良	明良,字时际,晋宁人。	是书雍正《志》作《西牧山人集》。按:晋宁西南距城五里,有牧羊山,黄氏先茔在其上,以“牧羊”为是。《晋宁州志》录诗十三首,文三篇。
池南按陕集	唐铎	铎,字子荐,号池南。晋宁人。	明、清诸《通志》《晋宁州志》皆未著录。见晁氏《宝文堂书目》。
揽翠山房集	李东儒	东儒,字未详,剑川人。	道光《志》著录,云白下殷海岱评。
贲所文集	张合	合,字懋观,号贲所,永昌(今保山)人。	是书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五首。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剩语闲吟稿	贾惟孝	惟孝,字若曾,号东晦,杨林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十一首,《滇诗拾遗》录十九首,《嵩明州志》录七首。李坤抄入《拾遗补》。李文汉、文林兄弟又搜得二十九首,合《诗略拾遗》《拾遗补》总得六十六首,与兰茂诗合编为《杨林两隐君集》。
三楚壮游诗	杨伯诚	伯诚,安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加案语云:《安宁州志》嘉靖乙酉举人杨茂,官岳州府通判,伯诚或茂之字,然不言有《三楚壮游诗》。按《升庵集》卷三有《三楚壮游诗序》,曰:“杨子伯臣者,连然韵士也。”
雪山诗选	木公	公,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丽江人。	道光《志》已著录。收入《云南丛书》二编。
饷余枕蓑吟稿、雪堂词、彩芷碧乐府	董难	难,字西羽,大理人,从杨慎游。	是书万历《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五首。
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	木公	公,见前条。	沈德潜《明诗别裁》录诗二首,《明滇南诗略》录诗四十六首,赵联元《丽郡诗征》录诗五十七首。
渔溪集	孟富	富,字以安,号渔溪,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一首。
枕泉诗稿	丁希度	希度,定远人。	道光《志》已著录。
苍洱集、咏天下名胜诸编	高可观	可观,大理人。	道光《志》已著录。
开啸集	偃应东	应东,姚州人。	是书道光《志》已著录。
宁澹诗草	史旌贤	旌贤,字廷俊,云南县(今祥云)人。	是书道光《志》合《西台奏议》《维风编》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二十二首。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居易稿	柴宗儒	宗儒,字师鲁,南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朝霞集	樊巍	巍,字松峦,鹤庆人。	道光《志》已著录。
归来园集	李茂阳	茂阳,字三山,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
龙溪集	叶松	松,姓王,复姓叶,宾川人。	道光《志》已著录。
星予稿 十卷	陶庚	庚,字子明,号星予,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一首。
涔南诗文稿 二卷	万文彩	文彩,字国华,号涔南,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冰玉堂集	严清	清,字真甫,昆明人。	是书天启《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二首,《云南府志》录诗三首。
梅樵集	马继龙	继龙,字云卿,号梅樵,永昌(今保山)人。	天启《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六十八首。
山斋集	俞汝钦	汝钦,楚雄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二首。
愉老强学集、枕源野韵	张如凤	如凤,镇南人。	是书道光《志》已著录。
保秀堂稿	石雷	雷,永昌(今保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
田园杂兴、林皋杂兴	龙施	施,字德敷,昆明人。	是书天启《志》已著录。
存拙稿、延明精舍集、自任归集	张必焕	必焕,字征文,永昌(今保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五龙山人集 三十三卷	唐尧官	尧官,字廷俊,晋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四首,《云南府志》录诗八首,《晋宁州志》录诗十八首、文十三篇,《滇文略》录文七篇。
沙坪草堂集	樊相	相,字汝弼,邓川人。	道光《志》已著录。
静斋诗	李鼎元	鼎元,字茹初,罗次(今属禄丰)人。《县志》作“调元”。	道光《志》已著录。
宁澹轩草	史旌贤	旌贤,字廷俊,云南县(今祥云)人。	是书道光《志》已著录。
禅喜禅续集	张廷璧	廷璧,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世外俚言诗	陈世冶	世冶,自号抱瓮老人,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玉水清音	木青	青,字长生,一字乔岳,号松鹤,丽江人,木公曾孙。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五首。
啸月函诗集、芝山集、光碧楼选草	木增	增,字生白,丽江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二首。
诗草 一卷、龙津集	何邦宪	邦宪,字宗月,宾川人。	道光《志》已著录。
南游漫稿	萧崇业	崇业,字允修,号养乾,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雅言集、立言文集	杨应科	应科,字时升,号顺庵,剑川人。	《滇南诗略》录诗九首,《丽郡诗征》录诗八首。
玉壶冰集	赵以康	以康,字元锡,号宏宇,浪穹(今洱源)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白业楼稿	张薰	薰,字伯舜,归化(今属呈贡)人。	天启《志》已著录。《呈贡县志》录诗八首。
乐寿堂文集、川黔游草	谈三极	三极,字立之,号太宇,蒙白人	道光《志》已著录。
来紫堂集	尹愉	愉,蒙白人。	道光《志》已著录。
羽岑园秋兴、吴越吟草	闪继迪	继迪,字允修,永昌(今保山)人。	《滇诗略》“羽岑”作“雨岑”,录诗三首。道光《志》已著录。
观海亭集	许登高	登高,字小鲁,通海人。	道光《志》已著录。
锦囊集	申吾敬	吾敬,陆凉人。	道光《志》已著录。
台山晚咏前、后二集	李萃	萃,字晨宇,号松轩,呈贡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拾遗》录诗一首。
乐真蝉鸣集、藏海探珠集	傅遇高	遇高,字克升,南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元畅楼集	刘养中	养中,字望龙,蒙化(今巍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
十海诗集	唐懋德	懋德,号十海,晋宁人,释普荷之父。	道光《志》已著录。
贡幽吟、阳城纪胜	朱化孚	化孚,号岱晟,安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一首。
素吟草、山窗漫言	杨忠亮	忠亮,字苾卿,一字元葛,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山窗”作“山房”。漫,《临安府志》作“蔓”。《滇诗略》录诗十四首。
初知稿 六卷 百咏梅诗 一卷	何邦渐	邦渐,字文槐,号绍渠,浪穹(今洱源)人。	《初知稿》未知刻否,现尚有抄本。《明滇诗略》录四首,《续刻》录两首。《咏梅诗》已刻。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寤歌楼集	赵日亨	日亨,号贞所,安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晴川集	王来仪	来仪,字仲威,昆明人。	《滇诗略》录诗二十三首。
凝翠集	王元翰	元翰,字伯举,号聚洲,宁州人。	是书道光《志》著录为《谏草凝翠轩诗》。《云南丛书》收入。
浮石岛诗	陈鑑	鑑,字虚白,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阆园集	陶珽	珽,号葛阆,晚号悦禅,又号不退,姚安人。	道光《志》已著录。
肖鹤余音	无名氏	不详	道光《志》已著录。
金台集、桧亭集	孔聘贤	聘贤,字泾阳,通海人。	道光《志》已著录。
宜竹居集、看剑楼集	李玉素	玉素,字昆源,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
葵谷草一卷	雷跃龙	跃龙,字石庵,新兴(今玉溪)人。	《滇诗略》录诗五首,《滇诗拾遗》录诗一首,《拾遗补》录诗十八首,皆在其集中。
嵩崧集、半留亭稿	何鸣凤	鸣凤,号巢阿,浪穹(今洱源)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十一首。
广叩缶集	俞焜	焜,字溟湖,永平人。	道光《志》已著录。
思亲集	华大统	大统,字君亮,通海人。	道光《志》已著录。
松鹤轩集	马质	质,字彦文,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竹坡集	朱绅	绅,字孟瑞,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桂林集	郭镛	镛,字希声,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退庵集	江濬	濬,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寄园集	陶珙	珙,姚安人,珽弟	道光《志》已著录。
垃圾堆诗卷	符节	节,字性善,保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
可吾吟集	李舜耕	舜耕,昆阳人。	道光《志》已著录。
文变 十二卷 书变 三十卷 自知楼点易 三卷 玉壶冰 一卷 玉鹊庵稿、概居稿、心如堂稿	杨应桂	应桂,字灵宝,一字徽郎,号玗云,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柏斋遗草	王元英	元英,字秀寰,剑川人。	道光《志》已著录。
鹿堂诗集	朱朝蕃	朝蕃,字岳生,陆凉人。	道光《志》已著录。
鹤鸣篇 三集	闪仲侗	仲侗,字士觉,永昌人(今保山),继迪季子。	道光《志》已著录。
阮吏部诗文集	阮元声	元声,马龙人。	道光《志》已著录。
畸庵草 一卷	高桂枝	桂枝,字树秋,号畸庵,邓川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十六首。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上元诗集	陈玺	玺,字泰籙,号石保,安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明阳山房遗诗一卷	文祖尧	祖尧,字心传,号介石,呈贡人。	《云南丛书》收入,并子《醉禅草》、孙《晚春堂诗集》,定名为《呈贡文氏三遗集》。《滇诗略》录四十四首,《滇南诗选》录五首。道光《志》已著录。
离忧集 二卷	文祖尧	祖尧,见上条。	是书已刊行,因清乾隆时抽毁违碍书籍,仍付劫烬。
鼻雷斋集	罗九有	九有,号云石,安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蓼怀文集 四卷	张启贤	启贤,字蓼怀,鹤庆人。	文散佚,《丽郡诗征》录诗四首。
翠屏诗集 一卷	杨绳武	绳武,字念尔,弥勒人。	道光《志》已著录。《明滇诗略》录四首,李根源《明滇南五名臣集》录诗二首,方树梅《滇南茶花小志》录《和邓溪茶花百韵》一首。
向薇夫集	向于宸	于宸,河西人。	道光《志》已著录。
玉兔草	杜天桢	天桢,楚雄人。	道光《志》已著录。按《楚雄府志》,天桢又撰有《燕携集》,与同邑同时萨天璟所撰同名,而《楚雄县志》不载,疑为府志之误。
通庵集、西湖草	萧琯	琯,字云五,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朝霞山集、蓼怀集	张九贤	九贤,鹤庆人。	道光《志》已著录。
芝樵诗草	辛亨	亨,永昌(今保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
止园集、古柏斋文草	张一甲	一甲,字退叔,号藁君,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居易轩诗文钞八卷	赵炳龙	炳龙,字文成,一字云川,剑川人。	收入《云南丛书》。《滇诗略》录诗一首,《滇诗拾遗》录诗四十八首,《丽郡文征》录文七篇、《诗征》录诗六十一首。
鸿雪草	陈士恪	士恪,字元敬,楚雄人。	道光《志》已著录。
脉望斋草	刘联声	联声,字毅庵,楚雄人。	《滇诗略》录诗三十二首,《滇诗拾遗补》录诗十二首。
藿场老人诗钞	迟光启	光启,字开先,昆阳人。	其诗未刻,今昆阳有传抄本,为数寥寥,其散佚者多矣。
北征集一卷	禄洪	洪,字霄宾,宁州(今华宁)人,竹居子。	收入《云南丛书》之中。
宁瘦居集、是何庵集、天叫集	陈佐才	佐才,字翼叔,蒙化(今巍山)人。	道光《志》已著录。《宁瘦居集》收入《云南丛书》。《滇诗略》录诗五十八首。
顶莲集	唐华	华,字六湛,晋宁人,唐泰之弟。	道光《志》已著录,误为康熙初诸生。《滇诗略》录诗三首,《晋宁州志》录诗二首。
山中逸趣集、空翠居录	木增	增,字生白,丽江人。	道光、光绪及光绪《续通志》俱著录。明《滇南诗略》录诗二首,《丽郡诗征》录诗二十七首。
说石山房集、碧磊集、驴背集	孙桐	桐,字我仪,号碧磊山人,鹤庆人。	三书道光《志》已著录。《滇南诗略》录诗二首,《滇诗拾遗》录诗二首,《丽郡诗征》录诗十一首。
浪楂稿	何蔚文	蔚文,字稚玄,浪穹(今洱源)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雪山堂集	李暘藻	暘藻,字涵白,昆阳人。	道光《志》已著录。
出山集、还山集	庄以裕	以裕,字仲元,南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
梅山集	孙袞	袞,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谦斋集	马信	信,字士辕,通海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槐庭集	王尚圣	尚圣,字睿思,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石阳集	张傑	傑,石屏人。	道光《志》已著录。
陇亩集	张国正	国正,字永和,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
借庵诗草 三卷	朱昂	昂,字子眉,昆明人。唐泰之外甥。	《滇诗略》录诗六十首。道光《志》已著录。
闲云轩诗文集	李思揆	思揆,号鹤胎,南宁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六首。
醉禅草 一卷	文俊德	俊德,字士宾,一字秋水,呈贡人。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九首。《滇南诗选》录一首。
烟坪诗钞二卷	陆天麟	天麟,字玉书,宁州(今华宁)人。	收入《云南丛书》。
高澹生诗文钞二卷	高应雷	应雷,字澹生,昆明人。	收入《云南丛书》。
方山吟稿	方世瑜	世瑜,字握之,号方山,晋宁人。	《晋宁诗征》录诗三首。
伍山集略	辛恪	恪,昆明人。	道光《志》已著录。
浪栖草	姜维蕃	维蕃,字介侯,楚雄人。	道光《志》已著录。
燕携草	萨天璟	天璟,字又宋,楚雄人。	道光《志》已著录。
云迹草	严士龙	士龙,字卧龙,号樵隐,昆明人,严清之孙。	道光《志》已著录。
野庵集	蓝和	和,字景中,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煮雪轩稿	凌广	广,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顺斋集	叶舟	舟,字济川,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易亭集 八卷	刘璈	璈,字景寅,临安(今建水)人。	道光《志》已著录。
白溪渔者集、蒿园集	张以恒	以恒,字子正,大理人。	道光《志》已著录。《大理府志》录诗一首。
菊花百咏	陈王廷	王廷,字冰素,号菊潭,广西人,明季遗民。	诗未梓,大关张维翰得其钞本,为《序》而印行之。
异野文集	马明阳	明阳,字异野,新兴(今玉溪)人。	道光《志》已著录。按:道光《通志》云康熙间举人,查《选举志》无马明阳。秦光玉据《新兴州志》考之,系明季遗民,收入《遗民录》,今从之。
日梅轩集	王氏	永昌(今保山)万纶的妻室。	道光《志》已著录。
朝天集	释无极	无极,洪武间感通寺僧,授大理府僧纲司都纲。	道光《志》已著录。
苍山集	释洪如	洪如,号无住,俗姓邓,定远人,崇祯间云南县水目寺僧。	道光《志》已著录。
风响集、禅师颂	释禅	释禅,号本无。俗姓张,名初俊,昆明人,万历间丽江悉檀寺僧。	道光《志》已著录。

集名	作者	作者简介	备注
南来堂诗集四卷	释读彻	读彻,字见晓,号苍雪,呈贡赵氏子。昆明妙湛寺僧,后住苏州支硎山,重兴支公道场。	收入《云南丛书》。《滇诗略》录六十首,《滇南诗选》录二十六首,《滇诗拾遗》录一百三十首。
偃园集、概庵集十四卷	释普荷	普荷,名通荷,号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晋宁人。	《云南丛书》收入,易其名《担当遗诗》。《滇诗略》录诗八十二首,《滇诗拾遗》录诗八十四首。
清心集	释本智	本智,字朗目,南宁人,嘉靖间普照寺僧。	道光《志》已著录。《滇诗略》录诗六首。
一衲云游草	释行脚	行脚,剑川向湖村赵氏子,名鳌,字海六,诸生,明末入宝岩居披薙。	诗已佚,仅传《鸡足山题壁》一首。
竹室集	释净伦	净伦,号大巍,别号竹室,俗姓康,昆阳人,成化间成都万佛寺僧。	道光《志》已著录《子部·释家类·曹溪一滴》亦收此集在内。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元明清文学硕士研究生王雪云制表)

三、重要论著论文索引

(一) 专著 (1940年~2009年)

1. 苍雪大师行年考略/陈乃乾著,出版地、出版单位不详(1940)。
2. 李贽年谱/容肇祖编,三联书店(1957)。
3. 明季滇黔佛教考/陈垣撰,中华书店(1962)。
4. 明苍雪大师赵读彻行年考略/王培孙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5. 云南诗歌史略/蓝华增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6. 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孙官生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7. 王文毅公集/王武科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8. 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张福三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9. 兰茂评传/苏石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0. 古滇文化思辨录/余嘉华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11. 杨慎评传/丰家骅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 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沈海梅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3. 历代宦滇督抚生平概略/云南省图书馆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
14. 担当/朱万章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15. 杨慎诗学研究/雷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6. 李贽评传/许苏民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7. 杨一清评传/谭祖安、戴美政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二) 论文集集中的文章(1963年~2008年)

1. 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江应樑,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63)。
2. 明代纳西族诗人木公和木增/赵银棠,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
3. 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的崛起/杨世光,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编印单位同上(1983)。
4. 明代白族诗人杨黼的家世,生平和思想/傅光宇、张福三,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编印单位同上(1983)。
5. 杨慎在云南的交游和文化影响/陈廷乐,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出版单位不详(1984)。
6. 白族学者李元阳思想刍议/龚友德,哲学与云南民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7. 滇南乡贤兰止庵/晁世新,《嵩明文史资料选辑》/政协云南省嵩明县委员会编,出版单位不详(1989)。
8. 兰茂和他的《早梅诗》/孔庆福,嵩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编印单位同上(1989)。
9. 兰止庵事略/张孔嘉,嵩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编印单位同上

- (1990)。
10. 明代白族思想家李元阳/伍雄武, 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伍雄武、杨国才编, 民族出版社(1992)。
 11. 李贽在姚安时期的思想辨析/卜其明, 滇中文化论丛/陈敢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12. 杨一清诗论/王运生, 云南文史论集/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13. 担当诗书画艺术评价/张苇研, 云南文史论集/编印单位同上(1994)。
 14. 风节高劲的李元阳/李行建, 云南廉政名人录/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5. 俸钱常喜赎民劳的李贽/王樵, 云南廉政名人录/编印单位同上(1997)。
 16. 李贽在姚安时的文化思想评说/马旷源, 回族文化论集/马旷源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7. 李贽的自警联/向明, 姚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政协姚安县委员会编, 出版单位不详(2001)。
 18. 杨状元陈御史吟诗同游归化海宝寺/管世恭, 历代名人在呈贡及外地轶事/管世恭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19. 李贽呈贡三台山题名联/管世恭, 同上书。
 20. 徐霞客在斗南村滇池海滨题名句/杨沛恭, 同上书。
 21. 明末清初云南理学家文学家文祖尧先生/管世恭, 同上书。
 22. 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著作/余海波、余嘉华, 西南古籍研究/林超民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3. 李元阳年谱/王艳萍, 西南古籍研究/林超民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4. 李元阳交游考/王艳萍, 白族文化研究/赵寅松主编, 民族出版社(2002)。
 25. 李贽在姚安/郭开云, 姚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政协姚安县委员会编, 出版单位不详(2003)。
 26. 杨林两隐君一兰茂与贾惟孝/李正清, 嵩明文史资料(第九辑)/政协嵩明县委员会文史委编, 出版单位不详(2004)。

(昆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系2007级学生刘慧芳辑录)

(三) 期刊论文 (1957 年 ~ 2009 年)

1. 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和土司/江应樑, 云南大学人文科学杂志/1957. 1
2. 李贽离滇的年代及其在滇时期的一些活动/砚孙、乘潮, 学术研究/1963. 7
3. 关于杨慎生平年代的订正/张增祺, 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0. 1
4. 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秦佩珩, 求是学刊/1980. 3
5. 明修九种云南省志概说/方国瑜, 思想战线/1981. 3
6. 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崛起/杨世光, 云南社会科学/1982. 5
7. 试论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龚荫, 昆明师院学报/1983. 2
8. 杨慎卒年新证/穆药, 昆明师院学报/1983. 3
9. 陈翼叔的生卒年/张秉祥, 昆明师院学报/1983. 4
10. 陈翼叔及其诗歌简论/张秉祥, 大理师专学报/1984. 3
11. 杨升庵对云南文化的重大贡献/李锡恩, 大理师专学报/1985. 1
12. 担当年谱/方树梅, 云南文史丛刊/1985. 1
13. 担当生卒年月及其作品/浦汉英, 云南文史丛刊/1985. 1
14. 明末遗民诗人陈佐才和他的诗歌创作/陈力,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 2
15. 杨慎年谱(上)/何作楫, 云南文史丛刊/1985. 2
16. 杨慎年谱(下)/何作楫, 云南文史丛刊/1985. 3
17. 杨升庵诗歌创作中的人民性/李锡恩, 大理师专学报/1985. Z1
18. 明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土归流/曹相, 昆明师院学报/1986. 1
19. 杨士云及其作品/张志明, 云南文史丛刊/1986. 1
20. 明末遗民陆天麟及其诗歌/张士儒,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 2
21. 关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龚荫, 明清史/1986. 3
22. 明末清初浪穹县何氏家族诗人群/张志明, 云南文史丛刊/1986. 4
23. 南明永历帝入滇纪事(上)/何小泉(辑录), 云南文史丛刊/1986. 4
24. 论明代沐氏世镇云南/潘洪刚, 云南社会科学/1987. 2
25. 明末云南黔国公沐氏兴衰史/万揆,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 2
26. 高名千古博南山——杨慎与杨门六子(纪念杨慎诞辰五百周年)/穆药, 大理师专学报/1988. 2
27. 访昆明现存杨慎碑刻/王海涛, 大理师专学报/1992. Z1

28. 从《徐霞客游记》看明代云南的道教/郭武,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4
29. 从《徐霞客游记》看明代云南的道教/郭武,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4
30. 杨慎描绘云南的诗歌/余嘉华, 学术探索/1996. 3
31. 杨慎和他的咏滇诗/张应松、朱子由, 大理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3
32. 杨慎与明代中期的云南文学/陶应昌,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1
33. 明代出版家毛晋与云南丽江木增的交往/黄李初, 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 1
34. 略论晚明云南作家/陶应昌, 学术探索/1999. 1
35. 论明代云南理学家兰茂的思想/杨开达,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5
36. 飘零数十载题咏满苍山——大理感通寺与杨升庵诗文创作/李锡恩, 大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Z1
37. 明代云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地域差异——兼论各类学校与人才数量的相关关系/林涓, 思想战线/2000. 3
38. 明代汉文化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影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张丽剑,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3
39. 杨慎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情结/李朝正,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12
40. 李贽宦滇事迹考述/郝晓莉, 云南社会科学/2000. S1
41. 李贽与姚安/薛丽云,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5
42. “李贽与云南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和勇, 云南社会科学/2002. 1
43. 明清时期云南戏剧文学略论/段炳昌, 民族艺术研究/2002. 2
44. 明季清初滇南诗僧苍雪论略/李舜臣,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1
45. 寄情大理山水状元随遇而安——明代四川著名学者杨慎在浪穹/杨玉藩, 大理文化/2003. 2
46.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林超民,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3
47. 情深意笃, 亦师亦友——杨慎与张含的交游及其影响/姜晓霞, 昆明

-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1
48. 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陆韧,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1
 49. 论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影晌/谭莲秀、李建军,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 4
 50. 张含与云南文学/姜晓霞,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1
 51. 张含年谱/姜晓霞, 保山师专学报/2008. 1
 52. 明代云南府隐逸诗人及“平居陈郭”考/孙秋克, 思想战线/2008. 4
 53. 论明代云南儒学教育的影响/张媚玲,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5
 54. 明代宦滇作家群考论/孙秋克,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6
 55. 明代云南府宦游作家行实创作考论/孙秋克, 昆明学院学报/2009. 1
 56. 张含文学交游考/姜晓霞, 昆明学院学报/2009. 5

(四) 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2008年)

1. 传播与交融——明清时期云南学校教育及其人才的地理分布/侯峰,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
2. 论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的心性说/李薇,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3. 杨慎滴滇及其对云南文化的贡献/戚红斌,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4. 杨慎诗词与云南旅游文化/冯玉华,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5. 论兰茂在云南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张克梅,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昆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系2007级学生张诗怡、潘少容辑录)